渭北革命根据地史

Weibei Geming Genjudi Shi

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编
王　继／主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简介

王　继，1948年2月出生于三原北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人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区域现代化模式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

《渭北革命根据地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景宏			
副 主 任	张　肃	郑富超	郭宝彦	王　继
委　　员	张宏立	刘　峰	何　锐	宁晓春
	乔恩平	王　健	汪德华	王　苗
	王鹏坤	常鸣龙	段志华	徐建刚
	程　宁	李鹏科	刁振辉	郝东峰
	雷彬献	孙朝晖	雷永利	李　鹏

主　　编	王　继			
副 主 编	徐建刚			
撰　　稿	徐建刚	刘　磊	乔怡红	李永斌
	常敬之			
特邀审稿	姚文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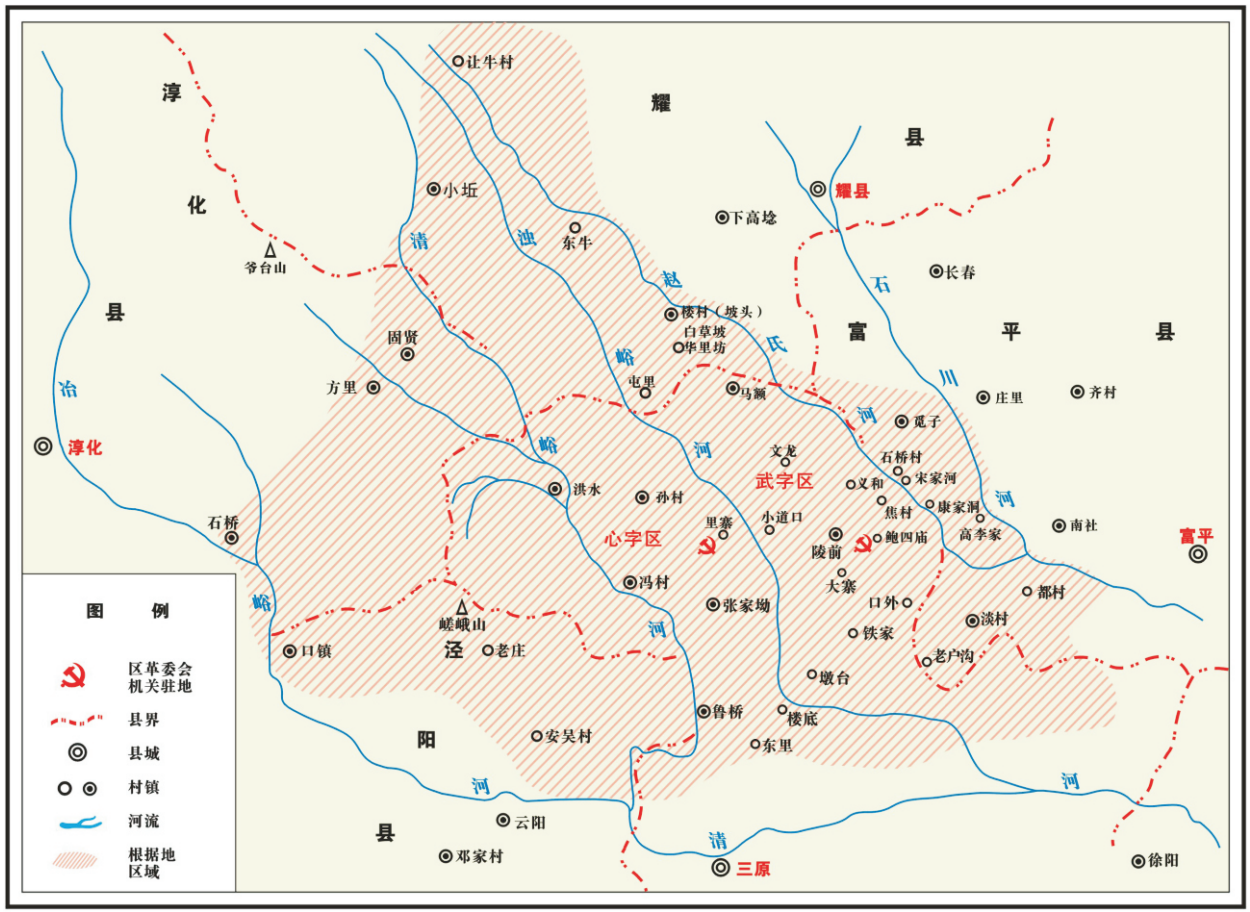
共产党在西北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战略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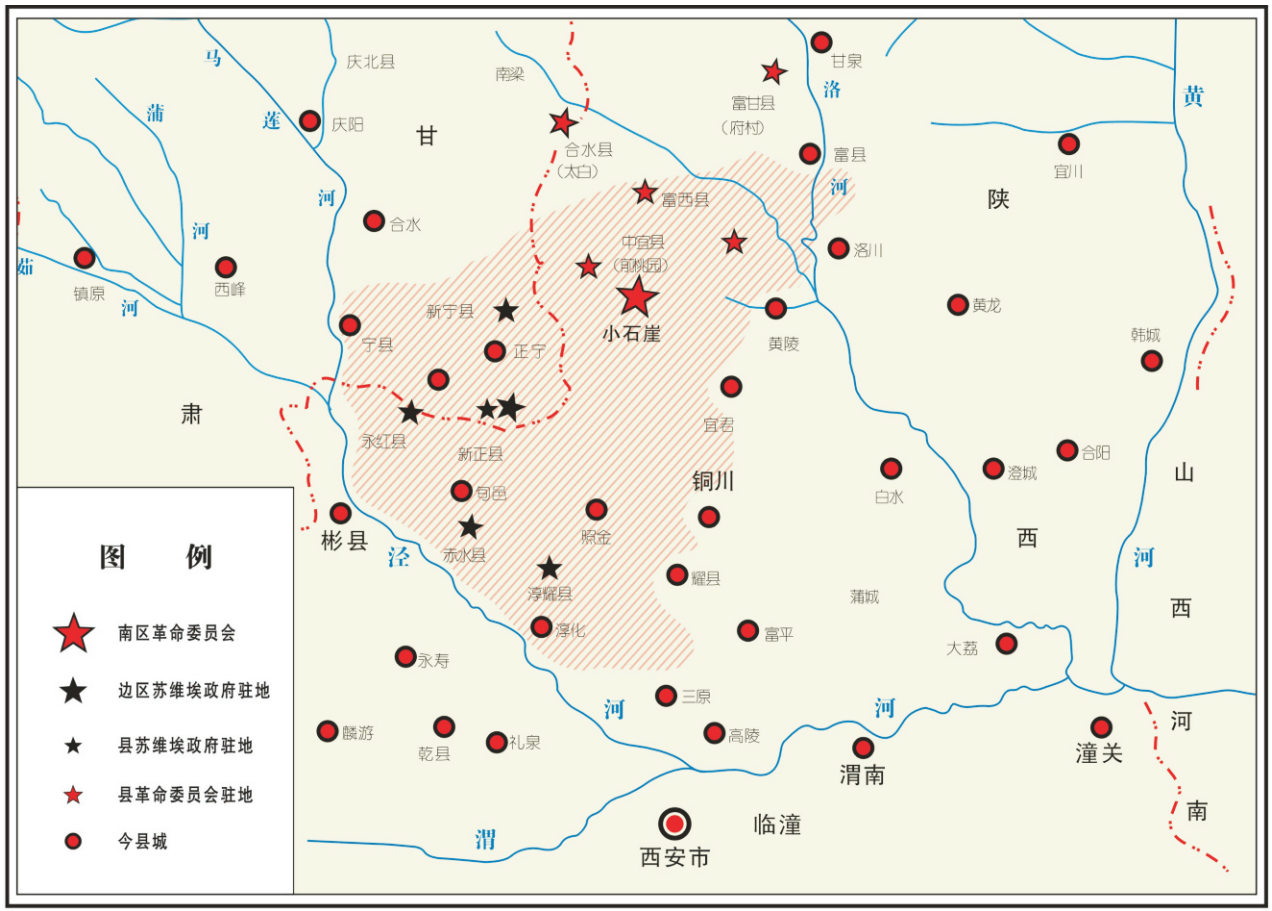


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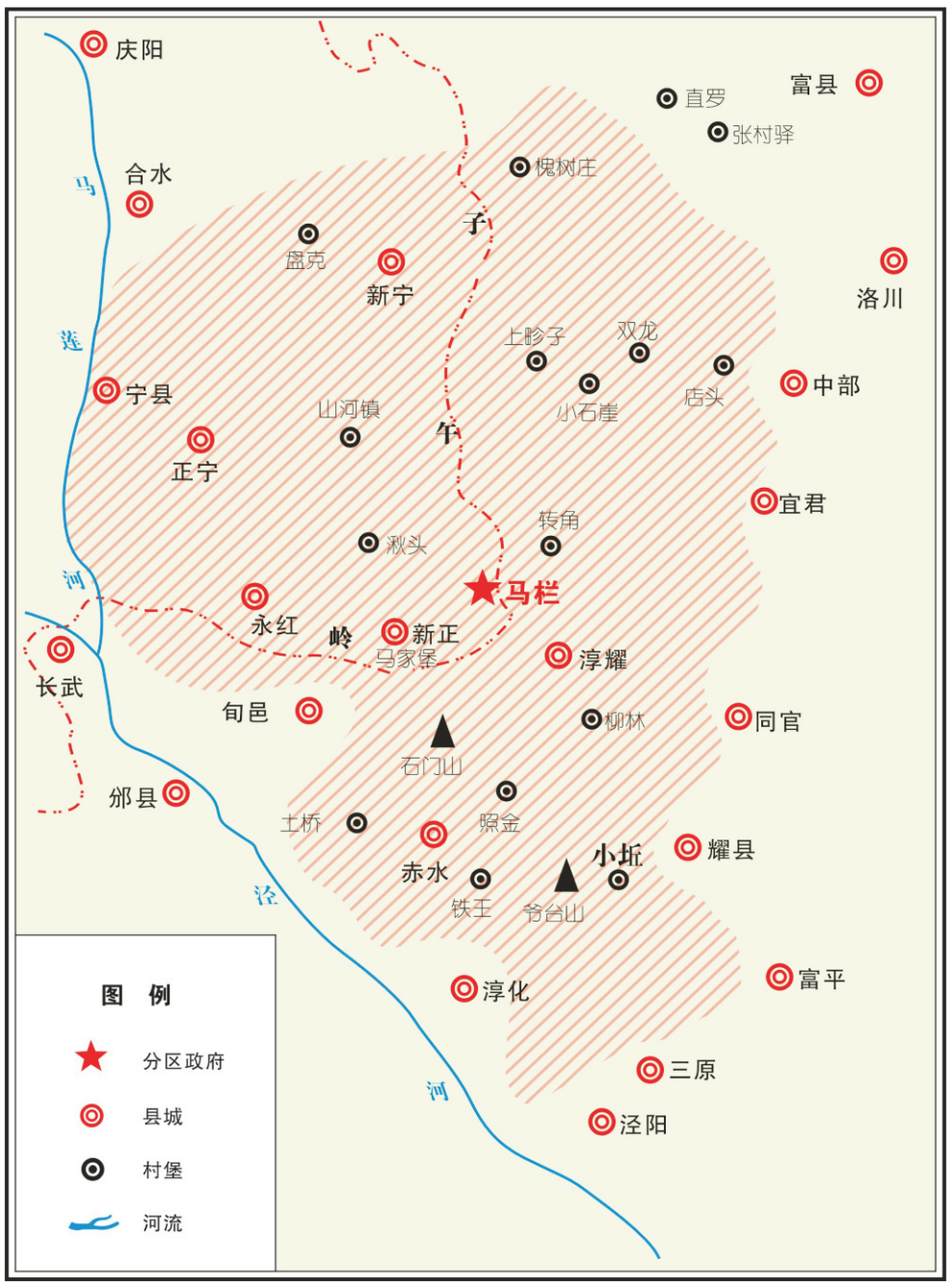
渭北革命根据地区域示意图



陕甘边根据地南区区域示意图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区域示意图



关于渭北苏区[①]（代序）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

习仲勋

渭北苏区处于三原北三十华里的武字区和心字区。大革命时期乔国桢[②]同志在这一地区作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为了援助渭华暴动[③]，这里发生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隐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其间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斗争，杀土豪反劣绅。是个“半红半白”[④]的环境。另一方面群众在斗争中也遭到国

①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14—16页。这是习仲勋同志在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的一部分。

② 乔国桢（1907～1945），陕西佳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陕后在关中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后曾任中共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多次被捕，越狱后在去苏联治病途中，被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投入监狱，1945年逝世。

③ 渭华暴动，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南县东南原、华县西南原一带的农民和由中共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陕军一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府。起义军民与冯玉祥部及反动民团激战多次，在暴动地区坚持武装割据近两个月。起义失败后，唐澍等英勇牺牲。

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地方政权都不能完全控制的地区，群众称为“半红半白”。

民党反对派的捕杀镇压。这就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这是渭北苏区的准备时期。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十月革命节[①]时，是渭北苏区的成立和失败的时期。一九三二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关中二十四县农民围城斗争。这时红二十六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也开到渭北苏区。成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及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但有雇农、中农、贫农，也有富农，而妇女联合会里的中农、富农家庭妇女更是屡见不鲜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②]、程建文[③]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从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是渭北苏区的最后时期，亦即恢复渭北苏区与成立红四团的时期。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

---

① 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苦农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举行的一次武装革命。因其发生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故名十月革命，11月7日为十月革命节。

② 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长安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30年10月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渭北特委书记。后叛变。

③ 程建文，陕西三原人。1932年10月后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后叛变。

后，我与李豫章[①]同志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对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②]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③]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④]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⑤]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⑥]来过一次，强调分配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

① 李豫章，陕西渭南人。1932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渭南市委员会委员、常委。

② 照金，是位于陕西耀县西北 50 多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照金为中心区域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陇东的南梁地区。

③ 苗家祥（1908～1933），陕西泾阳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泾阳石桥镇农民协会副主席、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1933 年 9 月被国民党杀害。

④ 张仲良（1907～1983），陕西耀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一团政委、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关中分区专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⑤ 张秀山，1911 年生，陕西神木人。1929 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东北支队政委、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⑥ 杜衡，陕西佳县人。曾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二部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1933 年 7 月在西安被捕叛变。

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被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目 录

关于渭北苏区(代序)——习仲勋 ·001

绪论 ·001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坐标 ·001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制变迁 ·004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与三原的互动关系 ·010

四、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15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渭北地区反清反军阀的斗争 ·021

第一节 渭北地区的社会状况 ·021

一、经济凋敝,文化衰落 ·021

二、政局混乱,民不聊生 ·022

三、军阀混战,匪患丛生 ·023

第二节 渭北地区早期民主思潮的涌动 ·024

一、维新和反清思想在渭北地区的早期传播 ·024

二、三原宏道书院与中国同盟会 ·029

三、陕西辛亥革命与渭北各县的光复 ·035
第三节 陕西靖国军在渭北的活动及其影响 ·037
一、张义安领导的三原起义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 ·037
二、反对军阀陈树藩的艰苦斗争与靖国军的分裂 ·041
三、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期对渭北革命形势的积极影响 ·05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传播与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 ·06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三原的反响 ·061
一、新文化运动在三原的兴起 ·061
二、五四运动传入三原 ·063
三、三原对五四运动的积极响应 ·06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传播 ·071
一、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三原的活动 ·071
二、共进社三原分社的成立 ·075
三、共进社三原分社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078
第三节 中共三原党团组织的建立 ·080
一、青年团组织在三原的建立和发展 ·080
二、渭北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建立 ·085
三、中共三原地委的组建与发展 ·088
第四节 大革命时期三原的国民运动和反帝斗争 ·089
一、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与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090

二、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学生运动 ·091
三、响应国民会议运动与反军阀斗争 ·101
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109
五、声援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109
六、三原妇女运动 ·112

第三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准备与初创 ·119

第一节 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 ·119
一、渭北地区早期的农民运动 ·119
二、农民协会在三原的蓬勃发展 ·128
三、渭北地区早期农民运动的特点 ·134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形势与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在渭北的贯彻 ·136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格局 ·136
二、三原革命转入低潮 ·137
三、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与工作重心的转移 ·142
四、渭北地区的“交农”斗争 ·142
五、中共组织在渭北的恢复与发展 ·146
第三节 渭北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 ·148
一、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武装围城起义 ·148
二、三原农民游击队的成立 ·157
三、三原武字区与富平淡村的筹赈运动 ·158
四、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游击战争 ·162
五、贯彻省委指示与兵运工作 ·165

第四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171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71

一、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71

二、武装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78

三、政权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187

四、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3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194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分粮斗争　·194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分地斗争　·198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202

一、反动民团“进剿”武字区　·202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当局连续“围剿”　·203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庆祝十月革命节再度遭敌“围剿”　·204

四、“左”倾错误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206

第五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与战略北移　·209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　·209

一、贾拓夫巡视渭北及渭北特委的恢复　·209

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成立与各级组织的恢复　·210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武装组织的重建及其活动　·212

第二节　红四团北上照金　·216

一、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　·216

二、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　·227

三、耀县起义 ·230
四、耀县游击队的建立 ·236
五、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敌“围剿” ·237
六、红四团转战照金苏区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 ·239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 ·245
一、包家寨会议与三路游击区的建立 ·245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与陕甘边南部苏区的创建 ·249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253
第六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259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日救国运动 ·259
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259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日宣传活动 ·261
三、渭北抗日群团组织的建立与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展 ·264
四、九一八事变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变化 ·267
第二节 西安事变与三原时局 ·271
一、三原在西安事变中的战略地位 ·271
二、彭德怀率红军在三原周边布防稳定西北局势 ·275
三、周恩来与杨虎城在三原会晤化解危机 ·284
第三节 红军在渭北改编和出师抗日 ·290
一、红军在渭北改编为八路军 ·290

二、八路军在渭北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294
三、渭北地区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297
第四节 抗战初期渭北中共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民众团体的建立 ·300
一、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恢复 ·300
二、抗战初期渭北党组织的发展演进 ·301
三、抗日民众团体的建立与救亡活动 ·307
第五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国高潮 ·319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农民连 ·319
二、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抗日活动 ·321
三、渭北青年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324
四、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 ·331
五、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三原组织的演变 ·334
六、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渭北国统区中共组织惨遭破坏 ·341
七、三原中共组织实行异地领导秘密恢复活动 ·346
第七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在解放战争中 ·349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中共组织在三原的恢复重建 ·349
一、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349
二、中共泾原工委的成立 ·353
三、中共三原县工委的成立 ·353
四、渭北游击总队的建立 ·354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自卫反击战 ·357

一、解放战争初期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 ·357
二、陵前起义 ·358
三、解放战争初期渭北游击总队的主要战斗 ·362
第三节 中共渭北工委的主要工作及武装力量的发展 ·367
一、渭北游击总队各支队的发展壮大 ·367
二、党群工作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374
三、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 ·380
第四节 渭北游击总队与关中各县的解放 ·383
一、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 ·383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在陕中战役中的作用 ·385
三、三原解放之前的反攻准备工作 ·391
四、渭北各县的解放 ·393
第五节 三原人民政权的建立 ·398
一、中共三原县委的成立 ·398
二、三原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399
三、中共三原地委的成立 ·404
四、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建设 ·407
第八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与深刻启示 ·415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 ·415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415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的有益尝试 ·424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割据有力打击了国民党
当局的统治 ·429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巩固的
重要依托 ·436
五、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改编和八路军出师
抗日的基地 ·456
第二节 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458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坚持以强大的农民运动
为基础 ·458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
命的有机结合 ·461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把中共组织建设与政权建设
同步推进 ·463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民众运动与统战工作的
协调开展 ·465
五、许多毁家纾难的满门忠烈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中发挥了重要的榜样作用 ·469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启示 ·486
一、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
偏远山区 ·486
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必须依赖于强大的红军力量 ·488
三、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必须不断排除“左”倾
错误的干扰 ·491

四、革命根据地内部必须建立起一个团结稳固的
领导集体 ·495
五、革命根据地必须争取外部力量的广泛支持 ·498

第九章 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加快老区建设 ·501

第一节 渭北革命精神的内涵 ·501
一、忠诚于党、全心为民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根基 ·502
二、坚守信念、敢闯新路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核心 ·504
三、百折不挠、无私奉献是渭北革命精神的要义 ·506
四、顾全大局、团结奋斗是渭北革命精神的特质 ·509
第二节 渭北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511
一、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511
二、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鲜活教材 ·516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宝贵资源 ·519
四、共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521
第三节 三原革命老区的开发与建设 ·523
一、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的关怀和支持 ·523
二、三原革命老区的建设成就 ·535
三、三原革命老区的发展蓝图 ·539

主要参考书目 ·546
后记 ·554

绪 论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成功践行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模式。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战略基地，是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坐标

（一）自然地理位置

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今分属于咸阳市、铜川市和渭南市。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即现在的三原县陵前镇、马额镇）和心字区（即现在的三原县新兴镇、嵯峨镇）为中心，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南接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北至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的华里

坊、楼村（坡头）、东牛、让牛村、小丘等地；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东西长 30 公里，南北宽 25 公里，总面积约 750 平方公里，4 万多人口。

1933 年 8 月下旬，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开辟了陕甘边南区。其地域包括今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中部（今黄陵县）、富县、甘泉、洛川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人口 10 余万。陕甘边南区包括了原渭北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心区域在中部县小石崖到耀县照金一带，正是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北部边沿。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在原陕甘边南区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中特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关中分区所辖区域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的延属分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总面积 7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关中分区是拱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南大门，在抗日救亡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安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区域环境条件

以三原、富平、泾阳、耀县、淳化为中心的渭北地区，自然形态多样，地面黄土肥厚，宜耕宜林，是陕西粮、油、果、畜等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煤炭、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是亘古通今的军事给养区，即使大灾之年，也能为渭北革命提供基本的物资保障。

这一地区，地貌呈平原、台原和山地分布，山川原交错，沟梁峁纵横，地形地貌独特。境内的嵯峨山、爷台山高大险峻，坡陡沟

深，具有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客观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地质结构和类型多样的地貌，既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天然屏障，也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开辟的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和以后所归属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地处渭北高原和桥山山脉，山大谷深，沟壑纵横，峰峦起伏，连绵不断，与绵延400公里的子午岭林区浑然相接，大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形成了天然屏障，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利于机动作战，开展大范围的游击战争。

此外，渭北高原和桥山各处山区都有可耕地利用，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空间。这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之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然选择。

（三）历史人文状况

渭北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蔚盛，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开辟华夏文明的主要活动区域，孕育出了秦汉文明和盛唐文明。渭北地区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汇融合的前沿地带，处于游牧胡人与农耕汉人争夺的地域分界线上，自古就是政治、军事、文化的敏感区域。

千百年来，受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激荡与交融，以三原、耀县、泾阳、富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催生出了多元共生的人文神韵。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和近现代史迹在渭北不胜枚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秦文化、汉唐文化、民俗文化等在这里交相

辉映。

从秦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渭北烽火到复兴征程，以三原、耀县、泾阳、富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历史名人辈出，繁如群星璀璨。他们当中既有治国兴邦的贤臣名相，又有开疆拓土的奇将军魂；既有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吏，又有披肝沥胆的伟烈将士；既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又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秦统一六国的大将王翦、王贲，隋唐雄才名将李靖，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朱佛光，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胡景翼、于右任等为其杰出代表。

民国初期的渭北地区，曾是陕西革命党人武装讨袁（世凯）逐陆（建章）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护法运动兴起后，渭北地区又成为陕西靖国军总部的所在地和主要辖区。当地民众为护法倒陈（树藩）运动的胜利、为击退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厚的历史文化，众多的历史名人，悠久的革命传统，始终启迪着渭北人民的心智，深刻地影响着渭北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为渭北地区始终走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潮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制变迁

渭北革命根据地始创于 1928 年 2 月，形成于 1931 年 5 月；1932 年，根据地全面发展壮大；1933 年 8 月，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严重受挫，实施战略北移，开拓新的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初创、形成和发展到战略北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

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组织形态和斗争区域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迁。

（一）隶属领导关系的多次变更

从1928年2月到1931年4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早在大革命时期，直属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和隶属于中共豫陕区委领导的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相继成立。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中共三原特支改由中共西安地委领导，下辖中共岐山小组、云阳小组和中共高陵支部。1927年3月，中共三原特支改为中共三原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陵等县党的组织。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泾阳地委改为中共泾阳区委，共青团三原地委和共青团泾阳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这一时期，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地区办事处直接领导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后，隶属当地中共组织领导，成为农民运动的主体。大革命失败后，渭北各地农民协会和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鉴于三原是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区域，遂于9月正式成立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黄子文任书记，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这一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武字区及武字区与富平、耀县的交界地带为主要斗争区域。1930年7月，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后，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从1931年5月到1933年7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全

面发展时期。1931 年 5 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三原特支，恢复成立中共武字区委，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2 年 7 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后，中共武字区委归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组织领导原（三原）富（富平）耀（耀县）广大劳苦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9 月 22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10 月，为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加快创建渭北苏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机关均设在三原武字区，三原、蒲城、耀县县委和白水县刘家卓区委改属中共渭北特委领导，共青团武字区委、心字区委成立后隶属共青团渭北特委领导。1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撤销渭北特委，组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辖耀县、富平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此后，渭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渭北游击队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1933 年 3 月，陕西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密切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根据地各武装力量编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总指挥部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7 月中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李杰夫、焦维炽、贾拓夫、汪锋、杜衡（后叛变）、李冲宵、刘映胜（杨声）、赵伯平、金天华等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根据地的割据区域拓展到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的交界地区和高陵县、蒲城县、白水县的部

分地区。

1933 年 8 月，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疯狂“围剿”而严重受挫，红四团战略北移照金地区。8 月 14 日，红四团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一并由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红四团成为红二团失败后陕甘边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 年 8 月至 1935 年 11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先后隶属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领导。1933 年 11 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根据照金苏区失陷后的形势变化，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四团改编为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骑兵团下辖两个连，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编入红三团。骑兵团仍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5 月，因中共陕甘边特委不健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特委职权。1934 年 5 月 28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恢复成立，红四十二师及其下辖的骑兵团、红三团等革命武装改属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军委领导。同时，骑兵团政委杨森改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骑兵团一直在陕甘一带开展游击战，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中共三原组织的形制演进

红四团转移照金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渭北革命根据地，数百名共产党员、游击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残酷杀害，党政组织被严重破坏，革命活动转入“荫蔽”状态。此后一个

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三原县的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恢复、发展，经历了多次变更和调整。

1935 年 6 月，渭北苏区共产党员周芝轩、孙一君、谈国帆、黄子祥、唐玉怀（唐亦民）等组建了中共渭北工委，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8 月，渭北游击队恢复成立，后改编为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十九支队，隶属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领导。

1936 年 12 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建立，中共渭北工委改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渭北工委先后下辖三原、蒲城、临潼、富平等县的 4 个中共支部和 1 个特支。1937 年 3 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渭北工委撤销，中共三原县委成立；4 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以党的基础工作较好的县为中心，领导周围各县党的工作”的决定，中共三原县委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设在武字区，下辖高陵、临潼、交口、富平及三原武字、西阳区委。

1938 年 4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1939 年 9 月，中共三原县委又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辖高陵、泾阳县委和三原县的 5 个区委。在三原党组织的恢复发展过程中，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从未停息，绵延不断。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与陕甘边南区的开辟

1933 年 8 月下旬，渭北革命根据地大批地方干部转战照金苏区。11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分别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

照金为中心，成立三路游击队，建立三个游击区（根据地）。

1934 年 5 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设立三路地区办事处，代行政府职能，主任黄子文（黄成章）。黄子文、金理科、李尚勤等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正宁、宁县等地发动农民运动，成立赤卫军，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9 月，陕甘边特委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并成立了以张邦英任书记的陕甘边南区党委，以黄子文任主席的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以张邦英兼任政委的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南区党委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隶属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隶属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期间，张邦英、黄子文等在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赤水、淳耀、新正、新宁、永红、中宜、富西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党的领导机关。

1935 年 10 月，隶属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南区根据地全面形成。到 1935 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彬县、淳化、中部、富县、甘泉、洛川、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

1936 年 1 月，以陕甘边南区为基础建立关中特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根据地南区是据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组成部分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历经长征到达陕北。1935 年 11 月 3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成立。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归属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1936 年 1 月，陕甘边南区改为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6 年 1 月至 5 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6 年 5 月至 12 月，隶属陕北省委领导；1936 年 12 月至 1937 年 3 月，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7 年 4 月，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关中特区归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县，面积 75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1937 年 10 月，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时淳耀县包括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至此，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区域归属陕甘宁边区。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 4 个县和双龙中心区。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包括的三原、淳化、耀县部分地区为关中分区管辖范围，故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关中分区的组成部分。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与三原的互动关系

三原县建置悠久，秦汉以来即为京畿屏藩之地，自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置三原县，先后四易县名，五迁城治，迄今已 1560 多年。

秦代，三原先属北地郡[①]，后属雍。汉初属上河郡，惠帝四年（前191）置池阳县，改属左冯翊[②]。前秦苻坚皇始二年（352）设三原护军[③]。北魏罢护军，置三原县，属北地郡[④]；孝明帝改三原县为建忠郡，治所在永安城[⑤]，属北雍州[⑥]。永安元年（528），县治迁至清水谷[⑦]。北周时期，先废建忠郡，后撤池阳县，仍为三原县，改属冯翊郡。隋代，三原县先隶雍州，后属京兆[⑧]，县治迁至永安镇（今富平县淡村）。唐武德四年（621），改三原县为池阳县，治所迁至今三原县城东北三十里刘家沟（今三原西阳境内）。武德六年（623），析池阳县为二，南北分治[⑨]，华池县居北，治所在永安镇，三原县在南，治所在刘家沟，皆隶北泉州[⑩]。太宗贞观元年（627），撤北泉州，并华池县为三原县，治所仍在刘家沟，隶雍州。五代梁朝，三原县改属大安府[⑪]。五代后唐以后至元初，三原县隶属耀州[⑫]。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县治迁至龙桥

① 北地郡：秦置，统甘肃旧宁夏、庆阳、平凉、固原、泾州诸府州地。治所在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

② 左冯翊：官名兼行政区名，汉代三辅之一。汉时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称三辅，即把京师附近地区归三个地方官分别管理。

③ 三原护军：幕府县治所，约在今马额镇以北耀州区境内。

④ 北地郡：汉永初五年（111），汉安帝刘祜下诏将边塞的北地、安定、上郡、陇西四个郡迁往内地，北地郡迁至池阳（今陕西三原县北）。顺帝永建四年（129），还治旧土。永和六年（141），又徙居冯翊郡境；后废。

⑤ 永安城：治所在今陕西淳化县小豆村。

⑥ 北雍州，北魏永安元年（528）分雍州置，治所在永安城。辖境相当今陕西铜川、宜君、耀县、淳化、三原、富平等市县地。

⑦ 清水谷：在今三原县城西北约15公里的杨杜村一带。

⑧ 京兆：地名，古代的二级行政单位，所辖范围相当于陕西西安及其附近所属地区。

⑨ 即分治三原县，华池县与三原县并列，南北分治。华池县治在北，三原县治在南。

⑩ 北泉州：治所在今泾阳县云阳镇，武德元年置。

⑪ 大安府：后梁乾化二年（912），改京兆府为大安府，隶属关内道永平军。

⑫ 耀州：后唐同光元年（923），耀州辖华原、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六县。即铜川市耀州区。

镇，即今三原县城，至今七百余年。明代，三原县先属耀州，弘治三年（1490）后，改属西安府。清承明制，县名、隶属均无变化。

近代以来，特别是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革故鼎新的社会环境，对三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尽管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救国强国依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政治上反专制、反复辟，维护民主共和；经济上大办新式工业，进行实业救国；文化上创办乡村学校，实行教育救国；思想上提倡民主、科学，实行科学救国。正是由于军阀内部各派之间相互制衡，故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思想言论趋于活跃，出现了思想大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和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原在明清时期就是陕西文化教育的昌盛发达之地，亦是渭北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繁庶之区。特别是陕西靖国军长期驻扎在三原，开展反军阀斗争，支持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创办学校和进步刊物，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使三原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渭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至于后来成为渭北地区的革命中心。

辛亥革命后，1917 年三原行政区划改制，全县分为“整、军、肃、武、同、心、合、力”[①] 8 个区，68 个分团。渭北革命根据地

① 整字区，含今城关镇大部；军字区，含今鲁桥镇大部，新兴镇、张坳乡、陵前镇及城关镇新庄个别村；肃字区，含今西阳镇全部，城关镇新庄少部分，大程镇和陵前镇个别村；武字区，含今陵前镇大部分，马额镇全部，新兴镇小部分，西阳镇个别村；同字区，含今大程镇、徐木乡大部分；心字区，含今新兴镇大部，嵯峨镇全部，陵前镇个别村；合字区，含今安乐、高渠、渠岸镇全部；力字区，含今陂西镇、独李镇全部。

就形成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和心字区。按理，渭北革命根据地与三原县之间仅属于行政隶属关系。然而，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仔细考察后，便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有机互动关系。

（一）不断高涨的三原革命形势，激励和鼓舞了武字区的农民运动

三原县是陕西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地区，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所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很早就在三原展开，特别是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渭北地区影响很大。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办事处就设在三原县城，加之共产党又在三原开办了农民运动培训机构，因而很快就在三原县城周边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革命运动的发展直接唤醒了武字区广大农民，在接下来的“交农”运动和之后的“武装围城”斗争中，武字区的农民便成为骨干和主力，而农民运动的开展正是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基础。

（二）繁荣发达的三原文化教育，为武字区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近代以来，三原是渭北地区文化教育中心，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三原县中以及甲种工业学校等，都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为渭北各县不仅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黄子文就是 1923 至 1925 年在三原县中求学时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参加进步学

生运动，并由此踏上革命道路的。同样，习仲勋也是在省立第三师范求学时得到革命的锻炼和提高。还有后来始终在渭北根据地负责坚持斗争的孙一君也是这一时期在渭北中学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共组织的。就连最早请乔国桢在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的唐玉怀、郭明效也是间接接受了三原的培养教育，他俩先后在富平立诚学校读书，该校校长、共产党员严木三就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严木三不仅给他们上课，而且培养介绍他们加入了共青团。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骨干都或多或少的在三原县接受过教育培养。

（三）三原党团组织直接指挥和领导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隶属关系尽管几经变迁，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三原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甚至在许多时段三原党团组织机构就设立在武字区。尤其是1932年11月中旬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因遭敌“围剿”处于低潮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具体承担了恢复根据地、反攻武字区的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重组了渭北游击队，恢复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而且领导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之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为以后的战略北移准备了条件。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增强了三原人民的革命信心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三原的革命活

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也极为艰难，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只能“荫蔽”身份等待时机。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轰轰烈烈的“三分五抗”和武装斗争，激发了三原人民继续革命的极大热情。一批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鼓舞下又在三原掀起了反日救国的宣传高潮。他们集会游行，上街讲演，积极动员三原人民为抗日救国出力。这期间，三原的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党团队伍也不断壮大。

（五）渭北革命根据地在逆境中顽强生存，鼓舞了三原人民的革命斗志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强大的不断“围剿”中，许多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牺牲，许多群众和积极分子遭到屠杀与关押，财物被掠空，家园被烧毁，但是仍然坚持斗争，在逆境中顽强生存。武字区距三原县城仅十多公里，那里发生的一切，三原有觉悟的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尽管有反动军警的严密监控和封锁，但人民群众对渭北根据地的关切和支持始终没有中断。三原地下党团组织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不断把武器弹药、征集到的钱粮物资，想方设法转送到武字区。1935 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三原中共组织开辟了渭北根据地的两条秘密交通线，向陕北输送情报、药品等物资以及出入根据地的人员都是经过秘密交通线转送的。

四、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渭北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渭北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追求民主解放的光辉斗争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

艰难曲折的顽强抗争史。在渭北革命斗争中，众多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经历了磨难与创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铭记着那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曾遭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期间，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以杜衡、李杰夫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执行者过高地估计渭北革命形势，迷信城市中心论，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急于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建成大片根据地，对武装斗争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任务、要求和主张，致使根据地接连遭敌攻击受挫；他们采取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公开举行红四团成立授旗典礼、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过分暴露革命力量，引发了敌人对根据地的残酷“围剿”；在敌人“围剿”时，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他们不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变，造成大批革命同志被捕、牺牲。“左”倾路线执行者思想激进，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独断专行，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条政策，排斥异己，给抵制“左”倾错误的优秀干部带来了严重伤害。“左”倾错误的横行是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严重受挫、战略北移的主要原因。

1935 年秋，陕北错误肃反期间，渭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黄子文、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王柏栋、张策等都曾被错误关押；黄子文之妻李盛云、妻侄女李金芳，黄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也被捕

押，后黄培兰和李金芳被残忍活埋，她们都是17岁参加革命的学生。金理科、宋子琦等领导人也被错误活埋。10月中旬，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习仲勋、黄子文、张秀山等人才被释放。陕北“肃反”扩大化，是“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等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在这次罪恶的“肃反”中，渭北根据地众多干部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许多忠实于党的革命同志蒙受冤屈。

（二）新中国成立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干部群众多次蒙受不白之冤

20世纪50年代初，受“高饶事件”牵连，西北革命史、陕甘边革命史成为研究禁区。其间，渭北根据地史也被严密封闭，既不准研究，更不准宣传。曾经在三原县博物馆刚刚开始举办的武字区革命根据地史展览，被当时的陕西省委领导下令立刻关闭，而且追查革命根据地史编写人员的政治责任，致使许多在展览中征集到的珍贵革命文物和渭北根据地亲历者编写的渭北革命史稿损毁丢失，对宣传、研究渭北革命根据地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反党集团”而“隔离审查”，并被下放河南劳动“监护”。从此，渭北革命根据地又被挂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线上遭到错误批判。习仲勋的家乡富平县淡村，习仲勋闹革命时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三原县武字区都被打成“反党老巢”，当年很多与习仲勋一起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开

展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革命和群众都受到株连，遭到批斗和迫害。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为了编写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曾经深入到渭北根据地，在许多老红军、游击队员和武字区群众中进行过调查访问。结果凡是接受过作者采访的人均受到重点牵连，强逼他们交代与“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关系，强迫他们揭发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罪行”。不仅如此，还清算历史旧账，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曾任渭北革命根据地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四团团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的黄子祥被以所谓“长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为反党分子笼络人心”、“受习仲勋反党集团多方庇护”等问题定为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习仲勋在遭到诬陷后被立案审查长达 16 年之久，直到 1978 年才复出；1979 年 3 月，黄子祥年近八旬时才被恢复党籍和公职待遇。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渭北革命根据地也遭到变本加厉的诬陷，被诬蔑为“黑窝子”，武字区地下党被定为“叛徒”、“狐群狗党”、“特务集体”。渭北革命根据地武字区的黄子祥、唐玉怀、肖德印、孙志正等 64 名共产党员中，11 人被定为特务，14 人被定为叛徒，3 人被定为土匪，5 人被定为反党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22 人被诽谤为敌伪乡保人员。[①]他们当中，被批斗迫害者无人幸免，很多人被迫害致残、自杀或关进监狱，且恶果殃及几代人，亲属子女不准参军，不

①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原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05 页。

准上学，不准当工人，不能入党入团。当年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黄子祥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唐玉怀被诬陷迫害致死。渭北革命根据地及其众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多次蒙受的不白之冤，成为渭北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

（三）历史使命的召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先后平反和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后受到污蔑和不公正评价的渭北革命根据地也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受到迫害的老党员、老同志也得到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渭北革命根据地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省委、省政府和三原县委、县政府在原武字区修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举行了缅怀纪念活动。但是，多年来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仍然不够全面、准确，宣传力度也不够大，与其他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推介相比明显滞后，其革命传统教育效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系统研究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深切缅怀渭北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渭北烽火光耀史册，红色记忆咏唱千秋。为了重新唤起渭北革命记忆，永远铭记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不朽贡献，大力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在血与火中铸就的渭

北革命精神，以期为实现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和宗旨。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渭北地区反清反军阀的斗争

第一节　渭北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 经济凋敝， 文化衰落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帷幕。陕西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并实现光复的省份之一。陕西在这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以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同盟会和以哥老会为核心的新军相联合，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省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陕西能最先响应，与陕西的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7 世纪之后，关中渭北地区不断遭到天灾人祸之乱。明崇祯四年（1631），宜君赵和尚等农民起义军攻打三原，三原人焦源溥、来复和三原县令张缙彦等相聚固守县城，与义军对抗。崇祯八年（1635），李自成率义军约 7 万人攻入关中，西安各府尽归降义军，

唯三原城坚固未下。崇祯十年（1637）正月，李自成和过天星、蝎子块（皆诨名）率兵再次攻打三原，仍坚守未克，唯乡里村寨备受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清末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在太平军和捻军影响下，首在华州（今华州区）举义，烽火遍及渭河两岸。三原、泾阳等地受蹂躏尤烈，三原“除东里和蔡王二堡外，尽遭兵燹”。全县人口由清咸丰时期的 16 万人，光绪时期锐减至 4 万余人。

辛亥革命前后，渭北地区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土地荒芜，人口流离。尤其是 1928 年至 1930 年在西北地区发生大旱的同时，风灾、雹灾、虫灾、水灾、火灾、瘟疫、兵匪之灾相继不绝，灾情一直持续到 1932 年。关中地区“首先是三原农村经济危机，经过了豪绅、地主、富农，国民党各种方式的搜刮与剥削，经过了连年春荒与夏收的低微，农村经济无以复加。一般贫农、中农家庭都陷于断炊的地步”。[①] 频繁的灾祸不但使人口骤减，经济社会也是每况愈下，给关中及渭北地区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造成重创，小农经济迅速没落，其规模之大，危害之惨烈，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经济状况的严重衰落，使社会难以承受。

二、 政局混乱， 民不聊生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与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在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27 页，贾拓夫《关于三原形势的报告》。

军阀手中，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陈树藩主政陕西时，渭北地区仍处在封建帝制、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陕西地方政权更迭 10 余次，军政长官“你方唱罢我登台”，20 多任官僚如同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但半封建军阀专制本质未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严重失控。在这种兵荒马乱，灾害频发的社会环境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据《三原县志》载，1923 年至 1931 年，全县人口由 11.7 万人锐减至 6 万余人。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

三、 军阀混战， 匪患丛生

1912 年 4 月至 1916 年 6 月，为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全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势力勃兴，军阀混战，匪患丛生。1914 年初，河南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第七师入陕，与陕西巡按使吕调之狼狈为奸，极力排除异己，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人民革命活动。1915 年 12 月 31 日，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声讨。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劳苦大众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

关中及渭北地区，由于政局动荡，经济破败，灾害频发，大量生活无着的贫民被推向当兵吃饷或为匪行劫的生涯，抢案层出，剪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5 页。

径时闻，士民不安，商旅裹足。关中强匪李水娃、韩世昌、王友邦等，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无所不为，百姓叫苦连天，其余小股土匪更是多如牛毛，防不胜防，而为政当局却视而不见、充耳莫闻。

天灾人祸，使渭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变社会、改变命运成为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

第二节　渭北地区早期民主思潮的涌动

一、 维新和反清思想在渭北地区的早期传播

在晚清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据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是维新变法思想。经过 1899 年短暂沉寂之后，1900 年维新反清思潮再度兴起，到 1903 年后才逐渐衰落。

（一）渭北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近代中国陷入沉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腐朽的清王朝屈服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淫威，听任宰割，彻底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败政府。

1862 年，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余部蓝大顺、邓天王、蔡昌龄、郭刀刀、曹灿章等先后进入陕西，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高涨，起义军进逼省城西安，攻克和占领渭南等地，摧毁清王朝地方封建政

权，惩办官吏和地主豪绅，消灭大批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太平军入陕，极大鼓舞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点燃了回民起义的烽火，策应了东南太平天国北伐。太平天国运动裹挟着西方基督教带有平等观念的原始教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及资产阶级某种新色彩的狂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而陕西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的回民反清大起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国家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

1895 年 5 月 2 日，北京发生了历史上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实行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挽救民族危机。在上书题名的603 人中，就有陕籍举人常鼎馨等55 人。1898 年1 月，咸阳籍御史宋伯鲁及总署章京、李岳瑞成立关西学会（也称陕学会）。4 月，康有为等又将陕学会、粤学会、闽学会合并扩大成立保国会，在会 186 人中，陕籍人士 34 人，占到 18%。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改良道路难以行通，但从另一方面激发了反清革命思潮在关中的兴起。如果说泾阳各书院及刘古愚师生开维新先河，那么以三原宏道书院及朱佛光师生则恰承其后，为反清革命思想在陕西的孕育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0 年夏，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三原、渭南、延安、宁强等地群众开展反教会斗争。1901 年后，陕西关中地区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捐和“交农”斗争，斗争延续到 1908 年 11 月。这些斗

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为陕西辛亥革命做了前期准备。

1907 年到 1910 年，陕西关中地区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学潮。其中，发生在渭北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的丙、丁两班学生成立联合自治会因受到校方干涉而取缔，43 名学生被开除，造成了 1908 年 7 月高等学堂学生全体退学，教师罢课。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各地学界的响应，陕西当局恐事态扩大，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 2 人，由学务议长和教育总会会长出面调停，当局基本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方结束。辛亥革命前的学生反封建斗争，使青年学生受到了锻炼，给革命队伍造就了一批新生力量，为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刘古愚开维新先河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逐步深入的形势下，其腐朽衰亡的本质已暴露无遗，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吸引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并为一些先进人士所接受。在陕西渭北地区，首推爱国教育家咸阳人刘古愚[①]。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沉沦为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刘古愚深感时艰，忧国忧民，呼吁教育救国。他认为救国必先从教育做起。并说："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②] 而"国势之贫弱，唯学能救之"。他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培养

① 刘古愚：即刘光蕡（1843～1903），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是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人的老师。

② 吕效祖主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24 页，《与沈淇泉学政书》。

“实心以求保种，实心以求保教，实心以求保国”的人才。[①]

刘古愚是推进陕西近代文化教育的先驱，提倡学以致用、学用结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大胆革新书院传统的教学内容，除学习经史之外，增设以天文、地理和算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兼学电、化、医、矿诸学，改变脱离生产实践的学风，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人才。

戊戌变法运动中，刘古愚在陕鼓桴响应，积极宣传和推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在陕成立“味学会”，创办“时务斋”等，主张迁都备战，实行君主主宪，建立和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竭力推动陕西社会的维新改革，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称。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被以“康梁新党”的罪名，解除了味经、崇实书院山长之职，归耕礼泉县九嵕山下烟霞草堂。后被聘为甘肃大学堂总教习。

（三）朱佛光反清革命思想的孕育和传播

三原人朱佛光[②]是主张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体、实行民主政治的先驱人物。他继承陕西“关中三李”[③]的学说，以传播民族精神为己任，主张其治经应从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应从自然科学入手。朱佛光自谓是明宗室秦王之后裔，不肯俯首事清，毕生从事教

---

① 吕效祖主编:《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47 页,《谕崇实书院诸生》。

② 朱佛光(1853～1924),名光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朱家湾(今三原县徐木乡朱家湾)人。自谓明秦王后裔,以宣传民族意识,传播民族精神为己任。曾设塾于三原县城,并曾执教于泾阳崇实书院,长期从事教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赞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学生踊跃参加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时,西北主持革命者多是他的门生。

③ 关中三李:是清初以来学人和社会上对关中思想家、学问家、教育家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的尊称。他们以其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学行操守在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和声誉。

学，不求闻达。他对学生多讲述明朝遗老的反清精神，以励后进而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与崇敬。

“甲午以后，外患日深，先生究心于经世之学，谓中国改革，非经学科学并重不为功。乃与孙芷沅于1895年发起天运会，又创设‘励学斋’，广购书籍报刊，以劝导有志之士，而西北之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此日启。是时康派学说风靡天下，先生1898年乃著《康氏纠谬》，指斥康有为政治主张之错误，右康氏者疾之，复尽力与之争，先生提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用革命手段’。戊戌后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励。及闻中国同盟会，见孙中山之演说，则劝学生加盟，以响应于西北，对于保皇主宪之演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①

朱佛光的思想，在反清意识的基础上，吸收了资本主义思想新内容，虽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还不是很完备的，但却影响了一批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辛亥革命中，关中地区一些激进人物多出自其门下。作为西北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诗人于右任先生，曾先后受教于刘古愚、朱佛光。他在《我的青年时期》里说，刘（古愚）先生“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而戊戌变法之后，刘倡导君主立宪，朱倡导革命之说，“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朱（佛光）先生“识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83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06—217页。

1918 年，于右任回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三原东里堡李靖花园。朱佛光在三原县城两所中学授课期间，于右任还邀请其每日到总部给一些靖国军将领授课讲解经史与政治。课毕，则在街头一饼一粥，而所事则风雨不避。其艰苦真挚之精神，当时军学文商各界多为之感动。朱佛光常说："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①

朱佛光先生容貌奇古，气宇轩昂，善演说，为人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常数小时不倦，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当时，长安毛俊臣先生亦以经术授学者，先生与之为昆弟交，故关内称"朱、毛二经师"。

二、 三原宏道书院与中国同盟会

（一）同盟会与三原知识界的联系

中国革命同盟会，亦为中国同盟会，是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 2000 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开端，为各种先进思潮的探索与传播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也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陕西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即开始涌动。

三原宏道书院创办于明，鼎盛于清，为陕西著名书院之一。1905 年 9 月，清政府因大势所趋，"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敦促下，

① 于右任撰：《朱佛光先生墓志铭》。

决然下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 早在 1902 年，陕西推行新政，改三原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并将泾阳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宏道大学堂。1906 年，宏道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工业学堂。

三原宏道书院保留了刘古愚的维新传统和朱佛光的反清革命思想，其除习经学外，又新增西学，传播西方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说及孙中山反清兴中的民主革命思想，西北一批青年多受陶冶，宏道学堂成为陕西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最高学府之一。在进步思想的启迪下，许多青年学子断然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制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二）宏道书院为陕西辛亥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1905 年，陕西派遣官费留日学生 30 名，其中宏道高等学堂占 15 人，而三原籍学生就有茹欲立（卓亭）、张宗福（景秋）、姚伯麟（鑫振）、张秉钧（治平），另有非三原籍学生宋元恺（向辰）、李寿熙（伯虞）、李元鼎（子逸）、杨铭源（西堂）、张炽章（季鸾）、景志傅（岩征）、李述膺（龙门）、李鼎馨（陋吾）、康耀宸（觐九）、马宗燧（勋丞）、安兆鼎（珍三）等。这批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后，适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招集各方面革命力量组建同盟会。是年 8 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宏道学生茹欲进、张景秋、徐朗西、赵世钰等首批加入同盟会。三原在日本的其他留学生陈之硕、张立卿、邹炳炎、于伯行、田种玉等也先后加入同盟会。

---

① 1993 年四期《历史教学》,冯培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三原宏道书院遗址

翌年，于右任为《神州日报》筹集资金，赴日本考察，结识孙中山，亦加入同盟会，被授予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会务。在辛亥革命中，毕业于宏道书院的李异才、樊毓秀、吴聘儒、胡文骥、刘淦、杨鹤庆等，都曾为后来西北民主革命立下过赫赫功绩。

据《陕西近代名人录》《辛亥革命在陕西》《咸阳百年革命志士》记载，1905 年到 1911 年武昌起义前后，三原宏道学堂和清麓山正谊书院的学生在日本或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者达 30 余人。其后，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知识界、文艺界或工商界，或投笔从戎拼杀疆场，或以笔文唤起民众。除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物井勿幕、于右任及宋向辰、李元鼎外，再如曾任秦陇复汉军总部秘书长的茹欲立，在乾州与甘军大战被俘英勇不屈的队官胡文骥，辛亥革命中的学生队队长柏厚甫，辛亥革命中曾任乾州知州的范紫东等人，均为宏道学生或曾受业于刘古愚、朱佛光二先生。

宏道学堂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乃至以后推翻蒋家王朝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时人称为“西北革命摇篮”。

（三）以三原为核心的渭北地区是陕西同盟会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

1905 年，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

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后，同盟会会员井勿幕被孙中山指派回陕工作。回陕后，井勿幕首先介绍朋友高又明加入同盟会。当时陕西清廷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矛盾激烈。到1906年春，仅发展各学堂学生七八人和社会上赞成同盟会宣言、支持革命者30余人。于是，决定召开同盟会第一次陕西支部会议，并以诗文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地点在三原城内北极宫柏筱余的大宅院内。会议主要研究发展会员和推进会务的方法步骤。当时出现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急进，认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陕西农民对地方官吏极为不满，反对盐斤加价和西潼路捐，斗争形势对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有利，应采取急进步骤；另一部分人主张缓进，认为清朝官吏耳目众多，同盟会在陕西工作开展较晚，基础薄弱，决定稳步前进，重新制订发展会员的详细办法，要求老会员慎重介绍。会上，井勿幕提出联络会党、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等重要意见，但因同盟会员多系读书人，认为会党“行为不良”，坚决反对与其联络，使井勿幕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井勿幕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志良等人赴宜君、黄陵、耀县等地筹建根据地。不久，井勿幕离开陕西再次去日本，决心把陕西留日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引向革命，但学生中因派系问题，陕西分会未能组织起来。此时，井勿幕说服了三原籍学生赵世钰，二人分头活动，一方面征询同盟会员对组织陕西分会的意见，一方面积极发展同盟会员，融洽同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63页。

关系。

1906 年初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成立。成员有井勿幕、赵世钰、宋元恺、曹澍、白秋陔、席丰、席梧轩、冠鸿恩、张崇基、张炽章、杨铭源、陈之硕、徐应庚、张庆豫、李鲁吾、张丙昌、茹欲进、张宗福等 20 余人，其中宏道学生和三原籍学生有 10 人之多。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同盟会会员的日益增加，1908 年冬，又在西安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李仲特为会长，将革命工作重点移向国内。从此，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1906 年 6 月，《关中学报》在三原北城崇贤街创刊。《白话报》《训俗报》相继在三原胡家花园创刊。1908 年，柏筱余、张立卿等在三原设立“勤工社”（同盟会秘密机关），运销各种新书报和教育用品，宣传革命。同年 9 月，蒲城知县李体仁迫害致死学生事件（蒲案）发生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全体师生率先罢课，声援“蒲案”受害师生，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李体仁于 11 月 8 日被革职。1909 年三原胡文豹、胡文骥与吴宓等在三原创办综合性刊物《陕西》杂志。1911 年 2 月，柏筱余、高又明等经洛阳、武汉去上海，在洛阳购回大刀 1000 把，长矛 1000 支，枪 100 支运回三原、耀县等地，武装组织起来的民军。

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并实现独立的省份之一。西安在全省能较早光复，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是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是陕西同盟会筹划辛亥起义的重要基地，也是保卫革命成果、屏卫光复后的西安的战略要地和

主战场之一。

三、 陕西辛亥革命与渭北各县的光复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虽遭到失败，但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恨。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 年，陕西同盟会会员已发展至近千人，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做好了起义准备。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特别是四川保路风波直接影响到西安，陕西革命一触即发。西安城中，到处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等歌谣，并有于农历 8 月 15 日举义的传言。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10 月 22 日，同盟会陕西分会发动新军、联合哥老会首领，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宜。会议推举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会后，陕西新军在张凤翙、钱鼎、张钫（伯英）的带领下，分三路进城，首先夺取了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后，起义军迅速控制鼓楼制高点，占领巡抚、藩台衙门。驻防西安的清旗兵将领文瑞率旗兵千余人在满城内与起义军对峙，其他清朝官吏纷纷藏匿，巡防营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迅速瓦解。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满城以外的西安地区。当晚，起义军首领商定，对外使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并在军装局设立临时司令部。23 日黎明，秦陇复汉军进攻满城。三原党仲超时任炮营中队

队长，亲率张钫、朱叙五、余永宽等各数10人，发起攻击；三原邹志良组织敢死队与军民共同进攻满城，清旗军将领文瑞率清兵负隅顽抗，但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清旗军纷纷弃城，或逃或降。文瑞见大势已去，投井自尽。25日，秦陇复汉军占领满城，西安光复。

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统领。11月22日，武昌中华民国军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改称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

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出后，旬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的60余州县接踵响应，全省很快光复。10月25日，哥老会首领陈坤山响应省城起义，率部队光复三原，为全省继临潼、富平光复之后的第三个县。不久，陕北招讨使井勿幕率邹志良、胡景翼部千余人，从耀县进驻三原，三原县城成为革命党人会集的重镇。正如前所述，三原在思想上、组织上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做了充分准备，且一举成功，在辛亥革命中处在了时代前列。

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证明帝国主义列强不能任意支配中国的命运，但并未结束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掠夺，并没有改变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促进了全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把革命推向了更深更广的层面。另一方面，它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民族工商业较前有所发展，对陕西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第三节　陕西靖国军在渭北的活动及其影响

一、 张义安领导的三原起义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

（一）起义背景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坚忍不拔地同反动势力斗争。袁世凯称帝后，派遣心腹爪牙陆建章在陕西执政，陆建章亲兵驻守各县。其间，巧取豪夺、为非作歹，无所不用其极，激起了陕西人民极大愤慨。孙中山讨袁护国兴起，陕西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即一致奋起“讨袁（世凯）平陆（建章）”。

1916 年 5 月 7 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军驻扎富平县。胡景翼与民党刘守忠、张义安、邓宝珊等人，在县城内外人民群众的援助下歼灭了“中坚团”，擒获陆承武。5 月 9 日，陈树藩由蒲城移兵渭北中心地区三原县，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一日甚于一日，在陕西已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

陈树藩（1885 ~ 1949），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早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后在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旅任职。1911 年参加陕西新军起义，任东路宣慰使。中华民国建立后，投靠袁世凯，任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914 年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兼任陕南镇守使，后任陕北镇守使。1916 年乘云南起义之机，驱逐陕西督军陆

建章。陈树藩窃取陕西军政大权后，背叛革命党人，公开投靠段祺瑞，秉承北洋政府旨意，于6月6日撕毁自己所发的响应西北护国通电，对陕西国民党人和青年军官多方裁抑、迫害及暗杀，排除异己，结党营私，钳制舆论，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较之陆建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激起陕西人民和民党人士的公愤，结果又形成了“反段（祺瑞）驱陈（树藩）”高潮。

（二）起义经过与结果

1917年10月26日，耿直在西安刺杀陈树藩未遂，退兵岐山，陈树藩令胡景翼团追剿。陈树藩素知胡景翼思想激进，信仰孙中山革命主张，对其依附段祺瑞颇有异议，人虽在其下，心却另怀大志，因而对胡景翼怀有戒心。经过一度激战，曹世英劝说胡景翼让道给耿直，由胡景翼的防区撤向蒲城、富平。胡景翼明追暗放，更引起陈树藩怀疑。陈树藩一面托故扣留补给胡景翼部的枪支弹药，一面为稳定胡景翼，委其为“渭北剿匪总司令”，严饬向富平、蒲城跟踪追击耿直。同时，还令其心腹旅长曾继贤到三原，勒令张义安移交各城门防务。张义安审时度势，明察陈树藩之动机，将东、南、北各城防门交曾继贤部驻守，以出入便利为理由，仅留西门一处，曾继贤亦首肯。但时隔不久（起义前四五天），曾继贤迫令张义安即日离三原开赴富平。

张义安接到命令后，极为愤慨，再难容忍，即同备补营教练邓宝珊，连长董振五和王诚斋（扶风人，董振五的老师，同盟会会员）等人，在附近染房的一间屋里，秘密计议，决计迅速消灭曾继贤、严锡龙部，然后以三原为阵地，响应西南护法，声讨依附皖系

祸陕殃民的陈树藩。有人担心敌众我寡，张义安坚定地说：“兵不在多，主要在于如何运用。我取主动，先发制人，敌人兵虽多而无备，胜算可操。”当即消除了大家的顾虑。①

之后，张义安表面上积极准备开拔，使曾继贤、严锡龙等不疑，暗地里却作动员部署。张义安以曾继贤旅部拉运行李为名，向三原县政府和商务会要骡马大车若干辆，集中在要冲地区，并张贴布告，令本部官兵送还借用商民的物品，清理商号欠款等。同时，令学兵携带测图板，在野外和城内各地以实习测绘为名，将三原全城街巷交通状况，所驻曾继贤、严锡龙部队番号、主官姓名、部队驻防以及私人住宅位置和出入道路等做了周密详查，并绘制成地图，制订了详尽的兵力部署方案，并派人摸清了曾继贤部每晚的口令，仿制了曾继贤部标记的灯笼。

1918 年 1 月 24 日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张义安决计当即发动起义。夜幕降临，张义安以举行告别宴会名义，邀请曾继贤部 10 多名军官赴宴，宴会中张义安频频敬酒，曾继贤部军官不知是计，举杯畅饮，人人烂醉。张义安一声令下，曾继贤部 10 余名军官被全部拿下。与此同时，张义安派飞骑给胡景翼、曹世英分别送去急信，言明当晚之事，请求派兵支援。密信中写道，“陈贼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决定今晚与贼等决一死战，以报十年的知遇，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云云。②

是日晚 9 时许，张义安集会排以上军官，宣布起义，按照事前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55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56 页。

商定的方案，由董振五、邓宝珊、张协万分别率兵先后缴获东、南、北城门守兵枪械。张义安亲率张成亮骑兵排和学生连攻击三原县城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及骑兵营。

各城门被控制后，董振五率百余人从山西街西口向曾继贤旅部发起进攻，宋锡侯排在东口堵截。因曾继贤旅部设在山西街一深宅大院，墙厚屋高，不便进攻，遂派人迂回登房，向其院内投掷弹药。顷刻间炸弹爆起，枪声大作，正在打麻将的曾继贤大惊失色，急下令抵抗，双方处于相持状态。此时，张义安所带人员已将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和骑兵营团团包围，趁敌混乱之机，佯喊“骑兵营哗变了!”以迷惑敌人。严锡龙团部不明真相，即下令向骑兵营开火，而骑兵营也以为张义安前来偷袭，拼命还击。如此自相残杀，直到天亮。这时，团、营双方均被张义安部火力封锁，不能出击，只能作困兽斗。

一夜战斗，起义军缴获了大量枪械弹药，迅速补充到各连排。围攻山西街曾继贤旅部的官兵，士气高涨，上房凿墙，步步逼近。25 日近午，曾继贤部官兵伤亡惨重。午后，曾继贤的副官和严锡龙之弟严锡鹏分别在驻地被击毙。曾继贤、严锡龙指挥力量大大削弱。入夜，董振五连已逼至曾继贤的住宅。曾继贤见大势已去，带残余人员由后门溜下河坡，仓皇逃窜。严锡龙得知主子逃跑，也乘夜潜逃。26 日拂晓，枪声渐绝，剩下残兵也或逃或降，中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历时一天两夜，俘敌数百名，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

（三）陕西靖国军的建立

张义安举义之日，曾飞骑致函胡景翼：“请火速回师，以善其

后。”同时函请曹世英来援。胡景翼接到张义安急信后，一面先派靳伯伦率骑兵驰援，一面急调蒲城之田玉洁、岳维峻营星夜赴三原集结，随后亲自率部出师。与此同时，曹世英也从耀县向三原进发。当各路援兵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各方将领便聚师三原，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但为总司令之职互争雄长。张义安愤然说：“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讨贼，以谢国人。”① 凛然大义，深以感人。旋经会商，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共推胡景翼为靖国军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

1918 年 2 月 2 日，靖国军传檄四方，宣布讨陈。旋即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伐陈树藩大计，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左翼军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部为东路军，由高陵之渭河桥进军；右翼军胡景翼部张义安、董振五、冯毓东（志明）等部为西路，经兴平、户县进军。其时陈树藩亦命令刘世珑会同曾继贤，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景翼、曹世英各军迎战陈树藩军于三原西南城郊，激战竟日，陈树藩军大败，退守泾阳。不久，陈树藩调泾阳驻军增强西安防务，胡景翼遂派田玉洁支队进驻泾阳。

二、 反对军阀陈树藩的艰苦斗争与靖国军的分裂

（一）靖国军反对直系军阀陈树藩的几次激烈战斗

靖国军形成两翼军之后，按照围攻西安计划，右翼军以张义安为先锋，与董振五、邓宝珊、李虎臣（李云龙）等率 300 余众，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出咸阳、礼泉之间，经兴平、周至、户县等地抵达西安近郊，并致书陈树藩部团长樊钟秀（醒民），说服其树靖国军旗帜，将驻防之西安城西南部四寨让予靖国军，樊钟秀引军退入商洛“休整”。

1918 年 1 月 28 日，左翼军曹世英率领大军与陈树藩军战于西安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草滩等地，战线长达 50 余公里，激战终日，是夜乃撤防回新筑镇。2 月初旬，左翼军得知张义安部已占领西安西关大营盘，遂发起二次进攻，一度曾攻入北关。但因陈树藩调大军增援，激战竟日不能取胜，遂又撤回新筑镇。次晨，陈树藩军突过灞河反扑，左翼军因指挥不统一，纷纷撤回渭北。此时，适有卢占魁（耀辰）率部 3000 余人，由绥远来陕，参加了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是役灞桥战斗中，卢占魁亲督精骑，出桥东攻陈树藩军侧翼，大胜陈军。是日，卢占魁进驻斜口。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获胜后，陈树藩军疲于东西应战，防线曲叠，迨及百里。陈树藩采用避实击虚之法，知曹世英军本不耐战，而卢占魁部无纪律，遂出精锐数营，猛攻斜口，卢占魁部骑兵猝不及防，呼应不及，于斜口战斗中失利，全军被迫再次退回渭北。

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疲于应对，便以省长官衔为诱饵，求告豫西刘镇华镇嵩军驰援。刘镇华镇嵩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刘镇华率 5000 之众抵户县，与张义安部对垒，1918 年 3 月 13 日（农历二月一日），张义安亲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身亡。胡景翼令董振五带领其部撤回三原，靖国军两翼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靖国军退守渭北之后，陈树藩据省东渭河以南及省西咸阳、兴平等地，重整兵力，向靖国军全面反扑，渭河以北地区的战火更为激烈。

1918 年 4 月下旬，陈树藩亲率所属各部及镇嵩军大部，组成东路军，从渭南渡河向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靖国军发起进攻。另派刘世珑、白弋人为西路军，由乾县、礼泉直扑三原、淳化，同东路军遥相呼应，企图相机决战，消灭靖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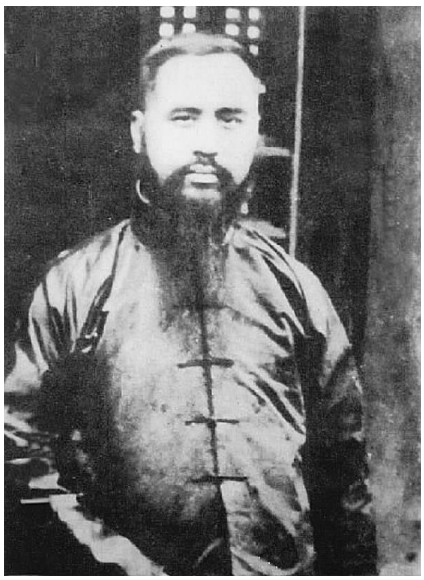
陈树藩军渡河之前，靖国军郭坚部已围攻大荔近一月。陈树藩军渡河后直扑大荔，郭坚撤围退守羌白镇。4 月 25 日，陈树藩军队围困羌白，激战数日，郭坚得到卢占魁部弓富魁（海亭）骑兵的增援，击溃了陈军。与此同时，陈树藩集结兵力号称 4 万之众，与靖国军展开关山之役。陈树藩军于 4 月 16 日首攻界坊，守军杨虎城及王祥生（崇瑞）部奉命抗击。李虎臣、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等相继增援，陈树藩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于 20 日停止进攻，向下邽、固市退却。靖国军乘势猛追陈树藩部，占领田市镇，生擒陈树藩部营长刘登科。在下邽几乎全歼陈树藩之姜宏谋部。在酒河口、上涨渡等地战斗中，陈树藩军亦连续遭受重创。同时陈树藩部西路军刘世珑也在泾河西岸受挫，停止前进。关山一役，激战一周，陈树藩精心策划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彻底失败，陕西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得以巩固。

陈树藩兵败关山后，调整兵力企图消灭大荔之郭坚部，郭坚退到羌白坚守 40 余日，终因给养、弹药告罄，于 7 月 31 日夜，率部突围至蒲城兴镇与杨虎城、张铎部会合。郭坚、杨虎城等决定，利用陈树藩在西部兵力比较单薄和正逢粮食收获季节等条件，向西路进兵。

（二）于右任归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陕西靖国军在 4 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但

所属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各自为政，号令不一。有鉴于此，胡景翼、曹世英等高级将领及民党人士商定，派王玉堂（子元）、张庆豫（立卿）等为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适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由广州至上海，王、张拜见了孙中山。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 1918 年 7 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于右任、张钫于 8 月 8 日通电就职。总司令部设于三原东里花园。陕西靖国军统一改编为六路，抽签为序，第一路郭坚，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世英，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峻，第六路卢占魁，另编惠思温（又光）部为陕北游击支队。延聘李元鼎（子逸）、茹欲立等为顾问。陕西靖国军的改组对于团结内部，统一指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坚持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军队实权仍分操于各路司令之手，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在陕西靖国军改组后的一段时间，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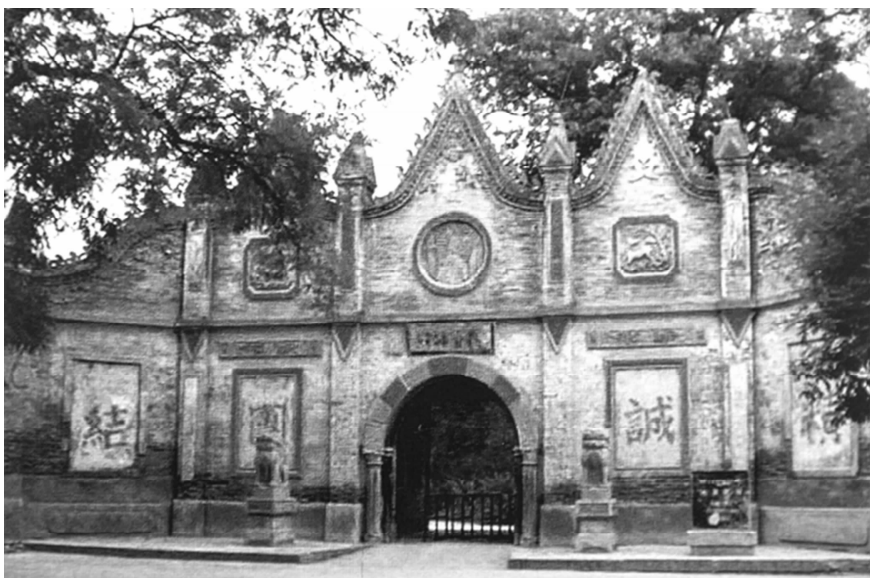
9 月，靖国军分路出击，向陈树藩控制的区域展开进攻。陈树藩惊恐万状，急忙联合刘镇华万余镇嵩军，倾巢出动，对靖国军防地进行全面扫荡和反扑。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从此全面铺开。

西路，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首先率部突袭乾县，城内守军弃城而逃，乾县遂克。接着兵分两路，乘夜袭击兴平、武功两座县城。兴平县城在重兵压境之下，发生兵变。连长贾福堂火并营长王振藩，遣人迎郭坚，愿受编制。郭坚单骑入兴平，编贾福堂为第一路第七支队。半月后，张铎部攻克岐山，李夺部攻克眉县，靖国军势如破竹，西路各县多被郭坚部占领。

东路，第五路司令高峻先声夺人，一夜间克复了合阳，委王怀斌为合阳知事。杨虎城支队东进黄河一线，克复了韩城，委曹仁寿为韩城知事。副总司令张钫和第二路司令樊钟秀率部出蓝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零口，绕长安城向周至、眉县一带挺进。三、四路军连挫陈树藩军数番进攻，驱军渡过渭河，在马驹寨一线，重创陈树藩军主力。

眼看靖国军步步紧逼西安，陈树藩一面急电北洋政府加派援军，一面使出惯用的缓兵之计，请出井勿幕和彭世安到三原靖国军总部议和，并暗中指示他们相机策反胡景翼部。此前，靖国军发兵讨陈后，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因赴渭南固市镇，劝降自己旧日助手姜宏谟（胡早先任陈树藩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姜任团附。三原首义，胡被推为右翼总司令，姜未参加，受陈嘉奖，率一团兵力驻防于固市镇）不成，反被姜宏谟暗中告密，被陈树藩挟持至西安软禁起来。陈树藩软禁胡景翼，一是想劝其归顺自己，二是想借其离开部队之机，分化离间胡景翼的部下。而胡景翼部军官又多系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旧部，陈树藩想利用这层关系，请井勿幕去三原游说胡景翼部倒戈。

不料，事与愿违，陈树藩弄巧成拙。井勿幕到三原后，非但没



陕西靖国军司令部旧址（三原东里花园）

有做他的内应，反而和于右任相谈投机，被推举为靖国军作战总指挥。于右任得到井勿幕的支持参与，如虎添翼，加快了军事进攻步伐。农历重阳节，于右任特派总部秘书党晴梵到乾县犒军，与郭坚计议兵进凤翔。凤翔踞关中右辅，向为西路政治经济之中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郭坚赞同于右任之计议，即留党晴梵为第一路军秘书长，部署进兵凤翔与西路各县。

郭坚部先到岐山设立大本营，以麻振武为前锋，于 1918 年 10 月 20 日兵临凤翔东郊。李夺、张铎部亦继至，将兵力部署于附近村落。靖国军对凤翔构成四面合围之势后，郭坚留参谋长马凌甫于距城三里的河南屯指挥攻城，自己亲率精骑百余，快马加鞭，直取千阳、陇县。陇县驻军头目李栋才，惧其锐气，派人到郭坚部谈判，假意愿投降，但要求仍守其地，请郭坚军队不要进城。郭坚轻信李栋才，遂驱军南进宝鸡。宝鸡守军闻风自乱，不战而逃。郭坚留少数人守之，即回师凤翔城下。郭坚率百余轻骑，风驰电掣，四日行程 500 余里，连克千阳、陇县、宝鸡三城，极大地震慑了凤翔城内的守军。

其时，凤翔城为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驻守，这三个人均为张钫任师长时的旧属。于是，张钫亲临凤翔，先以书致魏进先等劝降。魏进先等尚有犹疑，举棋不定。这时有消息传来，滇军叶荃率靖国军第八军，经四川出宝鸡抵陇县，先前假意投降郭坚的李栋才部迫于大势，出城投降。张钫即派参议刘承烈，郭坚派陈家谟赴陇欢迎滇军。叶荃遂以李栋才为前驱，亲率第八军合围凤翔。至此，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慑于大势，不得不献城投降。

1918 年 11 月 6 日，靖国军各路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县城。张

钫设总司令部行营于行台，叶荃设第八军司令部于县高等小学校，郭坚设第一路司令部于县署。为统一行政事务，经总司令于右任批准，靖国军在凤翔设立民政厅，由马凌甫兼任厅长。民政厅设总务、财政、教育三科，以蔚定侯、庞益三、刘子馨分任科长。所有西路一切行政事务，统由凤翔民政厅处理。同时，给凤翔、岐山、眉县、扶风、武功、乾县、千阳、陇县、宝鸡九县委派了知事。自此，西路各县一切政务渐入常态。

西路既平，张钫回师陕东，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随往，与久驻终南镇的樊钟秀合围周至，激战十余日，周至县城克复。樊钟秀即在周至县城设立第二路司令部，张钫总司令部行营亦由凤翔行台移到周至县城，委任了周至县知事，仍隶属凤翔民政厅管辖。

此时的陕西局势，除汉中道尚为刘存厚盘踞，榆林道的井岳秀中立，关中道除西安至潼关以外，大体上尽被靖国军占领。但由于靖国军战线拉得过长，连日不容喘息的闪电式运动，克关夺隘后的巩固工作来不及考虑，对陈树藩军怀有各种动机归降的部队也来不及整编，这就给胜利中的靖国军埋下了灾难性的隐患。在闻知北洋政府援兵不日抵陕，陈树藩、刘镇华联军的攻势变得活跃时，靖国军内部潜伏的隐患便一起爆发出来。

驻兴平的贾福堂部首先倒戈叛变，将第一路驻兴平的参谋兼营务处副处长肖荣寿拘捕，押送西安杀害；营务处军官张在璇也在被押送西安途中，在咸阳遭杀害。贾福堂叛变后，井勿幕率第四路岳维峻部围攻兴平，事先到凤翔与郭坚会商（贾福堂系郭坚收编），并向叶荃通报情况。叶荃即派李栋才率部参加合围，驻兵兴平城外

南仁堡。一天后，井勿幕同郭坚一道赴兴平前线。11 月 21 日，二人相约去南仁堡。不料，先到的井勿幕竟被李栋才杀害，郭坚闻变，中途急速折回。李栋才携井勿幕首级叛逃西安，复降陈树藩邀功。陈树藩授李栋才汉武军统领。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亦同时叛去，靖国军兴平之围自解。陈树藩乘隙派张鸿远入兴平，又杀了贾福堂。从此，西路战事陷入了拉锯式的复杂局面。

井勿幕遇害后，遗体十天后运抵三原，于右任抚尸恸哭，悲痛欲绝。在致广州参议院院长林森电中，于右任痛切地说："噩耗传来，五内俱裂，凡我将士，莫不痛心。我军倚望之胡君未及脱险，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右任抚躬自咎，愤恨何及。"① 一连多日，于右任神志恍惚，怅然若失。安葬之日，于右任用他雄劲的笔锋给井勿幕写挽联："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谁言李栋才，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高度赞扬了井勿幕的革命精神，痛斥了陈树藩一伙军阀屠手残害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

1918 年下半年，陕西靖国军迅猛发展，陕西在当时全国南北对峙的斗争中，逐渐占了重要地位。南北双方都把注视的焦点投向陕西，纷纷向陕西调兵遣将。立冬后，大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南方护法军方面，继叶荃入陕，颜德基、但懋辛、吕超、石青阳、石星川、王安澜等滇、川、黔、鄂部队，亦运动北上。北洋政府方面，也加紧调兵步伐。段祺瑞急调奉军许兰洲部，直军张锡元部 2 万余人，星夜赴陕援陈。又调晋军 13000 余众，自禹门渡河入陕。狭长

① 潘志新选编：《于右任诗文诵三秦》（陕内资图批字 2005 年 103 号），1918 年 11 月 29 日，于右任《致参议院报告井勿幕被害电》。

的关中地带，一时兵营林立，南北各路军马总计不下 20 万。

北洋军进入陕西，困境中的陈树藩如乏鱼得水，士气大振。遂派所属张鸿远部出兴平、武功为中路，白弋人部出礼泉为北路，镇嵩军出户县为南路，对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扑。靖国军叶荃、郭坚、卢占魁所属各部，与张鸿远战于兴平、武功之间。

1919 年 1 月 4 日，陈树藩军占领距武功城 3 里之华家坞，接着攻克兴平马嵬坡，两军成相持状态。其时，许兰洲率部由咸阳西进兴平，形势骤变，叶荃遂以郭坚、卢占魁为左、右翼，在扶风、武功之间的杏林镇一带阻敌，并急告于右任，请派第三、第四路援军出周至、武功助战，以成夹击之势。但因配合不当，各路军马未到达指定地点。1 月 27 日，大王村一战，靖国军受挫，名将董振五阵亡。

此时，北洋军张锡元部又抵渭南一线。靖国军总部吃紧，第三、第四路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即撤回，以保三原基地。叶荃孤军势单，只得弃杏林退撤凤翔。樊钟秀部被镇嵩军围困于周至，久等援军不至，退守眉县。北洋军长驱直入，不日兵临岐山。西路靖国军缩短战线，集兵凤翔。北洋军倚仗势众，以数倍兵力，四面合围，轮番进攻，凤翔城墙被炸得几无完堞。靖国军将士虽经血战，终因孤城无援，粮储不济，械弹奇缺，情势极为危急。

其时，甘军谢洪涛部又进入长武、邠县（今彬县）、陇县及凤翔以北，北军管金聚旅进入宝鸡，对西路靖国军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东路战场经界坊、交口、相桥、临河诸战，一度出现相持状态。援陕的王安澜、吕超等部，在进入陕南地区后，看到靖国军接连受挫，迟疑观望，拥兵不动，从而使在兵力悬殊下艰苦作战的陕

西靖国军处境更为困难，靖国军控制的地区日见缩小。面对日趋不利的战局，身为总司令的于右任焦虑万分。

1919 年 1 月 9 日，于右任上书孙中山，痛陈陕局之危急，请促援陕各路急进。适值此时，全国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矛盾亦日益尖锐。西南军阀为了保存自己，与同和英美勾结的直系军阀联系，准备“南北议和”，设法排挤孙中山。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离开广州。

北洋政府方面，先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不满段祺瑞的偏袒与专横，秉承冯国璋“主和”主张，通电主张和平，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后值新总统徐世昌上台，英、美等国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亦反对与日本勾结的段祺瑞，不断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的劝告。

早在 1918 年 11 月 16 日，北洋政府就发表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命令，日本被迫表面同意南北议和。南北议和一时成为大势所趋。在国内外压力下，段祺瑞不敢公开反对议和，但仍利用参战督办的职权，快速扩大武装，随时准备再走“武力统一”的老路。事实上，段祺瑞以所谓“剿匪”为借口，对陕西靖国军继续按“剿匪条例”进行讨伐，企图把陕西撇在停战议和之外。

于右任痛愤地在报上著文揭露北洋政府“在北杀人，在南欺人”的罪恶行径。在舆论的压力下，加之南方政府的出面交涉，陕西停战始达成协议，并通过由原国会议员张瑞玑赴陕西调解并监督停战事宜。而张瑞玑其人，是个接近立宪派的旧官僚，有明显偏袒陈树藩的倾向，受命后迟迟不肯成行，故意给陈树藩留下进攻靖国军的时机。其时陕西方面，北洋军政数旅之众围困凤翔多日，靖国

军伤兵与日俱增，弹尽粮绝，军心浮动，情势越来越不利。

张钫、郭坚、樊钟秀等会商，决定局部议和，于 1919 年 2 月 15 日派党晴梵去扶风与许兰洲晤谈，未达成协议。次日凌晨，奉军就发起了攻击。为冀成和局，张钫亲率卫队和随从前往，意欲同许兰洲晤谈。不料中途遭奉军截击，张钫在卫队保护下脱险，绕道回到三原。其弟张铮被击殒命。参议刘承烈以身穿之猞猁皮袍相赠截击之奉军兵士，幸免于难，见到了许兰洲。许兰洲对议和本无甚心思，但囿于南北议和大势，表面上满口答应，同意刘承烈速回凤翔，斡旋和局。

刘承烈回到凤翔后，郭坚决定派马凌甫与之同行，与许兰洲商定和谈具体事宜。二人领命再达许兰洲军驻地时，已是夜晚掌灯时分。许兰洲亲自迎接，表面优礼相待，十分客气，安顿二人歇息，答应第二天再谈。二人无疑，放心休息。然而老谋深算的许兰洲，一夜却不曾入睡，指挥奉军乘夜攻击岐山，企图拿下岐山后再行谈判，以增加谈判的砝码。无奈攻城无果，天亮后，双方开始了谈判。

按照预先议好的条件，马凌甫坚持：一是只与许司令妥协，不与陈树藩合作；二是双方各守原地，维持现状；三是保证叶荃部安全出境。许兰洲对靖国军提出的一、三满口答应，唯独不肯接受第二条牵扯实质问题的条款，坚持要靖国军做出让步，把岐山一线划入奉军辖区。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一时出现僵局，许兰洲负气拂袖而去，谈判不欢而散。

刘承烈、马凌甫回到凤翔后，从岐山方面传来消息，守军已难支持，夜间就要突围而出。此时，靖国军顺水推舟，答应了许兰洲

的要求，和议方告成功。许兰洲同郭坚在凤翔、岐山交界的横水镇会晤，郭坚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二支队，樊钟秀部为第一支队。从此，西路战事暂息，靖国军方面实际只保有三原、高陵、泾阳、富平、白水、澄城、同官、耀县等八县的渭北一隅，陕西大部又重新操在陈树藩之手。

陕西政局如此错综复杂，于右任虽然数次上书孙中山痛陈利害请求援助，但恰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亦无能为力。1919 年 2 月 18 日，孙中山复函于右任“陕事危迫，而兄日在痛苦之中，谁则能为分忧者？北既不舍，南不能救，不得已惟有藉力于和议”①。此后，孙中山又嘱张群入川督熊克武“与陕军联为一致”，但熊克武却拥兵不前，援陕之事始终未能落实，因而使陕西靖国军在南北和谈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直到 1919 年 4 月，由于多种政治力量的干预，牵动南北的陕西战事才终于停息下来。

（三）陕西靖国军的分裂

1920 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下野。军阀曹锟、吴佩孚建立了直系中央。陈树藩见段祺瑞下野靠山已倾，为了保住陕西这块地盘，尽早解除靖国军这个心腹之患，遂于 7 月 27 日释放了软禁在西安两年之久的胡景翼。陈树藩认为，胡景翼曾是他的部下，虽然一度倒戈，但为人豪爽义气，两年来好吃好喝奉为座上贵宾，必能回心转意为之效劳。陈树藩嘱咐胡景翼回靖国军后，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第 1 版，第 345 页。

相机解决曹世英部，结束靖国军残局，自己则率部属赴凤翔前线围攻郭坚部。

胡景翼回到三原，于右任十分高兴，委胡景翼继续担任靖国军总指挥。时值全国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孙中山在南方敦促陈炯明誓师回粤，兵分三路，展开了驱逐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的战争。壮心不已的于右任遂偕同胡景翼，于9月1日在三原宣布再次兴兵讨伐陈树藩。不料，靖国军内部却同室操戈，于右任的得力谋士总司令部参议于鹤九因办报评论军事得失，批评部分军队纪律废弛且扰民等事由而招致忌恨，被岳维峻部士兵追杀而自毙身亡。于右任极为伤悲，讨陈之事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20年，陕西境内大旱，数以万计的人背井离乡，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于右任虽尽其所能，募款赈灾，但无异于杯水车薪，难扼灾情燎原之势。更不能容忍的是，靖国军下属部队中竟有人趁火打劫、残害百姓，出现了贪污受贿、绑票索捐、滥征粮款等腐败现象。于右任痛心疾首，曾亲手严处了几起事件，无奈兵乱如山崩，他的三令五申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于右任愤然离去，于12月避居耀县药王山。两月之后，群龙无首的靖国军诸将领内部意见益发分歧，遂公推代表，请于右任下山。1921年2月，于右任由耀县入归三原，再次面对非常棘手的局面。

1921年5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任命阎相文为陕督，命冯玉祥护送入陕。8月初，冯玉祥军占领西安，陈树藩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往陕南。冯玉祥即集中精力对付和瓦解靖国军。郭坚部是靖国军中坚，其部人数最多，声势最大，驻陕西西部，掌握川陕交通咽喉。及奉军西来，血战连年，后与奉军议和，受奉军收编。

冯玉祥决定首先吃掉这支部队。于是，精心筹划，设下了一个圈套。8 月 12 日，郭坚收到冯玉祥送来的请柬，邀请他于 13 日下午赴宴。郭坚与副官商议，明知冯玉祥摆的是“鸿门宴”，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已受奉军收编，而直皖战争中直奉是一家，冯玉祥不至于刚入陕就对他下手。第二天下午，郭坚带随从赴宴，被冯玉祥击毙于宴席桌前。杀了郭坚，在直系军阀内部钩心斗角中，冯玉祥又挫败了阎相文。8 月 23 日，阎相文不明不白地宣告“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此后，冯玉祥软硬兼施，在武力弹压的同时，采用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等手段，对靖国军各部进行分化。

这个时期，广州革命政府受到挫折，“反段段已去，倒陈陈已倒”，靖国军斗争的目标已经失去。加上入陕直系军阀的威胁，疲惫不堪的靖国军人心涣散，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主张受冯改编，于右任总司令则极力反对，并晓谕各方，但终无效应。陕西靖国军原辖一、二路军早受奉军收编，第六路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入川。其余三、四、七路皆受冯玉祥改编。在收编与否问题上，靖国军两位高级将领于右任和胡景翼的意见也日趋分歧。于右任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拔旗易帜，等于投降，是革命者的奇耻大辱!”胡景翼则表示：“不如委曲求全，保存力量，待机发难……”

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函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胡景翼不顾孙中山致函，于 1921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三原城隍庙召开“国民代表会议”，胡景翼宣布所属部队易帜，接受吴佩孚之命，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胡任师长。9 月 25 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于右任万分失意，既无力扭转

大势已去的局面，又不愿随波逐流、丧失气节，只好采取“洁身自好”的办法，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新建的三原民治学校内。

胡景翼被收编任命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后，极力推荐于右任担任陕西自治筹备会会长，于右任却一笑置之。冯玉祥对于右任亦是早闻其名，为了笼络社会名流以壮声色，争取陕西民心，除提议委于右任为陕西林垦督办外，还外加直系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等，于右任“都拒绝不受”，反而移居三原以北 10 里之东里堡唐园躲避起来。冯玉祥恼羞成怒，便想用武力威胁于右任屈服。

1922 年 1 月 18 日，胡景翼派兵包抄靖国军总司令部，夺印信，毁文书，逐办公人员，查封了办公室。于右任闻讯，冒雪夜走淳化方里镇，暂住于鸣皋营部。3 月 23 日，于右任偕李元鼎、茹欲立设行营于武功。5 月 31 日，于右任率参佐人员离凤翔，经千阳、崇信、清水，入川至重庆赴沪。

坚持了四年多的陕西靖国军，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方向，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许多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加之队伍中存在危害百姓之事，处境较为孤立，多种原因最终导致了靖国军的解体。

陕西靖国军在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可叹的。陕西靖国军的武装斗争，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求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痛苦过程。陕西靖国军主政期间，倡导民主、自由，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政策，为渭北地区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和革命运

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陕西辛亥革命在三原，三原起义促成了陕西靖国军的兴起，靖国军的壮大与发展促进了三原的社会进步，使三原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轫之地。共产党人林伯渠曾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① 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民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辛亥革命和靖国军时期成长锻炼的一批三原籍进步青年人士，成为后来渭北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三、 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期对渭北革命形势的积极影响

（一）背景与经过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机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帝国主义列强意欲掠夺中国。在这种政局混乱的形势下，1918 年，陕西靖国军在军阀混战中登上了陕西政治舞台。

于右任主政陕西靖国军后，靖国军举义树帜，横扫关中，震动了西北。各地革命党人和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军队闻风鹊起，桴鼓相

①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1941 年 10 月 10 日)《解放日报》。

应，渭北三原一时成为革命进步人士瞩目向往之地。省内外各路首领纷纷率民军投入到靖国军大旗下，河南民军首领樊钟秀由商州直至西安附近蓝田，卢占魁率内蒙古骑兵3000余人赶赴三原。一时宛若星云际会，靖国军声威大壮，以三原为中心的各县军营星布，绵延数百里。陕西靖国军在4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得到空前发展。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各省中唯一大规模响应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和解散国会的斗争军事力量。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所发起的辛亥革命，在陕西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抗击数倍之敌并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在陕西这块炎黄圣之地上创造了八省战阀的盛举。

（二）主要成就

在靖国军兴起的前几年里，由于中国国内连年战争，军民交困，根本无暇顾及地方建设。南北和议后，战事缓和，靖国军开始注意所辖区域的建设。总司令部明令禁止北洋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节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豪绅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靖国军在三原建立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宣传。在靖国军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许多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等。靖国军一些高级领导人还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虽然当时社会各界对苏俄的理解仅是

浮浅的，但一片憧憬向往之心却是感人至深的。

靖国军还注重军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各军普遍设立了军事教育和普遍教育机构。第一路军在凤翔设立了军官研习所。第二路军在高陵创设了经武学校及简练队。第四路军在三原设立了军官教导团。第五路军在白水开办了教导营。其他支队亦多举办有学兵连。总司令部还先后选拔各路下级军官 200 余人送四川讲武堂及广东韶关讲武堂深造。

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各部也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除致力恢复旧有的各级学校外，还大兴军人办学之风，先后创建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达 17 所。

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相继创办有《战事日刊》《启明日报》《正义时报》《救国时报》《捷音时报》等报纸，传递时事消息，宣传革命主张，介绍中外政治思想及社会主义学说，分析和评论政治形势，在陕西乃至国内一些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 年夏，陕西发生大旱灾，靖国军辖区尤为严重。于右任与刚刚被释归的胡景翼等奔走呼号，筹办赈济，先后向国内各地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灾款近 70 万元，在渭北 20 余县发放赈款 11 次，救助了大量灾民。

1921 年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支持三原各界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赈济款余额，实施引泾吊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会长，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约经两年，测绘、设计大体完成。后因靖国军解体未能施工，但为 1930 年杨虎城主陕后完成引泾灌溉工程奠定了基础。

（三）陕西靖国军对渭北及陕西革命形势的积极影响

1919 年 4 月初，陕西划界停战后，陕西靖国军主要统辖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铜川、澄城等八县，形成了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同时得到当时南北两个政府的承认，靖国军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管理权。

护法军兴起后，三原成为陕西靖国军的军事政治中心，直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并在三原建立了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陕西省议会分庭抗礼，在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经济上形成了自主发展的特区，其对渭北乃至全省、全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陕西靖国军和广州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也称为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渭北及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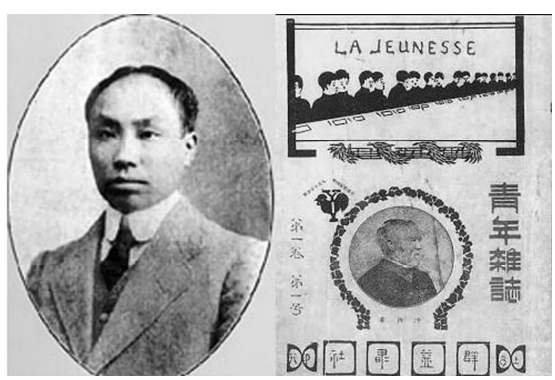
陕西靖国军的顽强斗争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三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靖国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感染了三原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团结和奋起，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组织在三原的早期建立和发展开辟了良好环境，也为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传播与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三原的反响

一、 新文化运动在三原的兴起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宣传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引导青年解放思想，破除陈旧学说，冲破束缚人们思想的罗网，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造就有利于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文化。



陈秀独与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里看到了曙光。于是，他们纷纷开始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

克思主义。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一时间，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文化运动在京、津、沪等地蓬勃兴起。

三原县地处渭河北岸关中腹地，在明清时期就有学古、宏道、嵯峨和正谊四大书院，是关中学派中三原学派的发源地。

辛亥革命以后，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在三原创办学校，推进了三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到了五四时期，在渭北各县还没有中学时，三原县城内就有三原县渭北中学、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陕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陕西省立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县立初级中学五所中等学校和七所小学，学校聘请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在京、津、沪、汉求学的大学毕业生或留日的学生。这些具有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教师在三原各中学教学期间，倡导科学救国，主张民主办学，提倡学术自由，反对学校讲经（书）等。这些新文化、新思想，吸引渭北各县和外省大批学生纷纷来到三原求学。

三原这些具有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教师，积极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之中，他们向学生传播新文化与新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各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及各种学科的学习组织，教师在校外也建立了教学研究会、教育讲演会等学术研究组织。教育讲演会研讨范围不限于教育问题，还涉及有关社会、经济、政治及新思潮传播问题，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自由讨论的社会风气。三原各校纷纷进行教育改革，提倡和运用新教材，废除宣传封建文化的旧教材，新教材内容丰富新颖，帮助学生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这些教师向学生讲授新文化、新文学，要求学生运用白话文进行写作，

应用新式标点等，使学生掌握这些传播新思想的锐利武器。

一些留学日本的教师回到三原后，在渭北中学讲述有关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新文化、新思想，且很快在三原及渭北地区传播开来，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 五四运动传入三原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 年 1 月 1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 27 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陆征祥、顾维钧等 5 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19 年 5 月，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强烈愤慨。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 13 所大专院校 3000 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讲演，反对巴黎和会决定，要求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开展了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大中学校求学的陕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杨明轩等，不但积极参加了 5 月 4 日北京学生集会和游行示威，还参加了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还有北大陕籍学生杨钟健、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三原籍）、张耀斗等。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中有陕籍学生杨明轩、郝梦九。在“六三”大逮捕中，刘天章、刘含初被捕。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雷晋笙、严信民。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王尚德等。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汪世衡也撰写文章，鼓动反日。

（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传入三原

1919年5月14日，西安《长安日报》首次对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做了简要报道。与此同时，三原旅外学生中一些进步分子通过外埠寄来的函件和报纸，向三原同学和好友报告五四运动的最新消息，三原人民对北京等地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情况了解日益增多。青岛丢失，山东难保，祖国危难牵动着中华民族的命运，陕西三原人民不再沉默，一场声援风潮正在酝酿。

三、 三原对五四运动的积极响应

（一）三原响应五四运动的主要表现

1.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三原后，三原学生积极响应，除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外，还举行了罢课罢教。他们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或私下传阅，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5月中旬，三原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举行了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在县城城隍庙戏台前召开大会，城隍庙内示威群众达数千人，爱国师生争先恐后登上城隍庙戏台进行演讲。

会后，全体学生一起绕南北二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途中仍有大批市民、商人、军人等参与进来，学生们手执各种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主权”、“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并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队伍沿大街游行一周后，学生们又分成小组进到街巷宣传，号召市民抵制日货，并进入商店进行搜查。陕西靖国军中部分进步军官和士兵也纷纷参与了这场游行示威活动。

2．通电全国，声明立场

示威游行活动结束后，省立渭北中学又向全国发出了通电，“青岛交涉，存亡攸关，一有蹉跌，国将不国，请电致巴黎议和代表，务期达到直接收回目的，万勿让步，致误全局。至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尤请依法惩办，以儆效尤”①。受三原这次罢课游行影响，渭北各县学生风起云涌，相继响应。

3．三原成立“救亡团”，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

6月初，由于西安陈树藩阻挠，西安不允许开展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陕西学联代表急赴三原，与三原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尾和居民家庭院落，宣传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倡导抵制日货，并与出售日货的商人进行斗争。6月6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简称三中）、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简称工职）、三原县高等小学校和西关学校等三原全城学校学生实行罢课，联合组成“救亡团”，连续三日在三原县南城北城大街举行游行示威。当天的游行队伍长达数里，向居民、商户、士兵进行宣传。学生手执三角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40页。

旗，上写各种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政府”、“铲除卖国贼曹、陆、章”等，并在县城内街巷到处设讲台，师生争先登台演讲。愤怒的学生们故意把段祺瑞三字谐音写作“断气睡”。

4. 广大学生把抵制日货作为一项具体的爱国活动

6月8日，游行到第三天，学生和市民群众再次集合于三原城隍庙内，各校师生在戏台上设讲坛，说明当时国家危急形势和北洋政府卖国勾当，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把列强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去。有的学生痛哭流涕劝告商户勿购销日货，有的店员受到感动，当场立誓回去劝阻自己的店铺不再经营日本货物；有的老先生激动地登台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台下市民和学生群众听到触动他们心弦的话语时，每每跳跃挥手，高呼口号，台上台下汇成洪涛巨浪。三原学生联合会向渭北各县学校发出通知，号召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各县学生积极响应，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在渭北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这次大罢课大游行以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的传播在渭北各学校得到更为深入的开展。此后，一些从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毕业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学生也来到渭北，他们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各方消息进一步传播到了陕西靖国军管辖区域的渭北各学校。

5. 编排戏剧，宣传新思想

9月后，五四运动在陕西更加深入人心，渭北各校全面转入学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1月，三原县城各学校师生还开展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两周年”活动。

1920 年下半年，三原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蔡祥符（留日学生）、李寿亭（留日学生）、雷绍元编排《新理想国》《列宁传》两个大型话剧，在渭北各县学生运动会闭幕时公演，宣传建立理想国家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斗争，在三原及渭北各校引起轰动。

继三原、西安和渭北各县之后，陕北、陕南一些地区也积极响应，开展各种形式活动，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二）三原响应五四运动的主要特点

五四运动在三原响应早、规模大，宣传广、影响远。三原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积极参与行动，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与军阀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渭北广大民众。

1．响应时间早

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原是全省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之一”①。“靖国军中心区域三原县的学生运动还早于陈树藩统治的西安”②。

五四运动爆发时，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靖国军的大力支持。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主政渭北期间，言论自由，政治开明，民主思想活跃，不干涉学生运动，而且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呼声。所以，五四运动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三原，三原各校学生便立刻积极响应，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四大游行，靖国军中的一些进步官兵也参加了游行，支持学生运动。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24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0 页。

2. 活动规模大

5月中旬，三原各校师生学生就积极响应，学生和群众六七千人走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五四爱国游行、演讲，走街入巷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军阀卖国。6月6日至8日，三原师生一连三天举行大游行和大集会，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靖国军官兵大力支持，甚至一些军官和士兵也参与到示威游行队伍中去，三原声援五四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空前高涨。

靖国军管辖区域的各中小学，师生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加上时代潮流的激荡，渭北地区的民主之风盛行，不干涉学生运动，而且靖国军大力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呼声。三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渭北革命的中心，这与靖国军的政治主张与其领导人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后，各校学生爱国热情瞬间迸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国行动。三原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举行各种形式活动，使渭北广大群众的五四反帝爱国精神更加高涨。

3. 宣传广，影响远

“陕西首先响应和支持北京学生斗争的是西安和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及其渭北辖区，其后波及陕北和陕南地区”①。三原通过多种形式声援五四运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五四运动消息传播到了学校以外的广大群众中。

三原各校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发放传单，组织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尾和居民家庭院落进行宣传；把抵制日货作为一项具体的爱国行为，并与出售日货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22页。

商人进行斗争；通电全国，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卖国行径；成立“救亡团”，统一组织和号召学生举行爱国行动，当地报刊积极报道宣传；公开演出了《列宁传》《新理想国》等剧目，宣传新思想等。轰轰烈烈、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很快带动了渭北各地青年学生团结一致声援五四爱国运动，靖国军辖区的高陵、泾阳、蒲城等县纷纷加入到集会和游行行列。

（三）五四运动对三原革命形势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论述五四运动巨大的历史意义时，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 陕西的历史实际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1.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前，渭北地区民众思想比较封闭，对西方的物竞天择、进化论、天赋人权等唯物史观知之甚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传入三原后，给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冲击，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理想追求做出新的反思。

2. 五四运动促进了渭北人民思想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兴起。三原各校立即响应，连续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宣讲等活动。联合组成“救亡团”，宣传反帝反封建，树立新思想，倡导新文化，推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19页。

张波在富平宣传演讲时，感情激奋，当场咬破手指，愤写血书，以明心励志。赴淳化山区宣传的学生经长途跋涉，演讲至声嘶力竭而精神不懈。进步知识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封建社会行将灭亡，他们以拯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

3. 五四运动促进了三原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四运动传入三原后，广大进步青年积极响应，他们以学校为阵地，通过学生运动，建立社团，出报纸，办刊物，引导大家学习宣传新思想。在各种学说百家争鸣的形势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渭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三原革命形势得以迅速发展。

4. 五四运动促进了渭北文化教育界思想的进步

五四运动的影响及新文化运动在渭北三原的传播，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由青年知识分子推广到了渭北广大群众中，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新风尚，同时也促进了渭北地区文化教育界思想的进步，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的影响，使三原乃至渭北地区的青年学生在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中得到成长，唤醒了人们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使人们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步入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阶段，促进了三原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并对以后众多渭北儿女踊跃投身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从思想上和干部培养上为中共党团组织在三原及渭北的建立和发展做好了前期准备。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传播

一、 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三原的活动

（一）渭北中学和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渭北中学创建于1919年，由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倡办，陕西靖国军出资。创建时，校址在“大公馆”[①]；1920年初至1954年前后30多年间，学校设在三原城内山西街西端学古书院；1954年以后，一直在今三原南郊中学现址。

渭北中学初建时期，首任校长田种玉聘请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其中有于右任的恩师、著名民主革命志士朱佛光，还有许多留学回国的民主革命人士。这些教师在学校设立“公共书报共览社”对外开放，陈列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大革命时期，许多在陕西有重要影响的革命活动也都在渭北中学进行，许多进步团体在渭北中学诞生。渭北中学第二任校长郝梦九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许多教师和学生即为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渭北中学成为大革命时期渭北地区的红色战斗堡垒。

渭北中学建校以来曾十易校名。1922年，北洋军阀势力卷土重来，陕西靖国军被遣散，渭北中学更名为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但不久又恢复了渭北中学校名。1928年，学校改名为陕西省立第三中学。以后人们习惯简称渭北中学为“省三中”，使用时间前后达40年。所谓“三中”，先后代表三层含义：一是“省立第三中学”，二

① 大公馆：清代陕西省提学使衙门设在三原县，即今三原县幼儿园所在地。



三原渭北中学（省立三中）旧址

是“三原初中”，三是“三原中学”。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成立于1921年，始称陕西省师范学校，校址在三原县城内骑龙庙街“大公馆”（今步行街县幼儿园处），不久即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为留日学生、岐山人张用章。1929年底，省立三师迁至西安。1944年，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建立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9年，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迁入西北大学文学院后与教育系合并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1954年，定名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旧址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建立初期实行两种学制：一种是四年制，课程设置较多，称为“完全科”；另一种是两年制，课程相对简单，称“速成科”。当时讲授瞿秋白、蔡和森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人士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

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积极响应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三师学生运动活跃，涌现出了以严木三（又名树森）、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意志坚定的革命骨干。

（二）李子洲等共进社成员的受邀过程

李子洲，陕西绥德（今子洲县）人，1917 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哲学系。1920 年至 1922 年，参与了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 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 年 8 月，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的委托，回陕开展革命工作。他应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之邀，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课教师。郝梦九是李子洲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两人曾在共进社共事。渭北地区的靖国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该校不少教师都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老同盟会会员或共进社社员。所以，这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很好，学术空气甚浓。李子洲积极协助郝梦九校长制定了改进教学的方针和扩建学校的计划，并把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插在学生宿舍的中间，经常和进步青年进行交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在课堂上公开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等革命理论，向学生推介《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向学生传播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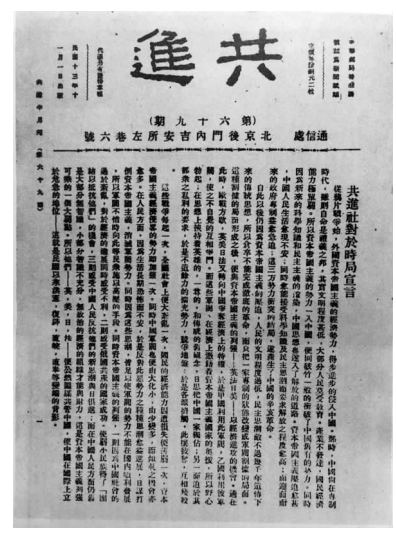
主义科学真理。

翌年，李子洲回榆林中学教书，同年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李大钊的帮助支持下，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延聘了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英、杨明轩、常汉三、韩叔勋、李瑞阳等一批进步教师作为革除旧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的骨干力量。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引导下，一大批革命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为西北地区革命的骨干。

二、 共进社三原分社的成立

（一）共进社与《共进》杂志

《共进》杂志创刊于1921年10月10日，且经历了一个由油印刊物《秦劫痛话》到《秦钟》再到《共进》的演进过程。《共进》杂志的创办人以北京大学的陕西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赵国宾、刘含初、呼延震东、韩述之、王君毅等人为主，他们联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陕籍学生，正式组成了《共进》杂志社。


共進

（第六十九期）

通信處　北京後門內吉安所左卷六號

共進社對於時局宣言

第九十六期《共进》杂志

1922年10月，在《共进》杂志创办一年后，旅京陕西学生刘天章、李子洲等又在北京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共进》杂志从此成为

这一社团的机关刊物。

《共进》杂志从1921年10月创刊到1926年9月停刊，时间长达五年，出刊105期，是一份在当时情况下连续出刊时间最长的刊物，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京、沪、汉、穗以及陕西三原、西安、渭南、华县、榆林、绥德、延安、南郑等地，销量达3500多份。由于一些社员出国留学，发行范围远至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共进》杂志发行区域虽然是以陕西为主，但影响范围却大大超出了陕西。从某种意义上讲，《共进》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下的一份刊物，它在配合国内政治斗争、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和主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共进》杂志紧密结合陕西实际，有力地促进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为陕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作用。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在段祺瑞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中，北大陕籍学生张仲超（三原人），是共进社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以后，不少共进社成员相继为革命英勇牺牲。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明轩、武止戈等人都在陕西早期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其中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武止戈还是中共陕西党团组织早期的创始人。共进社的成员中，也出现了刘志丹这样一些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由此可见，共进社和《共进》杂志对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共进社三原分社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1923年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给了共进社新的生命。

这时候，社员对于前进的方向有了进一步认识，尽管还限于陕西，但他们明白仅靠反军阀不能解决问题，根子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因而政治气氛比以前大大增强。这一时期，社员数目大大增加，特别是加入了一大批青年人。在北京的《共进》刊物由年轻社员承担后，发起《共进》半月刊的主要成员都先后毕业回到陕西。

1923 年 8 月，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杨晓初、赵葆华、杨明轩、严少儒等先后毕业回陕，受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邀请，来到三原渭北中学任教。他们在学校提倡和从事教育改革。首先提倡和采用进步的新教材，废除宣传封建文化的旧教材。魏野畴曾说："若用现在出版的课本作教材，那就牺牲光阴多了。"新教材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民主革命的原理及一些进步书报刊的文章。其次，引导学生建立读书会、研究会，把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他们为读书会、研究会提供进步书刊并予以指导，和学生一起研究、讨论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再次是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内外一些实践活动，使学生从读死书中解放出来。他们在师生中发展共进社社员，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活动，兴平、三原、礼泉、泾阳、旬邑及陕西各地在三原上学的一批同学加入共进社。不久，他们在渭北中学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

共进社三原分社成立后，共进社成员、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和教员赵葆华等以渭北中学为基地，积极向青年学生推荐《共进》杂志，并在校门口办起书报公共阅览室，为青年学生提供阅览马克思主义书籍，内有五四运动以来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天演论》《独秀文存》《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书籍和北平

《晨报》、上海《国民日报》《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报刊，通过这些刊物向广大师生和民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唤起三原和渭北人民的革命自觉性，使民众不断汲取政治营养，促进了思想的转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广泛传播。

1925 年 7 月 19 日至 25 日，共进社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共进社之所以把这次大会放在三原召开，是考虑到社员桑梓之情，三原又是当时渭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魏野畴、杨明轩、郝梦九、赵葆华、刘志丹（刘景桂）、方仲如（方廷桢）等 17 人分别代表北京、天津、上海、榆林、绥德和三原等地的代表出席会议。当时，刘志丹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代表榆林出席会议，他从榆林出发，走了 18 天才赶到三原，受到大家的热情欢迎。大会发表的宣言明确提出“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①] 等口号，大会还讨论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等问题。这次会议推动了三原及整个渭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指导文化教育界明确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三、 共进社三原分社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共进社三原分社成立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学生，指导教育界进步人士从事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促进了青年学生的进步和成长

共进社三原分社成立前后，兴平、三原、咸阳、礼泉、泾阳、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共进社和〈共进〉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第 1 版,第 64 页。

旬邑及陕西其他地区在三原上学的张含辉（张松林）、张仲实（张安人）、关中哲、亢维恪、张性初（张秉仁）、方仲如、王授金（王梦简）、秋步月、崔贯一和张金印（张慕陶）等陆续加入共进社。

共进社三原分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向师生宣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络三原各界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精神的感染。成员中“向上、向新、纯洁”的思想不断发展，促进了青年学生的进步成长。

（二）引领了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斗争方向

共进社三原分社成立后，三原及周边一些地区的共进社社员积极创办刊物，向学生和社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论述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魏野畴主办的《青年文学》（后改为《青年生活》），雷晋笙、崔孟博等主编的《西北晨钟》，蒲子政、亢维恪主编的《渭北青年》，何镜清、黄宪之主编的《新社会报》，赵葆华、宋树藩等主编的《青天白日报》，王森然等创办的《榆林之花》《塞声》，魏野畴、张性初、关中哲等创办的《西安评论》等，这些报刊与外地陕籍学生创办的刊物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指导了三原及渭北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使之逐步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坚强的战斗力，为马克思主义在三原及渭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了三原周边区域青年的思想进步

共进社三原分社李子洲、郝梦九等社员，在课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历史，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介绍并帮助学生学习革命书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向各界民众宣传革命道理，对三原周边区域民众的思想进步，对点燃渭北地区的革命烽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通过共进社的宣传活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了三原周边地区，培养和影响了一批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的骨干。共进社三原分社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第三节　中共三原党团组织的建立

一、 青年团组织在三原的建立和发展

（一）陕西地区最早建立的团支部——赤水支部

1922 年 5 月 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年 8 月，受武汉党、团组织和董必武派遣，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王璋峰）回陕发展组织。王尚德回到家乡渭南，发展张浩如、刘建侯入团。王尚德、张浩如在渭南赤水镇创办职业学校，以学校为阵地，指导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从事建团活动。

1924 年 3 月，团中央召开二届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西的西安、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团的组织。嗣后，团中央派共产党员武止戈赴苏联学习前先行回陕，帮助建立团的组织。5 月 30 日，武止戈到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的指示。同时，团中央负责人林育南也写信给王尚德，促其建立团组织。王尚德即把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刘建侯从临潼三育学校请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并于6月中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王尚德为书记，张浩如为干事会会长，这是陕西地区最早建立的团组织。团赤水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同年发展了武维化、程养廉、张宗逊等9名团员，隶属团中央领导。同年6月，武止戈到西安开展建团活动，他通过在西安省立一中、三原省立三中任教的魏野畴介绍，认识了一些暑假留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发展张性初、宋建旭（宋树藩）、杨宏德（杨起雄）三人为团员，上报团中央，经团中央批准，建立了西安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8月，共产党员雷晋笙从上海回陕，参加和指导了团小组活动。雷晋笙和杨宏德又介绍了四人入团，并报告团中央，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后称团西安第一支部），张性初为书记。到1925年初，青年团西安支部团员人数增加到16人。

1924年秋，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邹均奉团中央之命回西安发展团组织。年底，他同魏野畴一起又成立了一个团支部（后称团西安第二支部），两个支部分别同团中央联系，归团中央直接领导。

（二）王尚德在三原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4年冬，在渭南赤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姚志哲、薛应选、杨纯德、田怀德考入位于三原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们四人是三原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姚志哲等在三原上学期间，赤水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就指示他们在三原同学中秘密发展团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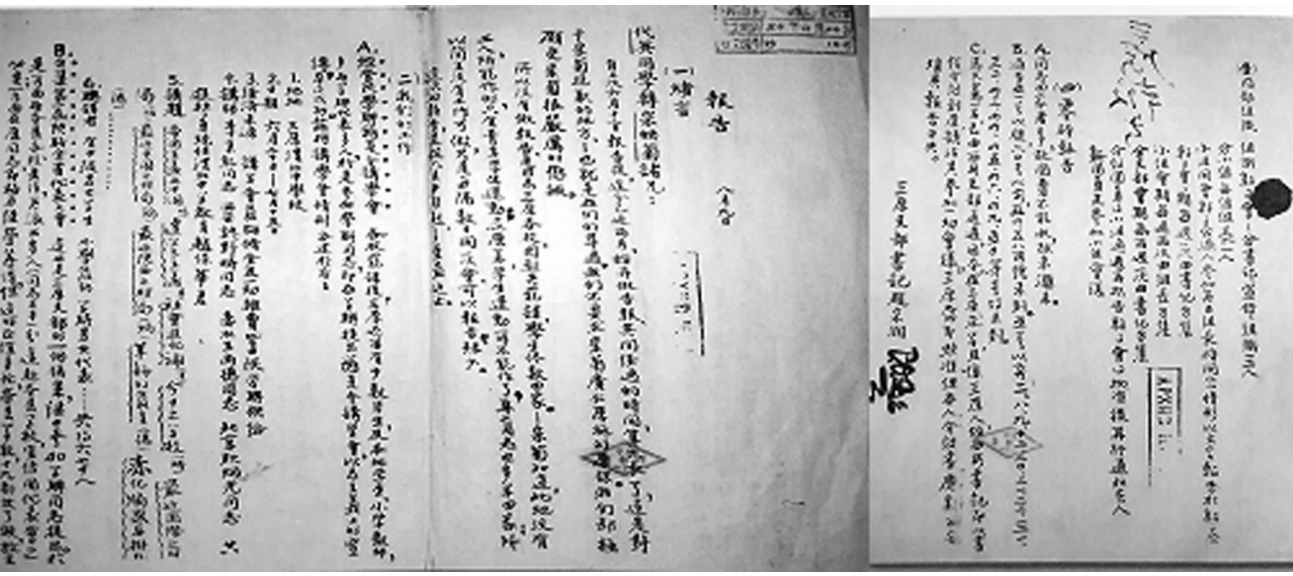
1925年1月7日，王尚德报告团中央，决定将三原共进社作为一个支部。28日，西安团组织负责人张性初到达赤水，与王尚德同

邀华县、三原、赤水、西安各团体进步分子，于2月1日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了团中央和西安团支部对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团组织的愿望，会议决定在三原和华县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原支部由姚志哲、薛应选、杨春德、田怀德四人组成，书记姚志哲。会后，以会议主席王尚德、书记张性初的名义向团中央和恽代英写了报告。

（三）渭北地区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的诞生

三原是渭北地区第一个建立中共党团组织的县，也是陕西最早建立中共党团组织的县份之一。

1925年1月，李秉乾（又名李子健，陕西三原人）受团中央和党组织派遣，回到故乡三原县，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指导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省立渭北中学等校的进步青年成立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渭北青年社等组织。2月23日，李秉乾在三原北城二郎庙主持召开会议，接收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王云）加入团组织，并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原特别支部，书记姚志哲，共有团员7人，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5月8日，张仲实、张云汉、何维珍亦被批准入团。为适应斗争需要，按照团章关于团书记三个月进行一次改选的规定，共青团三原特支于6月7日改选赵宗润为书记，有团员12人。9月6日，共青团三原特支干事会成立，亢维恪为书记，王之鼎为宣传委员，张仲实为组织委员，团员发展到17人。与此同时，各中学亦先后成立了团支部，三原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学生运动有声有色，许多有理想、有志向的进步青



1925 年 8 月 9 日，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给恽代英和团中央的报告（部分）

年走上革命道路。

（四）共青团三原地委的成立

1926 年 3 月，三原共青团员发展到 40 人。在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又名吴华梓，湖北汉川人）指导下，特支干事会于 3 月 30 日召开大会，成立共青团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共青团三原地委）。赵宗润、王鸿俊、庞诚斋（临潼人）、贾怀庚（贾子明）、程士诚（三原人）5 人为执行委员，马文宪（三原西关人）、孙一君、杨培琪 3 人为候补委员。是日晚，共青团三原地委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团地委书记赵宗润、组织委员王鸿俊、宣传委员庞诚斋（后由孙一君继任）、学生委员会书记贾怀庚、非基督教委员会书记程士诚。

这次会议还成立了共青团渭北中学、三师、工职、庄里（属富平县）等 4 个支部。马文宪任共青团渭北中学支部书记，李琦任三师支部书记，唐金满任工职支部书记，严木三任庄里支部书记。4 月 5 日，渭北中学团支部人数已达 15 人以上，并成立了干事会，马文宪任书记。

当时根据农民运动发展需要，于 4 月 28 日成立了三原西关农运党团组织，党团书记由庞诚斋担任。5 月，三原团员已发展到 59 人。6 月，因赵宗润外出参加会议，共青团三原地委书记由王鸿俊担任。

同年 5 月，共青团三原地委派马步云和张振海从三原到泾阳，协助耿觉等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泾阳特别支部，马步云任书记。团三原地委先后隶属共青团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和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

1927 年 2 月，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共青团三原地委隶属团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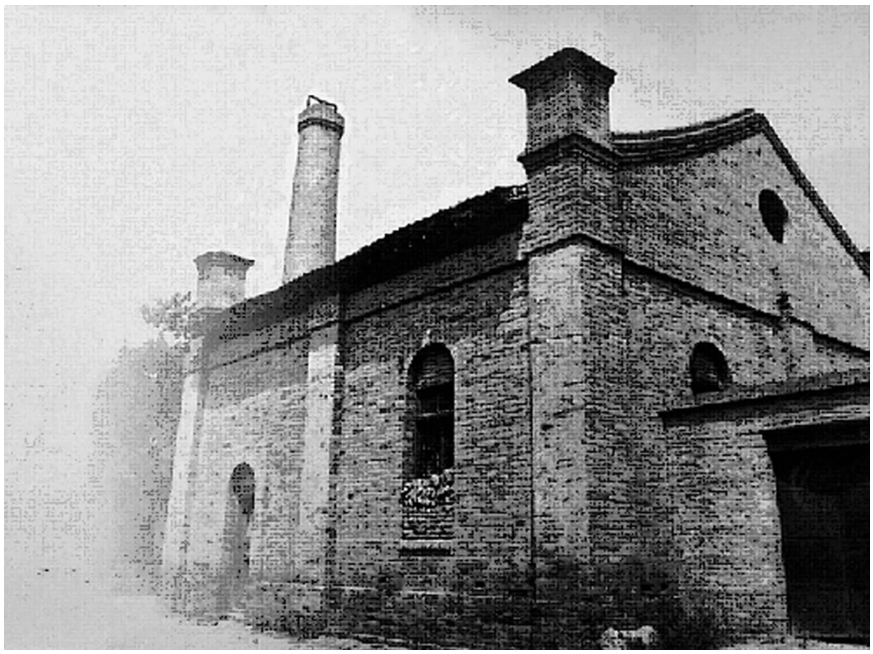
甘区委领导。4 月，共青团三原地委再次改选，由孟芳洲（又名士元，陕西洛川人）任书记。7 月，共青团三原地委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孟芳洲任书记。

二、 渭北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建立

1925 年 9 月至 10 月间，中共北京区委（1925 年 10 月改为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安体诚）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共青团中央派吴化之来西安整顿团组织。在赴陕途中路过河南时，中共豫陕区委委托他们在陕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安存真、吴化之到西安后，鉴于西安已有 5 名党员，便根据中共四大党章规定，于 10 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安存真（1925 年底安存真离开后，由吴化之接任），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7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务报告》称西安特支是党在“西北上的萌芽”。

继西安成立中共特支之后的 1925 年 12 月，吴化之来到三原，开始对三原团组织进行整顿，把年满 18 岁的优秀团员张仲实、王之鼎、庞诚斋、赵宗润、亢维恪、杨培琪、马文宪、赵伯经转为中共党员，在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①]召开会议，成立中共三原特别支部，书记张仲实，机关设在三职。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 年 1 月改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1927 年 3 月 22 日改属中共三原地委领导。中共三原特支先后下辖中共岐山小组、云阳小

① 1924 年 3 月，陕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改名为“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即今三原北城宏道书院。



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遗址

组和大寨支部、高陵支部。

1926 年 4 月，中共三原特支派在三原上学的高陵籍学生崔守仁、于廷林等回到高陵，并于 10 月下旬建立了共青团高陵特别支部，崔守仁任书记，隶属共青团三原特支领导。5 月，中共三原特支派严木三回富平庄里发展党员，组织建立了富平最早的中共组织。

1926 年 6 月，中共三原特支已发展党员 19 人。支部书记张仲实因毕业升学，书记由贾怀庚担任。下半年，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的岐山籍学生李琦（原三师团支部书记）、曹永丰回到岐山县职业学校开展活动，建立了党团小组，李琦为组长。

1927 年春，唐玉怀在三原武字区大寨堡主持成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中共组织——中共大寨支部，李鸿儒任书记。大寨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并在农民群众中发展中共党员。

2 月，中共三原特支派康效英（女，三原县人）、徐九龄（女，三原县人）到泾阳林桂巷女子小学任教，发展党组织。3 月，她们介绍武云绮（女）加入共产党，成立了女子小学党小组，康效英任组长。5 月，成立中共林桂巷女子小学支部，武云绮任支部书记。

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和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几乎在同一时期成立（三原特支比西安特支晚成立两个月）。这两个中共特支都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豫陕区委具体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是陕西建立的第二个党组织、渭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它的诞生，标志着渭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中共三原地委的组建与发展

1927 年 2 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于 3 月 14 日至 18 日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三原代表贾怀庚、刘炎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新建三原等地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3 月 22 日，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在中共三原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三原地委），书记张性初，贾怀庚负责组织工作，王之鼎负责宣传工作，农委书记庞诚斋，妇委书记王爱玉（三原县人）。中共三原地委负责三原、富平、高陵、泾阳、蒲城等地党的工作，下辖中共富平、高陵、泾阳、云阳、蒲城 5 个特支和省立三原渭北中学、第三师范学校、武字区大寨堡和机关 4 个党支部，时有党员 47 人。中共三原地委机关设在县城内渭北中学，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同年 3 月，中共三原地委在中共云阳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云阳特别支部，崔贯一任书记。5 月，中共三原地委党员迅速发展到 207 名。同时，中共泾阳特支改为中共泾阳地委。中共云阳特支改为中共云阳支部，归属中共泾阳地委领导。

这一时期，中共三原地委下辖的党组织有中共高陵、富平、蒲城 3 个特支和云阳、大寨、合字区、西王、蒙家、鲍四庙、渭北中学、三师、女中、炮兵营、机关等 11 个党支部。

1927 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军联军主政的陕西革命形势依然持续发展，三原农运、学运等革命活动仍然开展得轰轰烈烈，此起彼伏。6 月，冯玉祥倒向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开始公开反共，在陕西大规模“清党”，实行白色恐怖，陕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7 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突变的政治形势和

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地委一级建制，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富平、蒲城、旬邑特支和淳化第一高等小学支部及 6 个直属支部，时有党员 101 人。同时，中共泾阳地委改为中共泾阳区委。中共三原县委和泾阳区委均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共青团三原地委和共青团泾阳地委亦分别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隶属共青团陕西省委领导。

同月，三原民团勾结当地驻军田玉洁部捣毁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主席乔国桢、副主席唐玉怀被铺，三原武字区农民自卫队队长肖德印被枪击伤，农民自卫队被迫解散。随后，三原县农民协会主席庞诚斋亦被逮捕，三原农民协会组织解体，以三原党团为主要领导力量的农民运动很快陷入低谷，党团组织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第四节　大革命时期三原的国民运动和反帝斗争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三原的广泛传播，逐渐引起三原人民思想领域的变化。三原革命进步青年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驱逐陕西军阀势力相结合，把反对地方封建军阀的斗争提高到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三原青年进步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和渭北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组织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传播新文化、开展进步思想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渭北的建立和发展，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顺利进行，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力量

配备方面奠定了基础。

一、 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与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11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凡是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帮助建立。

1925 年 9 月，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临时省党部成立后，便通过发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省党部的核心骨干作用，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对国民党陕西地方党部的领导。

1925 年 12 月 13 日，赵葆华、张性初成立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张安人、王之鼎、关中哲、贾怀庚等均为县党部执委。自 1926 年 8 月起，西安中共组织曾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先后派赵葆华、方仲如、曹碧轩、张含辉、许才升、秋步月等分别到咸阳、乾县、兴平、旬邑、礼泉等地，一方面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动员进步学生、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筹备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另一方面，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统一战线的意义，积极发展党团员，创建党团组织。

1927 年 2 月前后，泾阳、乾县、礼泉、兴平、旬邑、咸阳都先后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县党部或临时县党部。国民党县党部的普遍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县党

部成立后，各地党团组织便以国民党县党部这种合法组织形式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各项活动。

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在1925年12月13日成立时，其宣言明确提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私有物而可以任意操纵的，中国的政权应当由人民来掌握，绝不是他们可以把持的。我们只有抖擞精神，团结起来，以热烈的心血，奋斗的精神，遵照中山先生指示我们的革命之路，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才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使我们逃出火坑，走到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上。"①

国民党泾阳县党部在筹备建立时就通过了《妇女运动》《农工运动》《学生运动》等5项决议案，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国民党礼泉县党部成立后，立即领导全县人民展开对恶绅县长陈钟秀的斗争，并发出《礼泉县党部为陈案告礼泉民众书》，揭露陈钟秀"草菅人命、胡摊滥派、纵吏殃民、敲骨吸髓、私养爪牙、拉票勒索、借公索贿"七大恶迹。县党部还成立了陈案委员会，一面组织群众清查其任内账项，一面派代表上诉其罪状。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陈钟秀终被处以极刑，为民除了一大害。

二、 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学生运动

（一）三原进步学生组织的建立

1. 渭北青年社

1923年8月，共进社领导人李子洲等毕业后来到三原渭北中学

①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咸阳地区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1987年8月,第11页。

任教，并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开展革命活动。1924 年初，蒲克敏、严木三等人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秘密组建青年同志共进社，联系进步学生，传阅进步书刊，研讨中国之前途。

1925 年 1 月 20 日，李秉乾由上海大学毕业回到三原后，他利用在渭北中学和第三师范任教之机，广泛接触进步学生，灌输党团基本知识。

李秉乾了解了青年学生中的一些情况后，从发展青年组织入手，认为“青年同志共进社”仅限于三师的同学，范围太小，不能适应青年学生追求进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重组范围更大的青年组织，向三原各校以至外县的学生中发展社员。

在李秉乾的倡议和支持下，由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姚志哲、薛应选、杨纯德、蒲克敏、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王鸿俊（陕西三原县人），渭北中学的贾怀庚、马文宪、庞诚斋、田怀德、梁俊琪、郝义，第三职业学校的张安人、唐金满、倪定国，女子中学的王爱玉、于云秀等人参加，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青年同志共进社”基础上成立了“渭北青年社”，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为蓝本起草社章。

1925 年 2 月 19 日，在渭北中学召开“渭北青年社”成立大会，通过了社章，选举产生了渭北青年社中央执行委员会，赵宗润为书记，王之鼎为组织委员，贾怀庚为宣传委员。渭北青年社执行委员会下辖渭北中学、工职、女中、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四个团支部，社址设在渭北中学。到 6 月，王鸿俊接任渭北青年社执行委员会书记，社员发展到 70 余人。渭北青年社的主要活动是发展社员，推动各校组织学生会，发动和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并于 8 月 4 日创办了

《渭北青年》期刊。渭北青年社在渭北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到了共青团外围组织的作用。渭北青年社的建立为创建青年团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1926 年 12 月后，随着党团组织日益壮大，渭北青年社职能弱化，逐步解体。

2. 渭北学生联合会

1925 年 2 月，三原各中学学生会普遍成立。为了统一领导学生运动，共青团三原特支在各学校学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学生组织——渭北学生联合会，9 月改名为三原学生联合会。

1926 年 6 月，三原学生联合会因刘镇华围城，张仲实去上海大学学习，联合会工作终止。

为进一步发挥学生会的作用，三原和西安地区的团组织共同研究决定统一全省学生组织。7 月 7 日至 13 日在三原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 10 余项反帝反封建议案，张含辉当选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

（二）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学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原县城各学校师生为声援北京，举行了反帝爱国大游行。同年，还举行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活动，公开演出了《列宁传》等剧目。之后数年间，在三原学生的感染和鼓动下，渭北周边各县的学生运动也纷纷开展起来。

1. 三原通电全国，反对北洋政府接受“金佛朗案”

1925 年 4 月 11 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5 月 4 日，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以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名义，在三原城隍庙召开 3000 余人大会，散

发传单4000余份，并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政府承认“金佛朗案”及善后会议所制定的国民会议条例，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2. 三原县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大会和“三师学潮”

1926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纪念日。3月15日，三原党团组织决定由渭北青年社发起，邀请三原各团体筹备成立“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纪念会，并由赵宗润、王鸿俊、关中哲等在纪念大会上演讲。3月18日，纪念大会在渭北中学操场召开，各校学生一律停课前往参加。但是，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程鼎臣却反对和阻挠学生停课参加。该校学生、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赵宗润因带领学生参加了纪念大会而被开除学籍，学校贴出布告公示，布告一出，立即引起三师学生的强烈不满。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渭北学联、渭北青年社等团体决定：赵宗润不离校，驱逐程鼎臣，声势浩大的“三师学潮”由此爆发。为了取得“驱程”斗争的胜利，三原党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通告各校学生会及渭北青年社支部，号召各校学生支援三师学生的革命行动，同时成立了“驱程大同盟”和纠察队。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程鼎臣被罢免，“驱程”斗争取得胜利。

3. 习仲勋在“三师学潮”中

1927年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白色恐怖。渭中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快愈好。”这个指示中提到的“原城”是三原县城的简称，“渭中”是渭北中学的简称，“杨某”指的就是渭北中学校长杨少农。

1928年初，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广大学生在该校党组织负责

人、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的领导下，掀起了与该校反动势力斗争的大规模学潮。同时，渭北中学党组织为反对该校校长杨少农迫害学生，也发动广大学生开展“驱杨”学潮。

习仲勋，1913 年 10 月出生于陕西富平淡村。1928 年 1 月底，14 岁的习仲勋从富平庄里镇立诚学校考入设于三原县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在富平读书时就参加了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并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中，共青团员习仲勋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入学就积极参加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每天晚上外出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采取多种方式在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久，发生的“三师投毒案”，让少年习仲勋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

1928 年 3 月，渭北中学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将杨少农赶出了该校。杨少农气急败坏，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和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 8 名，共青团员 3 名，进步学生 10 余人。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反动骨干分子到各学校担任校长、训导处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3 月 12 日，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校训导处主任魏海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将习仲勋等 9 名进步学生和党团员列入黑名单，企图打击陷害。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非常手段”对付第三师范学校反动训导主任魏海。

3 月下旬，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等开会，研究行动方案，决定实施毒杀魏海的行动，并指定由程建文负责实施，后由于计划泄露，行动未成功。三原地方政府和

军警在事发后的第三天早晨，包围了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镇压，武廷俊和三师党支部负责人李少华及习仲勋等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并被带上镣铐关押于三原县看守所，两个月后转入西安军事裁判所。

在狱中，14岁的习仲勋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屈服，他坚持革命信念，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开展机智的斗争。他们阅读党组织送进狱中的理论和文艺读物，互相鼓励要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和组织。他们还组织了要求改善伙食的说理和绝食斗争，并耐心启发同室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提高觉悟，不为反动政府卖命。习仲勋对党的忠诚和坚贞信念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誉。4月的一天，武廷俊单独与习仲勋谈话，郑重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习仲勋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因习仲勋年龄尚小，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不久，武廷俊在狱中被敌人杀害。由于习仲勋等人的坚贞不屈，三原党团组织没有遭到破坏。8月下旬，习仲勋等人经叔父习宗仁及党组织多方营救，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过问下获释出狱。

习仲勋早年的革命活动，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革命活动使习仲勋懂得，只有用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摧毁旧世界，建立理想的社会。同时，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给习仲勋以深刻的启迪。他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强大的条件下，革命不能单凭赤手空拳去进行，必须掌握枪杆子，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尚未成年的习仲勋又投身到了兵运斗争的艰险之中，走上了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征程。

（三）富平及渭北其他各县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4 年初，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富平籍学生严木三与同学蒲克敏、亢维恪、王之鼎等人发起成立了进步学生团体——青年同志共进社，吸收了该校一批进步学生参加。

在三原上学的富平学生赵宗润、严木三、张卓亭（云汉）、朱章汉等均为最早的青年社成员，赵宗润曾担任第一任执委会书记。数月后，李子洲、李秉乾在三原建立了团的组织，赵宗润、严木三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

这一时期，富平旅省（西安）、旅原（三原）学生中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王佛宗、党维榕、马冀云、赵宗润、严木三、何维箴、张卓亭等，经常在寒暑假时回到富平，在知识青年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联络返乡同学，组织宣讲团或宣讲组，在街头进行讲演，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富平的一些进步教师也开始传阅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青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以及《湘江评论》《中州评论》和《西安评论》等进步刊物，学习和研究新思想、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5 年初，富平旅省（西安）、旅原（三原）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陆续毕业回到富平，分布到各校任教。这时，富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并逐渐在全县形成了两个中心——县城的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和庄里镇立诚公学。在第一高等小学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王佛宗。王佛宗是富平县城人，在西安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 年冬从西安师范毕业，次年春到一高

任教，开始在教师和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介绍苏家恩、孟维谦等多名学生加入青年团。富平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刘恢侠思想守旧，对王佛宗宣传新思想极力反对，多方刁难。王佛宗毫不退却，坚持与刘恢侠进行斗争。

1925 年下学期，王佛宗领导发动了“一高学潮”，学生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刘恢侠。王佛宗与教师武景轩联合印发《驱刘宣言》。“一高学潮”得到旅省、旅原进步学生的支持。刘恢侠随后在三原印发剖白书，进行辩解，当即被赵宗润、刘铁山（树谋）、刘焱（兢民）、陈崇信等几十名旅原学生质问得无言答对。省县当局为平息学潮，只得将教育局长汝筱荀、校长刘恢侠悉行撤职，汝、刘的后台富平知事高耀东也被撤换。当年《新秦日报》报道：“富平教育界近日亦发现小风潮，学生方面以校长教员诸多不合，遂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另聘教员，教育局长汝筱荀因此辞职。”

1926 年 1 月 1 日和 1 月 15 日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连续发表评论，指出富平学潮是“因学生不愿受恶教育的压迫”、“为要求解放而发生的”，“是一个很光荣而最有价值的学潮”。此即时人所谓之“王武之乱”。“一高学潮”后，王佛宗、武景轩也离开学校。翌年秋，王佛宗应聘去旬邑教书。

富平立诚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严木三。严木三原籍朝邑，从少年时寓居富平。1925 年春，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到立诚公学小学部任教。他遵照三原团组织指示，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学生推荐《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启发青年的革命思想。这年三四月间，孙中山、胡景翼先后逝世。在严木三等人的鼓动下，立诚公学举行了追悼会，使革命

思想在学生中得到进一步传播。是年夏，严木三等以立诚公学的一批进步学生为主体，发起建立了进步的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通过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办壁报、开展文娱活动等形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为富平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5 年后半年，严木三根据共青团三原特支的指示，将立诚公学学生中的优秀青年社成员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师守约、葛凤梧、贺廷璋、赵承琨等 10 多人发展为团员。9 月，成立了立诚团小组，严木三任组长。团小组成立后，进一步发展组织，于当年年底时，又把表现积极的大部分青年社成员吸收为共青团员。翌年 1 月，根据共青团西安地委的指示，在立诚团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严木三任书记。

1926 年 3 月，中共三原特支通知严木三，由赵宗润、王之鼎介绍其转为共产党员。同月，习仲勋成为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社员。随后，严木三又介绍白振江、惠忠德、赵承琨、师守约等人入党。5 月，习仲勋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经中共三原特支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月，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严木三在庄里镇东门外张九渊的柏树坟园里主持召开党员会，成立了立诚党小组，严木三任组长，是为富平最早的党组织。党小组成立后，又吸收了宋懿模、宋光涛、葛凤梧、宋文梅等一批共产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10 月，根据中共西安地委指示，严木三、韩崇正、宋光龙三人在富平西北乡董家庄成立了中共富平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机关驻地董家庄。

1927 年 2 月，严木三受聘任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中共富平

特支领导机关转移至位于富平县城的一高学校。3 月，中共富平特支改属中共三原地委领导。

1928 年 3 月，中共三原县委指示将中共富平特支改建为中共富平区委，并派刘铁山回到富平，以一高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区委书记，区委领导机关设在一高。不久，刘铁山因敌人搜捕不能立足又离开富平。4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蒲克敏在富平视察工作，蒲克敏召集一高教员中的党员马文彦、严木三、石林侯、陈仲馨、石岳嵩以及校外党员石仲伟等在一高开会，成立了中共富平县委，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指定马文彦为县委书记。

中共富平县委成立后，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和农民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从此，富平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泾阳党、团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向旧教育制度发起进攻，迫使国民党泾阳县当局将县教育局长制改为教育委员会制，党、团组织负责人均为县教育委员会成员，各校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教育委员会改私塾为新型学校，经费由学区统筹安排，不再向学生收取。在教学内容上，剔除了《三字经》之类的旧教材，选用了适合民意的新教材。

1927 年 3 月 18 日，中共泾阳特支召开县一高、二高、女高和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团等 2 万多人参加的纪念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大会，悼念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

中共旬邑特支以宝塔高小为基地，领导学生开展新文化运动。特支书记许才升和共产党员宁克齐等鼓动宝塔高小学生会与旧势力

作斗争，夺了校长蒲鼎伯的权，赶走守旧派教师，烧毁反动书刊，使学生获得了看书、信仰、集会、结社、言论及择师的自由权。接着，成立了宝塔高小校务委员会，许才升任校务主任，宁克齐任教务主任，他们把这所宣扬反动复古思想的学校改造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阵地。

与此同时，高陵、耀县、淳化等县的学生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的影响下也开展起来，渭北一大批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受到了革命理论的启迪，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

三、 响应国民会议运动与反军阀斗争

（一）国民会议运动在三原

19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的号召。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中国共产党又于 1924 年 11 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1 月 10 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邀请，决定北上，共商统一全国大计，并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

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1925 年 1 月 21 日，魏野畴、王授金等在西安召集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实业会等 17 个团体开会，决定发起建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并发布启事，号召各团体加入。23 日，筹备会举行第

二次会议，36 个团体的 63 名代表到会。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此次筹备会改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推举俞嗣如为临时主席，魏野畴为临时书记。会议通过了《促成会宣言》和《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3 月 22 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推举王授金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

1925 年 1 月下旬，团中央派李秉乾回到三原，筹建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工作。同月，孙中山派屈武、董汝诚回到陕西做国民议会促成会工作。此时，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已成立，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成立。2 月，渭南赤水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等发起成立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八九个群众团体参加，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和通电。

2 月 4 日，李秉乾等联络三原及渭北各地 30 多个团体召开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宣言和通电。之后，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陕西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原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其活动主要是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陕西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许多工农商学兵联合会、学生会、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学校等团体纷纷发出宣言、通电，组织群众集会，反对“善后会议”，主张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

1925 年 3 月中旬，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三原，共青团三原特支立即发动学生、市民多次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李秉乾在悼念大会上做了《中山主义与实业救国》等专题演讲。4 月 21 日，各校学生、市民共同召开追悼大会，其声势和影响很大。

12 月，党团中央根据反帝反封建策略需要，再次号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指示各地党、团组织，恢复和重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8 日，共青团三原特支接到豫陕区委关于“十一月政变”的通告后，即于 10 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通告精神，会议通过六项决议。14 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研究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等工作。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由 5000 多市民参加的大会在三原城隍庙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及七项议案——支持召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免段祺瑞职权，组织真正的国民政府，恢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行动等自由权；停止关税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法律上应给人民以经济平等权；无产阶级在法律上应受同一待遇与保障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散发了大量传单。19 日，各校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宣传。20 日，三原团组织召开 14 个团体代表会议，重新成立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执委会由郝梦九、张耀斗、赵葆华、程鼎臣、赵宗润、关中哲等 7 人组成。

三原党团组织通过开展国民会议活动和悼念孙中山活动，动员和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北洋政府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1926 年 3 月 18 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 60 多个团体和 80 多所学校共约 5000 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

国的罪行。大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北洋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军警的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

北京大学三原籍学生、共产党员、共进社主要领导张仲超在惨案中遇害，更加激起了三原人民的反段情绪，各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二）反军阀的斗争

1. 驱逐吴新田的斗争

1925年5月1日，段祺瑞政府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接替刘镇华，代理陕西省督军、省长。吴部进驻西安后，骄横恣肆，继续欺压人民，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5月4日，西安省立一中学生踢足球时，将球踢出校园，落入隔壁西仓院内，被驻在那里的吴新田部士兵捡去。学生前去讨还，反被士兵殴打。更有甚者，在吴部军官指使下，大批士兵闯入一中校园，用砖头、铁锹、刺刀、木棒等凶器追打学生，有的还追到学生宿舍行凶。结果40多名学生被打伤，4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这就是震惊陕西的五四惨案。

事件发生后，一中全体师生罢课并发表宣言，揭露吴军暴行。一时间，西安数十所学校闻声而起，声援一中，并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组织学生后援会，要求吴新田惩办凶手，保护学生。吴新田置

若罔闻并袒护凶手。于是，西安团组织领导各校学生从5月10日起一律罢课。紧接着，西安学联代表张含辉根据魏野畴指示来到三原寻求杨虎城部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同三原团组织及学联负责人李秉乾、张仲实、赵宗润、王之鼎等同志一起研究，共同领导“驱吴”运动。

三原团组织多次召开驱吴大会，动员学生团结起来，组织演讲队，大力宣传动员各阶层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参加“驱吴”斗争；渭北青年社、渭北学联发表“驱吴”宣言，创办“驱吴”日刊——《血泪》；三原教职员工成立了渭北教职员联合会，支持学生开展“驱吴”斗争。

西安、三原团组织通过学联派出代表到各县宣传。西安党组织的魏野畴、方仲如等在三原召集了重要会议，把“驱吴”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会议提出了“到农民中去”、“到部队中去”的政治口号。会议动员党团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宣传队、工作队赴三原、渭南和华县一带开展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驱吴”斗争。同时，党组织还派人到陕军和国民军中，大力宣传统战工作。三原党组织派人赴河南与国民二、三军接洽，动员他们入关协助“驱吴”，并在沿途向驻陕各军进行宣传“驱吴”的重要意义，国民军和陕军抱着不同目的，也参加到“驱吴”运动行列。6月1日，各县学生一律罢课，投入“驱吴”斗争。

6月20日至7月15日，渭北学联、西安学联在省立渭北中学联合举办夏令讲学会。各校师生、学联代表六七十人参加听讲，李秉乾、魏野畴、王尚德、耿炳光、赵葆华等分别讲授“社会进化

论”、“帝国主义与中国”、“赤化煽惑与排外”、“最近国际之时局”、“最近中国之时局”、“最近陕西之时局”等内容，此次讲学会为“驱吴”斗争培训了骨干。

7月7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出席代表13人，分别代表陕北、陕南和关中等地学生联合会。在魏野畴的主持下，选举了省学联负责人，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机关。代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谋求学生永久利益和“驱吴”斗争等决议案。会后，组织了5个宣传队，分赴蒲城、汉中和高陵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使“驱吴”运动在全陕西迅速达到高潮。

7月上旬，国民军孙岳部和国民二军李虎臣（名云龙，字虎臣，陕西临潼人）部，先后从豫入陕直趋西安；杨虎城（陕西蒲城人）部的甄寿珊部亦由耀县南下向西安进发。15日，吴新田被迫率部撤离西安，逃往汉中，国民军进驻西安，“驱吴”运动取得胜利。

2. 三原军事会议

1925年8月，“驱吴”运动胜利后，北洋政府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为陕西军务帮办，由陕北南下的杨虎城部被孙岳编为国民第三军第三师。12月，孙岳离开陕西，李虎臣升任陕西军务督办，统管陕西军政大权。与此同时，吴佩孚、张作霖向国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河南督办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胡景翼已去世）指挥不当，在鲁西南作战失利，退守豫西。李虎臣派兵支援，后又亲自前往。但到达豫西时，国民二军和派去的援军已全军覆没。李虎臣遂与刘镇华开战，刘镇华在直系、奉系、阎锡山部队的支持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李虎臣部。李虎臣寡不敌众，率卫兵突围。1926年2月，李虎臣回到西安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再次

迎敌。

1926 年 4 月，刘镇华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率领 7 万镇嵩军（号称 10 万）兵临西安城下。5 月 15 日，刘镇华部攻占西安城西的三桥，完成了对西安的包围，一场惨烈的西安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西安守军最初只有李虎臣部以及国民军第二军第十二混成旅卫定一部两个团，人数不到 5000 人，李虎臣准备请驻扎在三原的杨虎城部前来支援西安。3 月 29 日，国民军二军、三军在陕将领李虎臣、杨虎城、朱子敏、田玉洁、卫定一、邓宝珊、冯子明、甄寿珊等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史称“三原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李虎臣辞去陕西军务帮办职务，通电下野；推举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并守中立”，并由杨虎城领衔发出通电。会后，杨虎城率领 3 个旅从三原进驻西安。

为了便于迎敌，统一指挥，军队统一改称为陕军，李虎臣被推选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反击刘镇华，保卫西安。守城期间，李虎臣和杨虎城几乎形影不离，平日互称“对点”（两人表字中均有“虎”字）。因此，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保卫战又被称为“二虎守长安”。

3．三原军民反击刘镇华围城的斗争

1926 年 5 月初，刘镇华派梅发奎和投降刘的陕军缑章保（驻蒲城）、麻振武（驻大荔），分兵围困渭北重镇三原，遭到三原驻军国民军二军和杨虎城部甄寿珊的英勇抗击。西安党团地委多次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出城到三原及渭北一带参与反对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

不久，围攻三原之敌被三原守城军击退。同年5月，由党团员领导的三原学生联合会发表《对陕局之宣言》，揭露北洋军阀残害陕西人民的罪行，号召全省军民从速组织联合起来，合力抗击北洋军阀，积极参与反对刘镇华的斗争。

8月上旬，刘镇华再次派兵围攻三原。三原守城指挥部派李子皋、王保民防守三原北城；甄寿珊部姚振乾驻防西郊一线重点守卫西关；党玉琨、韩秃子镇守东关及东郊临履堡一带；王绍猷旅驻守南关及河漕一线。

在此情况下，三原党团负责人张仲实、贾怀庚、王鸿俊等积极组织城内市民、商人、学生及各界人士投入斗争，并号召周边县的党团员学生回本县发展党团组织，支援三原守城斗争。针对城内驻军成分复杂、互不团结、军规军纪涣散的现象，学联组织学生宣传队到陕军士兵驻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深入营房慰劳伤兵，慰问战壕守城士兵，提高陕军官兵和群众的守城信心。同时，党组织还发动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协助守城士兵修工事，巡逻放哨，使守城将士深受感动。此时，西阳地区王永泰组织的“红枪会”也进入县城协助守城。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三原守城军民紧密协作，同仇敌忾，同心协力，与刘镇华围城之敌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敌军一直未能破城。10月12日，刘镇华被迫从三原撤围，三原人民最终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围困三原的镇嵩军撤退后，于右任经甘肃回到三原，在三原成立国民军第二、三军联军临时总指挥部，将其作为西安以外的陕军领导中心。在此期间，三原民众为支援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夺取西安反“围城”斗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助保障。

四、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后，由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的旨在对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进行文化、技能教育的运动。恽代英等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人物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其领导机关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者是各级学联，活动主体是青年学生。

平民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平民教育界的运动，现在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机会。”

三原平民教育运动最早起源于三原西关民治学校，由青年学生中的团员主持成立平民夜校，学生 60 多人，多为青年农民。渭北青年社、青年共进社等团体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是培养和选拔团员的场所，其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员。

通过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给广大青年农民提供了良好的革命教育和宣传平台。中共三原党团组织在平民教育中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加入了党团组织。

五、 声援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一）开展“非基”运动

1925 年下半年，以学生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在全省各地掀起高潮。“非基”运动是一场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争取民族平等的群众斗争。

三原是渭北地区教会势力最为集中的地方，基督教势力依仗不

平等条约，欺压人民群众，进行文化侵略活动。一些传教士还通过传教，极力散布迷信思想，毒害人民，并控制了一部分教育权。

三原共青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发起成立了“非基”同盟，并组织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领导学生、群众，开展了对反动基督教传教士的斗争。

12 月中旬，三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大游行，各校学生停课 3 天，组织讲演队，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唤醒民众参加反对基督教运动。

12 月 21 日，三原又召开“非基”运动大会，到会的有 20 余校师生，还有反基督教大同盟、县党部及渭北青年社等进步组织共万余人。大会一致通过收回教育权，要求县知事答应收回教育权，并不准当局保护教会教徒，教会学校同学应即日退出教会学校等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群众包围了县府和基督教教主的私宅，要求答复学生的条件，并砸毁了县城南大街的天主教谈道所，许多教徒都宣布退教，有些教徒还发表了脱离教会宣言。12 月 25 日圣诞节，“非基”同盟领导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县知事签字答应收回教育权。

1926 年 2 月，三原成立了渭北非基督教大同盟。从 2 月 23 日起，党团组织以 10 余天时间，组织党团员和青年以渭北学联的名义，在腊八古会上进行讲演宣传，内容主要是反对日本出兵满洲，揭露基督教的不法行径等。同时，演讲“基督教之罪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怎样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出兵满洲对于中国之害”、“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战争之意义”、“五卅惨案”等内容。每次听讲者 200 余人，每日发传单 2000 余张。通过演讲宣传，教育

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深恶痛绝，提高了渭北人民投身反帝斗争的觉悟。

（二）上海五卅惨案引发三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三原后，三原团组织立即印发传单，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恶行径，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6 月 13 日，三原和西安团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由陕西学联与渭北学联分别通告各县，开展五卅运动宣传，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渭北学联组织学生举行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学联主办的“驱吴”日刊——《血泪》刊发了关于沪案的《反帝特刊》。

6 月 14 日，三原教职工召开紧急会，发表通电：“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存亡攸关，愿共同策励。”随后，学联组织了宣讲团，分赴乡村讲演。

9 月，三原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通知精神，开展了九七国耻日纪念活动。渭北学联通告各校停课，组织宣传队伍到群众中开展反帝宣传，出版以反帝为主要内容的《三原学生》刊物，并通电反奉军阀，慰问上海总工会等。

（三）渭北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三原的成立

1924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通告。1926 年 1 月 5 日，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

提出开展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群众运动。1 月 8 日，三原党、团特支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贯彻中央通告精神，部署开展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的群众运动。10 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决定于 13 日召开三原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市民大会，成立渭北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选举王之鼎、赵宗润、关中哲、贾怀庚和张耀斗 5 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同时，成立了以程鼎臣、郝梦九、张文生、张耀斗、关中哲、张仲实、赵宗润等 7 人为委员的反日行动委员会，以姚志哲、王鸿俊、杨培琪、马文宪及张宇霞（国民党二军三师司令部代表）、王西园（县农会会长）、何干臣（女校教员）等 7 人为委员的抵制日货委员会。

12 日，共青团三原特支在书记赵宗润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确定了讲演同学，拟定了提案。13 日，三原市民千余人冒雪召开大会，各团体各界代表登台演讲，愤怒声讨，谴责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行径。大会一致通过了各项提案，以渭北青年社名义向日本各劳动团体发出了“请其抗议日本军阀出兵满洲”的通电。

六、 三原妇女运动

（一）三原妇女运动的兴起

清末时期，三原著名学者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在我国民间广为传播。改良后的《女儿经》在为人、处事、治家等方面，提倡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珍惜粮食、讲究卫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举止得体、注意礼貌等，时至今日仍值得学习和提倡。但是，受时代影响，《女儿经》仍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其宣传封建礼教，宣扬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男尊女卑”等，用以束缚压迫妇女，妇女除了同男子一样深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还受到神权、族权、夫权的压迫。

民国《续鲁桥镇志》记载，宣统元年（1909），东里堡绅士刘宗宴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倡导在堡中李氏家庙内创办东里男女国民学校。这所新式学堂具有相当规模，设有六个教室和操场，各有简易体育用具、风琴、鼓、号等乐器，并请三原名儒朱佛光等人讲学。1910 年，东里巨商刘昌显捐资在东里堡李靖花园创办私立女子高等学堂，这在当时全国乡村少有，在渭北各县可谓独一无二。同年，中国同盟会会员胡坪受其叔父胡子周及其兄长胡均兴办教育的影响，受其老师刘古愚实业救国的思想启迪，支银 300 两，在东关胡家花园创办起初等女学。这是三原县第一所初等女子学校，开创了三原办女校的先河。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是陕西靖国军辖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女子中学，使三原有了完整的女子中小学教育，为三原妇女接受新思想、新教育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入三原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青年学生群起响应，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迅速在三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三原女中的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战胜了几千年来女性自轻自贱的心理障碍，冲出校门参加游行队伍，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奸贼”等口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大革命时期的三原妇女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三原各学校开始传授新文化、新学说，一些进

步教师在课堂上批判孔孟学说中的封建糟粕，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传播。许多学生在学校受到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1．发展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建立妇女民众组织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三原女子中学教育从无到有，女子上学逐渐增加。三原城内女子上学多于农村，三原女子走出家门，积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教育。三原东关人康效英15岁入学，20多岁考入西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她在西安女师入学后，深感女师被封建文化笼罩，教规苛刻，远不及三原维新后的女子学校。在康效英的带领下，女师学生与反动封建校长康继尧展开说理斗争。在反对该校封建教规的斗争中，康效英表现非常出色；在女师罢免校长的斗争中，康效英得到了锻炼和考验。1925年10月，康效英成为女师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6年2月8日，西安妇女协进会成立，党组织派康效英、徐九龄回到三原指导三原妇女协进会的组建工作。回到三原后，她们深入各校，给学校学生带回许多进步书刊，并给进步青年讲西安学运斗争形势，同时介绍三原女子中学的王爱玉等进步青年加入了团组织。三原团特支干事会2月4日做出成立三原妇女协进会的决定，并指派康效英、徐九龄、王爱玉、于云秀为筹建三原妇进会的发起人。她们接受这一任务后，在三原女中、私立女子小学等学校，经过半个多月的积极宣传动员，发展会员23名。

2月18日，三原妇女协进会成立大会在三原私立女子小学召开，大会由康效英担任执行主席。参加会议的有五六百人，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陕西学生总会、三原特支、县党部、共进社、三原学

联、渭北青年社等社团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 5 人，候补委员 4 人，王爱玉任书记。

康效英在致词中讲道：“我们妇女受礼教压迫，也可以说叫中国的妇女是人的奴隶，是没有人权的，此等惨状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数千年，现在处此文明时代我们再不能忍受。今天成立妇女协进会团体组织，就是领导我们妇女去争取自身解放，要走出家门，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与自由到位……”她的激昂致词，赢得了与会妇女的广泛好评，在三原造成了很大影响。7 月中旬，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党反共”，中共组织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根据组织安排，康效英从西安回到三原，此时，她的肺结核病也越来越严重。康效英不能出门，就把家里作为党团干部秘密开会的地点。

1928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卖，她的亲密战友徐九龄、方鉴昭等五位同志被捕，6 月 17 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康效英闻讯后，五内俱焚，病情日益恶化。7 月，28 岁的康效英走完了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康效英作为新女性，在大革命时期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是陕西较早从事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品德将被后人所铭记。

从三原走出去的党的早期优秀干部王叔振（原名淑贞），1906 年出生于三原东关，1920 年考入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经常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7 年 4 月，王叔振与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结婚。婚后，王叔振任联军总政治部秘书，随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 月，根据党的指示，王叔振赴上海从事济难会的工作，营救被逮捕的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她冒着极大危险夜以继日地工作。1930 年秋，王叔振奉命调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从事妇女工作。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王叔振任中央政府秘书，负责记录译电、保管文件等工作，并将各地送来的报告加以整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1935 年 3 月，王叔振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秘密杀害，时年不足 29 岁。

2．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刘镇华围攻三原期间，康效英、徐九龄等组织妇协宣传会，深入大街小巷和守城军队驻地，揭露反动军阀刘镇华祸陕殃民的罪行，带领妇女参加反围城斗争。同时，女中党团组织派王爱玉等代表去西安，支援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5 年 12 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成立。1926 年 3 月，共青团三原女中特支成立，徐九龄任书记。

1927 年 2 月，受中共三原特支指派，康效英和徐九龄去泾阳县林桂巷女子小学任教，发展党组织。她们结合讲课，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教唱《国际歌》，组织指导学生办壁报、画漫画，进行革命宣传，在县城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3 月，介绍武云绮等加入党组织，并在女子小学建立了党小组，康效英任组长。5 月，在女子小学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党支部，武云绮任支部书记。之后，徐九龄调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3．开办妇女平民学校，开展反封建礼教斗争

1925 年 3 月，三原学联（渭北学联）成立，并在三原女中成立支部。12 月，国民党三原临时党部成立妇女部，徐九龄任部长。国民政府明令查禁妇女缠足，允许妇女改嫁，提倡女子上学等。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也积极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为三原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于右任在家中对长女于芝秀的教育非常重视，经常抽暇督导女儿习文功课，练习书法，并讲解天下大事，开阔其视野和见识。1925 年，于芝秀在三原渭北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右任支持爱女与曾在五四运动时期名扬国内的学生领袖屈武完婚，在门第婚姻尤盛的旧时代，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开明之举。

1926 年秋，于右任访问苏联后回到三原，将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送往苏联学习。在当时，女子出国留学者屈指可数，特别是他将自己的女儿送往时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留学，为三原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典范。

1927 年 2 月，三原妇女协进会和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共同创办了三原妇女平民学校，开学时学生有百余人，成年妇女 70 余人，年轻女生 30 余人。学校周围墙壁上贴满了“妇女解放万岁、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① 等标语。

三原妇女平民学校的成立，推动了三原及渭北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

1927 年 3 月，中共三原地委成立，王爱玉担任妇委书记，领导三原的妇女工作。三原妇协会依据《陕西暂行婚姻条例细则》调解和处理了许多婚姻纠纷，维护了广大妇女的权益。

1927 年初春，黄侠仙（黄子文之姐，黄子祥之妹）和郝祖义在武字区郝家村戏楼上举行了文明婚礼仪式，郝梦九代表家长讲话，

① 选自《陕西国民日报》,1927 年 2 月 21 日。

号召大家破除封建婚姻，实行自由恋爱结婚，议程很简单，没有磕头，只有鞠躬，参加婚礼的群众很多，戏台两旁书写有“握手共行平等礼，同心合唱自由歌”的对联。黄侠仙与郝祖义的文明婚礼在武字区影响很大，为三原妇女婚姻自由、婚事新办、移风易俗做出了榜样。

大革命时期的三原妇女反帝反封建运动，是渭北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原妇女协进会是渭北地区最早的妇女团体组织。渭北党团组织成立后，三原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并推动了渭北妇女运动的发展。三原的妇女运动为渭北妇女参加革命解放斗争、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妇女干部，它在陕西妇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三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准备与初创

第一节　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

一、 渭北地区早期的农民运动

1923 年 11 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就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开展国民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部署，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①

1924 年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陕西地区国民党组织得以建立。特别是国民联军入陕和西安城的解围，极大地推动了陕西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民国初期的渭北农民，因痛恨残酷的军阀压迫，便以传统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第 201 页。

“交农”方式进行反抗，此时期“交农”只有经济上的要求，即减租减税改良待遇等。随着进步书刊的广泛宣传及共产党人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渭北农民运动的目标开始提高，激烈程度也日益加深。中共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建立后，积极筹建各种农民组织，通过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组织农民反抗军阀和地主劣绅。

1926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目前农运计划》，要求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指示陕西“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的渭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具体组织下，已开始由民初“交农”只为单纯经济目的向经济、政治目标并重的方向转化。正如 1927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全陕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陕西农民并不与从前相同，我们从睡梦中觉醒起来，认清团结的力量是伟大的，更认清了迅速的获得幸福与自由惟有武装自卫。”① 这为此后中共在渭北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西关农民俱乐部和西关农民协会的成立

三原县的党、团组织建立比较早。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帮助建立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党、团三原组织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运动。

在共青团员的积极宣传鼓动下，三原农民俱乐部于 1926 年 2 月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203 页。

20 日（农历腊月初八）在县城西关民治小学内成立，到会七八百人，会场高呼“反抗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争夺民众之自由权”、“农民团结万岁”[①] 等口号。

三原农民俱乐部成立后，每天有三四百农民到俱乐部活动，开讲演会、讨论会，商讨组织农民协会和平民夜校等问题。2 月 26 日，三原平民学校（夜校）在农民俱乐部成立，上课农民 30 余人。夜校讲授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常识、时事讲话、唱歌、珠算等学科，结合实际对农民进行革命理论教育，使农民懂得“农民之痛苦，痛苦之来源”及“解决之方法”,[②] 懂得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之仇敌。农民夜校为农民协会的建立起到了思想准备和培训骨干的作用。

1926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三原特支为了加强对农运工作的具体领导，决定由庞诚斋为书记的农运党团具体筹建三原西关农民协会。5 月 9 日，三原第一个农民组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成立，张振海任主席，会员 60 余人，协会驻地在三原西关民治小学。

（二）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 年冬，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遵照中共中央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的指示，趁冬季农闲和学校寒假之机，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县 8 个区选派 50 多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培训学习。史可轩亲任讲习所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509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48 页。1926 年 4 月 5 日《共青团三原地委给团中央的第二号报告》。



史可轩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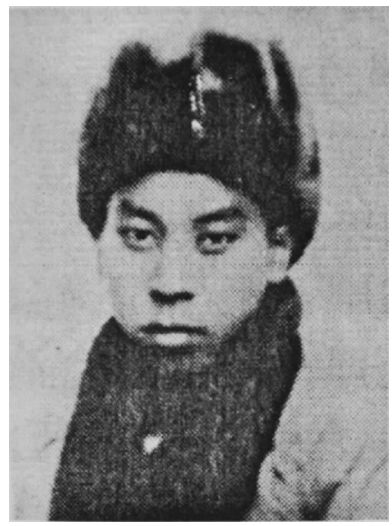
所长，学习班实行军事编制管理，统一服装食宿。教官多数来自政治保卫部，授课教员有崔佚帆（北京人，由广州农民讲习所来三原）、魏野畴、庞诚斋、乔国桢、马文宪、马价人（时为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等，教材多是江西编写的油印件，教学内容有如何宣传教育组织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等。

1927 年 2 月 7 日《陕西国民日报》载：“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情形……这次听讲的大部分是初小教员及各农协委员，听讲者日渐增加，达到100 余人，于本月（1927 年1 月）26 日期满，因旧历年节关系，未延长讲演日期……”此次讲习班颇受广大农民欢迎，不但为三原的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而且对促进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武字区农民协会

1926 年 11 月，从毛泽东在广东举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陕的共产党员乔国桢和亢维恪等人来到了三原武字区，与共产党员唐玉怀、郭明效一起，走村串户，调查民情，传播真理，发动群众。乔国桢每到一村，便向大家讲：“农民协会是咱们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

遭土匪抢劫，我们就要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①] 团结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乔国桢

1926 年 12 月 14 日，武字区农民协会在陵前镇大寨村汉圣母庙成立，乔国桢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张振海、郭明效、薛廷俊、侯永益、肖德印等为委员。大会宣布撤销民愤极大的武字区民团王厚安的团总职务，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自卫团。之后，武字区 36 个村堡中建起 5 个农协分会，会员达 1000 多人。从此，广大农民扬眉吐气，加入农协会的人越来越多。乔国桢在三原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四）云阳农民协会

1926 年 10 月，西安解围之后，中共三原特支派共产党员崔贯一回云阳组建云阳农协会，并担任云阳农运指导员。此前，中共三原特支安排当地共产党员张振海、雷炳南在云阳红枪会的基础上改建农民自卫团。农民自卫团建有党小组，崔贯一任组长。同时成立了云阳农民协会，发展会员 1000 余人。农协会举办农民夜校、禁烟戒赌、治理农村秩序，深受农民的支持和信赖。

---

①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咸阳地区农民运动》，第 144 页。

（五）陕西农民协会渭北办事处

1926 年 11 月，农运工作完全转向公开活动，三原县、区、村农协组织广泛成立，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三原成为陕西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出现了“农民的事情农民管”、“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的政治局面。三原广大农村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推动了渭北地区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7 年 1 月，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在三原设立渭北农民运动办事处，由马价人、乔国桢、严木三 3 人负责，指导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运工作。1 月 24 日至 28 日，渭北农运办事处在渭北中学召开渭北各县农运人员及各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联席会议的有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县做农运工作的人员及陕西青年社三原地方团、三原妇女协进会等团体代表，共 20 余人。会议交流了三原武字区、西关、泾阳县云阳及富平县建立农民协会的经验，讨论通过了《农民要求决议案》《整顿农民组织决议案》等文件。

（六）三原县农民协会

中共三原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关于“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我们宜全力去做”[①]，“党到农民中去”[②] 的指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51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59 页。

示精神，加强了对渭北特别是三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7 年 4 月 2 日，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渭北中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农协代表 38 人，农民群众及各学校师生 3000 余人。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代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驻渭北特派员，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代表，国民军联军驻三原部队代表及泾阳、高陵等地代表，共 60 多人应邀到会。会议选举庞诚斋为三原县农民协会主席，乔国桢、唐玉怀、马文宪、武纯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当时报载："由此可见，农友对农协之拥护与需要，社会各团体对农协之热烈与希望也，记者曾在北京、上海各地参加过许多大会，未有睹如此之盛况也。"①

1927 年 5 月 11 日，驻户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何经纬部捣毁农民协会，残杀农会会员和工作人员，打死 11 人，打伤 40 多人，史称"五一一"惨案。"五一一"惨案的消息传到三原，三原县农民协会按照《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为户县不法驻军何经纬屠杀农友宣言》的精神，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声讨大会，愤怒声讨何经纬，声援和慰问户县农友。为了坚决打击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宣布"地方旧有政治组织机关，如旧农会、乡治局、民团局、保卫团等，本为农村统治机关，应即取消。"此后，出现了"由农民协会来管理地方一切、执行一切"的新格局。

三原县农民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全县区、村农民协会的建立。全县 8 个区中有 6 个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620 个村成立了村农民协会，会员达 2 万余人，其中武字区参加农民协会的有 1200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521—522 页。

余户，会员达1万余人。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各区还建立了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卫团，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力量，在农民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泾阳县设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4个区、50个村的农协会。富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3个区、284个村的农协会。耀县农民协会办事处领导9个区、65个村的农协会。淳化县的西区亦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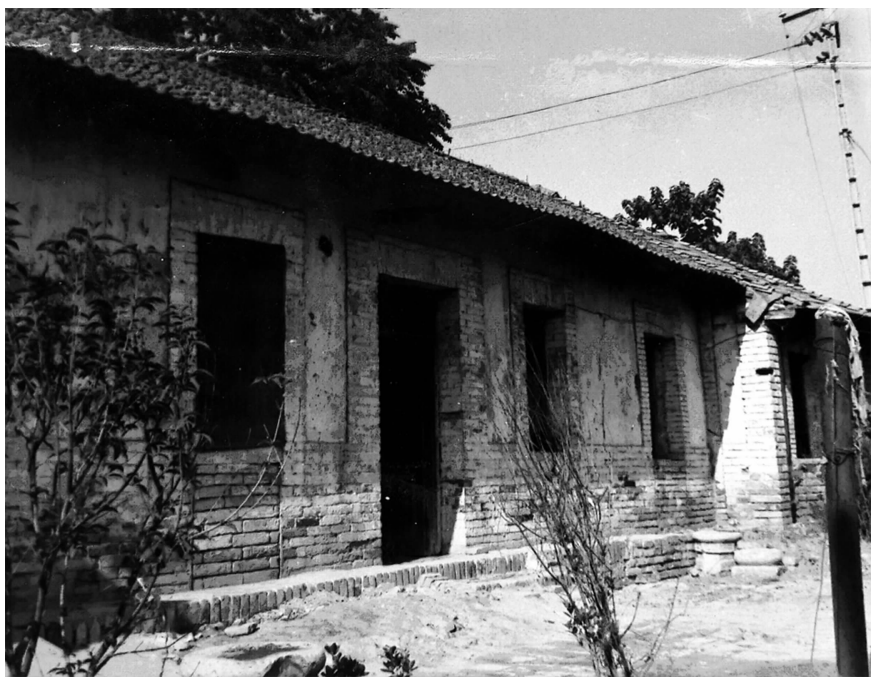
（七）纪念列宁万人大游行和反英等群众运动

1927年1月18日，三原党团组织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名义，召开了纪念革命导师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群众大会。三原县武字区农民协会，富平县石桥农民协会和泾阳县云阳、鲁桥（今属三原县）农民自卫团等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始，全体人员向三位革命导师遗像行三鞠躬礼，高唱《国际歌》。会上，进行“自由演说，有讲演三位导师史略，纪念三位导师意义，列宁与中国民族运动，列宁与农民等演说”①。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这样有群众的大规模的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三位革命导师大会，不惟在三原、在陕西，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②。

2月中旬，三原县党部为了扩大反英运动，从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抽派50多名学员组成反英宣传队，深入农村向群众揭露英帝国侵华罪行。当月，武字前区农协会召开了反英运动大会，通过并印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11—51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11—512页。



三原县农民协会旧址

发了《武字区农民协会反英宣言》。

4月27日，由县党部、县农协发起，在渭北中学召开了成立红色五月纪念筹备会，到会的除县党部和县农协会外，还有三原各驻军及县府各部局、三原学联、妇协会、陕西青年社三原地方团等37个团体参加。会议决定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等纪念日集会活动。三原县召开的五一纪念大会有万人参加。[①] 在红色五月活动中，三原地区广大农民的反帝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二、 农民协会在三原的蓬勃发展

1926年5月9日，三原县第一个农民组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成立，张振海任主席，会员60余人。

1926年11月，乔国桢来到三原。12月14日，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协会。在乔国桢的带领下，武字区农民协会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撤销地亩附加税和防灾之类的“麦米存”附加税，减轻人民负担；宣布禁烟查赌，劝喻农友不要沾染吸大烟，戒除耍赌恶习，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放足剪发等新风尚。武字区农协会还为革命青年公开举行新式婚礼，对破除封建礼教和陈规陋俗，提倡新风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乔国桢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农运大王”。三原县农协会成立时，武字区参加农协会的有1200余户，会员达1万余人。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23页。



乔国桢在三原武字区开展农运时的旧居

在武字区农协成立大会上，公开审理了统治一方达8年之久的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安收受贿赂、欺压农民案件，当众撤销其民团团长职务；此后，又将假借农协之名招摇撞骗的土豪赵某扭送县农协惩办，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武字区土豪崔某霸占焦村胡老本土地10多亩，长达10多年之久，农协会以理公断，勒令把地退还原主；同字区农协会根据群众揭发劣绅胡某霸占公产苇子园取利一事后，经查访核实，召开了斗争会，并令胡赔退了私吞的300元苇子价款，当场宣布将苇子园收回，由县立高小管理。

1926年冬，肃字区各地农民自卫团相继成立。1927年1月23日在西阳镇召开区团成立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均执长矛，全体武装。

1927年1月24日至28日，为了加强对渭北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省党部渭北农民办事处特召集在富平、蒲城、耀县、高陵、三原、泾阳各地做农运工作的人员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联席会议，并邀请三原县党部、共青团三原地委、三原妇女协进会等团体参加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民要求决议案》等。

1927年2月15日，鲁桥镇农民自卫团成立。鲁桥镇经常驻扎国民党军队，“农民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年来受军阀骚扰，早已感觉团结自卫之必要”。[①] 参加鲁桥镇自卫团成立大会者有武装团员1000余人，非武装农民2000余人。会上高呼“农民自卫团万岁”、“农民协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13—514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13—514页。

3 月，同字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三原三姑庙（今三原大程老庙村）举行，到会会员 1500 余人，“四方老少男女都踊跃参加”，是该区“破天荒空前未有之盛会”。①

4 月，军字区农民协会成立，同时设两个农协区分部。

4 月 2 日，中共三原地委在渭北中学召开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1927 年 4 月 11 日《陕西国民日报》载：“自县筹备委员会事前函达各团体邀请参加大会后，各团体异常热烈，皆赠有各款式的祝词 60 余处”，“渭中大操场设有讲台，讲台墙中央悬有总理遗像，场中竖立约二丈高杆，杆上悬挂有三原县农协会会旗”，“开会时雨乃渐大，会场全体民众衣帽俱湿未有一人走动，并且个个民众精神更为振奋，由此可见，农友对农协之拥护与需要，社会各团体对农协之热烈与希望也……”。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农协代表 38 人，农民群众、各校师生计 3000 余人，省农协筹备会代表侯启仁，省党部驻渭北特派员张性初，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代表王子新、郝梦九，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徐惟烈，国民联军驻三原部队代表及泾阳、高陵等地代表，共 60 多人应邀到会祝贺。会议选举庞诚斋为县农协主席，乔国桢、唐玉怀、马文宪、武纯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县农协在中共三原地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县农协会及区农协的相继建立，对促进三原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据 1927 年 4 月 2 日《陕西国民日报》报道：“该县农民运动之发起，为时不过两月之久，各乡农友纷纷要求组织，时经渭北办事处派员下乡指导及三原党部之热心提协，加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516 页。

之史可轩农民讲习所在三原举办，为各区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有力地推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 年 4 月 10 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通电全国，宣布誓师东征，完成国民革命。三原县农民协会两次组织 40 辆小车运输队，把当地征集的给养送到了军队驻地。

同年 5 月 20 日，武字区召开区农协联席会议，要求县署减轻粮赋及为农友借贷，并函呈救灾赈济会，要求县署对部分遭灾地方停征或减征赋税。武字区农协会组织农民与县、区当局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其撤销了“地亩附加税”和防灾费之类的苛捐杂税，并减轻农民的田赋粮负担。6 月，三原县署奉令向农民加派烟款 10000 元，并命令用银币交纳，又规定农民除纳田赋正粮外，每两正银加征 2 升小麦，各区农民俱感困难。

7 月 1 日，县农协召集区农协联席会，做出抗款决议，并派出代表同县署交涉，据理斗争，县署不得不做出让步，减轻了农民负担。

由于军阀混战，土匪趁机拦路抢劫，人民群众日夜不安。为此，农协会自卫团组织开展了武装打击土匪恶霸的斗争。军字区农协会逮捕了惯匪头子肖保清，提交县农协会转县公署严办。泾阳县云阳区农民协会捕获罪大恶极的土匪 3 名，解送到三原，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下令，在三原公开进行了处决；后又捕获土匪 7 名，缴枪 8 支。这些举动，有力地打击了土匪恶霸势力，维护了地方治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称赞。

1927 年 6 月，武字区农协会副主席唐玉怀出席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作农运的经验和目的》的发

言。同年夏，力字区农民自卫团成立，到会二三千人，“甚为严整热烈”。

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三原县农协组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区农协培训骨干 70 余名；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提高觉悟；召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各地农协五六千人参加，参加群众亦达五六千人。当时报载，“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不仅是在三原，在陕西即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县农协还发布宣言，号召农民发展、巩固农协组织，与土豪劣绅算账，为自身而奋斗；通告各区协，严查破坏农协之徒，送县农协惩办；成立红色五月纪念筹备会，分别举行‘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活动，以继承先烈遗志，振奋革命精神。召开各区农协联席会议，要求并实施减轻粮赋，农友借贷及选举出席省农协会议代表诸问题”。农协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农村的封建势力、土豪劣绅和反动的衙门官吏，积极为穷人办事，在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以及防匪、治安、禁赌、惩办坏人、解放妇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马列主义宣传资料

大革命失败后，渭北三原各地农民协会被解散和捣毁，农民运动转入低潮。

三、 渭北地区早期农民运动的特点

（一）国民党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举措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农民运动高度重视，不但成立了中央农民部专责农民运动，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创办农民运动刊物，宣传国民党的农民运动主张，而且成立了专门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农运特派员赴各地宣传、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等，并得到了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有效地促进了渭北农民运动的开展。

（二）农民协会的治理功能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

“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会一度成为乡村中重要的权力主体，它在武字区乡村创造了一种新的纠纷处理机制，这种纠纷调解既有农村调解传统的延续性，也体现了革命型乡村的现代治理模式，它将阶级矛盾纳入了治理视野中，农民能够从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焕发了农民的阶级情感，增强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即农民组织应维护农民（佃农）阶级的利益。

（三）农民协会和土豪劣绅之间的对立日趋激化

农民协会成立的动机是夺取乡村政权，其改造治理乡村必然冲击到地主、绅士和民团的势力，地主和土豪劣绅往往有强大的民团武装作为确保自己权力的后盾，农会与地主、绅士和民团这些传统

势力的冲突，使农会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与之对抗。在反动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农会与之冲突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农会与其反对势力的冲突往往以武装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阶级斗争的早期尝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农民运动干部乔国桢率先在三原武字区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继而黄子文、唐玉怀等中共早期党员成为武字区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大城市中求学，开阔了革命视野，接受了革命思想，回乡之后开始组织农民运动，这些中共地方精英是渭北农民运动发生的关键，并发挥了革命的“催化剂”作用。

（五）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赢得了民心

农民联合起来参加革命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是出于远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渴望尽快解决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试图保护和追求他们个人生存及家庭具体的利益需求。中共的土地革命满足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愿望，农民的政治境遇和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广大贫苦农民从革命中获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真正朋友和引路人。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看到了希望，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他们支持中共并参与革命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形势与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在渭北的贯彻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格局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政治风云突变，一时乌云密布，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迅速由高潮转入低潮。

5 月初，冯玉祥在西安接受武汉政府命令，将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连克洛阳、郑州等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

1926 年 12 月至 1927 年 6 月是陕西农民运动的高涨阶段。在中共陕甘区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农民运动发展迅猛，气势磅礴。

革命形势胜利向前发展，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空前高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不满、恐惧和仇视，冯玉祥违背自己的誓言，在 6 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在豫陕两省开展“清党反共”活动，“礼送”苏联专家回国，赶走了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强制解散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冯玉祥的“清党反

共”，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陕西的大好局面，陕西和全国一样，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二、 三原革命转入低潮

1927 年 7 月后，三原革命形势同样也遭到严重破坏和镇压。各级农民协会相继被捣毁或强制解散，停止了一切农民运动，禁止农民武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三原组织机关由繁华的南城转移到北城。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渐恶化，党组织秘密转入农运基础好的武字区等地。三原人民的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走向低潮。

（一）农民协会被捣毁，乔国桢、庞诚斋等被捕

1927 年 7 月 4 日，武字区原民团团长王厚安勾结三原国民党冯玉祥部驻军王少猷突然进攻武字区农民协会，击伤了农协委员肖德印，群众把肖德印连夜送往富平庄里镇医院治疗。武字区农协主席乔国桢和副主席唐玉怀悄悄去庄里镇医院探望肖德印时，不幸被军阀胡景铨（胡三）逮捕，当即送往三原关押。乔国桢、唐玉怀被关押期间，武字区前去探望的群众络绎不绝，保状呈文送得不停，在群众的影响下，国民党当局对乔国桢、唐玉怀未敢下手。9 月，在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保卫部保卫队长许权中等的营救下，乔国桢、唐玉怀获得释放，回到武字区。不久，乔国桢接到中共陕西省委通知，离开武字区接受新的任务，临行前他对前来话别的群众说：“我很感激武字区人民群众，是武字区人民救了我，是武字区这块宝地锻炼了我。我虽然离开了这里，党还会派人来，

你们要继续好好干!”

7 月 23 日，三原驻军田玉洁部又强制解散了三原县农民协会，逮捕了县农协会主席庞诚斋和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领导人张耀斗，捕杀了一批共产党员，三原及渭北各区农协会相继遭到破坏，城乡恶势力开始猖狂活动，三原革命形势遭到严重破坏。

（二）史可轩美原被害

史可轩，陕西兴平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 年夏，考入太原陆军学校，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1914 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冬，时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遵照中共陕西省委加强对农民运动指导的指示，趁冬季农闲和学校寒假之机，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了渭北农民运动讲习所，颇受广大农民欢迎，为三原农运培养了一批骨干，对促进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7 年 6 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后，即电令其参谋长、陕西省代主席石敬亭把史可轩和他率领的政治保卫队、中山军事学校学员队分别调往潼关、郑州，企图分而治之。

为了使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一是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二是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中共陕西省委经反复权衡，决定让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

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

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当即召开了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干部会议，决定军校停办，发给学员武器弹药，将政治保卫队和学员队改编为 4 个营，由许权中担任总指挥，向北开拔。7 月 15 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当晚，史可轩在草滩镇一个古庙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处境，决定由渭河乘船东行。第二天部队由草滩出发，3 天走了 45 公里水路，到达临潼县交口镇，司令部设在交口小学。史可轩一面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一面派张育生营长持信与国民军第二军驻陕的上层人物联系，以防发生不测。这时，邓宝珊来信联络，欲与史部合作组织一支“左”派力量，从南路入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合作，抵制反动势力。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是扭转西北形势的机会。

可是，汪精卫武汉叛变的消息很快传来，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依据形势的新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与宜川、清涧一带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石谦部靠近。省委派崔孟博（崔物齐，常委，负责宣传）来交口镇传达了这一指示。

当晚，史部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研究了总的形势，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史可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7 月 30 日，部队从交口镇出发，进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第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

田的旧交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以筹备粮草为名派营长张育生前去侦察田的态度。田生春对张很不友好，但张却并未在意，加上他怕伤害了史、田之间的“和气”，因而返回时没有对史可轩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说田生春的态度很好，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史可轩过分信赖自己与田生春的旧交关系，遂带数名警卫人员，身着便衣，乘马车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不料，田生春在反共逆流之下，又受其上级指使，根本不念旧情。当史可轩和随员刚进入美原镇，田即令关闭城门，并派其参谋长前来“迎接”，将史可轩带进司令部，假意设宴招待，先将史可轩的警卫人员缴械，随即将史可轩捆绑，逼其投降。史可轩义正词严，坚贞不屈，大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无好下场。当夜，史可轩惨遭杀害，年37岁。

史可轩牺牲后，国民军第二军各部立即拉开合围的阵势，政治保卫队处境非常危险。部队在党的领导和许权中的带领下，迅速脱离了险境，到达临潼县关山镇。在保证由许权中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改为暂编第三旅，军校改为教导营。在此期间，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站不住脚的党团员入伍，既保护了同志，又壮大了部队力量，改善了军队的成分。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为1928年渭华起义的主力。

史可轩牺牲一年后，在靖国军故友的帮助下，将史可轩安葬于三原东里花园内，并立石碑，上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之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枪决了田生春。1957年，史可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了“史可轩烈士之墓”墓碑。



史可轩烈士之墓

三、 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与工作重心的转移

大革命失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亦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子洲前往汉口汇报工作，并听取了八七会议精神。

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县委负责人和青年团代表，共15人。省委常委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耿炳光代表省委做了政治报告。

1927年10月，黄子文从武汉辗转回到西安，与中共陕西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省委鉴于三原系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大革命时期三原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即决定派黄子文回三原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重新组织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并任命黄子文为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负责全县农民运动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三原组织积极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决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

四、 渭北地区的“交农”斗争

冯玉祥公开反共后，陕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10月23

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动员很能做农运的同志及可能做农运的同志前往乡村中去，在最短期间要恢复农协或成立其他各种农民组织”。①

中共三原县委按照省委指示，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组织领导了渭北农民起义，特别是三原的“交农”围城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一）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

1928 年 4 月中旬，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群众基础较好的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举行“交农”斗争，并由黄子文具体组织和领导此次斗争。黄子文、唐玉怀利用他们掌握武字区民团的有利条件，于 4 月 20 日开始联络心字、军字、力字区的群众准备开展“交农”斗争。当时的口号是：“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23 日，以鸡毛传帖形式通知“交农”时间、集合地点以及各路负责人。24 日，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以及石



黄子文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24—25 页。

桥等地两三万名农民群众扛着杈耙、扫帚等农具，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的口号，从张家坳、陵前一线南下，沿途新庄一带的农民也纷纷加入，几路群众向三原县城进发，将三原县城团团围定。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的群众围攻北门和西门；同字区、力字区及富平石桥一带的群众围攻东门和南门。25 日，围城群众增加到三四万人，许多群众把杈耙、扫帚烧毁，表达了不减免税负再不种地的决心。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断给围城群众送馍、送水。在城内驻军赵寿山部当团附的黄子祥趁黑夜从北城上将馍吊下来支援围城老百姓。26 日中午，国民党三原县县长马润昌慑于群众压力，向围城群众说道：“你们后退一步，我给你们免粮、免款。如果不相信，马上出告示为证。”围城群众不肯后退，马润昌又让人从城里用竹笼吊下蒸馍，对围城群众表示“慰问”。27 日，黄子文继续动员群众围城，直到县政府贴出免除当年粮款的告示。此时正值种棉季节，为了不耽误农时，党组织决定撤围，坚持 4 天的“交农”围城斗争以当局满足了群众的经济要求而胜利结束。

富平、石桥等地农民，也随武字区、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农民参加了三原的“交农”斗争。“交农”围城斗争的胜利，锻炼了中共组织，激发了老百姓的革命热情，使他们看到了希望。这次“交农”斗争和团结的力量，为以后争取政治上翻身解放及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次预演。

（二）泾阳农民“交农”围城斗争

泾阳县“交农”围城斗争是与三原县“交农”围城斗争相互配合、同时开展的。

1928 年 4 月，中共三原县委派刘铁山到中共泾阳区委担任书记。中旬，中共泾阳区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在张家山召开会议，决定举行“交农”围城斗争。随后，区委又在千云乡三郎庙学校召开干部会议，确定了起义时间、攻城方案，设立了总指挥部，指定了城内和围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指挥和联络人员，并发出鸡毛传帖，通告各乡农民按时参加。

4 月 26 日，在起义总指挥、共青团泾阳区委书记张焕文和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的带领下，万余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农具，分别从崇文、永乐、梁宁、鲁桥、口镇、白王、兴隆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沿途各村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不断扩大。西北乡农民途经石桥时，烧毁了烟膏局的账簿。下午 3 时，上万“交农”农民齐集汉堤洞。张焕文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后，由雷志学率领“交农”农民直逼泾阳县城。傍晚前，农民包围了县城。泾阳县县长杨增润和劣绅贾千秋、王觐臣等登城观望，“交农”农民纷纷找椽、绳索绑梯上城。因事先约定的马仙舟率领的地方武装未到，除西门外其余各门未按时发出信号，已经攻上城墙的部分农民在守城军警的反击下后撤。

4 月 27 日黎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调集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镇压泾阳围城农民，围城指挥部当即下令解散。围城农民解散后，泾阳县警察局到处搜捕“交农”运动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并查封了城内姚家巷小学和桥底完小，泾阳党团区委遭到破坏，泾阳农民“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三）高陵党组织“清算”恶绅的斗争

1928 年 3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马文宪到高陵县调查并指导农运

工作。同月，中共高陵特支改建为中共高陵区委，负责高陵县党、团工作，马文宪担任区委书记，白文范任组织委员，黄承先任宣传委员，下辖东街小学支部、教育局支部、桑家村支部、官路小学支部，党员发展到39人。中共高陵区委隶属三原县委领导。

根据中共三原县委指示，由于纪桢之父子长期在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群众，高陵党组织遂决定发动群众到马南村进行“清算”。

1928年端午节晚，区委书记马文宪带领任家琛（高陵县药惠南任村人）、刘步青（高陵县姬家李张村人）、阎新年、桑三明、阎新四等农村党员，同时率领部分农村武装力量，如构赵村的赵老十、黄原村的周定邦等二三十人赶往马南村。纪家父子闻风逃跑，未能抓获，仅搜出了一些大烟土。参加“清算”的农民群众群情激愤，张贴了“打倒纪桢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标语，临走时又放火烧了纪家的后楼。这次“清算”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在高陵县产生了很大震动。

五、 中共组织在渭北的恢复与发展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927年7月11日将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张性初任县委书记，贾怀庚、王之鼎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亦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中共三原县委管辖泾阳区委，高陵、蒲城、淳化3个特支和5个支部，时有党员102人。

1928年3月，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广大党员不畏白色恐怖，坚持斗争，全县党员发展到360余人。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5个区委。4月，中共三原县委派刘铁山

（又名刘树模）担任中共泾阳区委书记。同年 2 月至 8 月，中共三原县委先后向淳化派去姜建平、第五伯昌恢复建立淳化区委。

1928 年 5 月前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全陕各地组织起义，以配合渭华起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三原、泾阳、旬邑、淳化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交农”围城斗争和武装起义。6 月，各地农民起义相继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

7 月，黄子文在武字区孙家壕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武字区委，孙平章任书记，侯守愚任组织委员，唐玉怀任宣传委员，委员还有王曲贤、李鸿儒和康德宽。中共武字区委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下辖大寨、蒙家、西王、鲍四庙、南原、富平宋家河、上河 7 个村堡支部。时有党员 110 余名。

9 月，白色恐怖更加肆虐，西安、三原的中共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被迫离开三原，中共三原县委、武字区委和各支部工作停止，处于瘫痪状态。11 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破坏，各地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革命再次陷入低潮。

1929 年 3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建立后，鉴于三原是共产党在陕西活动的中心区域，为了尽快恢复组织，遂于 7 月派人到三原寻找线索，联络党员。8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组建中共三原临时县委，领导三原和泾阳、淳化、旬邑、彬县及甘肃正宁等县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三原临时县委未能成立。

同年 9 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在党群基础较好的武字区正式成立，黄子文任特支书记，机关设在武字区鲍四庙，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10 月 9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报告中共中央：“三原

农协确实能代表群众利益，与豪绅地主做英勇斗争。”报告中还写道：“中共三原特支辖7个支部，有党员35名，管辖淳化、旬邑、正宁等县的工作。”

1930年2月2日，三原地方当局及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和其兄黄子祥逮捕。经党组织和群众多方营救，一个月后，黄子文、黄子祥获释。

7月，黄子文、陈云樵领导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10月，省委安排黄子文赴天津北方局工作，不久被派到山西开展兵运工作。同月，中共三原特支重新调整，孙平章任书记。

1931年5月，按照省委指示，取消三原特支，重新组建中共武字区委（亦称三原区委），马先民任书记，组织委员王曲贤，宣传委员胡德润，武装委员黄子祥，保卫委员侯守愚，财政委员孙平章；赤卫大队队长孙铭章，委员为黄子文、孙铭章。中共武字区委机关驻武字区，下辖7个支部，时有党员35人。

第三节　渭北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

一、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武装围城起义

（一）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指出：“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区……，将关中道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 渭北区：泾、

原、高、富、淳、旬等县，以泾、原作中心；……每区设一起义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三原县委管辖的旬邑、泾阳、淳化、三原、富平、高陵等县划为渭北起义区，并很快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武装。

3 月 13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起义”① 的动员令（即三十九号《通告》）。中共陕西省委在部署和领导发动渭华起义的同时，三原、泾阳、旬邑、淳化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先后领导发动了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

（二）渭北地区的农民武装围城起义

1. 三原武装围城起义

1928 年 5 月 1 日，渭华起义爆发。中共三原地委按照省委指示，决定组织三原等地农民开展武装围攻三原县城的斗争。三原组建了武装围城指挥部，黄子文任总指挥，杨致中任游击大队队长。武装围城指挥部设在三原城西申家堡。共青团三原地委书记孟芳洲也参与此次武装围城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任政委，武装围城队伍以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为骨干力量，杨虎城部驻三原炮兵营第四军支参与配合行动，三原炮兵营副营长、第四军支书记张汉民为游击队提供了 10 余支枪，并派军事干部参与围城指挥。同时，又联络了富平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5—180 页，“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1928 年 3 月 13 日”。



三原武装围城指挥部旧址（三原城西申家堡）

里地方武装胡景铨部、泾阳马仙舟部联合行动。

5月3日，武装围城爆发。胡景铨部由党谢芳团长率四个连的兵力，从富平出发到达武字区大寨堡，与黄子文接头后，连夜南下，经楼底、麦刘，从临履坡过清峪河到达三原南城东稍门外，杨致中率领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抵达西城门外待命。

天亮后，攻城开始。由于三原驻军宋哲元部已有防备，重兵镇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城未果。中午时分，黄子文、孟芳洲和联络员雷展如等人带领部队来到申家堡指挥部时，马仙舟率部突然叛变，缴了游击队的枪，扣押了黄子文、孟芳洲、雷展如等，胡景铨派来的四个连见势撤走，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习仲勋回忆讲："当时我在三原县城监狱中就听到了武装围城的枪声，可以说是打响了渭北地区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①

三原武装围城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在白色恐怖时期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基础，紧密地配合了渭华起义，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锻炼了干部，积累了斗争经验。

2．旬邑武装起义

旬邑起义是渭北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吕佑乾于1927年冬前往旬邑，整顿中共组织。1928年初，吕佑乾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他和曾担任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的许才升等人一起组织发动农民群众

① 1984年3月22日，习仲勋接见三原县党史研究室李学仁、常万贤等五位同志时的谈话录音。

抗粮“交农”，准备发动旬邑农民起义。

1928 年春，中共三原县委指示中共旬邑区委，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加紧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 月初，吕佑乾在旬邑安仁村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部署农民起义计划。随后，许才升前往清水原，在郝村药王庙召开中共郝村支部会议，决定以抗粮为导火线，发动全县农民起义。

5 月 6 日傍晚，许才升击鼓为号，召集清水原郝村、班村、蒲社等 18 个村庄的 140 多名农民，手持农具首先起义，并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扩大到 400 多人，进逼旬邑城下。7 日拂晓，在吕佑乾、吕凤岐等组织下，旬邑城内的学生和贫苦民众在城内共产党员崔维峻等策应下，砸开县城东城门，打开监狱，营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王廷磐、王日省及无辜群众后，攻占了国民党旬邑县粮秣局和县政府，处决了上任不久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李克宣等恶官，赶走了福音堂的神甫。随后，起义队伍控制了全城及附近村庄。

5 月 12 日，吕佑乾和许才升等在县城宝塔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佑乾为秘书主任。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程永盛任委员长；土地委员会，程百印任委员长；经济委员会，蒲玉阶任委员长；交通委员会，程国柱任委员长；宣传委员会，王浪波任委员长；外交委员会，王日省任委员长；革命裁判委员会，程雨顺任委员长。会议还宣布：将起义队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路，下辖三个连，程永盛任总指挥。会后，吕佑乾、许才升、程永盛等分别前往张家村、马家堡、职田、土桥、张洪等村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

物，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邻近的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省的宁县、灵台等地。

旬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面调动部队准备围攻起义队伍，一面指使逃亡豪绅在起义队伍内开展收买、瓦解活动，并任命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5 月 30 日拂晓，混入起义队伍的巡警刘兴汉和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被敌人收买，策动所掌握的两个连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等起义领导人。随后，刘兴汉等又窜至张家村，将许才升用长矛戳伤后逮捕。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人押至张洪镇。5 月 31 日，旬邑县代理县长李焕章下令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廷譬、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七名起义领导人杀害于张洪镇。旬邑起义至此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率领起义队伍余部，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石门山区坚持游击斗争。

旬邑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由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旬邑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其影响深远。尤其是起义后宣布成立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它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且政权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职能分工较为明确，为以后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淳化武装围城起义

1928 年 3 月，中共三原县委派何维箴到淳化，向淳化区委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起义的指示。中共淳化区委立即向全体党员传达，积极贯彻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时，共产党员赵新三、卜育生、杨昌俊、梁寿乾等，还开展了驱逐反动校长刘述璋的

斗争。是年5月，旬邑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交农”围城斗争，并派王廷磐来淳化县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

淳化地瘠民贫，1928年前又连年受灾，人民生活更加贫困。而这时国民党淳化县政府和豪绅地主的逼粮逼款、拉丁拉夫却有增无减，农民走投无路，部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抗税、抗差。5月初，固贤村农民董世玉、董世才等奋起杀死搜刮民财的匪军排长。接着，东北乡南村农民在第六团团绅[①]刘世耀的带领下，怒打并赶走三个恶差。刘世耀等深感此后当局必将报复，随即进城与团总办负责人郭天有和赵新三等商议对策。5月7日，他们邀请全县各团绅10多人在西屯庄村开会，决定发动全县10个团的农民群众“交农”围城。

当晚，赵新三、刘世耀、田新升等人分头发出鸡毛传帖。各团绅返乡后，挨门逐户通知动员，全县贫苦农民闻讯奔走相告，自动串联，广大农民围城“交农”的怒火随即四起。

5月9日清早，县城东北乡方里、南村一带，西北乡官庄、胡家庙一带，北乡十里原、铁王、秦河一带，以及县城周围的通润镇、屯庄、车坞、大店一带的农民群众肩扛农具，手执大刀、长矛，扛着土枪，抬着土炮，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沿途各村群众踊跃参加，各路起义农民约万余人包围了县城北门、南门和东门（西边靠山没有城门）。围城指挥部设在县城河东北的泰山庙内，总指挥由赵新三、郭天有担任。县城周围人山人海，吓得县长段桂田跑到南门、东门、北门，四处地向围城群众喊话：“你们都回去种庄稼去，民国十六年、十七年的粮款不向你们要了。”赵新三站在

① 团绅：不是官职，是指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并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人。

围城群众中反驳说“我们不回去，百姓种的粮食叫你们刮走了，回去没啥吃”、“庄稼，农民种不成了，今天，我们把杈耙扫帚都扛来了，交给你这个县长”。赵新三领着围城农民高呼：“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群众斗争情绪一浪高过一浪。

围城斗争持续了两天，县城周围10多里的群众源源不断地送水送饭，积极支持“交农”大军。但是，由于县城周围住户较少，围城农民吃饭、喝水发生困难。围城第二天，部分群众的情绪有所松懈。南城下和东河滩有些群众相继离去。这时，赵新三、郭天有等对围城农民一面进行宣传教育，一面解决吃饭、喝水问题，大多数群众仍斗志昂扬，坚持围在城下。群众的顽强斗争，迫使县长再次登城喊话，并派人到泰山庙与围城指挥部领导人谈判。赵新三等人提出放农民入城开仓放粮、救济贫民，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必须撤离淳化等条件，段桂田拒不答应。

5月11日中午，围城指挥部决定，在继续围攻东门、南门的同时，重点对北门发动进攻。围城群众争先恐后搭起人梯攀登北城。农民麻志雄第一个从西北角攻上城墙，被国民党士兵推了下来。朱常接着又攻上城头，被国民党军排长开枪打伤，倒在城墙上。国民党县政府的残酷镇压，更激起了围城群众的满腔怒火，有的放火烧城门，有的挥镢挖城墙，东六团用土枪土炮向城内轰击。淳化县城一时火光冲天，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将北城门攻开，起义群众占领了县城，县长段桂田带着部分亲信、随员从南门仓皇逃走。

当全县农民进行围城时，国民党淳化县政府还派出一名姓金的副官和一个恶差，于5月10日在十里原、蒙家、北城堡一带抓丁拉

夫，将白家村的青年白兴才和北城堡王家村的王恩拉去当兵。11日，又在梁家庄殴打团头蒙振喜和于天才，扬言要将他两人枪毙示众。当晚，蒙振喜、于天才、蒙天林等人书写鸡毛传帖，动员十里原、北城堡、马家等村群众开展抗丁斗争，与围城农民相呼应。12日中午，十里原、马家等村数百名农民，手执铁杈、杆子、铡刀，将金副官和恶差赶跑，救回了被抓去的白兴才和王恩。

12日，远在富平县的田望秀得知淳化农民起义的消息后，率领40余人的农民武装赶来支援。田望秀和赵新三在三原渭北中学时是同窗好友，后又在国民二军田玉洁部一起当兵，革命志向一致。1928年春，二人离开田玉洁部。田望秀回到富平家乡，在老庙乡的兰山、尹家及附近县的乡村组建了一支农民武装，自任团长。田望秀到达淳化后，与赵新三、郭天有密切接触，张贴布告，安定人心，酝酿筹建淳化县苏维埃政府。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500多人汇集润镇街药王洞，由田望秀主持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公推赵新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与会代表掌声雷动，鸣放鞭炮，以示庆贺，高呼“苏维埃万岁!”。

淳化起义农民占领县城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十分震惊。急令田金凯部骑兵团长过梦成，伙同新委派的淳化县长石翊、保安队长张合宪及暗中收罗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内奸、叛徒杜思聪，计700多人，于6月30日拂晓偷偷包围了淳化县城。守城军民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敌众我寡，县城被敌攻破。

为保存革命武装，田望秀立即下令，化整为零，能藏的藏起来，能冲的冲出去。他带少数战士冲出县城，上了西坡，但不幸在

向西退却时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还将他的头割下示众。当日，在城内战斗中，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干部、战士、农民30多人壮烈捐躯，10多人负伤。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捕杀起义人员，全城戒严，逐户搜查。赵新三和苏维埃政府的几位同志分别藏在群众家里。在被驱逐的一高反动校长刘述璋的领路指认下，赵新三遭逮捕，被锁入囚笼，于7月6日在县城南门口被杀害，淳化农民武装围城起义失败。

二、 三原农民游击队的成立

1928年2月9日，黄子文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在最短期间恢复农协或成立各种名称农民组织”的指示精神，认为组织建立群众组织时机已经成熟，遂与唐玉怀在武字区鲍四庙召开40余人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武字区抗敌委员会，由孙志刚任主任，李天赦任副主任，下设五个分会。为了筹集经费，购买武器，黄子文卖掉家中部分土地，还自设“苦肉计”，让地下党假扮“土匪”，把自己绑在母亲面前“拷打”，逼母亲把家中钱粮拿出来“救自己”。

同月22日，黄子文、唐玉怀在鲍四庙组建了由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①]，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黄子文任总指挥，有队员30多人。这是三原县建立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也是渭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武字区农民游击队活跃在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淡村、觅子一带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到当年9月，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

① 习浩胜等当事人回忆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

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厚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贪官恶霸。在5月初举行的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中，黄子文带领的武字区农民武装起到了骨干作用。

三原武字区游击队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 三原武字区与富平淡村的筹赈运动

1928年9月，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通缉，无法在三原立足，被迫离开三原。张性初离开后，中共三原县委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关中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加之军阀、土匪的掠夺骚扰，渭北一带更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广大灾民饥寒交迫，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当时的国民政府仅给陕西灾区拨款190万元，后又追加了10万元，总计200万元，全省625.5万灾民，平均每人只有3角钱。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刺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子而致死。

为了解决灾民的断炊断粮问题，1929年5月，由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陵前镇西王堡成立。在筹赈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黄子文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

筹赈工作”[①]。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成立后，黄子文带头出粮 7 石，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里，共筹粮 80 余石。筹赈委员会按大人每人 3 升，小孩每人 2 升，分等解决了 3700 多名无粮群众的暂时困难。此举赢得了武字区人民的广泛称颂。

武字区开展的筹赈运动使广大饥民暂时渡过了生死难关，但也引起了当地豪绅和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不满。1930 年 2 月 2 日，三原县地方当局及驻军魏凤楼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黄子祥逮捕。入狱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将黄子文吊起严刑拷打，用炭铣烙烤，但黄子文宁死不屈。魏凤楼见多次审讯无果，遂将其兄黄子祥释放，让筹钱作抵押，再释放黄子文。黄子祥向家里和组织说明了事由，党组织与群众立即筹集资金，黄子文的母亲也东借西凑了 800 银元，救出了黄子文、黄子祥。

在武字区筹赈运动的影响下，习仲勋等也在富平淡村周围开展了筹赈运动，先后四次筹粮 3 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身筹赈运动，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宣传委员。

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叙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唐玉怀的引见下，习仲勋与黄子文、黄子祥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

1997 年 6 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5 页。



陕西民国十八年（1929）灾荒——陕西三原饥民等候慈善团体施粥

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①]。

在中共武字区委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联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

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照金苏区失守后，参加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创建，后被叛匪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1933 年夏，在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②]

习仲勋还把筹赈斗争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1929 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仍要求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

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同时动员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淡村农民协会草拟了张长庆 20 条罪状，并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领党正学、李泗堂、冉四

① 1997 年 6 月 28 日《习仲勋致中共三原县委的信》。

② 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62 页。

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10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收缴民团的长短枪20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家，将张抓捕，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机脱逃。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四、 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游击战争

（一）中共党组织的决策

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要求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并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春，渭北遭遇百年不遇的灾荒，夏秋无收，赤地千里，一些破产农民为了活命，加入土匪队伍，导致土匪横行。豪绅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组织破产农民编练“民团”，富平一个区的民团竟有3000多支枪。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抢割地主豪绅的麦子，分配富农的粮食，以渡难关，渭北斗争风起云涌。渭北贫苦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他们对党的领导人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干，我们就到土匪里面混去。”

1930 年 4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情况，认为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且有农民武装，正是开展游击战争、开创赤色区域的理想之地。

5 月下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集渭北巡视员黄子文（三原特支书记）、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又名陈冠英、陕西兴平县人）开会，讨论渭北工作。会议估量了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的形势，研究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军，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

（二）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成立及战斗

6 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召开有三原、富平党员参加的会议，传达省委决定，研究了开展斗争的方法。会议确定，黄子文负责武字区，并去高陵联系王学道领导的武装力量；陈云樵前往三原陂西镇，联系王德修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前往富平开展工作。会议决定 6 月中旬在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军。会后，黄子文率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和群众，于 6 月 14 日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洲家的粮食，并将岳海洲处决。

6 月 16 日，由黄子文和陈云樵分别联系的各路武装力量汇聚武字区，宣布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汇聚于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包括三原陂西镇王德修部的 30 余人，21 支枪，由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儿）率领；高陵王学道部 100 余人，数十支枪，由赵干甫带领；武字区的农民武装和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共四五十人，40 余支枪。渭北灾民自救军总指挥陈云樵，政委黄子文，下辖 4 个大队，

每个大队编为3个分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德修，政委李秉荣；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学道（由赵干甫代理），第三大队大队长刘铁山；独立大队大队长田裕国、副大队长张振河。渭北灾民自救军共200余人。自救军还成立了中共军支，黄子文任书记。

渭北灾民自救军成立后，主要在三原的武字区（今陵前镇、马额镇一带）、心字区（今新兴镇、嵯峨镇一带）、同字区（今大程镇一带）、肃字区（西阳镇一带）、力字区（陂西镇一带）和富平的淡村区、觅子区一带活动。其间，适逢宜君前县长潘恩桐离任返回西安，途经武字区，遂将潘恩桐逮捕并予以处决。同时缴获长、短枪7支。6月下旬，渭北灾民自救军在三原县长坳堡分了地主豪绅赵应科、牛振和、叶子青的粮食，并捣毁了武字后区马额乡公所。

（三）渭北灾民自救军的失败

1930年，冯玉祥部盘踞三原县城，毕梅轩、王平部盘踞武字区马额镇一带。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当局的极大恐慌。7月上旬，国民党当局调集毕梅轩部和王平部围攻渭北灾民自救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渭北灾民自救军被迫于7月13日由武字区向富平转移。转移途中，在富平康家洞与富平民团遭遇，自救军猝不及防，损失了部分枪支。随后自救军继续前行，在瓦窑头附近的法华洞，遇到前来视察工作的陕西省委常委王林。自救军指挥部遂决定就地休息，向王林汇报工作。就在这时，第一大队的分队长张成义所部突然叛变，打死了正在参加汇报会议的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并收缴了其他大队的枪支。毫无准备的自救军指战员大都逃散。混乱之中，王林与陈云樵脱险，返回西安，黄子

文则前往富平美原一带活动。10 月，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黄子文前往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渭北灾民自救军至此失败。

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后，中共武字区委和所属支部的负责人及大多数党员被迫出走。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时期。对此，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会同陈云樵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在 9 月 13 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工作报告》中，认真总结了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的原因："党内右倾阻止了正确策略执行"，"富农路线的严重"，"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富农意识"，"党组织问题严重"。《报告》指出："以上是游击战争中给我们的几个严重教训。党的'右倾'富农路线，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的组织问题，不仅是目前党的错误与缺点了，而是陕西党目前革命形势及剧烈转变中的严重危机，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和这些敌人斗争才能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①

灾民自救军从成立到失败，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但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尝试，它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为此后的武装斗争准备了干部，积累了经验。到 1932 年武字区游击队正式成立前，渭北灾民自救军的部分人员在中共武字区委黄子祥、马德禄、孙平章等的领导下，仍在三原武字区一带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活动。

五、 贯彻省委指示与兵运工作

（一）中央和临时省委关于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

以渭华为中心的渭北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40—341 页。

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时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杨虎城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实力，到处收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有相对有利的条件。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度重视兵运工作，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汇报，通过了《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起义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决议案》还指出：“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①]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第70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②]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② 实现失败主义，指使军阀之间的战争归于失败。

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4 月 7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发布第九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① 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自己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发动起义。

（二）中共三原特支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指示精神，1930 年初，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的中共三原特支（机关设在三原武字区鲍四庙）决定派习仲勋、郭明效（三原陵前人）利用关系，一起打入驻长武县的西北民军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

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在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时，曾把王德修部编入渭北灾民自救军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并没有参加渭北灾民自救军活动，仅派其部下张成义带几十人参与，而该张后来叛变，导致灾民自救军失败。王德修的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1930 年 6 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司令。之后又归属杨虎城部，被编为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任营长。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14 页。



习仲勋

1930 年 2 月 6 日，年仅 16 岁的习仲勋和郭明效一起离开家乡，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彼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等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虽然该部归属与驻地多变，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在该部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加之省委又派吕剑人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该部，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起义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日后的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期，三原特支还选派了一些党员进入王德修部队参与兵运工作。

在灾民自救军活动失败以后，1930 年 10 月，黄子文被省委派去天津北方局工作。到达之后，北方局又派黄子文去山西开展兵运活动。不久，黄子文即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从此便开始了创建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习仲勋在 1945 年 7 月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

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 年时，为了支援渭华起义，曾发动过 3 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 年成立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队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这也就是渭北苏区的准备时期。”

1926 年至 1931 年 5 月期间的渭北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起初是农民在无以为继的生活状态下一种最低级生存权利的抗争。残酷的现实，使农民阶级日益觉醒，“交农”、“围城”等形式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向带有政治诉求的高级形态发展。

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农村远离城市，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受压迫深重，革命呼声更高，易于发动，农民本身也渴望着变革，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这就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这不单是一个理论总结，更是千百万农民和共产党人，用无数次的失败和无数条生命换来的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实践证明，农民运动必须由先进阶级来领导并融入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即到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渭北农民紧紧依靠渭北中共组织，成为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中坚力量，并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一时期，渭北地区中共组织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让残酷生存环境下的渭北农民迅速觉醒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定的武装革命队伍，斗争的锋芒直指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

权。其中涌现出了黄子文、习仲勋等一大批杰出革命战士，武字区成为渭北革命烽火的中心区域，这些为后来渭北根据地在武字区的创建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干部基础和武装基础。

第四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1932 年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壮大时期。

一、 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基础

渭北地区是陕西党、团组织创建较早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在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于 1927 年 2 月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寨支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7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精神，取消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共三原地委遂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富平、蒲城 3 个特支和 5 个支部。同年 10 月，旬邑区委划归中共三原县委领导。

1928 年 3 月，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 5 个区委，2 个支部。4 月，中共三原县委组织发动了三原、泾阳的“交农”斗争。

清涧、渭华及渭北几县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改组与调整。这一时期，国民党陕西当局向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出特务密探，侦查中共陕西各级机关驻址和领导人行踪，西安全城一度宵禁，军警到处搜捕，恐怖笼罩古城。街上行人，不准三五成群，不准交头接耳，违者以军法论处，中共组织屡遭破坏。1928 年 11 月 28 日，省委书记潘自力在长安县太阳庙门被潜伏特务逮捕入监，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1929 年 2 月初，共青团陕西省委两位负责人被捕叛变，致使党、团陕西省委多位负责人被捕，党、团陕西省委遭受第一次大破坏，接着成立了党、团陕西临时省委。1930 年 10 月 8 日，又由于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被捕和叛徒告密，党、团陕西省委又遭受第二次大破坏。1931 年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团省委多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在破坏与调整中恢复与发展，在改组与调整中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开展武装起义，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苏维埃政权。

在异常严峻的革命形势下，1928 年 9 月，中共三原县委也遭敌破坏，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县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29 年 3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后，陆续派员赴各地恢复整顿基层组织。同年 8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组建中共三原临时县委，领导三原和泾阳、淳化、旬邑、彬县及甘肃正宁等县的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三原临时县

委未能成立。同年 9 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黄子文任书记，机关设在武字区鲍四庙。中共三原特别支部负责指导淳化、旬邑和甘肃正宁县党的工作，辖 7 个支部，时有党员 35 名。1930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去北方局工作，特支书记由孙平章接任。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1. 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武字区委（亦称三原区委）于 1931 年 5 月恢复成立，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任委员，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 7 个党支部。

9 月 10 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工作报告》中写道：“农村工作以蒲城、富平、三原为中心……三原工作完全在武字区一区，该区在过去本为党在三原最有基础的地方，去年六月灾民斗争失败后，党的组织也塌台，现在党政组织已恢复，并有新的发展，在 7 月间领导群众反对水利借款斗争，已得到胜利，现在又发动了反区公所及地亩登记税的斗争。”①

1931 年冬季，三原武字区赤卫队镇压了富平县淡村区恶霸田顺之等，组建了淡村区党支部，姚万忠任支部书记。到 1931 年底，渭北根据地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发展到 200 人以上。面对渭北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从 1932 年 2 月至 4 月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的指示。2 月 15 日，中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6 页。

共陕西省委在《报告第一号》中指出："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三水（旬邑）、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报告》还指出："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①

为了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使党员适应革命形势，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32 年 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渭北巡视员焦维炽（焦仲明）和从北平回陕的黄子文在武字区长坳堡举办党员学习班，每期 3—4 天，历时一月多，共培训 40 多人。培训内容主要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分粮斗争和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等。在此期间，到渭北地区活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等也为党员训练班讲过课。



刘志丹

1932 年 3 月 7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指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刻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粮食，焚毁一切契约账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50 页。



1932 年 2 月中旬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和黄子文在长坳堡举办党员学习班旧址

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决议》还要求：“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刻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① 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焦维炽在武字区鲍四庙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主要研究了在武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通讯第三号》中汇报说，准备组建中共渭北特委，并由省委书记杜衡兼任渭北特委书记。4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此，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为迫切的任务。”②

2. 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艰难曲折的发展

中共武字区委成立后，多次遭到破坏。1932年4月12日，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及张树宏等被捕。6月初，在渭北地区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鉴于武字区委不健全，指定孙海章为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两个月之后，李杰夫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3页。

“尾巴主义”的错误为理由，将其撤职。根据李杰夫的指示，武字区委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

同年7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李逵）任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中共三原县委下辖武字区委及2个直属党支部。9月，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了中共三原县委，同时决定组建中共渭北特委。

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正式成立，李杰夫任书记，常委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王烈）、程建文，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北特委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武字区。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于10月8日至9日召开了由三原、富平、耀县、蒲城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了中共陕西省委10月6日做出的《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会议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问题。

1932年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渭北特派员贾拓夫在富平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撤销李杰夫渭北特委书记职务的决定，由李冲霄、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渭北特委，李冲霄任书记。后来，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武字区又宣布省委改组渭北特委的决定，由金理科任渭北特委书记。12月中旬，省委撤销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为书记，孙金钩、曾楚川、赵应奎为常委，马志舟、顾先臣为委员。机关驻武字区。

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又多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

员，1 月 16 日，增补汪锋为副书记。3 月 29 日，任命刘映胜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 月上旬，任命赵伯平为书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中共耀县、富平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 6 个区委。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和演进

1932 年 10 月，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程建文任书记，习仲勋、奥天斗、金天华为委员。12 月，共青团渭北特委撤销，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李盛弟、习仲勋、李云波、魏光波先后任书记。共青团渭北特委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机关均驻武字区。同年冬，省委派魏光波到武字区开展团的工作。魏光波到任后，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很快建立了武字区团委，书记李文义，秘书魏光波。

1984 年 3 月，习仲勋同志在接见三原县委党史工作人员时说，在特定的时期，团县委领导的青年团员非常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

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根据地内军事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二、 武装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首先抓武装工作，用军事力量创造苏维埃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组织，是在武字区各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武字区赤卫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1 年 5 月，中共武字区委决定，各村都要组织赤卫队，并挑



武字区赤卫队和渭北游击队使用的刀、矛及枪械武器

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勇敢分子30多人组成区武装赤卫队，由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7月，武字区委组织农民反对水利借款，取得胜利。8月间，发动了反区公所、反地亩契税和反豪绅的斗争。富平东北的农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赶跑了收款委员，收缴了民团枪支，先后三次包围县城，火烧城门，反抗豪绅和国民党县政府派款，取得圆满胜利；中共武字区委发动群众包围区公所，反对地亩登记税，赶走了国民党区长。10月，斗争了反动区长薛荫堂，处决了企图反攻倒算的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烧了崔福成的“变天账”。

在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前后，一些村堡也先后组建了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至1932年11月，在根据地内共组建了10支赤卫大队，约1500人，少先队400余人；有的村还成立了儿童团。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黄蛇尾，也有少量枪支。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巡逻，保卫村堡安全，保护分粮，掩护群众抢收劣绅庄稼，配合区武装赤卫队、游击队进行斗争。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搞宣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监视土豪，配合游击队和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

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后，在村少先队配合下，先是采取昼散夜聚的方法，在耀县西原、富平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心字、武字两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掩护群众收割豪绅地主的庄稼，后逐步发展为“三分”（分地、分粮、分牛羊）、“五抗”（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和杀恶差、反动官吏，惩治土豪劣绅，夺取民团豪绅武装的斗争。



武字区游击队兵工厂遗址

渭北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不断高涨，国民党当局不敢到三原、富平、耀县一些地区征粮派款，地主豪绅不敢去讨债。

1932 年秋的一个拂晓，三原李养民民团 100 多人偷袭武字区，由于情报得到迟，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迷惑民团，迟滞其行动，黄子文边派人在区外点起篝火，边集合赤卫队员。不多时，武字区周围到处浓烟滚滚，还不时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民团弄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只是盲目射击。这样相持了一天，晚上民团住下后，赤卫队又不断袭扰，天快亮时发现民团驻地没有炊烟了，判断其正在吃饭，赤卫队随即集中力量攻击，民团慌忙撤退，退至楼底坡时，遭到游击队伏击，民团乱作一团，落荒而逃。

（二）武字区游击大队的成立及活动

1932 年 3 月中旬，在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的主持下，武字区委在孙家壕连续召开七天会议，主要讨论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为保证分粮斗争的顺利开展，会议决定建立武字区游击队，由孙铭章任队长。4 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和武字区委决定，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武字区游击大队于 5 月上旬正式成立，孙铭章任大队长，共有队员 40 余名，长枪 30 余支，短枪 4 支。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别担任分队长。

为了有效反击国民党当局对武字区的“围剿”，中共武字区委决定筹款买枪，壮大武装。孙铭章、韩文禊在焦村分粮中筹款和党员凑钱共 2300 元，武字区委安排黄子祥、孙平章、孙海章等人去富平庄里、美原一带购回驳壳枪 3 支，手枪 1 支，步枪 1 支，又刨出

灾民自救军埋藏的枪支，武装起游击队。武字区游击大队主要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石川河、耀县西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保护群众抗粮抗租、分配粮食。

（三）渭北游击队的建立及活动

1932 年 8 月 1 日，中共武字区委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渭北游击队共 60 余人，30 多支枪。渭北游击队先由中共武字区委领导，后由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双重领导。渭北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在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①]的配合下攻打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缴获步枪 4 支。

9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害，习仲勋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特务队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武字后区游击队常驻在武字区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

（四）武字区的“拥红扩红”活动

在积极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渭北根据地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拥红扩红”活动。4 月 21 日，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第二天，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

① 泾阳游击队：又称苗家祥游击队，1932 年 3 月，在中共泾阳特支的策划下，担任杨虎城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副官的苗家祥、王福茂、侯振西回到泾阳，组建了泾阳游击队，苗家祥任队长，游击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七八十人。



习仲勋在心字区柏社村曾居住的窑洞

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马额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3000多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①

会议还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会议召开的当晚，第五支队获悉国民党军“进剿”的消息，连夜撤至耀县上楼村（今坡头镇境内）。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的黄子文亦随部队撤离。

6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和谢宝涵（三原肃字区李家坟人）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来到武字区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动员了马玉发、温春友、王化海、王建芳、王建章、王建林、习浩胜、李丁西、张玉川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壮男子报名参军，在小道口村集中后，由黄子文、谢宝涵、第五伯昌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②。此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安子凹、艾蒿湾、照金坟滩、保安（今志丹县）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在保安战斗中，谢宝涵阵亡。9月12日，陕甘游击队在耀县照金坟滩消灭了富平、耀县、同官三县民团百余人，活捉了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小丘民团柴子发。在这次战斗中，武字区大寨堡的李丁酉阵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16页。



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三原县武字区活动旧址

三、 政权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设，是与党组织建设同步推进的，其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过程。

（一）武字区反日救国会的成立及活动

1931 年 6 月，富平和三原交界的一些地方已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穷人会。7 月 10 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党组织加强农民运动，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反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号召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9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9 月下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成立，侯守愚为主任兼武装委员，唐玉怀为副主任，马先民任组织委员，王瑞琪任宣传委员，王曲贤任经济委员。武字区反日救国会下设五个分会，第一分会辖陵前镇、西王堡一带，第二分会辖大寨堡一带，第三分会辖长坳堡一带，第四分会辖侯家堡、小寨堡一带，第五分会辖双槐树村、油坊沟一带。同时，各村设村反日救国会。反日救国会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进行斗争。10 月，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了有 1000 多人参加的斗争区长薛荫堂大会，群众在大会上迫使薛荫堂取消了摊派的款项。

1932 年 1 月 15 日，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组织 2000 多人，在三原县城东北大操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民众抗日，并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震动了三原县城及附近地区。武字区反日会还在春节期间组织区内各村堡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

与此同时，中共武字区委为了使党员便于开展党的工作，1931 年 10 月，由黄子祥、唐玉怀、王曲贤、韩文楔、郭立三等组成了武字区教育促进会，黄子祥任会长。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各村堡开办学校，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并安排共产党员王曲贤、孙海章、全应功（富平淡村人）、胡德润、马先民、刘明凤（富平淡村人）分别在武字区西岳庙、小道口村、杏树沟村、义和村、大寨堡、蒙家堡各小学任教，以教员身份掩护中共组织的工作。

（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成立及活动

1932 年 3 月上旬，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改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为主任，成员有侯守愚、唐玉怀、王曲贤、王瑞琪、孙平章、韩鼎周等，会员 200 多人。农民联合会继续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发动农民群众反捐税，分粮食，有力地领导了心字区、武字区 11 个村堡和富平、耀县等地灾民的分粮斗争。武字区区长薛荫堂明目张胆反对共产党，大肆侵吞赈济款，民愤极大。农民联合会召开群众大会，杀了武字区反动区长薛荫堂，并先后杀了十几个催粮委员和恶差，动摇了国民党在武字区的统治。

（三）渭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2 年 4 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三原武字区为苏维埃临时根据地。5 月上旬，在中共陕西省委驻三原武字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的指导下，唐玉怀、黄子祥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土地、粮食、武装、财政和雇农工会 6 个工作部，由孙平章任主席兼肃反部长，王宏章任土地部长，胡德润任粮食部长，黄子祥任武装部长，马志舟任财政部长（兼），马宗德任肃反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顾先臣任工会主席。机关设在武字区孙家壕。渭北苏维埃政府隶属中共三原区委领导，7 月后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渭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肃反工作，摧毁了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统治，基本廓清了地方反动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2 年 10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记述："由于武字区摧毁了豪绅地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县政府的一切命令等于废纸，往北路去的一条大道完全截断。在这里的政治不是国民党县政府或区公所，而是共产党和农联。武字区俨然是一个赤色区域。群众放哨，群众守街，严密封锁消息，许多活动敌人很少知道。"① 黄罗斌在 50 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苏区还注意肃清内部的叛徒，使敌人缺少耳目，不摸咱们的底细。"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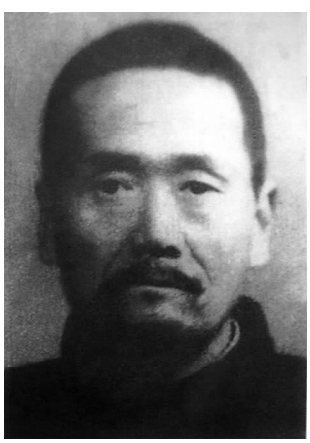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368 页。

（四）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32 年 4 月，在武字区的分粮斗争中出现了有人假借游击队名义冒领粮食的现象，且影响极坏。武字区游击队到铁家庄分粮时，将冒充游击队分粮的不法分子就地处决，整顿了分粮秩序。为了有效解决分粮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中共武字区委在鲍四庙召开会议，黄子祥、孙平章、孙铭章、孙海章、唐玉怀、康德宽、李鸿儒、金理科、赵应魁等经过讨论，决定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分粮和肃匪斗争，游击队执行革委会的决定，维持分粮秩序。

4 月 22 日，武字区召开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群众大会，



黄子祥

“大会上的决议主要是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①。

8 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黄子祥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李鸿儒、康德宽等为委员。这是依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成立的革命政府。同时，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分粮委员会，由渭北苏维埃主席孙平章兼任分粮委员会主任。武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苏区人民开展肃反工作，严厉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60 页。

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使渭北苏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促进了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渭北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改组

1932 年 9 月 22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也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字区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三原县委代表、共青团三原代表、农民联合会代表（共 11 个分会，每个分会 2 名代表，由分会全体群众大会选举产生）、雇农工会代表、游击队代表、少年先锋队代表，共计 28 人。会议选举 15 人为渭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 5 人为主席团成员。

渭北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五个部。会议选举黄子文为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马宗德为肃反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渭北革命委员会设有中共党团，领导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党团由李冲霄（书记）、黄子文、孙平章组成。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组织，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种植鸦片等 12 项决议。

会议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宣言》。《宣言》指出：“革命委员会明确的表白自己的主张与态度，是要站到工农穷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在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与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立刻坚决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武装与组织广大的群众为创造原富耀苏维埃区域而

斗争，创造陕甘新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①

会议通过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给中华苏维埃政府暨红军全体战士的通电》表示：“我们热烈的拥护我们的苏维埃和我们的红军，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的与敌人作战，加快速度取得我们的胜利。我们要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而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② 会议还通过了《给陕西共产党省委通电》《拥护东北义勇军通电》和《给陕甘红军的通电》等。

10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发出指示信，明确要求：“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障党在这临时政权的领导）。”③

10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造原富耀新苏区是渭北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党必须立刻加紧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保证雇农苦力与党在革委中绝对领导的作用，千百倍的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雇农苦力的斗争。目前最中心的是对秋收斗争的领导，在广大的开展群众斗争的当中，立刻实现扩大革委的工作，吸引后区、许字区④、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⑤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和中共渭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10 月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85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87 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76 页。

④ 许字区：即肃字区。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94 页。

18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主席团主席黄子文，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邓万祥、郝祖义、马宗德为委员。渭北革命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团改由黄子文、马志舟、郑彦青三人组成，郑彦青任书记。渭北革命委员会改组后，武字区有三个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四、 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31 年 2 月，根据省委的决议案精神，在武字区西岳庙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孙更升，一分队队长刘广茂，二分队队长赵子英。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巡街守夜、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配合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维护根据地内治安秩序。

1932 年 4 月，武字区雇农工会举行会议，到会 70 余人，选举顾先臣任主席，同时选举执委 7 名，其中共产党员 3 名，共青团员 1 名。会议通过了经中共组织讨论的《雇农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武字区还成立了妇女联合会，由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孙平章代理主任，领导雇农在区农民联合会中发挥骨干作用。武字区妇女联合会下辖 2 个分会，10 多个村会，有会员 600 余人。之后，太和堡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同凤云（金理科之妻）负责，马志舟代表武字区委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要求“妇联会要团结广大妇女，与地主豪绅作斗争，提高革命警惕，发现敌情及时给游击队报告，要保守游击队活动的秘密等”[①]。太和堡妇女联合会组织动员妇女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参加政治军事工作，为游击队做鞋、做衣服、做饭、送信；石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330 页。

桥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吴大新任队长，刘光远任副队长，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配合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

1932 年 10 月下旬，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后，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近 10 个村的妇女联合会，并在青年雇农中成立了青年雇工小组。11 月，武字区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石桥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身背大刀，肩扛红缨枪，维持秩序，巡逻防范。在 1932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参与了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根据地党团军政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粮食逐步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还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

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分粮斗争

（一）武字区的“三分”“五抗”运动

1928 年至 1930 年的西北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

又是陕西的重灾区，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野草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时冯玉祥部统治陕甘地区，蒋、冯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者不计其数，饿死者日有所见。由于灾情极为严重，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主要是打土豪、分粮食，以解救灾民为首要任务。

1929 年 5 月，黄子文、唐玉怀领导灾民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动了筹赈运动。1930 年，黄子文根据渭北灾情和人民群众的期盼，在三原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军，进行抗粮分粮斗争。1931 年 5 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在耀县西部、富平县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县的心字、武字两区，领导和掩护群众收割地主豪绅的庄稼，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增加灾民口粮，减轻农民负担。

（二）孙家壕会议

孙家壕位于陵前镇以东，焦村以南，西与鲍四庙相连。孙家壕仅是一个独家独户的地窑院子，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当年孙平章父子从湖北逃荒到此落户，就住在这个地方，人们习惯称此地为孙家壕。

武字区农民协会被敌捣毁后，孙家壕就成为武字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场所。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渭北游击队及中共武字区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1932 年 3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召集中共武字区委成员和耀县张仲良、杨仲杰及淳化县代表共 20 多人，在武字区孙

家壕召开会议。会议历时 7 天，主要讨论研究了根据地的分粮斗争以及成立渭北游击队、购置武器和游击队的脱产等问题。

会后，参加会议的中共耀县组织负责人张仲良和杨仲杰等，组织耀县西原 2 万多名农民群众“交农”围城，“交农”群众火烧了耀县西城门楼，要求减免粮款。这次围城斗争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残酷镇压，张仲良等人被捕，耀县“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武字区孙家壕会议旧址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分粮斗争的全面展开

孙家壕会议之后，分粮斗争在渭北地区掀起了高潮。

1932 年 4 月 4 日，太和堡地主张玉泉殴打揪苜蓿的群众，引起群众的愤怒。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分了武字区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的粮食 20 多石。

此后，相继在武字区太和堡、曹家庄、长坳堡、双槐树、郭家窑、口外庄、沟南堡、甘涝池、西王堡、义和村、蒙家堡、上王堡、安家堡，西阳镇的刘家沟，富平县的石家堡、田家堡、新庄

子、康家洞等地分了20多家豪绅地主的粮食。分粮人数由开始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千余人。分粮斗争的普遍开展，引起了景万里、苟世英、薛荫堂等豪绅地主的恐慌和国民党当局的震惊。4月12日，武字区的分粮斗争遭到泾阳、三原、高陵三县民团的镇压。

4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由五六十人发动，以致很快发展到1500人之多，整个分配活动达五六天之久，分了武字区20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城，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分所积下的粮食"。[①] 由于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联合会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1500人，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大力支持。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南下三原后对渭北农民斗争的推动情况，"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即心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4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8页。

10 月 5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帮助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 3 天，300 多群众参加，分粮 300 多石。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杀豪绅，抗粮杀差人，使耀州县政府不敢在那里收款收粮。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的农民联合会，开展了群众分粮、杀豪绅的斗争，同武字区的区域接连了起来，富平国民党、地主豪绅的统治，也达不到那里”。①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分地斗争

随着分粮斗争的深入发展，渭北地区的农民斗争逐步由分配粮食向分配土地发展。

1932 年 9 月 22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革命委员会立即公布并实行苏维埃土地法令，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与中农。”

10 月 1 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冲锋季工作决定》，《决定》指出：“团要领导农村广大青年群众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在分配土地中团要保障青年（18 岁以上）、雇农、贫农利益的获得，建立苏维埃政权，普遍地成立革命委员会。”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3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1 版，第 263—264 页。

10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分粮斗争的开展已经深入到分土地的阶段，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认为分配土地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抗捐、抗债、分粮、分财产是引导广大劳苦群众走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没收与分配土地必须鲜明地提到群众面前，在武字区必须立即实行"，"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号召之下，首先在武字区要立即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祠堂庙宇的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将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富农在他不反革命而且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可以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给坏地。残余地主，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分给土地"。①

10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革委会立刻领导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及一切法令，依照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没收豪绅地生富农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与游击队队员，一切官田庙产务必分配给群众，把不好的劳动份土地，分给未反动的富农。党应进行广大解释工作，在农民自愿条件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② 此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渭北根据地逐步展开。

（一）贯彻省委指示，开展分地试点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1932 年 10 月 10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原进行分配土地试点。10 月 20 日，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76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94 页。

中共渭北特委召开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南原土地分配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以农民联合会分会为单位分配土地。26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武字区的分配土地问题，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决定由中共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27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

（二）总结试点经验，开展土地分配

10 月 28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 38 个村堡的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经验，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令。会议决定在全区各村堡立即开始土地分配工作。

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各村堡的群众迅速投入到分配土地斗争之中，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土地分配斗争在武字区 38 村堡的群众中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及斗争勇气。义和村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没收了地主杨海清的土地。上河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分私地 200 亩，公地 20 亩，李春发、耿文才、李文义、习大盈、徐振才、仲永春、仲永恩、李春明、李春贵等 10 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口外庄由李寅三主持分地，常庆绪、杨德春拉尺丈量，共分配土地 83 亩，其中官地 70 亩，私地 13 亩，分到土地的农民有常玉昆、常庆绪、杨木斗、杨应本、李寅三等 10 户；其中常庆绪分到的 5 亩公地，一直耕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寨堡党支部把人均不到 5 亩地的群众确定为分给土地的对象，

分配卸坊村刘载福家的土地百余亩，刘家 4 个伙计每人分得土地 5 亩，李鸿儒家分得 20 亩。武字区南原分地经验推广后，富平、耀县、高陵等县的斗争很快发展到土地革命阶段，群众要求分配土地的呼声不断高涨。

（三）土地分配斗争的深远影响

从武字区开始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在 1932 年 11 月 19 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分配土地过程中虽有错误，但党坚决领导和进行了这一工作，已经分了的有一个分会，其他在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能得到 12 亩至 15 亩土地。武字区群众分土地的积极性很高，街谈巷议中谈论的都是分地话题。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 1933 年 1 月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中具体反映了渭北地区土地革命真实情景。《报告》中写道：“在渭北群众斗争突飞猛进发展下面，武字区已深入了土地革命的斗争，在革委会领导之下，南原上已实行了分配土地，三天内依靠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刀阔斧地初步解决了分土地中一切困难的问题。在群众自愿条件下平分了豪绅地主的土地，给雇农分土地以优先权，给游击队战斗员也分了土地，其他许多地方都在群众会议上计划讨论解决了如何分地的一切问题，但因白军的“围剿”没有赶着执行。

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

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如耀州西原）到处群众都说：‘分粮还不算，非分土地不可。’”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却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也成为渭北根据地一段光辉而不可磨灭的奋斗历史。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三原地区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地反复“围剿”。

一、 反动民团“进剿”武字区

武字区分粮斗争的广泛开展，引起国民党当局和当地土豪地主的极大仇视和不满。1932 年 4 月 12 日，当地豪绅雒彦福、侯雅堂、景万里、薛荫堂等指引三原、泾阳、高陵三县民团分路“进剿”武字区，共产党员周兴茂被杀害，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在大寨堡被捕，武字区赤卫队数百人持红缨枪愤怒追至墩台沟，但因缺乏枪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4 页。

支武器，未能将马先民救回。

5 月 31 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乘三夏农忙之机，率部“进剿”武字区，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共产党员孙太章和进步群众张树宏被捕。是年冬，马先民、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和张树宏 5 人被解往西安。

12 月 23 日夜，马先民、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在西安新城东北角被敌人杀害，推入枯井。张树宏负重伤从枯井中攀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张树宏回到武字区后，详述了四烈士遇难的悲壮情况，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决心誓与敌人斗争到底。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当局连续“围剿”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对渭北地区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地反复“围剿”。

从 1932 年 9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当局调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耀县 6 县民团和正规军两个连向武字区发起围攻。雷春伯率泾阳、高陵、淳化、三原民团，由南向北进攻武字区；胡景铨率富平、耀县民团进占马额，控制北部原区；正规军两个连为预备队进至北线之小丘待机。敌人采取南线主攻、北线堵截的方式，欲歼灭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10 月 22 日，驻守三原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向武字区南原进犯，并一度进入长坳堡。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合围下，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撤回三原城。当天，驻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铨民团也派出八九十人进犯武字区后区，随即被

游击队击退。23 日，驻守耀县小丘的陕西警备师第一团三营派出一连兵力，在侯家堡进行短暂扰乱后，又退回小丘。在此期间，杨森率领陕甘游击队一部来到武字区，会同渭北游击队给进犯之敌以严厉惩戒。10 月下旬，杨森率部北归，渭北游击队转至照金地区，以避敌锋芒。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庆祝十月革命节再度遭敌“围剿”

渭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严重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和力量，再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连续“围剿”。

1932 年 10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①

10 月 7 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在（陕甘）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②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 11 月 6 日至 8 日，用 3 天时间，盛大庆祝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00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04 页。

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

11 月 6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前后区毗邻的朱家堡召开群众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主持并致开幕词，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金理科代表党、团组织讲话，继由农联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讲话，会议通过通电五则。会后，1400 多名群众到马额镇的文龙、坡子一带向武字区的马额民团示威。

11 月 7 日，中共渭北特委在武字区再次组织由 2000 多人参加的集会。会后，整队游行。习仲勋等率领武字后区游击队，全副武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后，从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又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等地，返回武字区。

11 月 8 日，武字区举行游艺大会，有 1000 多人参加，共散发传单 7000 余份。中共渭北特委汪锋和武字区的妇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化妆演出了《可怜的秋香》等新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就在渭北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游击队员盛大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15 周年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向渭北革命根据地进犯。从 11 月 9 日起，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 6 个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的驻军开始联合“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为口号，对武字区发动了疯狂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等严令当地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到处捕人、杀人。

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的家乡陵前镇甘涝池村遭到洗劫，留在村内的 30 多名群众被抓，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掠夺一空，连打麦

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的10余间大房被烧毁，农具被抢，骡马被牵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6次遭到洗劫。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渭北根据地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领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离开时，留下了2支短枪、2支长枪和2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一个洞穴内潜藏了10多天，才幸免于难。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其离开了心字区。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渭北根据地遭受装备精良、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之敌“围剿”洗劫后，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此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踏上了更为艰苦的恢复根据地的斗争征程。

四、“左”倾错误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中共陕西省委自1931年3月第六次全委会议召开后，执行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指导渭北游击战争中，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一再强调“反对富农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省委指示的消极怠工”。要求渭北党组织轰轰烈烈地大干，迅速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积极争取渭北革命早日胜利，直接导致了渭北游击战争受挫。其主要错误有以下两点：

其一，省委发动渭北游击战争，其出发点是“城市中心论”，希望在渭北和西路地区迅速造成威胁关中、包围西安的态势，以此来动摇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根基，从而夺取整个陕西革命的胜利。“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敌人肯定会部署重兵，严加防范。在革命还不具备直接夺取城市的条件时，很难在渭北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当然，在渭北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强大的外围条件，群众斗争应采取缓进的策略，并尽可能争取合法斗争的形式，构筑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使其持久地坚持下去，并巩固坚实的地位，成为支援山区根据地的外围基础。渭北根据地的斗争说明，革命根据地要建在距大中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

其二，由于受中央“左”的错误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在对形势分析时，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基于这一错误判断，省委认为“革命高潮普遍增长”，“进攻形势迫在眉睫”。在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总是首先错误分析形势，并出台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盲目冒进的决策和行动，导致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受挫。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在 1945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总结渭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由于中共

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了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但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①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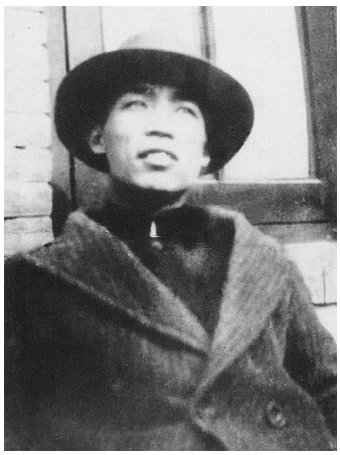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与战略北移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

一、 贾拓夫巡视渭北及渭北特委的恢复

1932 年 11 月至 12 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中共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渭北革命根据地一时陷入困境。

为了恢复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省委委员贾拓夫作为渭北特派员，从 1932 年 11 月下旬起开始巡视渭北。贾拓夫先到武字区，继而前往富平县。12 月，贾拓夫在富平城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决定，对中共渭北特委进行改组，新的渭北特委由李冲霄、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五人组成，李冲霄任书记。新的渭北特委组建后，派渭北特委委员郑彦青前往白水巡视，贾拓夫与渭北特委书记李冲霄等回到武字区开展工作。



贾拓夫

此后，“杜衡又从省委来到武字区，在武字区召开渭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渭北特委的指示，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会议讨论了反攻武字区的计划及重建中共武字区区委等问题。此时，黄子文已由西安回到武字区，因在讨论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革命形势中与杜衡等人发生分歧，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以特委名义错误地停止了黄的‘一切工作’”①。

二、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成立与各级组织的恢复

1932 年 12 月中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在武字区主持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取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由 7 名正式委员和 2 名候补委员组成，刘林生为书记，孙金钧、曾楚川、赵应奎、王金彦为常委，马志舟、顾先臣为委员。此后，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先后由李盛弟、习仲勋、李纪善、魏光波担任。

1933 年 1 月 16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书记刘林生、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汪锋、宣传委员孙金钧、军事委员阎文必、秘书余海丰组成常委会。刘林生和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7 页。

孙金钧均系从农民中选拔的贫雇农党员，任职一段时间后即离开县委回家务农。3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成人员，刘映胜任书记，赵伯平（周中）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并暂代军事委员，李俊藻任常委兼宣传委员，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5月上旬，陕西省委任命赵伯平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李俊藻、姚万忠为常委，周芝轩、黄子祥为委员。



赵伯平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2月中旬，三原中心县委决定，中共武字区委由5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赵应奎任书记。1933年1月20日，三原中心县委改组了武字区委，马志舟任书记。在此期间，武字区委在全区恢复了18个党支部。3月，中共心字区委成立，宋士斌、韩学理先后任书记。

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还为恢复渭北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渭北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组织终究未能重新组建。经过多方努力，武字区几个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组织得以恢复并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从渭北革命根据地接连受挫这一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根据地是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所以，根据地革命武装的恢复被摆到了中心县委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武装组织的重建及其活动

（一）渭北游击队的重建

1932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曾楚川将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后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南原游击队有 20 多人，十七八支枪；武字后区游击队有 20 多人，10 多支枪。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派金天华为特派员，到南原游击队做党的政治工作。同年 12 月底，金理科、金天华和黄子文在太和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整顿渭北游击队的方案，决定由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各有 20 多名队员。第一中队队长李天赦，由刘鸿儒（刘庚）暂代，指导员马志舟；第二中队队长赵立魁，指导员王瑞琪。改编后，两个中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

（二）渭北游击队的发展及其主要活动

1933 年 1 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在此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全大队共 50 余人，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侯振西，第二中队队长吴世昌，第三中队队长赵启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还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派黄埔第四期学员、中共党员刘清和担任书记。

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成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派汪锋前去巡视。汪锋于 1 月 24 日向三原中心县委递交了巡视工作报告，报告


汪锋

写道，第二大队“在最近帮助当地的贫民分了一次粮，有群众六十七人，群众在这一次分粮斗争中表现非常积极勇敢”，“他们对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摧毁也是有相当的成绩，例如他们杀了七八个差人，杀了区长一人，民团团附一人，对国民党豪绅地主一切统治机关的摧毁，使统治阶级不敢向西北原一带去催款，豪绅地主不敢去讨账，群众非常的高兴，群众说，‘红军是我们的好军队’”[①]。报告还提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应向三原武字区、泾阳、淳化发展，与武字区连成一片。[②]

1 月 22 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刘映胜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集武字区委成员开会，讨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行动去向。会议决定，第一中队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第二中队由心字区向西发展，与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相呼应。26 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调整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成员，由马志舟任大队长，政委仍由金天华担任。此后，第一大队向耀县照金一带发展。2 月 4 日，第一大队奉命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突围行动，在照金芋园一带阻击夏玉山民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渭北游击队恢复以后，还积极帮助各地组建游击队。到 1933 年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212—218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姚文琦、姬乃军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097—098 页。

2月初，富平的都村、淡村一带建起一支游击队，其中有共产党员六七人，全队有三四支枪；三原武字区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共有40多名队员，其中共产党员七八名；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有30多人，七八支枪；耀县三条沟游击队，有灾民七八十人，30多支枪。3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组建了三原心字区游击队，有队员10多人。心字区区委书记韩学理兼任政治指导员，李青云、安大元先后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立后，有力地配合了渭北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三）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

1933年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①

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指陕甘边根据地）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指示信还指出："你们提出把渭北游击队编成为二十六军的一个连，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因渭北游击队恰在敌人'围剿'二十六军的后方上，保障渭北游击队的强有力的行动，是对红军有更大的帮助，是使红军更能迅速地有利地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页。

密切的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①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于同年3月成立，总指挥刘捷三（李平），政委金天华，参谋长李天赦。金天华离队后，政委由张培述接任。同年4月，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补充支队，心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



张秀山

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了驻守侯家堡的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同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黄子祥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映胜为政委，以接替离队的刘捷三和张培述。此后，刘映胜奉省委指派，前往耀县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张秀山接任政委。

在此期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300余人，黄子祥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100余人，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会合，在泾阳县西苗村召开军人大会。会上，刘志丹发表了讲话。大会正式授予苗家祥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队旗和“陕西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关防”。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组织和支持根据地的农民在艰苦的条件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239页。

下继续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并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


陕西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关防

1932 年 12 月后，渭北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已初见成效。党的基层组织、各地党支部开始恢复并有发展，革命武装开始建立，群众斗争初步在发动。但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由于前两次失败给群众所造成的疑惑尚未消除，多数群众还在观望；基层党组织仅在少数地方建立，乡和村基层政权普遍没有组织起来，整个组织工作还不能紧扣群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计划抓紧武装力量建设，广泛建立 10 人、8 人的小游击队，在此基础上集中编成红军一个团，进一步动员群众，尽快建立基层政权，普遍展开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相应地转入分配土地。

第二节　红四团北上照金

一、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

1. 南梁游击队

1931 年 9 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来到甘肃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

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击溃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2．晋西游击队

同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围剿”，中共山西省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省委书记刘天章遂指示拓克宽、黄子文率领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和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重远，副支队长吴岱峰。

3．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为加强对两支队伍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部队。谢子长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

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此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

1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 年 1 月初，阎红彦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村合并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 700 余人，分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两个支队各辖三个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陕甘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并建立了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当日，受中共三原党组织委派，黄子祥带领三原武字区几十个青年农民参加大会。会上，黄子祥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①] 黄子祥从武字区带来的几十个青年农民参加了

① 刘风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7 页。

陕甘游击队。几日后，由武字区、旬邑来的100多人又加入了陕甘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力量，[①] 成为陕甘游击队的主要力量之一。

4. 杜衡、李艮的“左”倾错误指挥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改编后的陕甘游击队向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随后，陕甘游击队在同官、宜君、中部一带活动。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村。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不切实际地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会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个月内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时再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92页，李维均《战斗中成长的陕甘游击队》。

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遂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并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

在游击队无休止的“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镇的军队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使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突围三嘉原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新返回游击队，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

5．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成立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六军第四十一师。8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力量逐渐增强。9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 400 余人。11 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20 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的决定。会上，杜衡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给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局“受训”。杜衡的无理指责和独断专行，引起了陕甘游击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杜衡被迫将刘志丹和杨重远留在部队，而谢子长、阎红彦则被强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22 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

12 月 24 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

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枪支弹约齐备。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6日，红二团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红二团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红二团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红二团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

1933年4月，红二团奇袭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和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到1933年秋，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根据地。

（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南下

1. 北梁会议与二台子会议

在红二团返回照金苏区之际，杜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回到照金，重新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

1933年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杜衡、金理科、李妙斋、黄子文、刘志丹、李杰夫、汪锋等人。

北梁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红二十六军如何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主要出现了三种意见：一是李杰夫提出，红二十六军

应向北发展，具体是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去建立组织和革命政权；二是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三是杜衡提出，红二团应当南下渭华，在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他认为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会议围绕这三种意见进行了讨论。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养伤未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由于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取个人专断的压制手段，北梁会议强行通过了杜衡提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

6 月 21 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第二天，红二团在三原县心字区嵯峨山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由于南下渭华的决定是杜衡采用政治高压手段下做出的，所以，红二团大多数指挥员思想不通，普通战士更是茫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只得又在二台子召开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南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李杰夫、黄子文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政委张秀山等。王世泰回忆说：“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①

关于二台子会议，张秀山回忆说：“会上，我和黄子祥提出，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21 页。

红二团不应南下。理由是：红二团留下，可以帮助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苏区，壮大革命力量。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预料不到南下会遭惨败，只是直觉地认为红二团留在渭北比南下更有利，更能把陕西的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但是，杜衡否定了我们的意见，继续强迫红二团南下，致使二台子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①

6 月 22 日，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受到了黄子祥、张秀山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欢迎。23 日拂晓，红二团在三原长坳堡配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袭击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准备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孙平章。战斗开始后，张德润民团紧闭城门不出，战斗进行到黄昏。因红二团急于执行南下命令，撤出战斗，前往南原口外村。长坳堡没有攻下，孙平章第二天即被民团杀害。红二团撤出后，在口外村外场上休息吃饭。此时，杜衡突然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王世泰回忆说：“杜衡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临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②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88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22 页。

2．红二团南下失败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的消息后，派省委书记袁岳栋从西安急赴三原，准备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岳栋到达三原后，恰巧碰见只身离队的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原政委刘映胜以及黄子文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首先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及斗争，杜衡本人承认了错误。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决定由赵伯平安排通知高陵特别支部在境内拦截部队，赵伯平一面向高陵传达省委阻截红二团南下的决定，一面安排黄子文前往高陵阻止红二团南下。

当黄子文到达高陵时，红二团已于6月24日拂晓渡过渭河。黄子文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袁岳栋、赵伯平后，立即化装成木匠只身进入秦岭。山里有人请他解木板，他却把工钱要的很高，老实的山民对这位不解木板、不做活的木匠难以理解，但对他也并未产生恶意，对他打听的事，总是诚实地给予回答。

6月25日，红二团与奉命追击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向东转移。进军途中，红二团又连续四次冲破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层层堵截，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到达蓝田县流峪口。

7月中旬，红二团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激战整整一天，部队伤亡严重。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率领余部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的斗争。

黄子文几经周折，联系上了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富平人，曾在渭北武字区任过职），赵应魁派数名党员和黄子文跑遍了渭华高塘、箭峪、宋家斜、弯子、黄口等地的山沟老林。为寻找刘志丹和

红二团余部，黄子文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穿林过沟，寻找被冲散的红二团生存者的踪迹，与渭华党组织派的同志一起，历尽艰苦，终于在涧峪间找到了饥寒交加、病魔缠身的刘志丹同志。黄子文当年化装成木匠，用过的锛子至今还被华县文管所收藏在展览馆里。

3．王世泰、李盛云假扮夫妻巧渡渭河

黄子文在找到刘志丹后，又找到了红二团团长王世泰等人，在渭华地下党员王杰、李凌云、陈居义、宋金昌等协助下辗转回到华县，1933 年 7 月下旬又转到渭南地下党员张文华、张我公、白思堂家“荫蔽”，以待时机过渭河回照金。

七八月份，正是渭河河水暴涨的季节。大桥被敌人封锁，渡口也被敌人控制。黄子文、刘志丹、王世泰等聚集在张文华家，为北渡发愁，特别是团长王世泰不识水性，除从大桥上过，别无办法。大家的枪支也不能各自带在身上。黄子文出主意说：“枪让我老婆带上，与世泰从桥上过，其余的人分头泅水过河。”刘志丹担心李盛云年轻，又有孩子，不愿让其冒险。黄子文笑道：“咱这老婆，坐过牢，造过手榴弹，会打枪，胆子大着哩，你放心吧！”黄子文望了望王世泰，又望了望抱着孩子的李盛云补充道：“至于他俩如何带枪过桥，我自有锦囊妙计，大家不必担心！”

8 月上旬的一天，王世泰抱着李盛云两岁多的儿子，李盛云身着孝服提着一只篮子，里面盛着香裱纸钱、献食，两人扮成小两口过河去娘家吊孝。哨兵也未发现疑端，顺利过了河。当王世泰、李盛云到达约定的地下党员李毓章家里时，黄子文、刘志丹、黄罗斌已由渭南地下党员分头护送到了这里。李盛云从篮子里取出手枪交给了大家，便抱着孩子带着刘志丹的嘱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

王世泰、李盛云假扮夫妻巧渡渭河已成为革命佳话，在渭北地区广为传颂。

9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杨林、曹士荣、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 20 多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先后辗转回到照金苏区。

红二团南下失败，是“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延缓了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程。

在红二团南下渭华、陷入绝境之际，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于 7 月 28 日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杜衡和袁岳栋被捕后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区及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二、 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

1933 年 7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中共陕甘边区特派工作委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金理科、秦武山、黄子祥、杨森等领导下，继续坚持陕甘边和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集中力量在渭华地区“围剿”红二团，暂时放松了对三原、照金苏区的进攻，陕甘边特委利用了这一时机，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陕甘

边和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仍有一定的发展，并成立了新的游击队。这时国民党报纸却大肆宣扬，“在陕西把红军消灭了”，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迷惑人心的宣传，打击其嚣张气焰，采纳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建议，决定将在渭北地区经过多年锻炼，且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把红二十六军的旗帜继续打起来。

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同志回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连南下失败后，敌人夸大他们的‘胜利’”，“但是，渭北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等，特别是在耀县照金苏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都没有渡过渭河南下，不仅未受到损失，而且逐渐发展壮大”，“为了弥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连南下失败影响，赵伯平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几位领导研究后，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建议，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举起红二十六军的旗帜，继续战斗。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采纳了三原中心县委的建议”[①]。

7 月 24 日，杜衡来到三原，在武字区焦村崔德成家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渭北游击队、武字区党组织和武字区游击队的黄子祥、李鸿儒、周天福、李尚勤、李天赦等 30 多人。会议由黄子祥主持，杜衡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赦任参谋长，全团下辖两个连及一个骑兵班。第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柏栋；第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386 页。



红四团在陵前镇小道口村成立旧址

全团共120余人，长短枪80余支。当晚，召开了渭北游击队班长以上的干部会，传达省委决定和人事安排。

第二天下午部队开往小道口村休整。共青团武字区区委书记李文义组织一批青年团员为召开授旗典礼大会做筹备工作，书写布告和会场的标语。同时，中共武字区委安排人去富平将民愤极大的于官狗押到武字区。

7月26日，红四团成立授旗典礼大会在武字区小道口村举行，参加大会的除渭北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外，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分会代表和各村堡群众代表约200人带着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向红四团授旗，黄子祥代表全体指战员讲了话。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成立，重新打起了红二十六军的旗帜，成为创建照金苏区和陕甘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三、 耀县起义

（一）王泰吉与耀县起义

1933年春，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团长王泰吉因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又参加过渭华、麟游起义等多次革命斗争，脱党后仍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因此在驻防三原期间，他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王泰吉的侄子、共产党员王振民在骑兵团一连四排任代理排长，也多次与赵伯平和团县委书记习仲勋等秘密来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四排起义的准备工作。赵伯平和习仲勋指示他们：一是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地参加到

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二是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的办法，多领枪支弹药，支援渭北游击队；三是成立“红军之友社”，秘密宣传红军抗日主张和优待俘虏政策；四是调查部队装备和机密军情，向党组织汇报；五是掩护地下党员，自由出入三原县城。在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对红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3 月 12 日，三原县中学生抗日总会借纪念孙中山逝世 8 周年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的停战协定，砸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骑兵团士兵纷纷上街，声援学生，并捐募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抗日救国。在此情势下，王泰吉受任“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剿共”总指挥，移驻耀县。但他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在“剿共”期间，他跟在红军部队后边，追而不击，虚张声势，假报战果，使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红军不战自胜。同时他又急于率部起义，回到党的怀抱。王泰吉一面约请早年曾是共产党员的何寓础转告省委，说他想领导起义；一面又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周芝轩汇报了他的起义计划。为表示他的起义决心，并将一支驳壳枪送给周芝轩作纪念。

赵伯平将王泰吉的起义计划和决心，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省委于 6 月中旬派余海丰、何寓础到耀县和王泰吉一起研究了起义计划。继之，又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并带领周芝轩、刘映胜等到耀县，同中共耀县县委一起，具体帮助和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7 月 21 日中午 12 时许，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刘映胜

任政治部主任。起义后，王泰吉宣布将骑兵团组编为第三路，由他兼任第三路总指挥。第三路下设五个大队（其中一个为特务大队），共1200余人。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设四个小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子明，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建民，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第四大队大队长董崇道（后由周德民任大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谈国帆。

王泰吉起义后，对外发表了通电，并张贴布告、标语，进行宣传。起义部队收缴了驻耀县的三县（耀县、富平、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所部的全部枪支和两门迫击炮，并收缴了耀县民团团总雷天一所部的枪支。由于雷天一信誓旦旦，向王泰吉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遂将枪支发还雷天一，并将该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雷天一以率部到耀县城外防守为名，开出耀县城。义勇军从耀县开拔时，雷天一没有跟随，仍任耀县民团团总。王泰吉还拟以第三路所属的特务大队为基础，组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但终未完成组建工作。

当天，起义部队扣押了耀县县长沈育成，收缴了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县城。起义部队根据中共耀县县委提供的名单，逮捕了耀县城内的一些大豪绅、大地主，勒令他们交出现款，作为义勇军军需，并没收了这些豪绅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

7月27日，王泰吉与三原中心县委取得联系，率领义勇军到达武字区。当天，在武字区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和人民在会上讲话，祝贺王泰吉起义成功，并给起义部队送了慰劳品。王泰吉也赠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给三原中心

县委，感谢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对起义部队的支持。

（二）义勇军辘轳把遭遇战

7 月 28 日晨，王泰吉率领义勇军由武字区出发，经心字区向淳化转移。上午 10 时，部队到达心字区新城村一带时接到当地群众报告，有大批敌军上原。王泰吉闻讯，即将部队部署在三原通向心字区大路旁的辘轳把村、白家坡及翟家村原畔、樊家河等上原的路口处，在新城村部署了两个连兵力，配备两门迫击炮，并派刘映胜通知红四团从左侧塔凹村伏击，心字区游击队在丰王村配合，以便敌军进入凹地后发起伏击。上午 11 时左右，王泰吉部与杨虎城一部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加之官兵辎负过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右翼支队溃退，左翼红四团也感不支，义勇军大部被冲散。

这时，王泰吉、刘映胜已被敌从左翼包围。谈国帆率特务大队奋勇阻击，王泰吉得以突围。王泰吉遂命令部队向北（小丘）撤退，第一大队作后卫掩护，但士兵疲劳，情绪不高，且战且走；第四大队周德民率部作战，大部牺牲。王泰吉、刘映胜率指挥部仅百余人于黄昏时到达小丘镇，敌又紧追而来，部队绕道向照金一带继续撤退。王泰吉于 8 月上旬率义勇军到达照金苏区，在薛家寨与习仲勋、李妙斋游击队会合。由于辘轳把战斗损失惨重，先后到达照金的义勇军仅剩百余人。

耀县起义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

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①

习仲勋还总结了耀县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在一度脱党，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②

（三）红四团老户沟伏击战

为了掩护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北上照金，减轻国民党军给照金苏区的压力，同时，也为了给孙平章报仇，打击张德润民团的嚣张气焰，红四团决定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三原武字区与富平淡村交界处一沟道）伏击张德润民团。

7 月 30 日，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安排参谋长李天赦和孙铭章装扮成土匪，趁淡村逢集进入集市，假装争吵放枪，以诱民团出窝。民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2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2 页。



老户沟（陵前东沟畔）战斗旧址

团张德润闻报后，果然带了几十名团丁追击。黄子祥提前率部队在老户沟设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四团和游击队员一齐开火，打得敌人四散逃命，张德润被擒。这次伏击战共击毙俘敌20余名，除将罪大恶极的张德润、蒋彦奎、宁景轩3人当场处决外，其余被俘团丁经教育后释放。红四团一连长马志舟，班长秦福善不幸阵亡。

老户沟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武字区及淡村人民的革命斗志，增强了渭北苏区人民反“围剿”的信心和决心。黄子祥的指挥才能在老户沟战斗中得到充分发挥，赢得了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信任。从历史的角度看，黄氏兄弟的领导才能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和发挥出来的。他们的政治威信和在群众中的声望，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赞许。

四、 耀县游击队的建立

在策划组织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耀县县委准备建立耀县游击队。

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发动的当天，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等即组织了事先已联系好的一部分民众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配合起义部队，逮捕了一些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并在西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南三保保长张恒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还组织群众开展了分配豪绅地主粮食、财物的斗争。

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还于当天组织成立了以阿姑社村青壮年农民为主体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

兼政治指导员，张仲良任副队长。游击队设三个分队，陈国栋、安天民、张智怀分别担任分队长，全队共 100 多人。王泰吉指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为耀县游击队配备了 19 支步枪。

耀县游击队成立后，首先捕捉和处决了阿姑社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处、左国明、左国鼎兄弟三人，并分配了左家的粮食、财产，焚烧了左家的地契和债务契约。随后，游击队由孙家原村党支部书记蔡凤凯做向导，前往孙家原，捕捉了当地作恶多端、企图破坏孙家原村党支部的兵痞、恶棍张廉明。此后，游击队又前往白家庄，发动群众分配了当地一家周姓大地主的粮食。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离开耀县县城后，耀县游击队离开白家庄，经墓坳、高山槐等地，于 8 月初进入照金苏区。

五、 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敌“围剿”

（一）杜衡、袁岳栋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惨遭破坏

1933 年 7 月 28 日，杜衡同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宣传委员贾拓夫及高岗 4 人，来到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作掩护，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耀县起义后等问题。饭间，国民党特务尾随而来，贾拓夫、高岗寻机逃脱，袁岳栋、杜衡当场被捕。袁、杜二人被捕后即叛变投敌。侥幸脱险的贾拓夫暂时“荫蔽”在西安，处理省委危局。高岗带着省委的介绍信赶赴照金，通报袁、杜被捕叛变事件。袁、杜被捕叛变后供出陕西地下党组织状况，供出了省委及其下属组织领导人姓名和活动据点，供出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和王泰吉起义的来龙去脉，供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苏区有关党和红军、游击队等重大机密。

接着，杜、袁二人带着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寻找并当场指认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陕西关中、甘肃陇东等地下党、团组织遭受空前的严重破坏。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三原中心县委巡视员潘士杰被捕叛变，带特务亲自到三原、高陵等县，指认逮捕中共党员。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入低潮。杜、袁二人叛变后，被国民党陕西当局一直视为芒刺在喉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首要“进剿”目标。

（二）根据地再次遭敌残酷“围剿”

1933 年 8 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开始对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

国民党军队进入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原县民团李养民，马额镇民团王茂臣，陵前镇民团刘子茂，陵前乡联保主任景万里，心字区民团段金玉，大程镇民团孙耀南，西阳镇民团李保臣，富平县民团周公甫，淡村镇民团张德润（曾驻长坳堡）、王德五、田俊福和尚家堡民团尚德胜等，先后杀害了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渭北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宏章，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姚万忠，中共心字区委书记宋士斌，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张武，渭北游击队补充第一支队长周天福、中共大寨堡支部书记邢志义，文龙堡支部书记靳生才，中共淡村支部委员姚西茂，红四团参谋长李天赦、严克栋（共产党员），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分会主席黄生源，武

字区少先队长温春祥，红军游击队战士姚克勤、荆天荣和赤卫队员管正银、张钧德、周州之、农民联合会会员唐焕仁等数百名中共党、团员和进步人士。

据当年8月9日的《新秦日报》披露，仅杨竹荪团第一营在老户沟一带获“嫌疑犯”百余名。第二营在油房沟，第三营在太和堡获犯各七八十名，并正在对该地区中之高窑、地洞继续搜查破坏。敌进入武字区后，见人就捕，肆意枪杀，许多村堡群众倾家逃离，人去房空。据一些老人回忆，仅这一次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赤色群众有四五百人之多，渭北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

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红四团与渭北游击队于8月10日决定撤出渭北根据地，北上转移到耀县照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秘书李俊藻等于中旬被捕，渭北根据地被敌占领。

六、 红四团转战照金苏区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

（一）陈家坡会议

1933年8月上旬，随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照金苏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苏区后，被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当时，照金苏区的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七支，旬邑、淳化等地也活跃着十来支地方游击队。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坚持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

挥部总指挥李妙斋，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秀山，红四团领导人黄子祥、杨森、王伯栋，耀县第三支队领导人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等。已恢复中共党籍的王泰吉和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围绕统一几支部队的领导、根据地向何处发展、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习仲勋回忆说："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①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严峻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策，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制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陕甘边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拖垮和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为以后陕甘边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二）红军主力转战外线

陈家坡会议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下称总指挥部），统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及渭北游击队、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各游击队，全军共计500余人，长短枪400余支。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3页。



陈家坡会议旧址

陈家坡会议之后，总指挥部率部向东出击。1933 年 8 月 18 日消灭庙湾民团夏玉山一部；21 日，在高山槐打败耀县雷天一民团；24 日，攻占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27 日，袭击柳林镇，再歼耀县民团一部，随即返回照金休整。9 月 3 日，转向西进，在彬县龙马、龙高、柏子沟一带，游击数日，即转北上，进入宁县。9 月 10 日，在金村庙消灭民团一部，缴枪 10 余支，并获一批物资，战后胜利返回根据地。9 月 17 日，总指挥部决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游击队在照金苏区游击，红四团及义勇军等主力部队向正宁、合水游击。

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利用敌人“围剿”的空隙时机，率领红四团、义勇军大队及耀县游击队开展了许多巧妙的战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壮大了力量，增强了战斗力，锻炼了部队，鼓舞了士气，为抗击反动势力进攻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力量。特别是部队到达合水县古城川与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所部 60 余人，战马 30 余匹，两军会合后，全军战马达 60 余匹，组成临时骑兵队，为日后将英勇善战的红四团改为骑兵团奠定了基础。

两支部队会合后，战斗力进一步增强，部队士气高昂，准备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张洪镇位于旬邑县城西南 15 公里处，城池坚固，不易强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用诱敌出城的办法歼灭守城之敌。

9 月 25 日晨，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冒雨南下，设伏于彬县底庙一带。负责攻打张洪镇的旬邑游击队在中午发起猛攻后，遭到守敌反击。旬邑游击队遂佯败后退，大部守敌乘机出城追赶。旬邑游击队且战且退，诱敌进入红军主力部队伏击圈，将其全部歼灭。随后，

10 余名红军战士扮成民团团丁，由被俘的民团班长宋飞带路，骗开张洪镇城门。主力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击毙了旬邑县民团团总，消灭剩余民团 10 余人，并活捉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霸劣绅，还缴获了一部分物资和 1 万多块银元。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召集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旬邑县县长谢骞及恶霸劣绅等反动分子 12 人。张洪镇一战，陕甘边红军共歼敌 100 余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10 月初，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回到照金。10 月 4 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也在南下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就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出任红四团第二连连长，黄子文则被派往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担任领导工作。刘志丹等脱险归来，极大地加强了陕甘边红军的领导力量。

（三）薛家寨失守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与不安。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限期攻克薛家寨。

1933 年 9 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兼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又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活动于甘肃合水、正宁一带。留在照金苏区的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阻击来犯之敌，照金苏区的大本营薛家寨仅有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力较为薄弱。9 月 21 日拂晓，国民党军向薛家寨发起猛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奋起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紧

急关头，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根据地军民凭险坚守，并巧布地雷阵，还用修械所制造的“麻辫手榴弹”投向敌群，给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获知敌军猛攻薛家寨的消息后，迅速率部从绣房沟返回薛家寨，与留守军民发起迅猛反击，敌人狼狈溃逃，根据地军民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在这次激战中，李妙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10 月 12 日，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前往甘肃合水一带捕捉战机，寻机歼敌。

红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刘文伯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数千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0 月 13 日，进攻之敌分别进占照金老爷岭、芋园等地。10 月 15 日晚，在叛匪陈克敏的带领下，国民党军沿着后山腰岘旁边的一条石缝攀上薛家寨主峰。红军留守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特委一边组织根据地军民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搏斗，一边迅速做出边党政机关分路突围、以保存力量的决策。突围人员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率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

10 月 16 日，照金苏区薛家寨大本营失陷。国民党军攻占照金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很多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照金苏区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它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照金苏区，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写道：“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

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①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

一、 包家寨会议与三路游击区的建立

（一）包家寨会议召开前的陕甘边革命形势

1933 年 6 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因孤军作战，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张家坪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给陕甘边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7 月下旬，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强敌镇压而失败。8 月初，王泰吉率起义余部百余人退入照金根据地，但照金根据地已处在敌重兵围攻之下，红军主力已丧失。因杜衡（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陕甘一些党的基层地下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与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相连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强敌的进攻下也严重受挫。10 月间，敌人向照金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游击队被迫退出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照金苏区失陷后，陕甘边革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从红二团南下失败到照金根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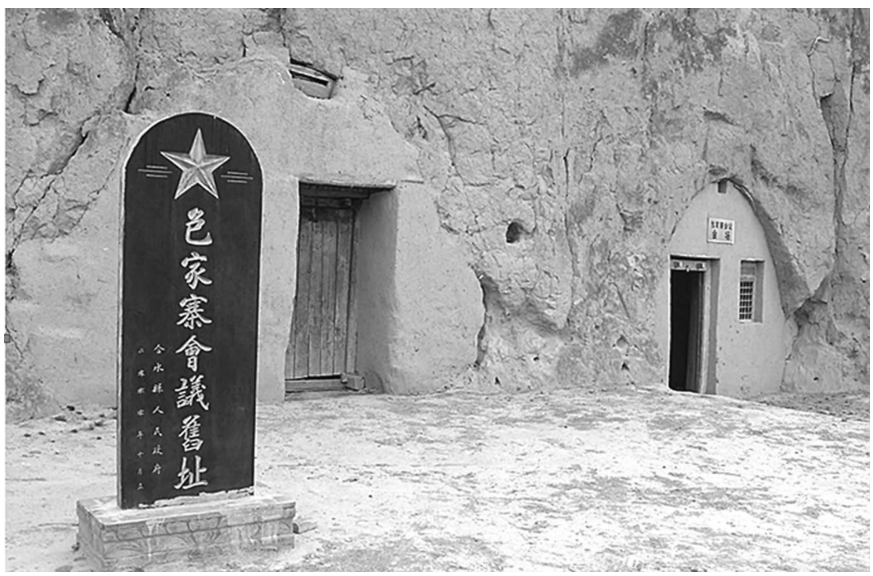
据地的陷落，陕甘乃至西北地区的革命连遭挫折，形势不断恶化，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二）包家寨会议的重大决策

在陕甘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研究解决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影响，讨论了部队的改编、根据地的建设以及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并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先建立第四十二师；二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三是大力开发游击区，分别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游击区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为中心，成立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南梁为中心，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游击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后，由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苏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三）包家寨会议的历史意义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与同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陈家坡会议都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特委失去上级领导后独立自主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解决了



包家寨会议旧址

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建设问题、战略发展问题、红军的组建以及游击队的组织领导等问题，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不仅都是正确的，而且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其一，陈家坡和包家寨会议充分认识到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明确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能离开桥山，特别是包家寨会议确定在南梁建立红二十六军后方基地，开辟南梁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的中心区域。

其二，统一军事指挥，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这正是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战略思想。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新建四十二师，既表明经过挫折西北红军依然存在，又为以后的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在不长的时间里，四十二师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了三个团。

其三，包家寨会议关于开发和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决策，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史上具有独创性的意义，朱德总司令曾经给予“狡兔三窟”的高度评价。后来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三路游击区的建立，也就很难顺利扩大发展为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其四，这两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反证了摆脱“左”倾错误领导干扰的重要性。陕甘边特委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只能面对实际，自己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最了解实际，最清楚在陕甘边应该怎样开展游击战、怎样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所以，一切决策都是符合实情也深得民意的，必然能够得到根据地人民的

拥护和支持。同时，也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正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四）第三路游击区的开辟

包家寨会议结束后不久，陕甘边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即在原照金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成立了指挥部，王安民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接着，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主力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在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指挥部的领导下，金理科在淳化、耀县，杜宛、李尚勤在正宁、旬邑、彬县，黄子文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团结当地革命积极分子，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和区、乡革命政权、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时，周围地区一些不堪忍受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揭竿而起，造豪绅地主的反，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军和保安团队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加入了革命队伍。到 1934 年秋，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富县、甘泉等县先后组建了十几支游击队，打击歼灭了众多敌人，拔掉了南邑、直罗、麻子掌、小石崖等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照金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与陕甘边南部苏区的创建

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自 1933 年 8 月遭敌重兵“围剿”受挫后，红四团转移至照金苏区，之后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继续在

陕甘边坚持战斗。而原渭北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分别先后北移到陕甘边南部地区，投入到了开辟陕甘边南区根据地的斗争中。所以，所谓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实际上是指原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了陕甘边南区。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边南区归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的关中分区。由此可见，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其中心区域武字区和心字区于1933年8月失守，并不代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消失。我们认为，采用战略北移的表述，相对而言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原渭北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三原陵前、马额、柏嵯一带，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

（一）陕甘边南区党政组织的成立

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议，1934年春，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张明吾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下辖直属特务队和正宁、宁县、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在陕西的中部、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5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政权建设，派黄子文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第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代行政府职能。9月，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驻中部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

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

（二）陕甘边根据地南部苏区的游击战和革命政权建设

陕甘边南区地处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包括现在的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和甘肃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这里山岭、川峪、高原、沟壑甚多，地势险要。靠近深山的地方森林茂密，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这一区域，敌人的统治势力薄弱，有利于创建和扩大苏区。

1934 年 2 月，总指挥张明吾、政委黄子文领导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开展游击战。5 月，黄子文带杜宛、蔡子伟、张静文（女）、许国琏、蔡春堂等到陕甘边工作。途中，在三原武字区又集合了 10 余名游击队员携带枪支北上，被编为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十九支队。同年冬，按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的指示，第三路游击队抽出约两个连的兵力补充了红军主力部队，于 1934 年底前后又以指挥部所属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第一团成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成立后，在南区开展游击战，同敌人进行周旋。这一时期，黄子文等指导湫头、三嘉、长舌头的当地干部建立了三个区级政权；同时，在新宁县设立了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办事处主任。随着陕甘边南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区域的发展，一些地方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办事处。

1935 年春，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宁县办事处成立，黄子文、张邦

英派郭廷藩任办事处主任，并派南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封正宝和杜宛协助郭廷藩筹建正宁县苏维埃政府。2 月，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张仲良派宋飞到赤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同月底，黄子文与封正宝协助指导宋飞在赤淳西区成立了赤淳县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封正宝任财政部长。同年 3 月，正当黄子文、张邦英等领导南区各地建党建政工作之际，蒋介石调集陕西井岳秀、杨虎城部，甘肃马鸿宾部，河南高桂滋部，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因马鸿宾部围攻而遭破坏，张邦英、黄子文及机关干部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4 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寻找红一团和淳耀游击队，组织反“围剿”斗争。瓦扇子战斗中，红一团失利，团长陈国栋负伤，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军委派黄子文为代理团长，张文华为政委。后因张文华腿部扭伤，黄子文率领红一团向礼泉和彬县出击。在礼泉泾河畔的北平镇，黄子文巧施“引蛇出洞”之计引诱叱干镇民团，将其一举歼灭，获长短枪 30 余支，弹药若干，取得胜利。此后，黄子文和张仲良率红一团挥师北上，配合中宜游击队袭击了柳林西峪民团。接着，红一团北上与杨森率领的骑兵团会合，继续转战歼敌。七八月间，红一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向外活动，配合西北红军主力粉碎了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南区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党、政组织，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准备分配土地。这时，西北工委派唐洪澄任南区党委书记，惠碧海做团的工作，张邦英改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从中部县迁到了正宁县的三嘉原和南邑等村。到 1935 年秋，陕甘边南区相继成立了新正（正宁）、

赤水（旬邑）、淳耀（县）、新宁（宁县）、永红（彬县永乐等地，后大部被敌占领，改为一个区）、中宜、富西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在这些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有金理科、杜宛、杨伯伦、卢永财、郭廷藩、李尚勤、张积太、李积城等。

同年10月，陕甘边南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南部苏区全面形成。同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彬县、淳化、中部、富县、甘泉、洛川、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中特区的设立和发展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并决定设立关中、神府和三边三个特区。

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贾拓夫等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关中特委机关驻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同时，在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

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关中特区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永红5个县19个区106个乡。管辖地区北至宁县的盘克原，南至淳化的关庄，东至耀县的姚曲，西至彬县的泾河，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75公里，面积7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

同年2月下旬，张学良东北军8个师对关中特区实行大规模“围剿”，大部分苏区被占，革命陷入低潮，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损失严重。关中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率大部武装奉命转移到陕北，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暂时撤销，汪锋、习仲勋、张凤岐等继续在关中开展游击战争。后习仲勋奉命随军西征。3月，汪锋受上级指示，在旬邑花家洞成立中共关中临时特委，汪锋任书记。临时特委成立后，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在新正的南邑、三嘉原，赤水的七界石、桐树庄等地坚持武装斗争，革命运动又出现新一轮高潮。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中共关中临时特委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同年9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郭炳坤、张策、陈学鼎等来关中恢复特委工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并主持组建了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特委机关得到了恢复，机关驻地先后设在耀县槐庄子、淳化县桃渠河、旬邑马家堡。1936年5月至12月隶属陕北省委领导，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至9月隶属陕西省委领导。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1937年4月撤销）5个县苏维埃政府。

中共关中特委成立后，由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员周芝轩、唐玉怀、孙一君、黄子祥、谈国帆于1935年6月成立的中共渭北工委直属关中特委领导；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建立后，中

共渭北工委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至1937年1月，关中特委共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县1937年4月撤销）4个县委19个区委。9月，关中特委划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二）关中分区的设立和发展

关中分区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实行合作，由内战转为共同抗日。

1937年10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并相应设立了政、军、统战、群众团体机构。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和1940年秋建立的东行政区。关中分委机关驻地设在旬邑县马家堡，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1941年4月隶属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下辖淳耀（淳耀县包括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委、马栏中心区及旬邑、淳化两县的八路军办事处，共22个区委。

1942年底，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与中共陕

西省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此时机关驻新正县（今属旬邑县）的马栏镇。关中分区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同宜耀5个县和1个中心区，19个区，131个乡，384个村。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地仍在新正县马栏镇。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关中分区辖4个县，1个中心区。专署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驻地先后设在旬邑的马家堡、杨坡头、马栏等地。

1946年1月，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与中共陕西省委又分设。1949年5月，关中分区改称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前沿阵地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先后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关中分区设立后，不仅包括原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开辟的陕甘边南区，而且其下辖的淳耀县包括了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而三原和淳化、耀县部分地区均属原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因此，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处于关中分区的南部边沿，因而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实施反共，消极抗日，不断制造摩擦，南部前哨时刻处在敌人的进攻威胁之中，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解放战争时期，渭北根据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旧址

地人民掩护中共淳耀县县委书记郭进亭及杜兴全、田志杰、任云峰、兰子敬、孙一君等许多干部突围到武字区“荫蔽”，护送大量革命青年进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黄子文、兰子敬、孙志正、孙一君等领导的渭北革命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渭北游击总队和西北野战军有力打击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日救国运动

一、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

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此后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当时，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剿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严厉谴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以满腔热血，发出了正义之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反日救国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与广大民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各种形式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对华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的侵略扩展，中国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序幕。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26页。

此后，“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①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日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北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以及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精神，渭北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救国宣传运动。

（一）三原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版。

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号召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议，9 月下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成立，侯守愚为主任兼武装委员，唐玉怀为副主任，马先民任组织委员，王瑞琪任宣传委员，王曲贤任经济委员。武字区反日救国会下设五个分会，第一分会辖陵前镇、西王堡一带，第二分会辖大寨堡一带，第三分会辖长坳堡一带，第四分会辖侯家堡、小寨堡一带，第五分会辖双槐树村、油坊沟一带。同时，各村设村反日救国会。三原县各界反日救国会也相继成立。在武字区反日会的组织下，广大青年和群众手持梭镖，开展经常性的军事训练。10 月，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成立，黄子祥任会长，委员有唐玉怀、王曲贤、韩文禊、郭立三等。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学校师生中开展反日反蒋宣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群众同反动政府作斗争。当时各学校和农村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歌曲，抗日宣传热潮在三原武字区迅速掀起。

1932 年 1 月 15 日，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利用三原县城的“腊八”古会，组织 2000 多名群众手持大刀长矛，在三原县城东关大操场举行集会，唐玉怀和工人代表讲话痛斥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城乡互动的民众抗日游行示威，震动了三原县城及附近地区。武字区反日会还在春节期间组织区内各村堡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同时，反日会又把抗日宣传和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

（二）富平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 年 9 月 26 日，富平民众在流曲镇举行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10 月，富平各界反日救国会相继成立。富平庄里镇立诚学校学生师源（继周）联络八九名同学组成宣传队，历时 5 天在县西北乡各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采取开群众会、学生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2 月 15 日，富平反日救国会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称：“组织义勇队 1500 人，朝夕训练，待命前驱……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誓非歼灭倭奴，永不休止！”① 表达了富平人民的抗日决心。

1932 年 1 月 25 日，富平反日救国会又一次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谴责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前防不修，后援无继，既不免以弱国外交乞怜国联，内而又复意见分歧，中枢涣散，负责无人”、“奴颜婢膝，事事仰人，而不思应用民族自决之精神，合力自救”。吁请当局“速派劲旅，驰赴疆场，痛歼倭奴，还我河山”。通电言辞痛切，愤激之情溢于言表。②

（三）高陵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 年冬，在西安上学的高陵籍学生邢子舟、韩学理等人在寒假期间返回高陵，与高陵进步学生许宗岳、马怀功、张映涛、王步翰等

---

① 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富平历史大事记》（1919. 5 ~ 1995. 12），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218 页。

② 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富平历史大事记》（1919. 5 ~ 1995. 12），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218—219 页。

人组织草市小学学生上街游行，发动群众集会，驱逐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志笃，砸毁国民党高陵县党务指导处的牌子，查封了县党部的大门，在县城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迫使当局同意成立高陵县各界反日救国委员会。高陵县反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召开全县市民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开展反日救国活动。

（四）耀县的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1 年 9 月 26 日，耀县各学校举行国难大会，控诉日军侵占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2 月，耀县成立各界反日救国会，张贴标语，开展反日救国宣传。1932 年 1 月，耀县反日救国会组织外地寒假返乡学生，到县城周围的农村进行反日救国宣传，声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三、 渭北抗日群团组织的建立与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展

随着全国反日救国宣传运动的不断推进，在中共渭北组织的领导下，渭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青年学生以及工商等各界纷纷成立抗日群团组织，严厉谴责、声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3 年 4 月 26 日，三原县各校学生成立了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会员达三四百人。随后，又成立了前卫社和互济会。富平县也成立了互济会（1934 年 8 月，互济会会员陈叔馨、陈伯馨等人遭到富平保卫团团长周公甫率兵逮捕，互济会的活动停顿），有四十多人。[①] 随着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爆发，渭北地区掀起了反日爱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1 版，第 323—328 页；1933 年 11 月 25 日《贾拓夫关于陕西反帝运动与组织的报告》。

国运动的高潮。

（一）三原的“红五月”纪念与反日大示威

1933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在中共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三原学生及群众举行了“红五月纪念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会及游行示威活动。

5 月 3 日，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学生在县城张贴标语，在城内城隍庙召开“五卅纪念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大会，到会群众、学生达四五百人，渭北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纠察队三四十人保护会场。大会上讲演人颇多，个个言辞激昂，质问国民党县党部为何卖国压制人民的革命运动，并高呼反日口号。会后即全体整队出发，举行大游行，出城隍庙，沿察巷前进，记者亦遂前往，沿途高呼口号。至国民党县党部门首，由纠察队入内提出质问，恰巧县党部委员吴子超未在县党部，职员从后门逃走，未见一人，遂将党部捣毁，并书字将党部永远封闭，群众高呼痛快，后又继续整队游行。经过县政府门口，过南大街至西渠岸而散。全城劳苦群众皆为之兴奋！[①]

5 月 31 日与 6 月 1 日，三原各校罢课，渭北学生反日联合会于三原县城关帝庙内举行反帝公演，政联会各分会担任演剧与宣传。当日武装纠察队戒备很严，保护会场，到场广大群众、市民、灾民及学生数百人，拥挤不堪，公演效果甚佳，促动了渭北反日反国民党浪潮的开展。县城内各街巷，满贴着红红绿绿反日反国民党的标

①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35—136 页。

语及宣言，渭北学生反日联合会还张贴了《为反对日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与封闭三原县党部告民众书》。[①]

（二）三原响应一二·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

1935 年 12 月，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12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这种爱国主义壮举，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渭北以三原为中心的学生首先组织起来，迅速地投入到了这一爱国行动之中。三原县城的省立三中、工职、女中等校爱国学生，冲破重重阻力，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各校纷纷举行罢课、下乡宣传等爱国活动，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三）渭北其他各县抗日群团组织及反日爱国运动

1936 年秋，在西安民运指导委员会工作的邢子舟与许永平等人，在西安组织建立了进步组织——西安人民协社。不久回到高陵，又联系本县许宗岳、段文义（段稀圣）、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张维贤）、刘永端、高平（高尚文）、雷致祥、白文鳌（白西京）等进步学生，成立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亦称高陵分社），由许宗岳、段文义、白文鳌负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

①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35—136 页。

国运动，清算了反动县长陈家珍的罪行。高陵学生救国会成立初期，高陵人民协社的成员多是学生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和进步学生，该组织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



1936 年，西安学生农村工作团在三原崔家堡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11 月，绥远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渭北工委的领导下，蒲城尧山中学及县城各小学在学校自治会的基础上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联合会，骨干多系尧中的学生党员（中共党员），他们领导和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开展援绥募捐活动。

四、 九一八事变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变化

（一）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艰难恢复

1933 年 7 月下旬，杜衡被捕叛变，渭北地区的中共党、团组织都受了严重破坏。陕西幸存的中共组织仅有韩城、临潼两个县委。8 月，国民党六县正规民团连续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地 500 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

从 1933 年 8 月到 1934 年间，由刘映胜、雷振东、陈子敬、咎玉祥、余海丰、韩学亚、魏光波等中共党员多次组建的中共陕西临

时党、团组织均被叛徒出卖或被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随之解体。

1935 年 5 月，高克林、孙作宾、崔廷儒在西安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负责西安和东路工作；孙作宾任组织部长，负责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党的工作；崔廷儒任秘书长，负责西路工作，并负责与各地零星中共党员加强联系，重建中共党的组织。

1936 年 4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再次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与孙作宾等又赴陕北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央决定，高克林、孙作宾等在陕北工作。

在高克林、孙作宾到陕北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到在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的谢华的报告，立即亲自复信，对谢华等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示尽快重新建立陕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此，中共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开始恢复。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二）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1933 年 8 月，中共陕西省委由于执行错误的“左”倾路线，渭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之后，渭北地区一些幸存的中共党员分散到云阳、临潼、高陵一带，继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34 年 6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周芝轩获释后，在云阳培英小学任教；8 月，周芝轩被中共组织派往蒲城尧山中学任教。他

一边从事教学，以革命思想影响学生；一边执行党的使命，与三原的黄子祥、唐玉怀，临潼的谈国帆，渭南的金子仪，高陵的孙一君以及王瑞琪、毛瑞甫等中共党员常秘密联系，商定恢复中共组织，研究发展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1935 年 5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秘书长崔廷儒与周芝轩取得了联系。6 月，在崔廷儒的主持下，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渭北工委）在临潼栎阳成立，周芝轩任书记，唐玉怀任组织委员，孙一君任宣传委员，谈国帆任军事委员，联络员为崔廷儒，工委机关无固定驻址。渭北工委成立后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后由中共关中特委领导。1936 年 12 月，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其中心任务是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开辟渭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工作，逐渐恢复和建立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蒲城等县的党组织。在中共渭北工委的领导下，三原地区疏散的党员开始秘密联系，并秘密联络周边各县的党员开展地下工作。同时，积极组织渭北各地的群团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 月，中共渭北工委按照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指示，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渭北国统区的工作。9 日，谈国帆在武字区联络员王瑞琪的护送下，从三原武字区动身，经耀县照金、旬邑马栏到甘肃正宁湫头后，中共关中特委又派武装交通队队长黄罗斌护送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谈国帆向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汇报了渭北一带的工作情况，并参加了中共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

议。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接见了谈国帆。

中共渭北工委还顺利完成了护送刘少奇去华北的重要任务。1935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

1936 年 1 月 16 日，谈国帆准备返回关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张浩部长遂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其他有关抗日的文件交给谈国帆带回关中转发，并指示要把地方武装搞起来，建立可靠的地下交通站。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商请刘少奇取道关中乘火车赴天津，并指示贾拓夫、张德生与谈国帆同行。

为了保证安全，刘少奇扮作商人，化名胡服，偕同夫人与随行五六人，沿山间小路步行，几天后到达富县。贾拓夫和张德生指示谈国帆先动身前边走，把交通线搞好，与沿途地下党组织一一联络，做好安全工作。谈国帆走了整整一个月，到临潼栎阳后，与地下党负责人唐玉怀取得联系，两人商量决定让刘少奇住在当地知名绅士杨宜瀚家里，并由唐玉怀事先做好杨宜瀚的工作。

2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护送下途经淳化县。2 月 16 日，贾拓夫指示关中军分区供给科科长王瑞琪等人护送刘少奇等一行经三原心字区到达武字区太和堡（今陵前乡南原）；17 日，在中共渭北工委及上级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武字区地下党派刘成德护送刘少奇到达临潼徐阳后，唐玉怀将刘少奇安排在临潼栎阳镇徐杨村进步人士杨宜瀚家住了 3 天，后由杨宜瀚派许于华等人武装护

送，刘少奇等人乘坐马拉轿车到达临潼新丰火车站，乘车东去，赴华北开展工作。

第二节　西安事变与三原时局

一、 三原在西安事变中的战略地位

（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接受了中共和红军的联合抗日主张。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共集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一再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停止内战。

1936 年 11 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绥远，国民党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战。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表示红军准备立刻开赴晋绥抗日前线。张学良、杨虎城也电请出兵抗日，但均遭蒋介石拒绝。相反，蒋介石调动大批中央军入陕，并于 12 月 4 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否则将对他们采取“措施”，双方矛盾骤趋激化。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随行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10 余人，随即宣布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国际关注。



1936 年夏，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靖国花园秘密动员部队军官坚决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对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为了争取实现举国抗日，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12 月 16 日，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参加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向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进行了深入的说服工作，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主张。周恩来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亲自同蒋介石谈话。经过反复谈判斗争，24 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双方达成六项协议。25 日，张学良陪蒋介石离开西安。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二）西安事变中三原的战略位置

1. 十七路军的大后方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主战、主和各执一见。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维护“国统”、讨伐“叛逆”的旗号下，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再度出现。“讨逆军”组成东、西两路军向西安逼近，派飞机轰炸西安。与此同时，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调整军事部署，抽调十七路军部分人员转入三原，设立了“西安绥靖

公署三原行营”，张平为三原行营参谋长，代为主持三原有关事宜。

12 月 16 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军 10 余架飞机轰炸渭南。17 日，又派 20 余架飞机轰炸华县。同时，派 8 架飞机轰炸三原、富平，在三原北城投弹 2 枚，炸伤群众数人。三原人民通电抗议，指出：“国家设置空军不去炸击日寇，保卫国土，而竟忍心加于我无辜同胞。如此举动，实堪痛心。”东北军、十七路军也积极做好应战准备，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等为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经协商，三方达成共识，一方面坚持和平主张，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地、各军、各界团结协作，推动南京政府放弃武力，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采取防御措施，集中兵力以应付突然事变。三方议定，以三原为核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 月 18 日，杨虎城将十七路军主力集中在三原一带，在三原县城设立渭北警备司令部，并委任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统一指挥渭北地区的十七路军。一是准备防御战；二是联络红军，发动和武装渭北民众，以备万一。19 日，赵寿山到达三原，巡视渭北 10 多个县，对部队进行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国民党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至此，渭北三原成为十七路军的战略中心与大后方。

2. 红军驻防的战略要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为了稳固西北抗日局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按照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东西两路的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南下。12 月 25 日，红军南下进军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国民党“讨伐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应对国民党“讨伐军”进攻的准备，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以国民党军队东面 10 个师，西面和北面 15 个师逼进西安。中共一面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协同杨虎城从军事上积极做好应战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迅即南下，1937 年 1 月上旬，红军主力集结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一带，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于云阳镇。红军主力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努力维护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红军集结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广大渭北地区，本着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谋独异、和衷共济的态度，竭诚对待友军。

至此，地处西安近邻的渭北重镇三原县，不但成为红军的驻防地，也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沿阵地和争取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桥头堡。

二、 彭德怀率红军在三原周边布防稳定西北局势

（一）红军主力南下

1936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环县、定边地区南下，在 10 天内到达长武、彬

县，再在10天内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抵达蓝田、商县以南地区，以防守国民党东集团军左翼，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在渭南等地的正面防御；以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会同红三十二军组成追击军，在胡宗南军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翼侧平行追击，并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牵制该部，配合固原、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六十七、第五十一军牵制国民党西集团军。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仍担负定边、盐池和吴起镇至保安一线的保卫任务，红八十一师东调延安，协同陕北地方红军保障西安北线安全。”①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主力到达庆阳地区。鉴于国民党“讨逆军”开始后撤，红军主力遂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地区休整待命。此后，红军第十五军团回到庆阳地区，其余部队在原地休整。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主力在渭北集结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了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大批国民党军队重新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接受其“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从1937年1月初起，内战阴云重新笼罩陕甘上空。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仍本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南京政府和全国各党派团体，促蒋“履行诺言，撤兵释张”；另一方面，由中共代表协助杨虎城做好战争准备。按照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领导人商定的联合作战纲领，中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87—688页。

共中央命令红军主力继续南下。

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等主力部队，在左权、聂荣臻的率领下于1月上旬抵达渭北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防御由渭水以北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红十五军团经咸阳、蓝田，于16日开到商县地区，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会合，配合当地十七路军一部，担负抗击由洛南方向进攻的中央军第八纵队李默庵部，保障渭南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的翼侧安全；由红八十一师和陕北部分地方武装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十七军进驻洛川，牵制位于蒲城、白水等地已经叛杨投蒋的十七路军原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红军追击军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作战。①

红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于1937年1月4日奉命南下，向淳化地区集结，防御进逼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9日，到达三原以西的云阳镇驻扎。27日，奉命开往富平，进驻在庄里、华朱、肖华一带，总指挥部设在华朱村。2月6日，总指挥部向北移驻同官县陈炉镇，二军团的四师、六师移驻薛镇、底店，六军团由庄里镇移驻曹村一带。4月17日，总指挥部又由陈炉镇移驻富平庄里镇，四师、六师也向西移驻到觅子及觅子东南一带，六军团从曹村移驻流曲镇、到贤镇一带。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和第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奉命率领红军南下，“于1936年12月16日由盐池地区出发，22日抵庆阳，续经赤城镇，于1937年1月4日到达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89页。

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淳化地区，驻扎布防。”①

红军到达渭北之后，不驻县城，遍扎农村。其中，第一方面军由西向东驻扎于泾阳安吴堡、鲁桥，三原东里、孟店、山东庄、线马等村以及西阳、大程一带。1 月 9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于泾阳安吴堡。25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云阳镇。2 月上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泾阳县云阳镇移至淳化县。5 月下旬，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又移驻云阳镇。

（三）红军在三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 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

1937 年 1 月，彭德怀、左权等率领红军进驻三原、泾阳一带。7 日，在西安的周恩来派罗瑞卿到三原迎接红军。随后，周恩来到咸阳看望红军指战员，并筹划部队的装备、弹药问题。②

当日晚，红军进驻三原东里堡，部队露宿于街道两边房檐下。翌日早晨，老百姓看见到处都是军人，经打听得知是红军。联想到以往经过的军队进村先抢占房屋，要粮要草要料，闹得百姓鸡犬不宁。再看看眼前的军队，宁可寒冬露宿街头，也不惊扰百姓。老百姓顿时对红军产生敬意，纷纷欢迎红军住进家里。于是，红军首长彭德怀、左权以及丁玲住刘宏家，军政治部驻刘述恒家，红一军团军团部设在东里堡。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驻扎在鲁桥、西阳、大程一带；红十五军团一部分驻扎在咸阳。

---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05—406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67 页。

当天，红军政治部在东里堡关帝庙召开群众大会，说明红军来意。第三天，在东里堡外北花园西边空地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彭德怀、左权等红军将领同东里堡及邻村参加大会的群众见面，向与会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和政策，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行动和“八项主张”，宣讲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在红军的指导帮助下，周围各村成立群众组织。东里堡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下设联络、文化宣传、生活改善等部，李芝惠任联络委员，刘善述任生活委员；二是成立了三原县北乡学生救国联合会，由东寨堡周希江，东里堡刘紫侠、刘善述、李凤英具体负责。两个群众组织经常和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联系，在靖国小学开会，商讨开展工作，并配合政治部的红小鬼剧团宣传联合抗日政策，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2. 加强友军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为了加强十七路军与红军的联络，任命杨法震（中共党员）为三原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常汉山兼任。杨法震对三原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惩办了一些中伤红军蓄意制造摩擦的恶霸。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也派一个连驻守在三原县城北门，并指示：“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表示欢迎；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①] 这些具体规定对密切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赵寿山》,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97 页。



1937 年 1 月，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将领在陕西三原县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司令部（尊经阁）同友军及地方人士合影。前排左二为任弼时，中间为彭德怀，左四为赵寿山；后排左二为杨尚昆，左五为马文彦。

红军南下进驻渭北的泾阳、三原一带后，受到了十七路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等人的热烈欢迎。1937 年 1 月 11 日，在三原举行了红军、十七路军、三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约 1000 人的盛大联欢会。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丁玲、王炳南等出席大会。彭德怀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表重要演讲，赵寿山等人也先后讲话。与会官兵士气高昂，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丁玲带领的文工队还演出了《丰收舞》《丁零舞》和《秧歌舞》等文艺节目。

赵寿山驻防三原期间，同红军的接触、交往非常频繁，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十七路军与红军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备战。十七路军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得大量粮食，并筹派 150 多辆马车将粮食运往陕北。在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方面也给陕北很大支援，还赠送银元 30 万。

3．大力宣传联合抗日政策

1937 年 1 月 13 日，陕西省学联、三原民运会等在三原县城内东关大操场召开欢迎红军大会，欢迎彭德怀率领红军到三原。三原县各界人士夹道迎接红军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及丁玲等。大会由三原民运会主任委员张子敬主持，女中教务主任徐振化致欢迎词，彭德怀、丁玲在大会上向大家讲了中国革命形势，讲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八项主张”，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字字句句震动人心，博得群众阵阵掌声。

1 月 20 日，三原民运会组织发动张卓儒、贾怀庚、马宏山及三原商会会长等 20 余人，组成慰问团慰问红军。慰问团携带糕点等慰问品，到安吴堡慰问彭德怀部队。彭德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慰问

团，并给慰问团的同志讲了当前革命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还询问了三原县城学校设置及教育情况，告诫慰问团的同志要办好教育，培养好青少年，让他们多学知识，为国家多做贡献。随后，慰问团到云阳镇慰问贺龙部队。红军指战员精神焕发，态度和蔼可亲，鼓励慰问团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有人还给慰问团讲述了贺龙两把菜刀劈开芭茅溪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闹革命，以及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故事。之后，慰问团又到斗口村慰问了萧克率领的部队。慰问团先后到20多个村庄，看到家家户户都住有红军，并遇见了很多红军指战员，深切感受到红军和老百姓亲似一家的鱼水之情。

红军还在三原县城南关东巷子设书报发行处，将大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和马列主义的小册子等进步书刊赠发给三原人民群众。红军文艺宣传队常到中小学等处演出，对青少年进行抗日宣传教育。

（四）红军在三原周边布防对稳固西北局势的重大作用

1. 审时度势，巩固西北抗日联合

红军进驻渭北一带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时局形势变化。1937年1月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至三原后准备休息三天，情况许可再延至五天或七天，请规定工作日程，十五军团在咸阳亦然……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

出动。”[①] 9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关于力主和平保持西北目前局面》中写道：“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部一团固守，但十五军团仍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②]

2. 维护“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争取了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合抗日，并达成了共识。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不少官兵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迷惑不解，甚至一些重要将领也顾虑重重。1937年1月，红军进驻泾阳、三原后，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彭德怀与任弼时等亲往三原县渭北警备司令部做赵寿山的工作。赵寿山在彭德怀、任弼时的启发引导下，认识了释放蒋介石的必要性，顿时解除了疑虑，完全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共同联盟。

在“三位一体”的促动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3. 宣传抗日政策，渭北青年踊跃参军

红军驻防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一带，严格执行革命纪律，与

---

①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942页，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准备对“讨伐军”开战的三步策略》的电报。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67—168页。

当地群众公平交易，秋毫无犯。红军开办的诸多报刊门市部，公开销售《解放日报》[①]《新华日报》[②] 等报刊书籍，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帮助地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红军进驻渭北期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渭北各县积极开展了“扩红”活动，广大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临潼抗日义勇军的100多名青年集体参加红军；高陵先后组织近百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三原组织武字区、心字区、肃字区等地的6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富平的淡村、底店、薛镇等有500多人参加红军。同时，耀县、泾阳、淳化等县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渭北地区的群众基础好，思想觉悟高。红军主力集结三原、泾阳等地后，推进了渭北根据地抗日宣传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成为渭北根据地人民的主要斗争，民族革命的阵营空前扩大，抗日救亡的浪潮不断高涨。

三、 周恩来与杨虎城在三原会晤化解危机

（一）东北军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并命令中央军大举西进，企图以武力

---

① 《解放日报》：194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停办三日刊的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将该刊与新华社编发的《今日新闻》合并，在延安出版大型日报《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刊物。

② 《新华日报》：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由周恩来等在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司令部亲自创办，在南京公开发行的中共党报，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型机关报。

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刚刚平息的内战烽火又重新笼罩西北大地。就在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刚刚完成军事部署之时，在如何解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

1937 年 2 月 2 日，东北军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军官铤而走险，枪杀了坚持主和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史称“二二事件”。事后，周恩来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其枪杀王以哲的错误，力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另一方面，积极联系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在极端危险的形势下，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颇有说服力的谈话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力挽狂澜，维护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赢得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为挽救危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东北军内部的裂痕早已存在。二二事件的发生，加深了这种裂痕，2 月 3 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十师檀自新部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一〇六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张学良。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了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檀自新在蒲城叛变时，适逢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返回蒲城老家，当即被檀自新扣留作为人质，企图迫使杨虎城放弃抗日救国的主张。杨虎城委派驻防蒲城的高级将领韩世本、孙辅丞等赴檀自新部商议解救其母亲，未料也被檀自新扣留，这使杨虎城更加忧虑万分。

（二）三原成为化解二二事变危局的重要基地

东北军二二事件发生当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告周恩来、博古等人，请“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①]。因西安局势紧张，为了确保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和博古等商议，决定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退撤到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留在西安坚持工作。2 月 2 日下午，博古、刘鼎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和叶剑英及部分工作人员仍坚持在西安竭力做好友军的工作。6 日，经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了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叶剑英到三原后，在城内椽巷中段建立了秘密联络站，随时将西安动态向中共中央进行汇报。

（三）周恩来在三原会晤杨虎城

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1937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在一天之内连续发布了八道命令，其中主要是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职务均予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此后，顾祝同率领大军进驻潼关。

为了维护抗日大局，2 月 5 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同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五军团由商洛开赴三原进行整训。6 日，杨虎城被迫辞职。7 日，第十七路驻西安部队开往三原，杨虎城部由西安移驻三原县东里堡。8 日，国民党三十六师宋希濂部

---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72 页。



叶剑英曾在三原居住的旧址

进驻西安。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在西安的周恩来闻知杨虎城的处境后，在刘鼎、黄辉的陪同下，于2 月 11 日专程赴三原东里堡看望杨虎城。杨虎城长叹说："周先生，我今遭此危难真是一言难尽。"周恩来对杨虎城说："在国家民族遭受极大灾难的时刻，你和张学良将军为国家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人民不会忘记，共产党永远支持你们。"接着，又从当前形势谈到抗日前景，从个人处境谈到国家前途。周恩来诚恳的态度，精辟的分析，让杨虎城心情舒畅，精神顿爽。随后，周恩来、杨虎城、周梵伯三人站在杨虎城东里堡住宅大厅前院合影留念。

顾祝同进驻西安后，即会见周恩来、孙蔚如、于学忠等，并提出派员迎接杨虎城来西安，执行西安绥靖公署职责，处理善后交接事宜。遂议定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西安行营、陕西省政府与东北军共同前往三原接杨虎城。杨虎城见顾祝同有诚意，于2 月 14 日由三原返西安。

1937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就国共合作、中共的地位、红军改编、苏区改制、西路军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①。

① 《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73—74 页。



周恩来、杨虎城会晤旧址

第三节　红军在渭北改编和出师抗日

一、 红军在渭北改编为八路军

（一）红军改编的背景

从1937年2月中旬开始，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谈判。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携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①。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递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重申：“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在中共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准备应战”。但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当局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妥协谈判，而把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抗日宣言搁置不顾。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继续就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4页，《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的通电》。

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7月22日至27日，红军前方司令部在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军为单位改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加强抗日教育及军事训练，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出动。"① 7月28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令罗荣桓、邓小平、萧克、宋时轮、宋任穷、贺龙、关向应等并报毛泽东："部队急待出发"，"拟将一、四方面军集中三原、泾阳区域改编"；"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四军、三十一军，统限于本月三十一日由现驻地出发，于八月八日前到达三原、泾阳地带集中完毕"，"二方面军集中庄里，二十八军暂留原地待命。"② 洛甫、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当日电复："同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意见，一、四两方面军，均调三原集中改编。"③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就红军作战问题致电红军总部，提出了改编原则，并让商讨关于红军改编出动兵力问题。5日，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中共领导到达云阳红军总部，同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开会讨论红军改编问题。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待命。7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各兵团部队配置方案："以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共1.1万余人改编为一一五师；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40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90页。

原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及独立第一、二师共约1.4万余人改编为一二〇师；四军、三十一军、三十军、二十九军等共约1.3万人改编为一二九师。”同时，提出了留守部队防区配置的具体意见。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①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被迫于8月22日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22日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共4.6万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全师1.55万人；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全师1.4万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主任张浩，全师1.3万人。三个师分别辖三四三旅、三四四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旅团以下职务委派朱德任命。八路军划归阎锡山之第二战区序列。防区划定为晋东北，令朱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78页。



1937 年，杨尚昆（前排坐者）等在云阳镇。二排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三排左起：罗荣桓、黄克诚

德三日之内将三师编就，本月底前全部开赴山西前线，投入抗日之列。同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全国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发出就职通电。与此同时，原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后勤系统由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组成，部长分别为赵尔陆、姜齐贤、叶季壮。由此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机构。八路军总部驻泾阳县云阳镇。

二、 八路军在渭北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1937 年 8 月，红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在三原县、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后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一）一一五师在三原誓师

8 月 22 日，驻扎在三原的红一军团第二、第四师作为红军先遣部队（8 月 25 日该部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由代理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在三原地区誓师后，途经富平、澄城、合阳，于 31 日由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9 月 5 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三原东关操场设分会场，史称“三原誓师”。因当时云阳镇中共组织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故习惯上把云阳镇称“三原云阳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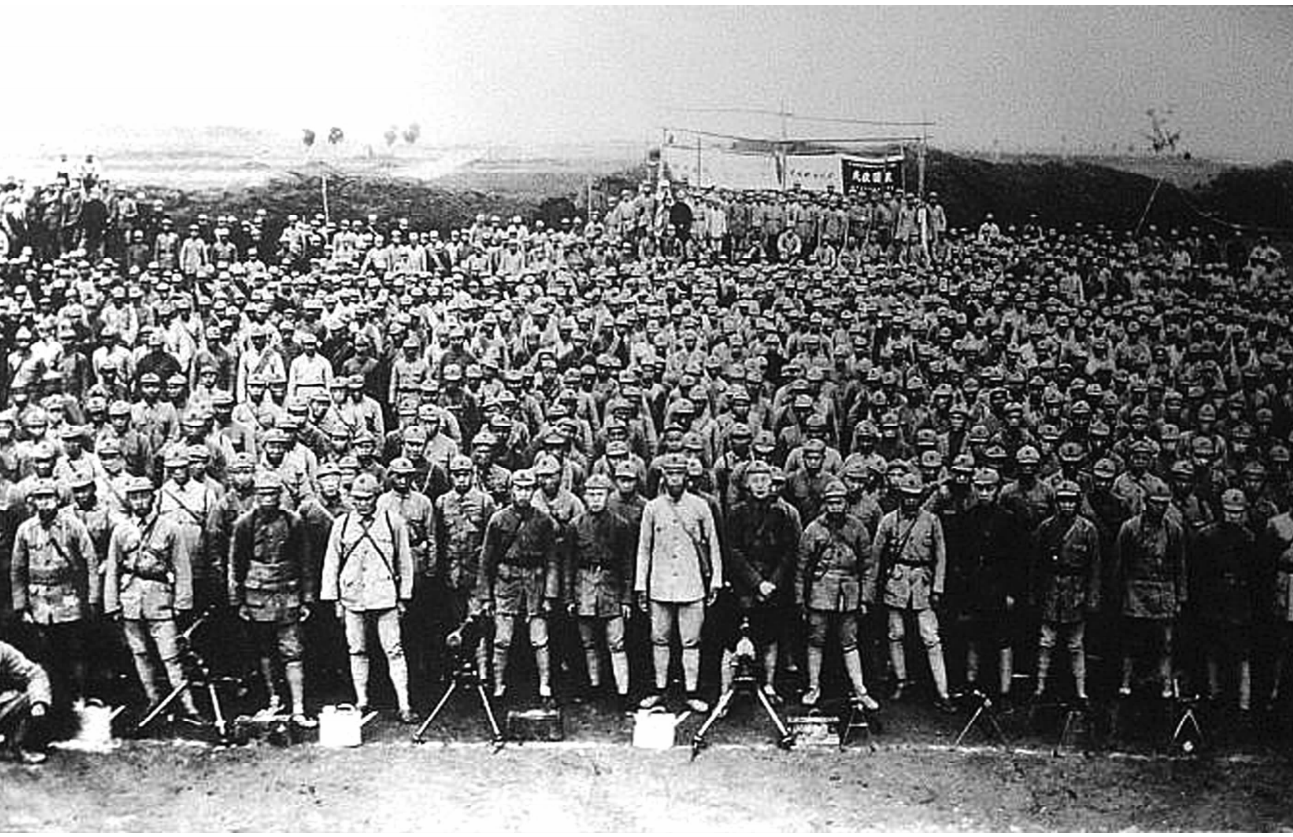
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参加大会的除驻云阳地区红军全体指战员外，云阳镇各界代表及云阳、培英两所小学的全体师生也手举小红旗，高唱抗战歌曲进入会场参加大会。大会向红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建军10周年纪念章，朱德总指挥做了红军改编和开往华北抗日前线的动员讲话。在朱德总指挥的带领下，与会指战员高声诵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现在上前线去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们的指责！谨此宣誓。

随后，任弼时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改编时，当要求全体指战员将红五星帽徽换成青天白日帽徽、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军灰布装时，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有的伤心流泪，有的愤愤不平。朱德总指挥和其他首长耐心向全体红军指战员讲解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说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理，消除了许多指战员的思想顾虑。

（二）一二〇师在富平誓师

9月2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东永安村西



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动员大会会场

南葫芦宝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出席誓师大会并讲话。师长贺龙宣誓就职。贺龙和萧克、周士第发布《一二〇师出动渡河命令》："本师决定明日起分6天向韩城县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

（三）一二九师在桥底镇誓师

9月6日清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泾阳县桥底镇三里村召开改编与誓师抗日大会。全师万余人在检阅台前列队。临开会时，大雨倾盆而注，全体指战员站立在大雨中，秩序井然。

誓师大会由陈赓主持，刘伯承师长检阅部队后，简要讲述了全国抗日形势并作动员讲话，并对红军战士不愿换装进行了耐心的思想解说。大会向全体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建军10周年纪念章。在举行宣誓仪式时，大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全体指战员热血沸腾，群情振奋，决心奔赴前线，把日寇赶出中国。

三、 渭北地区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一）八路军从渭北地区出师抗日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进驻泾阳、三原、富平等县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历时八九个月。

1937年9月3日，第一二〇师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过蒲城、澄城、合阳到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于9月17日集结于晋西北的榆次、忻县地区。



1937 年秋，八路军部队日夜兼程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9月6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从云阳镇冒雨出发，经三原、富平、澄城、合阳到达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于21日拂晓到达太原，23日进抵五台山指挥八路军作战。

9月16日，第一二九师从泾阳县桥底镇出发，经三原抵达富平庄里镇进行休整待命，加紧做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9月30日，师长刘伯承率七六九团先行从富平出发。10月6日，到达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由山西万荣县到达太原抗日前线。

（二）渭北人民为八路军出师抗日送行

八路军将士出师抗日前线时，在泾阳、三原、富平等驻地各村镇的街头张贴了《告别父老书》，并给房东打扫了院子，给水缸里挑满了水，还给群众赠送纪念品留作纪念。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项规定，在临离开宿营地时，都将借物一一归还，把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部队出发后还派出检查组，认真检查执行群众纪律情况。这一切都给渭北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一九师和一二〇师分别从泾阳县云阳、桥底等地和富平县庄里等地出发时，泾阳云阳、桥底和富平庄里等地的大街上挂满了彩旗和标语，学生排成队，人民群众自发列队站在街旁，欢送八路军出征。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从三原县城出发时，正值大雨倾盆，三原人民自发沿路冒雨为八路军送行。三原商会组织商界人士为八路军将士赠送雨具；三原民运会和三原各校的学生团体组织欢送团为八路军送行，并向八路军赠送毛巾、香皂等日用品。凡八路军途经

的各村，三原党组织动员群众设立供水站，沿途群众纷纷向八路军将士送食品，送鞋袜等。

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从泾阳、三原、富平等地出发东渡开赴抗日前线，前后历时40多天，受到了渭北人民的热情慰劳和欢送。每当部队经过时，沿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当部队宿营时，当地群众热情地为八路军腾房、烧水、做饭。沿途许多群众还主动牵着骡子、毛驴自愿为八路军驮运物资和行李，为部队带路，为八路军送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渭北地区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从渭北地区开赴抗日前线，渭北地区成为红军改编誓师抗日的出发地。这一地区见证了国共携手、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历史性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四节　抗战初期渭北中共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民众团体的建立

一、 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恢复

（一）中共陕西省委的重建

1936年12月25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博古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和人事安排。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贾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杨清）、张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伦、惠子俊任省委常委，

李初黎、崔廷儒、谢华、王俊为委员，彭加伦兼任省委秘书长，崔廷儒任副秘书长，张德生任组织部部长，谢华任组织部副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先设在二府街，后迁至西安城内纸坊巷。

（二）陕西各地中共组织的恢复发展

1937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增设青年部和妇女部，王俊、危拱之分别任部长。省委还下设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理治）、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欧阳钦）、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赵伯平）。1 月下旬，省委机关迁至泾阳县云阳镇，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开展工作。

3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依照地域便利，依照工作基础”，以工作基础较好的县为中心，将所辖区域划分为西安工委、渭华区、蒲白区、韩合区、三原区、北路区、关中区、邠长区、平泾区、泾阳区、乾县区、扶风区、蓝田区等 13 个区，实行分区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管理。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各地的中共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 21 个县、市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国统区有中共党员 900 多人，连同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全省有中共党员 1350 多人。

二、 抗战初期渭北党组织的发展演进

（一）中共渭北工委的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中共渭北工委隶属省委领导，周芝轩任

书记，唐玉怀负责组织，孙一君负责宣传，谈国帆负责军事、统战兼交通工作。1936 年 12 月，唐玉怀调离，黄子祥接任。中共渭北工委领导中共蒲城特支，中共尧山中学支部，中共石桥支部及中共交口、栎阳 2 个直属党小组和三原武字区，高陵岳华地区中共组织。

1．中共高陵特别支部的成立

1936 年 12 月 20 日，中共渭北工委派谈国帆带着张策（时在关中特委工作）的信来到高陵，恢复了许宗岳、白文鳌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1937 年 1 月中旬，中共渭北工委又派孙一君到高陵与共产党员许宗岳、段文义、白文鳌、高平、张贵林等人取得联系，在白文鳌家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渭北工委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高陵特别支部，许宗岳任书记，白文鳌任组织委员，段文义任宣传委员。中共高陵特别支部隶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2．三原基层党组织的恢复

1937 年春，中共渭北工委为了恢复党在三原的工作，在三原肃字区开始组建党的支部，于 2 月恢复成立了中共柴尧支部（书记杨顺玉，党员 6 人）、中共东寨支部（书记袁秀成，组织委员周玉山，宣传委员周鸿铸，党员 7 人）和中共西阳镇支部（书记吴曰聪，组织委员杨太升，宣传委员杨伟林，党员 5 人）。

3．中共蒲城特支的改组

1936 年秋，中共渭北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周芝轩在蒲城尧山中学附小任教时，先后恢复了尧中学生陈树藩、刘拓（刘振之）等人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于 12 月初成立中共尧山中学支部，由陈树藩负责。12 月下旬，建立中共蒲城特支，时有党员 20

余名，先后由周芝轩、屈计君负责，隶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1937 年 1 月，中共蒲城特支介绍尧中学生王伯泉、刘秉钧、曹步云、马志贤等 10 余人赴陕北参加革命。2 月，屈计君赴陕甘苏区后，中共蒲城特支和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2 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建立中共蒲城工委。3 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蒲城特支改组为中共蒲城工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与此同时，中共尧山中学支部改属中共蒲城工委领导。

（二）渭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变化

1. 中共三原县委的恢复发展

1937 年 3 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北工委，成立中共三原县委，周芝轩任书记，黄子祥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孙一君任宣传部长，李鸿儒、马志轩任委员。机关驻址在县城内管家巷小学内。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各县及三原武字区、肃字区一带的党组织开始恢复建立，中共党员发展到 130 余人。

中共三原县委恢复成立后，即派李鸿儒等人在武字区各村恢复成立了 8 个党支部。分别为：中共陵西支部，康德宽任书记，赵兴龙任副书记，党员 12 人；中共陵南支部，蔡家荣任书记，赵福兴任副书记，党员 16 人；中共甘涝池支部，温春荣任书记，党员 5 人；中共陵东支部，孙景元任书记，党员 9 人；中共陵北支部，李怀瑞任书记，党员 16 人；中共口外支部，常庆春任书记，党员 9 人；中共朱家支部，李志超任书记，党员 6 人；中共长坳支部，宁振昌任书记，党员 19 人。

2. 高陵县中共组织的发展

1937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申元龙）到高陵巡视工作，并在白文鳌家中召开会议，宣布省委决定，停止了人民协社高陵支部的活动，将学生救国会的骨干分子段文义、聂景德、陈光舜、张贵林、刘永端等人转为共产党员。同年初，中共高陵特支指派樊霞生去高陵崇皇小学任教，在当地发展党的力量。经过一段秘密接触和宣传，先后将莫英贤、吉振乾、任维友发展为中共党员。

3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特派员韩学理到高陵、临潼巡视工作。韩学理以在泾野小学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许宗岳被调到边区工作后，由韩学理接任中共高陵特支书记，段文义任副书记并兼组织委员，樊霞生任宣传委员。特支成员以所在学校教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到 5 月底，特支共有党员 15 人，并组建了中共泾野学园、窑子头小学 2 个支部。

3. 泾阳县中共组织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泾阳县云阳镇。1937 年上半年，在红军总部的帮助下，泾阳北乡建立了 2 个支部，党员 11 人；在西乡建立了 1 个支部，党员 4 人；在县城建立了 1 个支部，党员 11 人。全县共有党员 24 人。中共陕西省委迁至云阳镇后，这四个党支部暂由省委巡视员管理领导。

4. 富平县中共组织的发展

1936 年 10 月中共石桥支部建立后，主要任务是恢复组织生活，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壮大组织。同年冬，中共渭北工委派女党员陈玉秀到石桥开展工作，第二年先后发展朱美仁、吴彩银（吴玉珊）、

席玉珍等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 2 月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到达富平觅子、庄里、宫里、曹村、流曲一带。红军一边整训，一边恢复和建立富平党组织，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先后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 60 余名，并建立了南北韩、赤兔、到贤、臧村、乡里村等 5 个党支部，恢复了曹村党支部。3 月，中共石桥妇女支部成立，朱美仁任书记，席玉珍、吴彩银分别为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

5. 中共交口小组的演进

1937 年 4 月，中共临潼县工委成立，中共交口党小组改属中共临潼县工委领导，后改为中共交口特别支部。

（三）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成立和发展

1.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重新建立

1937 年，为了加强和统一渭北各县党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以党的基层工作较好的县份为中心，成立中心县委，领导周围各县党的工作。4 月，在省委书记贾拓夫的指导下，由张德生主持，在三原武字区长坳堡召开会议，决定重新组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中共三原县委遂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周芝轩仍任书记，黄子祥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孙一君任宣传委员，李鸿儒、马志轩为委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武字区，负责管辖三原、泾阳、高陵、富平及临潼栎阳等地的党组织。

2.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的党组织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即在武字区恢复成立了中共武字区

委，由康德宽任书记，郑怀德、蔡家荣为委员，同时对武字区的中共陵西、甘涝2个支部负责人进行了调整，由赵兴龙和黄永浩分别担任中共陵西支部和甘涝支部书记。其他支部负责人保持不变。中共武字区委时有党员130余人。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在城区各学校中发展党的基层组织。4月，相继成立中共省立第三中学教员支部（书记刘继曾，党员3人）、中共省立第三中学学生支部（书记魏文伯，党员3人）、中共三原职业学校支部（书记郭长寿，党员4人）、中共三原女子中学支部（书记刘桃贞，党员5人）4个支部。同月，又成立了中共团队支部、中共县府支部。

1937年4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把中共栎阳党小组改为中共栎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栎阳特支），邢子舟任书记，王臣、王智德、毛瑞甫分任组织、宣传、统战委员。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继续领导中共石桥支部和中共石桥妇女支部的工作。中共石桥妇女支部又陆续吸收在斗争中涌现的妇女积极分子张凤英、罗英兰、张凤莲、吴秀云、杜英莲等人入党。1937年间石桥地区共发展中共党员20名。

1937年5月底，中共高陵特支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发展党员16名，并组建成立了中共泾野学园支部、崇皇寺小学支部和窑子头小学支部。同年暑期，共产党员王振邦按照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的指示回到高陵，以岳华学校为中心，在农村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发展磨子桥村的王耿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在西阳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阳区委员会，胡志德任书记，杨顺玉任组织委

员，袁秀成任宣传委员，吴曰聪任武装委员，时有党员 20 余人。中共西阳区委下辖 3 个支部，分别为中共西阳镇支部，书记吴曰聪，组织委员杨太升，宣传委员杨伟林；中共柴尧支部，书记杨顺玉；中共东寨支部，书记袁秀成，组织委员周玉山，宣传委员周鸿铸。

3.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主要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突出发展壮大党员队伍。1937 年 3 月，三原有党员 130 多名。到 7 月初，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党组织增加至 3 个区委、4 个特支，有基层党支部 18 个。渭北各地的党组织得到不断发展，党的力量和组织作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领导渭北广大民众、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采取群众集会、开展纪念活动、办农民识字班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和组织进步师生成立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演出，举行抗日讲演，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形成新的热潮。

三、 抗日民众团体的建立与救亡活动

（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原队部

1. 民先队三原队部成立前的形势

1936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简称民先队），这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青年抗日救国组织。1936 年 10 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的民先队西安临时队部成立。1938 年 4 月初，民先队西安临时队部改称为民先队西北

队部，队长李连璧。青年学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抗日宣传运动之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三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民先队西北队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直接带动和影响下，三原民先队便应运而生。

2. 民先队三原队部的成立

1936 年 11 月，解登科、朗瑞亭、李润诚等以个别接收的方式，在三原中学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原秘密小组。1937 年春开学后，三原中学秘密成立民先队组织，由解登科、李润诚、冯永吉、郎瑞亭等 5 人组成队部。此后，三原工职、女中的民先队小组相继成立。为了进一步扩大民先队活动，3 月，按照周芝轩的安排，李润诚先后会见了普育小学的马宏山和克强小学的李明哲，这两所小学的民先队随之成立。到 1937 年夏，三原的民先队员已达 300 多人。9 月，为了统一领导民先队的活动，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三中、工职、女中等学校在民先队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民先队三原地方队部，王云魁任队长，蒙荁（蒙季伢）任组织委员，孙希文任宣传委员，朱光荣任秘书，李润诚、郭长海、张敏德为委员。[①] 联络点设在三原县南关东巷子。

3. 民先队组织在三原的发展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到渭北后，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三原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了新的高潮。从组织到抗日宣传，民先队三原队部的活动逐渐公开化，

① 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咸阳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咸阳市组织史资料》（1925. 12～1987. 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44 页。



三原民先队成员合影

民先队组织也得到快速发展，遍及三原城内所有的中、小学校，就连国民党统治的民治小学（后改为民治中学）也成立了民先队组织。当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孙一君在云阳小学任教，他在该校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发展民先队组织。不仅在各校学生中，在店员和青年农民中也建立有民先队组织，民先队组织甚至打破了三原县界和教育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全县民先队员很快发展到400余人。

1937年11月，王云魁叛变，加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操纵的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并担任主要职务。郎瑞亭担任民先队三原队部队长。1938年3月，董仲良又接替郎瑞亭任民先队队长。5月，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限制广大群众的抗日宣传活动，宣布取缔民先队等13个群众团体组织。到年底，三原民先队的活动终止。

民先队在三原虽处于秘密状态，但其活动却非常突出。他们积极主动地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积极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斗争，并积极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渭北地区充分发挥了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

（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渭北队部

1. 成立民先队渭北队部的必要性

由于各校、各地民先队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此时急需建立一个与中心县委及各县民先队进行联络的领导协调机构。1938年4月初，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与民先队西北队部商议后，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以三原为中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渭北队部（简称民

先队渭北队部）的报告。后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李润诚被派往西安，参加民先队西北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民先队渭北队部。

2．民先队渭北队部的成立

1938 年 4 月下旬，民先队渭北队部在三原县正式成立。民先队西北队部负责人李连璧、蒙念祖出席并指导了在三原北城蒙念祖家召开的成立会议。会议确定民先队渭北队部由李润诚、黄国斌、赵守杰、卢肃慎（刘静）、蒙荁等 7 人组成，李润诚任队长，朱光荣任秘书。民先队渭北队部辖三原、泾阳、高陵、同官、耀县、蒲城、富平、临潼栎阳地区等县、区的民先队组织。渭北队部还建立了党团组织，朱光荣任书记。

民先队渭北队部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和西北民先队部联络，领导、督促和检查渭北各县民先队的活动。

民先队渭北队部的成立，促进了渭北各县民先队的发展，使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地在渭北各县开展起来。

3．渭北其他各县民先队的建立

1936 年秋，蒲城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同年冬，尧中学生秘密建立了民先队组织。1937 年后公开组织，随之壮大；蒲城中学成立了民先中队。1938 年上半年，蒲城中学成立民先大队，崇实、罕井、党睦、洛西（孙镇）等地中小学相继成立民先中队或小队。9 月，成立了民先队蒲城总队，总队长赵志刚。同年年底，蒲城县各民先队的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禁止。

1937 年 10 月，中共高陵特支书记韩学理、青运干事李金浪首先在泾野学园进步师生中发展民先队员，成立了民先队泾野学园队部，韩学理任队长。随着民先队组织的不断发展，1938 年 1 月，中共高陵

党组织在各界抗战后援会中发展骨干分子30余名，又在泾野学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高陵民先队，张贵林任队长，陈光舜任副队长兼组织部长，高平任宣传部长。不久，在泾野学园、草市小学、崇皇寺小学、张桥小学、董白小学等各校成立了民先分队，共有队员100余人。10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高陵民先大队停止公开活动。

七七事变后，三原人毛瑞甫（中共党员）在临潼栎阳小学任教，经常向学生作抗战形势报告，影响了杨树芳、贺仪、张庆发等学生。1938年2月，在毛瑞甫的支持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栎阳地方队部在栎阳小学成立，杨树芳任队长，贺仪任副队长兼组织委员，张庆发任副队长兼宣传委员，高玉杰为委员。该队部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4月，不少队员参加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的学习，20多名队员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同年6月，国民党命令解散民先队，栎阳民先队以“青救会”的名义继续发展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栎阳民先队停止活动。

1938年夏，富平县旅省学生回乡工作团在庄里、流曲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工作团的成员张少林及立诚附小教师窦多寿等人，在立诚学校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富平队部，张少林任队长，窦多寿任副队长，队员30多人。民先队富平队部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隔不久，民先队主要负责人窦多寿被校方解聘，民先队遂停止活动。

1937年上半年，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帮助下，云阳小学就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到1938年春，泾阳民先队组织有了很大发展，除云阳小学成立了民先队部外，姚家巷小学、泾干中学

也成立了民先队部。在泾阳各校民先队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五六月间，渭北民先队部队长李润诚来到泾阳，与泾干民先队赵积民商议成立泾阳民先队部事宜。此后，赵积民等在泾干中学成立了泾阳民先队部。泾阳民先队部成立后，创办了《潮光》壁报，并组织民先队员到城乡进行文艺演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取缔民先队及其他抗日进步团体，泾阳民先队组织遂停止活动。

4. 渭北地区民先队的主要活动

一是代销和推荐《群众》周刊、《青年战线》杂志等进步书刊和马列等著作，用革命理论武装青年的思想，增强抗日救亡工作的自觉性。发动青年、农民去安吴青训班学习。

二是利用合法的球类比赛和组织合法的宣传团（队），联络感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三原中学代表队与泾阳、云阳、安吴、蒲城等地互赛，扩大民先队影响。组织三原各校的外县学生，利用假期成立临时返乡工作团（队），以演讲、印发传单、书写墙头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人民支援前线，保卫家乡。

三是组织宣传和文艺演出。发动学生办有《曙光》《春光》《先锋》《燎原》等十几种墙报，宣传抗战到底和抗战必胜的思想。组织学生、市民给前方抗日将士募捐鞋、袜、毛巾、肥皂，写慰问信等，鼓舞前方将士的战斗士气。在寒假、春节期间，组织各个学校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宣传抗日。

（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渭北的主要活动

1.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1937 年 4 月 12 日至 17 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

安召开。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作为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各地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举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后由黄华接任），胡乔木为宣传部长（后由刘光接任）。12 月下旬，西北青救会由延安先后移驻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等地办公。期间，方晨任西北青救会联络员，住三原县城的八路军联络站。

2. 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的设立

1938 年 4 月，为了加强和扩大渭北各县的青年运动，在八路军三原联络站设立了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由方晨、何贵生（何承华）负责，后来杨帆、白云繁、张瑛、王宜才等人相继加入。办事处党的活动归安吴青训班党总支负责，方晨、何贵生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杨帆负责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联系。

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负责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淳化、临潼、蒲城等县的工作，广泛动员和团结渭北地区青年学生，在渭北各县建立青救、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 年 5 月上旬，办事处与三十八军教导队、十七师政训处、三原民先队和学生分会等联合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大会及活动周。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的活动得到三十八军教导队和十七师一〇一团以及十七师政训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西北青救会孩子剧团在三原宣传演出期间，遭到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阻拦，在十七师政训处负责人吴仲鲁的直接帮助下，演出得以顺利进行，受到群众称赞。

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还动员三原、高陵、临潼、富平等地大批青年学生到安吴青训班参加了学习。10 月，由于三原形势恶化，

不利于办事处开展活动，杨帆撤离三原，到青训班负责儿童连队工作。至此，西北青救会渭北办事处停止活动。

3．渭北各县的青救会组织

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加强抗日宣传，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三原县青年救国会于1938年4月12日成立，由岳怀喻、曹秀玉、韩正运、黄瑞兆、马宗福5人负责。三原青救会组织三中、工职、女中学生及部分农村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①] 6月，柯乐满率领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安吴青训班。三原学联受邀，各校民先队、青救会均派代表前往安吴堡参加了欢迎联欢活动。到1939年4月底，根据上级决定，三原青救会停止活动。时有会员170余人。

1938年5月，安吴青训班派何贵生到高陵找关系，决定把遭受破坏的民先队转为青救会。10月，高陵民先队正式改为青救会，由许宗岳、白文鳌、徐髦、高尚文负责，许宗岳任大队长。同时，在草市小学成立了一个中队，黄希敬任中队长，田恒道任泾野学园青救会中队长。联保地区划分为7个分会。至1939年4月底，共有会员420人，学生占绝大多数。[②] 此间，高陵派许宗岳、王金才、史民权、刘岳锋、马继超为代表，从三原出发北上延安，参加了全国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9年初，泾阳青年救国会在云阳镇中街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书报门市部成立，毛鹏程任主任，杨万仓任组织部长，谢鸣智任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29页，中共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1941年6月《陕西青救的活动及初步总结》。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29页。

宣传部长。泾阳青救会成立后，各中小学民先队组织为适应局势变化，以青救会为组织形式转入秘密活动。云阳小学将民先队部改为云阳小学青救会，项志毅任主任。泾干中学在原民先队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泾干中学青救会，郭述全任主任。其他民先队纷纷改为青救会组织，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 4 月底，泾阳青救会共有会员 250 余人。[①] 1940 年春季以后，泾阳县青救会于同年 4 月停止活动。

1938 年 4 月，栎阳学生王智德、杨树芳等人在安吴青训班学习期满后回到栎阳，又组织 20 多人去青训班学习，并参加了青救会。6 月，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刘西山、王志新、王连元、陈来福等组成了栎阳青年救国会。[②] 栎阳青年救国会按地域划分有 6 个支会，该会在三原、高陵、临潼三县交界地区活动。9 月，栎阳青救会派代表王智德、李居仁、马平民等赴延安，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9 年 4 月底，栎阳青救会共有会员 600 人。1940 年上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栎阳青救会被迫解散。

4. 渭北各地青救会的主要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渭北各地的青年救国会在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西北青救会在云阳镇安吴堡主持开办安吴青训班，培训了大批革命青年干部，并组织很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29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29 页，中共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 1941 年 6 月《陕西青救的活动及初步总结》。

多爱国青年投身到了抗战第一线。各地的青救会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秘密地下交通线，护送了大批爱国将士和青年学生北上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并多次选派广大青年去安吴青训班和抗大学习。各地的青救会与民先队共同开展抗日宣传及统战工作，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建立了良好关系，一些中共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敌协会，宣传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

（四）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及主要活动

1．三原县抗敌后援会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三原县抗敌后援会随之成立，主席张玉祥。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三原抗敌后援会动员省三中、女中、工职等学校，先后组织农村工作团（队）开展救亡宣传活动。同时，先后派李屹阳（刘德植）、何纯渤、刘多桂、霍波、肖朝午等到武字区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向群众教唱抗日革命歌曲。1938 年 5 月，三原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地方当局取缔，其活动遂停止。

2．武字区抗敌后援会

1938 年 5 月，三原县抗敌后援会被取缔后，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中共三原县委于同年 6 月在武字区西岳庙小学成立武字区抗敌后援会，何纯勃、郭立三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武字区抗敌后援会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前，动员青年参军，对农民进行游击战训练。这一时期，武字区先后成立了 9 个抗敌后援分会。1939 年 7 月，何纯勃调往陕西青委党训班学习。到年底，

武字区后援会的活动终止。

3．高陵学生抗敌后援会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高陵县先后成立了学生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农民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4．渭北各地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

1937 年 9 月中旬，三原抗敌后援会在武字区组织 3000 余人举行纪念九一八大会，其中各小学学生 600 多人，妇女 50 余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等人亲临大会进行指导。会上，发言者络绎不绝，讲演者慷慨激昂。会后，各分会率领会员，沿途高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8 年 6 月，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李屹阳在武字区南原铁家庄开办妇女识字班，教妇女识字、学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此间，又在长坳、官道、三店、孙家壕、石桥等村举办了识字班。8 月，因参加学习的人数剧增，李屹阳、黄子文、郭立三等在长坳堡专门开办了一所女子义务学校，校址设在武字区抗敌后援会副主任郭立三家，对外称作“纺织厂”。此时，被党组织送到旬邑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学习的李盛云毕业后回到武字区，与陈玉秀一起在女子义务学校任教，协助李屹阳工作。“纺织厂”招收有武字区和富平县西原的青年妇女三四十人，他们以纺纱织布为掩护，学习文化、时政和党的知识，为抗日救亡培养妇女干部。同年冬季，党组织又派青训班女子连的夏青来武字区女子义务学校协助开展抗日形势教育，灌输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学员的爱

国热情。

1938 年 6 月，西岳庙小学抗敌后援会借西岳庙古会之机，邀请安吴青训班“抗战剧团”来武字区演出新戏、登台讲演，开展抗日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三原女中宣传队也到武字区西岳庙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武字区成为三原抗日宣传阵地和党的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渭北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民众团体的建立，在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共渭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推动了渭北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增强了渭北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使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抗日救国的前沿基地。

第五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国高潮

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农民连

（一）黄子文返回武字区组建农民连

1938 年 5 月，担任陕甘边庆阳抗敌后援会主任的黄子文，经中共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批准，回到渭北家乡三原武字区后，立即投入地方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中共三原县委派驻武字区的谈国帆及中共党员王瑞琪商议后，利用在瓦窑堡兵工厂学到的技术，自筹经费，在自己家的旧窑洞里办起了兵工厂，为抗日武装修理枪支，制造手榴弹。

在此期间，黄子文在武字区组织一批青年农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针对这些青年农民年纪轻，无斗争经验，不懂游击战术的实际，黄子文建议中共三原县委与安吴青训班联系，把这些青年编为抗日农民连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军事知识，为开展抗日游击战培养军事力量。

中共三原县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共赴国难”的号召，采纳了黄子文的建议，并组织所辖的临潼县栎阳和富平县淡村选派青年一块去学习。9 月，黄子文带领武字区 60 余名青年农民，连同富平淡村、临潼栎阳选送的青年共 90 余人赴安吴青训班学习军事。

由于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文化程度低，安吴青训班专门将其编为农民连，即十三连，黄子文任连长，张戈任政治指导员。青训班对农民连的教学除党的基础知识外，主要培训军事知识。

（二）农民连的学习培训

在安吴青训班，农民连重点学习开展游击战的军事知识、各种武器的构造、零件名称和安装、野外地形侦察、夜间攻击以及如何打伏击战等。青训班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练结合，注重提高学员的实战技能。当时青训班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在野外培训时，选比较僻静的地方，架一块木板做黑板便是课堂。学习训练虽然很艰苦，但学员们学习、训练的热情却很高。

（三）农民连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

3 个月的学习、训练结束后，青训班在安吴堡街道召开了毕业

典礼大会，学校负责人冯文彬、胡乔木亲自向每个学员颁发毕业证和安吴青训班纪念章，号召学员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用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拿起枪杆子保卫陕西，保卫党中央。

在渭北党组织的安排下，农民连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加入了八路军，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一部分深入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有一部分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二、 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抗日活动

（一）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成立

1937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八路军主力分批开赴抗日前线。驻扎云阳镇的一一五师离开后，在云阳设立了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汪锋为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即以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鉴于三原是整个渭北地区的中心区域，也是西安到延安的必经之地，遂在三原县城南关东巷子的汽车站西侧设立了公开活动机关——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时称“八路军三原联络站”，并以“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联络站除利用本院 10 余间房子外，又租用了马车店中的部分房屋，在临街的门房外，公开挂起了“第十八集团军三原联络站”的牌子。联络站对外是八路军“云阳后方留守处”的办事机构，实际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管理，是省委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联系工作的主要枢纽。

（二）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组织机构

1937 年 9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董振国担任联络站站长。此后，

为了加强联络站的工作，又相继调来王元一、张瑛等。王元一协助董振国处理联络站的日常事务，张瑛在联络站办起了书刊报纸发行部。

1938 年 4 月，董振国调离，王元一继任站长。张瑛负责向关中、陕南各地邮售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报纸，党内文件则以报刊之名邮寄到陕西各县党组织。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渭北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在联络站成立。办事处与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三原县委的联系分别由方晨、何贵生、杨帆负责。办事处的工作主要是组建渭北各县青救会和民先组织，广泛动员和团结渭北各地的青年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恢复发展党组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9 月，王元一去延安学习，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史道（郗安民）任联络站站长。

1940 年 10 月，史道调回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工作，张胡宣（张周勤）接任站长。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恶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奉命将联络站的大部分干部转入照金，联络站的工作就此终止。

（三）八路军三原联络站的主要活动

1. 传寄党的文件，发行党的刊物

八路军三原联络站是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北国统区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其公开的工作是接待过往的八路军干部、战士，秘密的工作则是以联络站报刊销售部为掩护，传寄党内文件，发行党内刊物。对各类刊物、邮件，联络站采用近取、远邮的办法，向关中、陕南及关中东、西府各县发送有关文件及党内刊物。发行的刊物有《抗日游击战争论》《论持久战》《新中华日报》《解放》《西北》

等。张瑛在发行工作中还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如给党内刊物包上古典小说书皮，在报刊中夹带党内文件等，把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等及时传递到了全省各地的党组织。

2．广交各界人士，加强统一战线

三原素为渭北重镇，社会各界人士常聚集于此。当时，国民党在三原设立的党、政、军、宪、警等机构相当庞杂，仅联络站附近就驻有三十八路军十七师一〇一团、国民党西北行营检查站、国民党陕西公路检查站、马步芳暂编骑兵第二师部等。把他们争取到全民抗战行列是联络站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为此，联络站负责人常奔走于这些机构，以拉家常、交朋友、谈时局等方式，建立友好关系。同时，说服、鼓励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参与抗日。史道与时任国民党三原县县长侯良弼在闲谈中拉成乡党后，从侯良弼处得知县党部准备查封联络站书店的消息，便主动找到县党部书记，追问原因，据理力争，使书店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

3．接待过境人员，迎送北上学生

中共的各级干部北上延安或从延安南下赴各地，大多都要经过三原。全面抗战后，接待、护送过境人员及物资均由中共三原组织和联络站负责。

1936 年，中共渭北党组织就在陵前、马额和洪水、嵯峨等地建立了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并多次顺利完成了护送中央领导和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青年学生的光荣任务。1938 年 11 月，林彪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路经三原时就由联络站负责接待。1939 年，刘少奇从西安到延安，也由联络站负责接待。联络站先后接待的还有李天佑、胡乔木、黄华、张德生、贾拓夫、汪锋、

海伦·斯诺、欧阳钦等人。

1938 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泾阳县参会代表谢秉成等到三原联络站后，由李润诚安排送往延安。联络站还先后介绍三原王沿平、屈斌、马宏智等人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原各中学的师生经常到南关公路旁观看这些潮水般奔赴延安、安吴堡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时趣称为“观潮”。

1939 年春，延安用汽车送来 18 名伤残军人去旬邑县坪坊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由于交通不便，汽车无法前行，联络站多方联系马车，将这些伤残军人送达目的地。延安十八兵站派人到三原做生意，出售石油、食盐，购买陕北急需的棉花、布匹、药物等，联络站为其提供了各种方便。

八路军三原联络站历时 3 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联络站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各项指示，加强了中共陕西省委与关中各县、陕南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完成了中共陕西省委及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渭北青年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三原县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 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

1937 年 10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按照西安学委的做法，针对三原驻军十七师政训处及国民党党部，尤其是新驻三原的宪兵对三原民众救国运动一贯采取包办和阻止态度的局势，准备开发民众运



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旅行剧团在三原街头开展宣传活动

动，通过斗争取得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的地位，增强抗日力量，推进城乡抗日救亡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利用文化界协会的名义，发动和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并成立筹备会，由筹备会向县党部、宪兵、驻军、警察、县府、教育局等单位发出通知，并邀请讲演。10 月 18 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奉令禁止后援会召集此会，亦不许各校长组织学生参加”。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结合三原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及群众斗争的情绪，分析认为县党部只是威吓，不敢用武力镇压救亡运动。于是，筹备会连夜召开三中、女中、工职三个学校的党支部会议进行讨论，并向学生公开宣布，征求意见。各校学生一致要求举行纪念大会。工职校长在学生强烈要求的压力下，只好答应全体学生参加纪念大会。

10 月 19 日，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如期举行，工职、女中、普育、中山女小及各界人士约 1000 人参加纪念会。因有警察局、保卫团、驻军及各校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会场异常严肃。大会由陈静之主持，三原县县长、保安队队附也讲了话。杨志杰、蒙荁分别代表文协、民先队讲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会后举行了游行请愿。当日，向群众散发了文协纪念鲁迅特刊和传单，城内到处张贴着纪念鲁迅和抗日的标语。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这次纪念活动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及威胁，取得圆满成功，在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广泛影响。

2. 营救进步教师

西安事变后，三原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省立三中的学生运动在渭北地区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

满。加之三原城区政治复杂，斗争尖锐，复兴[①]与 CC[②] 的对立，抗协、抗敌先锋团与民先队的摩擦，三原县党部、宪兵、县府利用抗协极力破坏民先队、文协等救亡团体。1937 年底，三原省立三中校长、进步人士冯一航被省教育厅撤职，国民党县党部多次欲将三中一些革命教师排挤出校。

1938 年 2 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民先队等 13 个救亡团体，遭到西安及全省各地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利用其操纵的“抗敌协会”也加紧活动，与民先队相对抗，采取威吓、拉拢等各种手段破坏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2 月 26 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与 CC 分子 30 多人，深夜翻墙闯入省立三中，将民先队组织者、进步教员原禾森、赵曼青、朱茂青、刘继曾 4 人秘密绑架，并以汉奸的罪名押送三原县府扣押。

省立三中“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出后，三原各界议论哗然。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策划和指挥下，三中全校师生率先罢课、游行以示抗议，各校师生立即响应声援，纷纷罢课。三中、女中、工职等校派出代表党新民、王玉（袁杰）、贺怀玉、蒙荁、郭长海等到县府请愿，质问县长侯良弼，并提出了不释放原禾森等老师就不复课的正义要求。学生代表王玉、冯永吉、郎瑞亭、韩红印、苗彦青等 9 人又找到当时驻三原的杨虎城部警二旅旅长孔从洲，提出要求追查此事。中共三原组织通过上层运作，国民党三原县当局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于一周后释放了被绑架的进步教师。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把握客观时局，有策略地领导广大师生同国

① 复兴：指国民党在其军事系统中的秘密特务组织“复兴社”。
② CC：指国民党在其党政系统中的秘密特务组织。

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

3．下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三原女中民先队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二至三人的宣传小组，深入家户院落，与家庭妇女和老人们拉家常，给他们读报纸、讲时事，募捐军鞋、寒衣，收集废铜烂铁，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援抗日前线。她们还动员能走出家门、店门的家庭妇女和商店学徒读书识字，学习抗日救亡的文章，学唱抗日救亡歌曲等。

三原女中民先队每次去农村，同学们都背着行李，高唱《毕业上前线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让我们去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总会有留恋，学无止境，力求完善，要在工作中去锻炼……”一次，在山东庄开展宣传，东北流亡同学刘镇元唱《松花江上》这支歌时声泪俱下，场内外哭声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声此起彼伏。1938 年麦收后，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屹阳的带领下，女中民先队到陵前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二）富平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富平旅省学生邵武轩、师源、刘茂坤、田仲廉、李指南等 20 多人响应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号召，利用寒假回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富平县保安大队队附周公甫进行阻挠，邵武轩、师源等人慷慨陈词，与之进行说理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县城民教馆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富平县抗日救国总会，随后即有组织地分赴各地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华县咸林中学的富平籍学生刘华林、杨树森、董天佑、陈益

勋、杨怡鲁等10多人，也利用寒假组成“咸中抗战救亡宣传队”，到富平东北乡一带，联络当地教师、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7年2月，红二方面军进驻富平后，把富平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推向了高潮，驻各地的红军组织了许多小宣传队，在集镇街头和农村进行讲演，张贴布告，刷写标语，给小学生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各种座谈会、联欢会，逢集时演出文艺节目等，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这年上半年，红二方面军总部和驻庄里地区的红军同当地群众一起，先后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胡景翼逝世12周年，纪念五一，纪念五卅运动等军民大会。抗战爆发后，于7月上旬和下旬又先后两次在庄里镇召开军民大会，当会公审并处决了破坏抗战的汉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少林等40多名富平旅省学生于暑假期间组成“富平旅省同学回乡工作团”，分为4个队，奔赴美原、流曲、刘集、庄里、淡村等地进行宣传。他们在县城设立留守处，负责与各队联系、交流情况，并出刊登载抗战消息和各地宣传动态的墙报。宣传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直到秋季开学时结束。

1937年寒假，西安和华县的富平籍学生响应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的号召，在张少林、武梦名等人的联络和组织下，联合组成“富平旅外同学寒假抗战救亡工作团”，时有西安师范、西安一中、二中、玫瑰女中、尊德女中、华县咸林中学等校的富平籍学生30多人，在富平县城郊、庄里、觅子、留古、流曲、美原、老庙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刷写标语，散发传单，表演话剧、小演唱等，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1938 年 4 月间，以富平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并吸收部分外县民先队员，组成了 30 多人的“咸林中学战时农村工作团”，到富平留古、到贤、流曲和临潼的田市、关山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慰问挖战壕的民工。当年夏，富平旅省学生又一次组成回乡工作团，在庄里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立诚学校民先队在校内出墙报，在校外贴标语、散传单，在街头和附近农村进行讲演，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民先队员还在庄里镇南场的华佗庙摆设书摊，经销的进步书刊达 200 多种，颇受大众欢迎。当时庄里镇的“二酉书局”也经销起这一类进步书刊。

（三）耀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 3 月 14 日，中共耀县工委借药王山二月二古庙会之机，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发动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了 15 个宣传工作队。在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和友军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的配合下，宣传工作队在药王山和耀县城内采用演话剧，散布传单，张贴标语、漫画，演讲等方式向游山逛会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间长达 10 天，受众达 4 万人之多。

1937 年冬季，耀县籍在西安求学的青年学生任步文、文玉寅、魏智宏、邱射轸等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和西安学联的组织下，结伴回到耀县，打起抗日救国会的旗帜，住进国民党县党部，上街刷写“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口号，召开群众动员大会。通过讲演会、座谈会、演唱会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八项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声讨日军侵华暴行。在中共耀县党组织的策应下，学生以“救国会”的名义面见国民党耀县县长李书亭，要求立即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扩大抗日影响。

12 月 24 日，在西大操场举行了“耀县抗日宣传大会”。市民扶老携幼，进城置办年货的四乡农民涌入会场，达 5000 余众。会上，县长、民运指导员（省委委派）及学生代表分别讲话、演讲。爱国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台下数千民众的热烈掌声。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的青年学生分别深入农村，继续开展抗日宣传，一直坚持到旧历年关，促进了耀县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四、 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三原组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民族抗战的号召，加强了对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把拥护统一战线政策的各界进步名流、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团结组织起来，使其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 年春，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农村工作团（队）分赴各地，与国民党当局商议，共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三原民先队和青救会组织还与国民党当地驻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政训处建立了良好关系，争取他们对民先队、青救会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支持下，十七师在三原建立了由安吴青训班培训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当地党组织动员的中共党员和先进青年 200 多人参加的教导大队。该大队先后由黎子淦、李慕愚、胡振家等负

责，并按照抗大的教育方针进行治学，他们学政治、学军事、练作风，充分显示了革命活力。

教导大队在三原张贴抗日标语，在街头演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帮助群众扫院挑水。三原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来访，老百姓交口称赞：“这才是真正的子弟兵。”教导大队在三原虽然不到两个月，但政治影响很大，西安《老百姓》先后做了几次报道。6 月 26 日，《老百姓》刊登题为《祝三原军队收麦运动》的诗歌，集中展现了军民间的鱼水之情。

（二）处决叛徒

西安事变后，中共组织趁杨虎城主政西安绥靖公署之机，通缉潘士杰。潘士杰便逃离西安，躲藏在临潼家中。

潘士杰，临潼县油坊人，原系中共党员，在三原中学上学时曾负责支部工作，曾先后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巡视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对中共在渭北一带的组织情况了解较多。1933 年 7 月，潘士杰叛变，向国民党出卖了中共三原和高陵等地的地下党组织，致使许多中共党员被捕。因潘士杰“反共有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赏识，被吸收为国民党陕西省“肃反”委员会委员，并委以乾县、礼泉等 5 县“肃反”专员重任。

1936 年 12 月 19 日，潘士杰从临潼去三原途经高陵，被高陵反日救国会的许宗岳、白文鳌发现后，于翌日晨被抓捕。西安学联会组织蒙念祖等为代表的公审团要求公审潘士杰。经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批准，潘自力奉警备司令部命令，在高陵冬至古会上对潘士杰公审后执行了现场枪决。

（三）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持“陕军”抗日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于7月10日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支援抗战，共赴国难。为了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三原、富平组织积极动员群众慰问和欢送驻陕第三十八军和胡景铎部，动员青年参军，到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作战，保家卫国。

1937年7月21日，由十七路军改编而成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率万余将士在三原县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三原各界代表及数万群众、市民、学生热烈欢送。7月24日，十七师抵达河北省深县，与日军战于保定。

8月28日，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在三原县城举行欢送第五二九旅抗日参战大会，李兴中师长、许权中旅长、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及三原群众代表分别讲话，中共三原组织动员数百名青年参军。9月1日，第五二九旅从三原出发，10日与日军激战于山西忻口。

1938年5月3日，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率直属部队及第五三〇旅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与日军战于晋西南。

第三十八军在三原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开赴抗日前线，屡建战功。因中共在三十八军曾长期开展团结抗日工作，部队中的广大中共党员在与日寇的作战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第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坚强的抗日部队之一，被卫立煌称赞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38年3月，在中共富平县工委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师源、刘

茂坤在庄里镇招募青年组建抗日义勇军。4 月下旬，经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同意，由刘茂坤带领富平抗日义勇军约 60 人编入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胡景铎部。后来，在山西抗击日军的战斗中，12 名抗日义勇军战士壮烈殉难。

在中共渭北组织的领导下，中共耀县组织引导和组织返耀爱国学生不断扩大抗日宣传，动员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为国效力；广大民众慷慨解囊，捐献钱物，支援抗战，在全县形成了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浩大声势。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渭北组织的领导下，富平地下党组织在觅子、曹村、流曲等地区组织抗敌后援会和一些进步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发动群众做军鞋，搞募捐，支援抗日。

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三原组织的演变

（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发展变化

1.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概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继续领导中共武字区委、西阳区委、城区区委、武字后区区委 4 个区委以及中共高陵特支、2 个直属支部和临潼栎阳地区的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 1937 年 10 月，三原县中共党员发展到 360 余人。1938 年 4 月，黄子祥、孙一君、李鸿儒调离，增补王玉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2. 三原县各级党组织的发展

1937 年 7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刘继曾组建中共城区区委。10 月，中共城区区委成立，刘继曾任书记，程颐醒任组织委员，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机关遗址

许宗岳任宣传委员。下辖中共教员、三中、工职、女中、街道5个支部，时有党员31人，机关驻省立三中。

1937年8月，中共岳华村支部成立，王振邦任书记，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支部成立后，发展党员20多人。11月，在樊霞生的指导下，中共崇皇小学党支部成立，莫应贤任书记，任维友任组织委员，吉振乾任宣传委员。该支部成立后，在崇皇地区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员，为延安红军输送进步青年。1938年春，中共崇皇区委成立。3月，中共高陵特支改为中共高陵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1937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黄子祥、黄致信在马额一带发展党员。同月，中共武字后区区委成立，邓子敬任书记，刘满年任组织委员，王巨英任宣传委员，刘克勤任青年委员，黄定江、刘春发为委员。下辖文龙、邓家、马额、郑家4个党支部，时有党员25人，机关设在邓家堡。

1938年春，中共栎阳特支的邢子舟、王臣等在临潼栎阳以教师为职业，秘密发展党员。

同年2月，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中共高李支部委员会在富平高李村成立，吴培根任书记，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3月，中共西阳区委书记胡志德在延安学习后返回三原途中牺牲，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整了区委领导，李万峰接任区委书记。又因袁秀成调离，周新轩接任宣传委员，时有党员105人。

（二）中共三原县委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决定改

变各地党的组织形式，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周芝轩任书记，陈元方（陈宏）任组织部长，薛振清任宣传部长，马志轩任军事委员，王玉、李屹阳为委员，王玉兼任学委书记。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武字区委、武字后区区委、城区区委、西阳区委、栎阳区委5个区委和富平石桥村、石桥妇女、高李村3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因泾阳、高陵划出而减少到290余人。

同月，中共城区区委组织委员程颐醒病逝。10月，王玉继任组织委员。1939年8月，中共三原县委开始陆续将部分干部调往陕甘宁边区，刘继曾离开三原，区委活动受到影响。

8月，中共高李支部书记吴培根调离，高元宽继任书记。11月，中共三原县委对中共武字区委领导进行了全面调整，任命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刘光远为区委书记，原区委书记、委员均调离。中共武字区委下辖蒙家、朱家、甘涝、油坊沟、官路西、柿树坡、口家庄、长坳、上河、双胜、西王、义和堡、石桥河13个党支部，时有党员200余人。

12月，中共栎阳特支书记邢子舟调离，郎瑞亭接任书记。1939年春，中共栎阳特支改称为中共栎阳区委，郎瑞亭任书记兼青年委员，王臣任组织委员，刘芳任宣传委员，杨明亮任农运委员；王知德调离。中共栎阳区委下辖中共栎阳学生、教工，义和村，尚寨农民、教员，朝邑村、新华小学、徐杨村、沟里村9个支部。

1939年3月，中共武字后区区委书记邓子敬和区委组织委员刘满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区委组织遭到破坏。

（三）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恢复

1939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西府地委，实行特派

员负责制，建立中心县委组织。中共三原县委又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周芝轩任书记，陈元方任组织部长，薛振清任宣传部长，王玉任青年部长，李屹阳任妇女部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县委和泾阳县委和武字前区区委、中区区委、后区区委，西阳区委，栎阳区委等5个区委，时有党员370余人。同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肖江洪（肖蓼）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县委机关先后驻云阳镇、临潼栎阳区上寨小学。

1940年4月，肖江洪带职去延安学习。5月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三原地区国民党反共破坏日趋加剧的形势变化，先后将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周芝轩、组织部长陈元方、宣传部长薛振清、青年部长王玉调离三原，由刘光远、郎瑞亭分别接任组织和宣传部长职务。1941年春，刘光远、李屹阳、郭立三调往陕甘宁边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仅留肖江洪、郎瑞亭开展工作。

1．中共三原县基层组织的演变

1939年9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根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治形势，决定将武字区化为小区管理。随即恢复成立了中共武字后区（又称武字第一区）区委，李志超任书记，下辖富平石桥和武字区焦村、侯家、蒙家4个党支部，区委机关驻侯家堡，时有党员33人。1940年3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杨顺玉接替李志超任书记。

1939年9月，中共武字中区（又称武字第二区）区委成立，蔡家荣任书记，常庆绪任组织委员，下辖朱家、周家岭、陵前、官道窑、唐家、长坳、沟南7个党支部，机关驻陵前镇，时有党员67人。1940年3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调整区委成员，常庆春接替蔡

家荣任书记；同时，常庆绪调离，李志超任宣传委员。

1939 年 9 月，中共武字前区（又称武字第三区）区委成立，康德宽任书记。下辖中共寇家庄、桃六、曹师凹、关路西 4 个支部，区委机关设在寇家庄，时有党员 42 人。1940 年 2 月，区委组织做了调整，由侯新民接康德宽任书记。

1939 年 9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对西阳区委成员进行了调整，杨顺玉任书记，景天佐任组织委员，周新轩任宣传委员，吴曰聪任保卫委员。1940 年 3 月，杨顺玉调往武字后区，书记由周新轩接任。

2. 中共高陵县委

1939 年 9 月，中共高陵县委改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高陵县委下辖中共城关、崇皇、会泾 3 个区委和泾野小学、草市小学、古城小学、街道、崇皇寺小学、坡底任村、桑程村、姬家庄村、高刘村、徐吾村、船张村、米家岩、马渡村、东城坊村、贾家村、岳华等 16 个党支部，时有党员 205 人。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高陵县委书记段文义被通缉，代理县委书记古韦（张久安）、组织部长刘永端被捕。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将高陵县部分党员骨干送往陕甘宁边区。中共高陵党组织从此处于“荫蔽”状态。

3. 中共泾阳县委

1939 年 3 月，中共泾阳县委成立，徐洛克（罗克）任书记，谢鸣智任组织部长，白德全任宣传部长。中共泾阳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驻云阳镇。1940 年 4 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撤离云阳后，中共泾阳县委改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辖云阳高小、

同州师范、泾干中学、西安高中 4 个学校党支部和中共安吴区委。1941 年 9 月，徐洛克等前往陕甘宁边区，泾阳县各级党组织进入“睡眠”状态。

4. 中共栎阳区委

1939 年 6 月，刘芳调离栎阳，朱光荣接任中共栎阳区委宣传委员。12 月，区委书记邢子舟调离，郎瑞亭接任书记，冯彦亭接任委员。1940 春，郎瑞亭调离，朱光荣接任书记，江云接任宣传委员。6 月，组织委员王臣调离，高树德接任组织委员。1942 年 12 月，朱光荣、高树德、杨明亮、江云等前往陕甘宁边区，其他党员进入“睡眠”状态。1943 年 1 月，贺仪接任书记，与区委委员冯彦亭继续工作。1944 年，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栎阳区委改属中共临潼县委领导。

（四）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发展党组织中的作用

1. 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1937 年 3 月，三原有中共党员 130 多名。6 月，党员发展到 234 名，其中工人占 5%、农民占 70%、学生占 25%。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的中共党员不断增加，至 1939 年 9 月，党员发展到 370 余人，党的队伍不断壮大。

2. 积极发展基层党组织

1937 年，中共西阳区委、武字区委、栎阳区委、城区区委相继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中共党员到高陵、富平等县发展党员，在高陵县相继成立岳华、崇皇小学 2 个党的组织，在富平县相继成立中共石桥妇女、高李 2 个支部。1938 年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

三原各校120多名外地学生党员派回当地发展党组织，白德全被派往泾阳云阳，邢子舟、王臣等到临潼栎阳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3．开办党员轮训班

为了提高党员素质，1937年7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陵前镇长坳堡举办支委轮训班，全县各党支部支委80余人参加了轮训。1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又选派30余名区委干部到延安学习。同时，安排各县委、区委主要负责人赴边区中央党校学习，翌年7月结业后，分别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六、 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渭北国统区中共组织惨遭破坏

（一）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团体的取缔和破坏

1937年1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成立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后，企图与抗日进步组织民先队、青救会争夺爱国青年。

三原时为陕西教育大县，是陕甘学生的云集之地，县内中等学校达5所之多，在中共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教育培养下，各校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学校民先队和青救会，仅有极少数学生被国民党引诱参加了抗协。

1938年2月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两次下令取缔各地民先队、青救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三原的形势日趋恶化。8月，民先西北大队队长李连璧在三原被捕。民先渭北队部队长李润成和西北青救会负责人方晨被县党部追捕，两人得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等人掩护而逃离，民先渭北队部和渭北青救会的工作被迫处于瘫痪状态。

1938 年 8 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为了控制地方行政人员的思想，举办了以“防共、反共”为主题的三期训练班，对县长以下的 3500 多名行政人员进行了培训。三原县百余名国民党行政人员参加了培训。10 月，国民党复兴社在三原开始训练保长及社训助理员，欲将三原建成“反共”的第一模范区，并以民治中小学、县立高小为抗协大本营，在乡村仍然利用地主豪绅做联保主任，其派款、征兵无不从中渔利。

1939 年 5 月，三原的民先队、青救会等抗日进步组织均被迫停止了活动。6 月，国民党在三原设立了后备军三青团陕西支部三原分团部，妄图引诱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进行反共活动，但遭到多数青年学生的拒绝，三原教育界一度出现混乱。

（二）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重新抛出了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从 3 月起，国民党秘密调兵遣将，沿边区各县挖战壕，筑修碉堡，在三原、泾阳、富平、耀县一线对陕甘宁边区筑起了一道封锁线。国民党密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在三原北部的洪水、柏社及淳化方里、耀县小丘一线构筑工事，三原大部分地区成为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

此时，为了防止日寇西渡黄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国民党驻陕军队共同担负起陕西境内 716 公里黄河防务的重任。国民党假借抗日名义，剥削人民，保甲长强令人民群众出钱出力，保甲人员任意指派民工构筑工事，地主豪绅把持着

整个保甲系统，给淳化、三原、耀县等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2 月，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兵退陕西，到达三原，驻东里堡，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部进驻三原县城。随同迁到三原的有西北实业公司、棉纺厂、棉织厂、机械厂（驻鲁桥）、汽车队（驻起驾村）、军鞋厂（驻鲁桥镇）、制药厂（驻北城）等工厂，山西大学、铭贤中学亦随同迁来。三原人民的劳务、捐税负担加重，生活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侵占淳化、旬邑等 5 座县城和边区 6 个区，掀起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以西安为反共中心，开始在陕西各地继续破坏中共组织，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志士。同月，因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恶化，中共陕西省委从国统区的泾阳县云阳镇先后迁至淳耀县安社镇、照金镇及新正县马栏镇（今属旬邑县），在陕甘宁边区境内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党的力量，1940 年 5 月 4 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加强了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对党员的“荫蔽”工作，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打入国民党的群团组织，如共产党员王德生、张庆发等，与抗协组织拉上关系后，加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357 页。

入抗协借以掩护；二是选送一批党员参军，如中共党员张维奇等去部队，党组织通过关系，将他们送到第三十八军；三是北上边区，对县区级主要干部和已暴露身份，无法在当地立足的党员，陆续调入边区开展工作；四是撤出原单位，继续坚持工作。如学委的王玉住在校外，尚未暴露身份的陈元方等迁驻农村或外地，继续坚持党的工作。

（三）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到破坏

1940 年 6 月，三原中学学生、中共党员郭壬戊被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逮捕，并押往西安劳动营。此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施行联保制，设置侦察网，搜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各级党组织活动异常困难，三原城内中共党员也远离党组织的领导，中共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共三原组织的会议一般不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为口头传述。

在这种形势下，黄子文在武字区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将此事告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时，周指示说：“黄子文这个人太红了，他到谁家，敌人就怀疑谁家是共产党，现在敌人到处‘清共’，最好让他离开地方。”刘光远派交通员将黄子文送到了陕甘宁边区中共陕西省委驻地。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送黄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延安研究院学习，在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①

1940 年 7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和宣传委员薛振清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后，三原党组织负责人均离开县城，县委工作由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7 页，刘光远：《忆富平石桥党支部和三原党组织》。

陈元方负责。下旬，张维奇秘密去临潼栎阳上寨小学向“荫蔽”的陈元方汇报三原的严峻形势后，经研究决定，凡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不参加期终考试，立即离开三原，并通知中共高陵县委负责人段文义等一批骨干相继进入陕甘宁边区。

8 月初，贾拓夫来到三原检查工作。9 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报告了三原党组织的现状。已经暴露身份的陈元方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工作，陈元方临走时，调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中共栎阳区委书记朗瑞亭分别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临时负责中心县委的工作。10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肖江洪从延安回到三原后，负责中心县委的工作。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三原的形势更加恶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刘光远和妇女部长李屹阳被调往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只有肖江洪、郎瑞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坚持以武字区为中心开展工作，而在武字区的大多数中共党员是农民，还能经常召开会议（大约一月左右一次），接头谈话也比较便利。刘光远回到省委所在地照金后，因与武字区关系比较密切，仍负责三原武字区、西阳区和富平庄里党组织的工作。

1942 年 10 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肖江洪、中共西阳镇东寨支部书记周新轩及中共党员殷兆中、周鸿运等 10 人被国民党军十五师便衣队逮捕，关押于西安。随后，国民党三十八军集团军司令部在三原城内逮捕三中、女中、工职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多人。中共西阳区委的杨顺玉、吴曰聪、景天佐等北上边区。12 月，中共陕西省委迫于形势严峻，撤销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但三原地区的基层党组织依然秘密开展地下活动。

至此，三原地下中共党员严格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全县党员转入“睡眠”状态，党的基层组织也暂时停止了活动，转入地下“荫蔽”。

七、 三原中共组织实行异地领导秘密恢复活动

中共三原党组织遭敌破坏后，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仍留在当地“荫蔽”。从1943年起，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对国统区处于“睡眠”状态的中共党员进行“唤醒”，在边区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并向国统区多次派出交通员，传达党的指示，实行异地领导，逐步开展党的工作。

（一）单线联系，“唤醒”党员，秘密恢复活动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精兵简政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统一领导关中分区根据地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从1943年开始，中共关中地委逐步恢复了与国统区党组织的联系。

1943年2月，刘光远根据中共关中地委的指示，在淳耀县境内前嘴村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争取非法武装。4月，黄子文回到西安，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长王俊安排刘光远了解黄子文的情况，刘光远派吴子玉（刘光顺）见黄子文，黄对吴说：“我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我爱人和孩子都在马栏，以全家人担保，对共产党永不变心。”此后，黄子文一直和刘光远保持联系。[①]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7页，刘光远：《忆富平石桥党支部和三原党组织》。

1944 年，刘光远对分布在三原的地下党员实行联络员制度，实施党组织对党员的异地领导，并派禾青（刘觐业）、吴子玉等联络分散“荫蔽”在三原武字区等地“睡眠”的党员，互通情况，秘密恢复三原部分地区党的工作。

（二）组建武工队

1943 年初，刘光远根据中共关中地委的指示，在淳耀县境内，通过当地党组织，深入非法武装中做非法武装人员的思想工作。1945 年 1 月，刘光远在陕甘宁边区高山槐一带组建起了一支 10 余人的武工队，刘光远任队长，朱龙江任副队长。当时，由于人员少，武器差，武工队主要活动于淳化、耀县一带，有时也南下到三原和富平交界地区的石桥、淳化方里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为了恢复、打通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线，武工队协助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于 1944 年下半年恢复和重建了由西安经三原坡子堡（今马额坡子村）通往延安的东路交通线，并在李怀西家设了联络站。同时，恢复了党组织以前建立的洪水、嵯峨西路的联络站和联络点。通过这两条交通线，先后将几十名地方干部送往陕甘宁边区。这支武装活动于三原、富平、淳化、耀县一带，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迎接抗战胜利

1945 年春，随着抗日战争局势逐渐走向明朗化，中共中央于 4 月提出了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5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

合政府，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军队和学校内的党部，实行宪政和地方自治，还政于民，以迷惑民心，并吸纳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在全国各省、县分别设参议会。三原县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张警吾任临时议长。7 月，国民党三原县民团副团长靳景云贪污壮丁款，被中共三原组织发动的民众告发，后在西安被处决。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三原，县城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拥上大街欢呼，奔走相告，广大民众欢欣雀跃，城内街道鞭炮齐鸣，处处锣鼓声震天。三原县临时参议会在东关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集会，军警朝天鸣枪助兴。县城连日夜间大耍社火，从早到晚庆贺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渭北地区不仅是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出发点，也是西北支援抗日前线的前沿阵地。中共渭北党组织始终围绕抗日救亡大局，积极组建和发展群团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在解放战争中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中共组织在三原的恢复重建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强烈追求和平与民主，渴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和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凭借其在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的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又一次投身到争取民主解放的战争中。

一、 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一）渭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

抗日战争期间，关中国统区三原的中共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荫蔽精干”的方针政策，大部分领导干部转移北上进入陕甘宁边区。三原境内的中共党员则就地“荫蔽”，三原基层党组织也随即隐伏，并处于秘密工作状态。

1945 年 10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抓紧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加强领导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运动，为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而奋斗。

1946 年 1 月，为了加强关中地区和陕南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形势需要，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陕西省工委），汪锋任书记（同年 8 月，汪锋调豫鄂陕区工作，赵伯平接任书记），中共陕西省工委机关驻关中分区所在地旬邑马栏镇。

中共陕西省工委成立后，把恢复重建陕西国统区各县党组织，发展党员，组建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斗争，作为首要重大任务。遵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中共陕西工委先后向关中各地派出大批干部，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将关中 38 个县划分为西府、太白、西路、渭北、北路、东路、沿河、西安等 8 个战略区，其中渭北区包括泾阳、三原、临潼、高陵、淳化、耀县共 6 县。北路区包括蒲城、白水、同官、富平 4 县。中共党员陈元方被派到三原县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三原党组织，建立武工队，开展游击斗争。

（二）中共渭北工委的发展演进

1. 中共泾原耀临高工委

1946 年春至 11 月，中共临潼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临潼县工委）、中共三原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三原县工委）、中共泾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泾阳县工委）、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耀县工委）、中共泾原（即泾阳、三原）工作委员会（简称

中共泾原工委）、中共临高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临高工委）相继成立，中共在渭北各县的党组织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

11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工委在三原、泾阳、耀县、临潼、高陵 5 县工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泾原耀临高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泾原耀临高工委）。中共泾原耀临高工委书记由谈国帆担任，并与中共泾原工委书记张中涛、中共临潼县工委书记尹省三、中共耀县工委书记张少林 4 人组成工委委员会，负责中共泾原工委、三原县工委、耀县工委、临高工委的组织工作，发展三原、泾阳、耀县、临潼、高陵 5 县的武装力量。

2．中共渭北工委

1946 年 12 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陕西省工委在耀县寺坡村正式成立中共渭北工委，同时撤销了中共泾原耀临高工委，任命谈国帆担任书记兼管统战工作，张中涛兼任组织部长，并和易省三、张少林组成了工委委员会，机关驻地在耀县寺坡村。中共渭北工委负责领导中共泾原、高陵县、临潼县、耀县 4 个工委组织。

1947 年 1 月 1 日，中共渭北工委驻地耀县寺坡村遭到国民党军袭击，工委机关移驻高尔原村。

3 月，中共关中地委在耀县文王山下宣布成立中共路东（咸铜铁路以东）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路东工委），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下辖中共同官县工委、富平县工委、蒲城县工委、白水县工委 4 县党组织。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将中共陕西省工委同中共关中地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关中地委。同时期，还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国统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关中国统区工委），由赵伯平担

任中共关中地委第一副书记兼中共关中国统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中共渭北工委归属中共关中国统区工委领导。同月，中共咸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咸阳县工委）成立，划归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6 月，中共关中地委将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原中共路东工委所辖的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工委统一归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同时，对中共渭北工委组织机构及领导成员做了调整，由张凤岐担任书记，张中涛担任组织部长，董实丰担任宣传部长，谈国帆兼任统战部部长，张为民担任社会部副部长，并和张军、邵武轩、刘拓、尹省三组成工委委员会。中共渭北工委负责领导中共泾原工委、三原县工委、高陵县工委、临潼县工委、耀县工委、同官县工委、富平县工委、蒲城县工委、白水县工委 9 个县的党组织。

9 月 6 日，中共关中地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路东临时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临时指挥部，领导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工委及其游击队开展工作，张凤岐任中共路东临时工委书记兼路东游击总队临时指挥部政委，仍隶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11 月 9 日，中共路东临时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临时指挥部在同官县瓦渣岭遭敌主力“围剿”，工委成员被打散，工委书记张凤岐辗转回到中共关中地委，中共路东临时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临时指挥部此后停止活动。

1948 年 2 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中共路东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中共路东工委直隶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中共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工委归属中共路东工委领导。划分设立后，中

共渭北工委领导成员由 5 人组成，由郭进亭担任工委书记，张中涛担任组织部长，董实丰担任宣传部长，张为民担任社会部长，谈国帆担任渭北游击总队司令员。中共渭北工委辖中共三原县工委、泾阳县工委、高陵县工委、临潼县工委、耀县工委、咸阳县工委 6 个党组织。

二、 中共泾原工委的成立

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前夕，中共陕西省工委于 1946 年 8 月开始酝酿组建中共泾原工作委员会，以加强三原和泾阳两县的党组织领导，便于开展武装斗争。

1946 年 9 月，经中共陕西省工委批准，中共泾原工委在耀县寺坡村成立，由张中涛担任工委书记，段文义担任副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直接领导。中共泾原工委负责三原、泾阳两县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泾阳县工委也在耀县寺坡村成立，中共陕西省工委任命徐洛克担任中共泾阳县工委副书记。

同月，中共三原县工委书记陈元方调离，中共陕西省工委任命张中涛和段文义兼任中共三原县工委正、副书记。因中共泾阳县工委副书记徐洛克没有到任，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由张中涛兼管中共泾阳县工委的工作，便于加强和开展三原和泾阳两县的工作。

12 月，中共渭北工委建立后，中共泾原工委归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1947 年 6 月，中共泾原工委撤销，中共三原县工委、泾阳县工委直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三、 中共三原县工委的成立

1946 年 8 月，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

工委指示，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耀县小丘镇独石村重新组建成立了中共三原县工委，由陈元方担任书记，刘光远、吴曰聪、杨顺玉为委员，时有党员 55 人。中共三原县工委成立初期归中共陕西省工委直接领导。9 月，中共泾原工委成立时，陈元方被调回中共陕西省工委工作，张中涛、段文义兼任中共三原工委正、副书记，隶属中共泾原工委领导。

1947 年 6 月，中共泾原工委撤销后，中共三原县工委直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7 月，中共三原县工委副书记段文义调往中共渭北工委工作，吴皋森接任副书记。

1948 年初，张中涛不再兼任中共三原县工委书记职务，工委工作由吴皋森主持。12 月，中共渭北工委撤销，中共三原县工委直属中共关中工委领导。

1949 年 1 月，中共关中地委将中共三原县工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

四、 渭北游击总队的建立

（一）渭北游击总队建立时的革命形势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反共集团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并授意其心腹胡宗南集结重兵于关中，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渭北一带地处陕甘宁边区南沿，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三原、泾阳两县是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10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制定了关于《陕西党目前工作方针》，明确了沿边区山地、南山地区以及

麟游山区各地下党武工队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要求“以现有武装力量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以配合边区自卫战争为中心任务”。[①]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又致信陕西省工委，要求“应即动员全党，进行发动及准备发动国民党区游击战争，配合边区军民，打垮蒋、胡进攻，保卫边区，解放关中，准备进一步摧毁蒋、胡在西北的统治。”“工委应立即根据自然条件、工作情况，将大关中划成若干独立工作地区，以免陕委（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外面断绝联系后，他们仍可单独活动。每区应配备一两个独立主持工作的干部。每区并应创造一支基干武装力量，作为地方武装骨干”。[②]

（二）渭北游击总队的成立及发展

1946 年 12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在组建中共渭北工委的同时，成立了渭北游击总队（简称渭北总队），谈国帆任司令员兼政委。渭北总队随中共渭北工委机关驻耀县寺坡村，受关中军分区和中共渭北工委双重领导。

渭北总队成立后，调集 3 支武装力量，共 100 多人，建立游击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将原在临潼交栎地区活动的渭北武工队调至淳化县方里以东和耀县西原一带活动，并配备党员干部六七人加强领导；将刘光远、朱龙江带领的金刀大队调至三原武字区和心字区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渭北工委与渭北游击总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2 页，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于陕西党目前工作方针》。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渭北工委与渭北游击总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9 页，1946 年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指示信（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开展蒋区游击战争活动》。

以南，以嵯峨山为中心，在方里以南和张家山一带活动；将1946年8月建立的由杨凯领导的耀县独立中队（有20多人枪）继续留在耀县阿子乡肖家原一带活动。

1947年2月20日，吴曰聪、段垣、李荣福、桑子良又组建起一支20多人的三原独立中队。中共关中地委将中共咸阳县工委及其武装力量划归中共渭北工委和渭北总队领导。5月5日，黄子祥、黄子文等在三原武字区领导了陵前起义。5月8日，淳化方里镇国民党自卫队队长宋彦芳也率部起义。两支力量均由渭北总队领导。

5月29日，为了统一指挥各地武装力量，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渭北游击总队司令部（简称渭北总队司令部），谈国帆任司令员兼政委，黄子祥任参谋长，张孝德任政治处主任，并对所属武装组织进行了改编。至此，渭北总队下辖5个支队和三原、耀县2个独立中队，共有350多人枪。6月，中共路东工委及其所属中共同官、富平、蒲城、白水4县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其所辖4县的武装力量也划归渭北总队领导。三原独立中队于同年7月改编为地方警卫部队。同时，中共关中地委对渭北总队司令部的领导成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充实，由谈国帆担任司令员，张凤岐担任政委，黄子祥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占云担任副司令员，薛健担任副参谋长，董实丰担任政治处主任。9月，渭北总队下辖9个支队和耀县独立中队。至10月，蒲城支队划分为路东三、六两个支队。此时，渭北总队共辖10个支队和1个独立中队，1100多名指战员。

1948年2月，中共路东工委与中共渭北工委分开，所属武装力量亦相应分开。渭北总队司令部领导成员又进行了调整，谈国帆担

任司令员，郭进亭担任政委，罗克明担任政治处主任，下辖5个支队和1个独立中队。12月，中共渭北工委撤销后，渭北总队直属关中军分区领导。1949年5月以后，渭北总队所属各部队分别被编入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属部队或各县的地方武装。

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的两年间，渭北总队及其所属组织已发展为千人左右的武装队伍，经常活动于渭河以北和淳、耀西北部的广阔地区，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部队消灭反动武装，并在宣传党的政策，建立地方政权，护送革命干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陕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能够迅速在渭北地区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这与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长期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和良好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和武装力量的发展，为渭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主导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自卫反击战

一、 解放战争初期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协商组建联合政府，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国民党蒋介石

反共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在1946年6月底，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心以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的进攻，争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并制定了以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内容的军事原则，打击国民党军队。

解放战争初期，渭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力量比较强大，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的活动仍沿用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度，坚持开展“荫蔽”活动。1946年1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成立后，秘密恢复重建了渭北国统区各县党组织，发展党员，组建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动用34个旅23万兵力大举进攻延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部队奋起反击，打响了延安保卫战。

二、 陵前起义

（一）陵前起义的背景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黄子文受到迫害，回到三原武字区。1944年，黄子文利用早已被“开除党籍”的特殊身份，通过王鸿俊等社会关系担任了国民党三原县陵前、马额、柏社、嵯峨四乡指导员。自此以后，黄子文将一些进步人士安插到鲁桥、嵯峨、长孙、陵前、马额等乡公所自卫队任职，并多次从西安驻军处购买枪支、子弹运回三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在黄子文的策划下，以“清账”的

手段，罢掉了国民党陵前乡乡长，选举郭立三为陵前乡乡民代表会主席、三原县参议员。9 月，由郭立三主持选举孙志正为陵前乡副乡长。10 月，三原民众代表黄子文、杨发科（三原人）及三原县浊峪河水利协会会长王虚白等人，向陕西省监察使状告国民党三原县县长陈琯贪污代购军麦款 17.7 万元，此案轰动三原县城乡，陈琯被三原各界告倒后离任。

从 1945 年至 1946 年间，黄子文利用其身份和职务之便，获取情报，多次保护了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和中共边区武装。他得知三原驻军联络乡卫队准备袭击在柏嵯一带活动的刘光远、朱龙江带领的武工队的情报后，立即派孙景元给刘光远送信。刘光远收到信后，及时改变了行动方案，保存了革命武装。黄子文和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志正等商议，决定夺取国民党陵前乡的政权和武装，组织一支革命武装。于是，黄子文变卖了自家田地 200 余亩，先后筹钱购枪 30 余支，子弹 6 万余发，准备组织起义。

1947 年 3 月，黄子文被选为陵前乡乡长兼自卫队队长。上任后，黄子文改编了乡自卫队，让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掌握枪杆子。这样，陵前乡政权武装全部被黄子文、孙志正控制。同时，黄子文又以四乡指导员的身份，在马额、柏社、嵯峨三个乡自卫队安插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为发动起义奠定基础。

（二）陵前起义的经过

1947 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关中地委发出保卫边区、保卫关中的指示。黄子文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的指示，要求他把陵前乡的武装拉到陕甘宁边区。黄子文决定立即组织

起义，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

1947 年 3 月下旬，黄子文、黄子祥、孙志正、郭立三等在陵前乡街道“天成合”粮店秘密商议起义事宜，决定派当时在家养病的中共淳耀县保安科科长兰子敬向中共关中地委、渭北工委汇报请示工作。4 月，黄子文、孙志正相约时任淳耀县柳林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孙一君在兰子敬家开会。会上，兰子敬向与会者传达了上级指示，讨论研究了起义具体方案，决定 5 月 8 日（农历三月十八日），趁陵前大寨堡汉圣母庙会之机起义，起义人员以乡自卫队为基础，动员、挑选部分党员群众组成一支武装队伍，由孙一君把起义方案向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政委吕剑人进行汇报，并电告习仲勋同志。

5 月 4 日晚，传来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一旅攻打耀县的枪炮声，黄子文决定提前起义。5 日晨，他令孙志正迅速集合陵前乡自卫队员，并密切监视马额乡自卫队动态。两乡的乡公所相距不足 10 里，马额乡公所所在地坡子村是北上耀县、南下三原的必经要道，若不把马额自卫队降服，起义队伍势必没有退路。

黄子文带领自卫队员 20 多人，前往马额乡找乡长兼自卫队队长安仲阳，欲将其诱到陵前乡公所。但安仲阳不肯上钩，黄子文便让黄子祥去做安仲阳的工作。随后安排孙志正等人守在陵前乡公所，密切关注事态变化，并召集陵前各保武装到乡公所集中。黄子祥和乡自卫队副队长慕天祥带领自卫队员 10 多人，到马额的坡子村见到安仲阳后，以陵前、马额两乡自卫队住在一起相互照应为由，说服了安仲阳。当晚，便将马额乡自卫队全部缴械，对自卫队实行“地方戒严”。

6日晨，黄子文派人将马额通往三原的电话线割断，又烧毁陵前乡公所所在地侯家堡的城门楼，起义队伍在陵前街道张贴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并抓获被解放军边区联防部队警一旅打散的敌骑一旅1名军官和2名话务员。

傍晚，起义队伍集结于陵前乡小道口村，兰子敬代表中共关中地委讲话。此后，约100人的起义部队，携带机枪1挺，短枪40余支，长枪100余支，在黄子文等带领下连夜经孙村（今新兴镇）、洪水、淳化方里等地开赴陕甘宁边区。

5月7日早，起义部队到达淳化县方里上常社村休整。孙志正、慕天祥到崔家原，通过吴怀玉给渭北总队司令员谈国帆送去了史义（孙志正党内代号）和慕天祥署名的信，相互取得联系。

下午，谈国帆和张中涛带领20余人到爷台山碑子腰岘接应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在崔家原接到了习仲勋的电报慰勉，习仲勋指示："环境好时，部队到渭北平原活动；环境坏时，部队拉回休整。"[①] 中共关中地委派组织部长陈元方对陵前起义人员进行了了解审查，向上级写了《黄子文起义始末》的报告。

（三）陵前起义的意义及影响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结20万重兵进攻陕北解放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②]。在这一关键时刻，在中共渭北工委的领导下，渭北国统区以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渭北工委与渭北游击总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58页，孙志正《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1页。

黄子文、黄子祥、孙志正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了三原陵前起义，有力配合了解放区的反击战斗。

陵前起义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关中地委发出的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粉碎敌人侵犯的重要指示，是一次有群众基础、有组织地摧毁敌人基层政权，瓦解乡镇保甲地方武装的斗争。这次起义充分证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独裁和发动内战的政策是很不得人心的。

陵前起义是在国民党反共集团侵犯陕甘边关键时刻发动的起义，震动很大，影响广泛，它如一把尖刀插在国统区心脏，扰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破坏了国民党军队的后方供应，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兵力，配合了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保卫解放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解放战争初期渭北游击总队的主要战斗

（一）嵯峨山突围战

1947 年 7 月初，渭北总队第四支队 130 多人在支队长刘光远、副政委吴皋森、副支队长朱龙江的带领下，在三原县北部地区开展以摧毁敌人保甲组织，准备建立新政权为主要任务的武装斗争。

8 日，四支队从三原北部地区行至嵯峨山下时，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暂编二旅一个团和三原、淳化、泾阳 3 县的保警队 3000 多人包围，刘光远、朱龙江、吴皋森、方金刚迅速将四支队拉上山，并占

领有利地形，凭借天险进行还击。国民党军队重兵三面包围了嵯峨山，从早上 6 时发起进攻，机枪、炮弹向山上猛发，嵯峨山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四支队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因敌众我寡，弹药无援，粮食缺乏，不能久战。但四支队战士士气高昂，把山上的石头向下摔，又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四支队的伤亡也很大。战斗持续至下午六七点钟，支队召开会议，分析战情和形势，决定在黄昏之际，从地势险要的白石崖突围下山。暮色降临，国民党军队大炮发疯似的向阵地打来，四支队由朱龙江带领大部队先行撤离，刘光远、方金刚则带领一小分队打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主峰时，才发现四支队战士早已顺着陡壁山崖，手拉藤条下到“鬼门关”，撤到了山底。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追击，四支队兵分两路撤离。这样，在强大敌人包围之中，四支队胜利突围。

在嵯峨山突围战中，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兵力不足两连人，武器、弹药匮乏，而国民党军队有 3 个团的兵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四支队以少胜多，战斗击毙击伤国民党军 200 余人，突围成功，取得胜利。战后，渭北总队授予四支队“嵯峨伟绩”奖旗一面。

（二）小道口战斗

1947 年 6 月 20 日，渭北总队获悉胡宗南部四十八旅运输队将向延安运送军火，并从咸榆公路富平县觅子乡康王洞经过，渭北总队决定拦路伏击。23 日晚，渭北总队司令员谈国帆带领第一、二支队 200 多人，从三原马额范家堡出发，于黎明到达富平县觅子乡康

王洞附近埋伏。此间，二支队队长杨汉三带领的搜索队与国民党巡逻队遭遇，发生战斗，击毙巡逻队 6 人，余兵逃走。渭北总队司令部得知伏击计划已经暴露，遂决定向西运动。

6 月 24 日早，部队经陵前乡三店村向西开到小道口村，约 10 时许，突与国民党驻柏社（今三原县新兴镇北部）保警队余祖德部六七十人遭遇。保警队向支队哨兵开枪，一支队副支队长黄子文利用地形指挥部队还击。激战数小时后，保警队被击溃，打死打伤 20 余人，俘虏 7 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10 支。战斗结束后，黄子文与刘汉臣、刘学成在村北城壕边高处观察侯家堡方向的行动时，黄子文突然头部中弹倒地，谈国帆命令部队抬着黄子文向北转移。26 日上午，在转移到耀县境内烟当村时，黄子文不幸牺牲，时年仅 39 岁。

黄子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是开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之一，[①] 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为渭北乃至西北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 年 11 月 10 日，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召开了隆重的黄子文烈士追悼会，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对黄子文的一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在追悼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追认黄子文党籍的决定。1950 年，黄子文的灵棺移于陵前乡甘涝池村安葬，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中地委、三原县委及各区都送了挽联，中共关中地委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毕生奋斗历尽艰险，战胡匪奋不顾身捐躯疆场”，这幅挽联正是黄子文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48 页，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



小道口战斗旧址

（三）侯家堡战斗

1948 年 4 月 4 日，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子祥率领渭北总队、西府游击总队 200 余人，在西北野战军骑六师新三团的援助下，奉命攻打驻三原县陵前乡侯家堡的国民党保警队。拂晓，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随指挥部提前从三原县马额镇邵村出发，行至侯家堡西侧朱家堡驻扎，即派人侦察，构筑简易工事。渭北总队和西府游击总队分别组成百余人突击队，一支队战士马志英、金彦英（侯家堡人）为向导，完成了城门爆破任务。侯家堡保警队用大车堵塞城门洞，突击队未能冲入城内。时天已大亮，保警队居高临下，猛烈还击。突击队处于开阔地带，强攻受挫，渭北总队一支队分队长罗建中、西府游击总队一支队陈双才和五支队班长李春鸿等 9 人牺牲。

战斗持续到下午 5 时，突击队伤亡 11 人。此时，担任北线阻击援兵和掩护任务的新三团前来支援。但是，渭北总队的进攻部队已完全处于保警队的火力之下，且发现国民党军队从南面正向侯家堡东靠拢，黄子祥即令新三团掩护，其他部队向北撤出战斗，转移至淳化爷台山崔家原休整。

在解放战争初期，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充分运用和发挥了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的游击战术，发动游击战争，积极开展自卫反击战，不但沉重打击和瓦解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以及乡保政权，而且在战争中壮大、保存和发展了自身武装力量，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中共渭北工委的主要工作及武装力量的发展

一、 渭北游击总队各支队的发展壮大

（一）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

1947 年 5 月 9 日，在淳耀县姚家河，张中涛代表中共渭北工委宣布，将黄子文、黄子祥和孙志正等率领的陵前起义部队正式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黄子祥任支队长，黄子文任副支队长，慕天祥任参谋主任，孙志正任政治主任。渭北总队第一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张云德；第二大队大队长陈新民。5 月 10 日，为加强对一支队的领导，中共渭北工委派杨顺玉任第一大队副队长，刘多荣（李卜特）任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5 月 11 日，张孝德任支队政委。5 月 19 日，黄子祥调任渭北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慕天祥接任第一支队支队长。7 月，董实丰（石峰）任第一支队政委。是年秋，董实丰调渭北总队政治处工作，孙志正任一支队副政委。不久，三原县独立中队编为一支队第三大队，吴曰聪任教导员。7 月，黄子祥调回渭北总队工作，一支队领导成员再次调整，张孝德不在兼任政委，慕天祥担任队长，董实丰担任政委。1949 年 1 月，中共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将一支队改编为三原县大队。

（二）渭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

1946 年 12 月，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派王廷兰等六七人回到

临潼栎阳、交口一带，发展武装力量，组建了渭北武工队，王廷兰任队长，有五六十人枪。渭北总队成立后，渭北武工队调至淳化县方里镇以东和耀县西原一带活动，隶属渭北总队领导。1947 年 5 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渭北总队司令部，统一指挥渭北各部武装力量，并将渭北武工队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二支队，王廷兰任队长，队员有 300 余人。6 月，渭北总队对第二支队领导人做了调整，杨汉三任队长，王廷兰任副队长，段文义任政委。1949 年春，二支队人数发展到 800 多人，领导人也有了变更，王廷兰任队长，张基任政委。7 月，二支队编入西北军区警卫团二营。

（三）渭北游击总队第三支队

1947 年 5 月 9 日，国民党方里自卫队宋彦芳率领的起义部队改编为渭北总队方里支队，5 月 29 日，渭北总队司令部在淳化方里魏村将方里支队编为渭北总队第三支队，未配备队长，宋彦芳任副队长，孙一心任政委，杜俊锋任副政委。1948 年 1 月，渭北总队将第三支队下设的大队改编为 1 个中队，有 50 多人，余增贤任中队长兼指导员。11 月，国民党方里保警队队长俱兴义起义，渭北总队将方里保警队编为第三支队第二中队，俱兴义任中队长，刘海锋任指导员。1949 年 7 月，渭北总队第三支队在西安皇城改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警卫团二营四连。

（四）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

1945 年春，刘光远、朱龙江等地下共产党员遵照党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南部高山槐附近正式组建了一支 20 多人的武装工作队

（简称武工队）。这支武装力量受三原地下党组织领导，活动于淳化、耀县西北部、泾阳、三原北部、富平西部以及旬邑、彬县一带。1946 年 12 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组建了渭北总队，将刘光远、朱龙江领导的这支武工队改为金刀游击大队，刘光远任大队长，朱龙江任副大队长，张中涛兼任政委，全大队共 100 多人，下设两个中队。1947 年 5 月中旬，金刀游击大队武装力量逐渐壮大，人员发展到 130 多人。渭北总队司令部成立后，金刀游击大队改编为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刘光远任支队长，朱龙江任副支队长，张中涛兼任政委。1948 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游击区不断扩大，四支队增加到 300 多人，下辖 1 个大队，大队下辖 3 个中队，朱龙江兼任大队长，罗生杰任大队教导员。1949 年 2 月，四支队在富平淡村接收了一支 30 多人的非法武装，建立了四支队第四中队。7 月，渭北地区全部解放，四支队奉命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警卫团，人数达 500 多人。

（五）渭北游击总队第五支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凤凰山下的阴坡村就活动着一支咸阳籍农民自卫队。1943 年秋，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赤水县任区委书记的陈吾愚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将阴坡村农民自卫队改编为武工队，龚生满任队长，张茂儒任副队长，宁志学任指导员。1946 年 10 月，中共咸阳县工委将武工队改编为咸阳支队。1947 年 3 月，中共咸阳县工委划归中共渭北工委领导，咸阳支队随之划归渭北总队领导，驻淳耀县阴坡村，主要活动于淳耀县方里镇、爷台山、桃渠河一带。5 月 29 日，渭北总队司令部成立后，咸

阳支队被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五支队，中共咸阳县工委书记陈吾愚兼任支队政委，龚生满任中队长，宁志学任指导员。10 月，谢兴东（咸阳人）从宜君来五支队，任支队长。此时，队员已由二三十人发展到七八十人。五支队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龚生满，副队长张茂儒，指导员宁志学；二中队队长杨生茂，指导员黄涛。中队又下设分队，黄立有任一中队一分队分队长，王天才、荣正发任一中队二分队正副分队长，刘金祥任二中队一分队分队长，王振西任二中队二分队分队长。1948 年，又增设了三分队，徐志华任分队长。1949 年 5 月 18 日，咸阳解放，五支队一部分人员接管咸阳城市，一部分人员调往西安和陕南。7 月，渭北总队撤销，五支队被编入咸阳军分区独立大队。

（六）渭北游击总队三原县警卫队

中共泾原工委成立后，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壮大三原武装力量，中共泾原工委书记张中涛指示县工委委员吴曰聪组建武装游击队。1947 年 2 月，吴曰聪、段垣、李荣福、桑子良等人分头活动，组织起一支 20 余人的三原游击队。5 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 30 多人，被渭北总队命名为三原独立中队，吴曰聪任中队长，李荣福任副中队长。7 月，三原县政务委员会在边区成立，三原独立中队改编为三原县警卫队，任云峰任指导员；三原警卫队下编 2 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刘怀德，二分队队长吕老虎。警卫队共 40 余人。1948 年 10 月，三原县警卫队大部分整编到关中军分区二十一团，仅留下七八个人。随后，赵西秦、吴曰聪又从国统区发展了 20 多人，壮大了三原县警卫队，后人员发展到 50 余人，队长吕老虎，副队长崔忠

成。三原县警卫队辖两个分队，秦自有、张振元、孙学发先后任分队长。警卫队随三原县政府活动在淳耀县边区，有时在淳化方里、耀县小丘一带游击。三原县警卫队对外番号为“永安部”。

（七）渭北游击总队耀县独立中队

1946 年春，张仲平负责筹建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时，为便于工作，在耀县故贤村组建了一支有 10 多人的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8 月，杨凯（耀县人）调任耀县武工队队长，随之，在肖家原村将耀县武工队整编为耀县独立中队，杨凯、傅亚军分别担任正、副队长，杨增贤、王钊分别担任正、副指导员。之后，李荣福担任耀县独立中队中队长，时有队员 20 多人。11 月，中共耀县工委成立后，独立中队归其领导。12 月，渭北总队建立，耀县独立中队隶属渭北总队和中共耀县工委双重领导。1947 年 7 月，耀县独立中队队员发展到四五十人，编为两个分队。1948 年底，独立中队已有队员八九十人，扩编为 3 个分队和 2 个直属班。1949 年 2 月，耀县独立中队升编为渭北总队警卫连，隶属关中军分区和中共耀县县委领导。

（八）渭北游击总队的其他支队（原路东游击总队）

1947 年 6 月，遵照中共关中地委指示，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原路东工委所辖的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的武装力量也划归渭北总队领导。渭北总队发展为辖 11 个游击支队和独立中队的武装力量。1948 年 2 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与路东游击总队，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武装力量隶属路东游击总队领导。

1. 同官游击支队

1947 年 6 月，同官游击支队改编为渭北总队第六支队，徐天杰任支队长，雷炜任政委。由于形势的变化，渭北总队决定把六支队化整为零，以中队、分队、小组为单位，在同官、富平、蒲城、白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8 年 2 月，中共关中地委重新建立路东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同官游击支队隶属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路东游击总队第二支队。11 月，第二支队划归同官县执委会领导，下辖 2 个中队。1949 年 2 月，同官游击支队更名为同官大队。5 月，同关大队又改名为铜川县大队。是年冬，改编为正规军。

2. 富平游击支队

1947 年 6 月，富平游击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同年秋季发展到 150 多人，王维担任队长，邵武轩担任政委。富平游击支队下设 3 个中队，一中队队长任忠义，二中队队长陈安德，三中队队长刘天升。1948 年初，陕西省工委决定成立路东工委，统一领导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的工作。随之又成立路东纵队，各县的游击支队和挺进支队均归属路东纵队领导，富平游击支队改编为路东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王维，政委田绍锡。11 月，中共路东工委撤销，中共富平县委成立后。路东纵队进行整编，除组建一个团补入第四纵队外，其余部分仍留归各县。

3. 富平挺进游击支队

1947 年 5 月，许秀岐、邵武轩根据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指示，以部队留下来的 20 多名干部战士为基础，组成骑兵师挺进支队。6 月，挺进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许秀岐任支队长，邵武轩任政委。挺进支队主要活动在富平境内和富平、蒲城、白水交界处

的山区，有时也到临潼、渭南一带活动。1948 年 7 月，挺进支队和路总第四支队被整编为西北野战军后勤监护营。

4. 蒲城游击支队

1947 年 6 月，蒲城游击支队归属渭北总队领导，王玉成担任支队长，林光担任政委，游击队员 150 多人，后经整顿精简到 70 多人，在蒲城、白水、澄城三县交界处的沟壑地带活动，多次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均机动灵活，以少胜多。1948 年 2 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蒲城县武装力量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路东游击总队第七、第九支队。1949 年 4 月，第七、第九支队划归黄龙军分区领导，被改编为第三、第六支队。

5. 白水游击支队

1947 年 9 月 25 日，由中共关中地委直接领导的白水武装起义成功后，以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白水游击支队，杨培才任支队长兼政委（后调石生芳任政委），田贵焕任副支队长。白水游击队下辖 1 个直属警卫队，3 个大队，共有游击队员 248 人。归属渭北总队领导到 11 月底，白水游击支队队员发展到 750 人。1948 年 2 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和路东游击总队，白水游击支队归路东游击总队领导，被改编为中共路东总队第八支队，后一部正式编入西北野战军后勤部监护营，随军南下。另一部组建成白水县游击大队。1949 年春，白水县游击大队编为渭南军分区独立营。

这一时期，渭北总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12 个游击支队和独立中队，数千人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革命武装在渭北北部地区建立游击区域，开展游击战争。

二、 党群工作与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

1946 年 12 月，中共渭北工委成立后，立即派人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一是对原有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整顿”；二是对新发展的党组织和党员注重提高质量；三是在一些没有党员和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进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46 年冬，中共三原县工委派刘多荣、张庆发等人到三原陵前、马额、嵯峨、柏社、西阳各乡和城内几所中小学开展工作，恢复了基层党组织，同时恢复了 68 名党员的组织关系，新发展党员 65 人，全县党员人数达到 133 人。自 1948 年 2 月起，中共三原县工委先后建立了方里、小丘、柏嵯区委，党员人数发展到 197 人。

与此同时，泾阳县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1947 年 2 月，中共云阳特支成立，发展党员 21 人。至 1949 年初，云阳特支由成立时的 12 人发展到 78 人，并建立了 7 个党支部。其中九娘庙党支部党员由 9 人发展到 27 人，磨子桥党支部党员由 7 人发展到 24 人。

1947 年 3 月，中共咸阳县工委归属中共渭北工委领导后，采取积极慎重、稳步前进的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咸阳解放时，发展党员 97 人。

1947 年 6 月，中共路东工委及其所辖的同官、富平、蒲城、白水 4 县党组织并入中共渭北工委领导。同时，中共蒲城、白水工委相继成立。到 1948 年 2 月，中共路东工委恢复重建后，中共同官、蒲城、富平、白水 4 县工委归中共路东工委领导，在路东一带开展工作。

（二）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武装

中共渭北工委领导渭北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削弱国民党反动力量。

1947 年初，胡宗南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实行“清剿”，制造“无人区”，建立保甲制度，残害群众。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渭北总队第四支队积极采取行动，先后袭击、捣毁了庄里、小丘、三安、安吴、陵前、觅子等地的国民党乡、镇公所，在柳林一带处决了 10 多名国民党反动保甲长，缴枪 30 余支。1947 年除夕，四支队又将淳化县常社原 3 个保的 30 多名保甲长集合起来，经过教育后释放，这一带的保甲组织完全被摧毁。

1947 年 6 月，国民党保安七团盘踞在淳化县铁王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盼望游击队早日到来。渭北总队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为民除害。五支队接到命令后，政委陈吾愚和队长龚生满亲自带领队员潜伏至离敌保安七团前哨只有 3 米远的土坎下，先解决了哨兵，兄弟支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铁王镇内，一举消灭了 600 余名敌人，缴获步枪 500 余支、轻重机枪 6 挺以及大批弹药、物资。

1947 年 6 月 20 日，渭北总队一支队在富平盘龙湾袭击了国民党四十八旅运输队，一支队先后 7 次破坏了敌人架设在三原至耀县、洛川等地的电话线路，收割电话线 450 斤，摧毁柏社乡、杨家岩窑至狼沟敌人封锁线上碉堡 15 座，这一地区敌人的通讯联络一度中断，指挥失灵，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作战。同时捣毁了三原柏社乡、嵯峨乡乡公所及陵前乡一、二、三、六保，长孙

乡第八保保公所等国民党保甲组织。

1947 年 12 月 31 日，渭北总队一、二支队同西府游击总队联合作战，在彬县香庙原奇埠一带击溃国民党彬县自卫营营部及该部五连，俘虏 77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83 支、子弹 1600 发、炸弹 120 枚。

1948 年 2 月 24 日元宵节之夜，渭北总队一、四支队利用敌人麻痹大意之机，进入三原陵前乡寨堡，冲进副乡长侯海亭家，活捉侯海亭等 3 人，缴获步枪、子弹等若干。

1948 年 3 月，宜川战役后，渭北地区国民党政权陷入一片混乱。渭北总队一支队趁机向同官石柱原、耀县小丘镇、淳化方里镇东南方向出击，摧毁了国民党耀县小丘乡第三保，三原县陵前乡第二、三、四保，柏社乡第五保，嵯峨乡第六保保公所，活捉保长等 19 人。一支队还在耀县乙社、西牛村、屯里、杨家河，三原县西王、西邵村、柏社、北窑等村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选举村长，建立了人民政权。

1948 年 10 月 13 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渭北总队主动袭击三原县城北 10 公里之鲁桥镇，歼敌地方武装一部。10 月 19 日晚，渭北总队司令部又命一支队队长慕天祥率第一、二支队各一部，从陵前乡金家尧出发，袭击了三原县城东 20 里之独李车站，炸毁铁路轨闸等。12 月，渭北总队派慕天祥带领一个小组，掩护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在三原、富平一带测绘地图，为迎接 1949 年春季攻势作准备。

1949 年 4 月 14 日，渭北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分队长袁良才等人在淳化方里秋社村歼灭国民党三十师六四四团通信连 1 个班。战斗

中，群众呐喊助威，吓得敌人四处溃逃。这次战斗大获全胜，受到关中军分区的嘉奖。

1949 年 5 月 8 日，渭北总队从直属支队抽调队员 50 名，组成一支人民警察部队，准备在西安及关中各城市解放后进城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渭北总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其势如摧枯拉朽。从 1949 年 2 月开始，渭北总队积极配合第一野战军，对驻守在渭北各地的国民党部队发起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至 7 月，渭北地区各县相继解放。

（三）发展统一战线，建立基层人民政权

中共渭北工委和各县工委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团结争取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

中共三原工委领导常社原群众抗粮、抗款、抗丁、抗税，“能抗就抗，能拖就拖”，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1948 年 2 月 9 日（农历除夕），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将方里地区常社原 3 个保的 20 多名伪保甲长集中到游击队驻地常社原，进行集训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形势，要求他们不给敌人做事，争取立功赎罪。经过教育，大部分保甲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痛改前非，为人民做事，使这一带的保甲组织完全被摧毁。之后，建立了中共三原工委领导的第一个乡级政权——常社原乡政府。接着，又建立了中共方里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李厚喜任区委书记，杨义英任区长，刘明新任副书记，并建立了西区游击队，镇压了民愤极大的邱志明，使方里地

区不但成为县工委的立足之地，也成为渭北工委与各县的联络点，打通了通往边区的交通线。

中共泾原工委做通了三原于右任，斗口试验农场负责人刘多贵、茹卓亭，开明绅士马文彦和泾原教育界名流崔贯一的工作。从1946年至1947年4月，利用桥底商人贾张祥、马全兴等人，先后为武工队、游击队购买长短枪95支、机枪1挺、子弹150箱、手榴弹10余箱，为边区购买布匹、棉花等物资150驮，为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中共耀县工委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这些人不仅成为朋友，而且为解放战争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国民党南中乡乡长陈忠信、西仁乡乡长何德兆、北信乡乡长阴水余、耀县保警大队附崔瑞山、铜川黄堡镇镇长冯永右、富平县保长李向儒、在乡军人纪元林等人，在耀县国统区的6个乡中，3个乡长，5个保长与耀县工委建立了统战关系。

中共咸阳县工委也团结争取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947年春，有人密告魏治钧是共产党员，特务分子翟锦堂准备到周陵中学抓魏治钧，校长王藩诚得知此事后出面周旋，保护了魏治钧。北高乡乡队附王世安准备上县告密，说韩明珠是共产党员，于升恒先生获悉后设法劝说，使王进安放弃了告密举动。工委还通过写信等方式，争取了董正宇、马振杰、王干侯、王鼎侯、宁蔚青、周欣、靳展如、冯希农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为革命同志打入国民党县、乡政权取得合法身份及搜集敌特情报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蒲城县工委在斗争中执行党的“爬高站稳，广交朋友”的

白区工作方针，团结争取在乡军人、中小学教师、开明士绅、军政要员等60余人，特别是争取了国民党县自卫团和保安二十六团，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解放蒲城奠定了基础。

中共同官县工委先后在陈炉、黄堡等地建立了几处“两面政权”和10多处统战网点，基本控制了同官、富平交界的山区一带，使这一带形成了“暗边区”。工委通过选举，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募集粮草、做军鞋、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解放军，群众把工委经常活动的地区称为“红土”地区。广大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炸碉堡、填战壕，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至1948年4月，先后建立了2个区公署、9个乡政权、88个农会。

（四）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干部北上南下

渭北地区是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中共渭北党组织高度重视地下交通站的建设工作，在渭北各县发展了许多地下交通员和联络员，并建立了诸多地下交通联络点。这些交通员和联络员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秘密开展工作，三原的刘多荣、袁秀成、赵西秦、樊贵鑫、禾青、张庆发，泾阳的何明德、马汉麟、赵海、杨润田，高陵的王凤叶、莫英贤，耀县的张兴怀、孟庆和、何振海，临潼的田益海，咸阳的韩明珠、王广录、孙士元等，这些交通员和联络员有的承担着送信、传递消息任务，有的承担着护送干部、青年学生北上南下的秘密任务，他们在危险时期为解放渭北地区发挥了重大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6年7月至8月间，汪锋由陕北去陕南接应中原突围北路部

队途经渭北时，由中共渭北工委安排人员护送。10 月，李先念、郑位三等人先后奉命回陕北，路经渭北地区时，分别由中共临潼、富平两县工委安排人员护送。1947 年 3 月，赵寿山（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夫人黄居仁由西安途经三原去边区时，在中共三原党组织的护送下安全进入边区。

中共渭北党组织还积极动员进步青年学生赴边区学习。中共泾阳县工委先后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70 多人，中共咸阳县工委先后组织进步青年学生 20 多人进边区学习，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从 1948 年冬至 1949 年春，渭北游击总队各支队或独立完成，或相互配合，不但护送了由各县工委组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等大批进步人士安全进入边区，而且护送中共干部或北上、或南下超过了千余人次。

三、 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

（一）动员国民党淳化方里自卫队起义

1947 年 2 月，关中军分区派部队攻打方里镇，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容志成营，国民党在方里的守备空虚。中共渭北工委、渭北总队不失时机地派共产党员余增贤去做争取国民党方里自卫队队长宋彦芳起义的工作。因余增贤和宋彦芳不但是同乡，而且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十分熟悉。余增贤回到方里后，多次找宋彦芳谈心，做思想动员工作，终于打消了宋彦芳的种种顾虑，下决心举行武装起义。5 月 7 日中午，宋彦芳和张志珍下令解除反动分子、副队长井鼎堂的武装，立即宣布起义。在渭北总队金刀游击大队的接应下，起义部队 70 余人按计划撤出方里镇。5 月 9 日，起义部队顺利到达

渭北总队驻地魏村，被改编为渭北总队方里支队，宋彦芳被任命为副支队长。不久，方里支队又被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三支队。

（二）动员淳化张子信起义

1947 年秋，在淳化县住东村、东柳村和西柳村一带盘踞着国民党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为了消灭这股敌人，渭北总队第五支队决定先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然后一举歼灭。五支队政委陈吾愚得知驻地老庄子村有个人和敌保安中队驻东柳分队队长张子信是亲戚，便动员其去做张子信的工作，同时，带去了陈吾愚的亲笔信，劝张子信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张子信接受了陈吾愚的劝告，赴五支队驻地与陈吾愚会晤，商定了起义计划。次日晚，五支队兵分两路将敌保安中队包围，首先夺取了住东村敌人的一个碉堡，控制了制高点，用机枪将敌人压在窑内。正在酣睡的敌人吓得呆若木鸡，一个个举手缴械，中队长等 20 余人被俘。战斗胜利结束后，张子信带领 30 余人起义投奔解放区。

（三）争取淳化俱兴义起义

1948 年 11 月底，渭北总队对淳化方里镇守敌发动进攻，久攻未克。渭北总队司令员谈国帆召集各支队分队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决定放弃强攻，先争取国民党方里镇保警大队第二中队分队长俱兴义起义，从内部瓦解敌人，然后一举歼灭该保警大队。会后，谈国帆、黄子祥命令余增贤和宋彦芳去执行这一任务。

余增贤和宋彦芳带人来到距方里不远的固贤姚店村后，分别设法先同俱兴义手下的于善儿、班长肖兴旺、牛长生单独谈话，向他

们宣传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利害，指出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干是没有出路的。这三人纷纷表示愿意说服俱兴义，一起举行起义。余增贤等又到俱兴义家中，说服其父劝子起义。宋彦芳又动员方里镇镇长张锡畴和宋锣等人去说服俱兴义起义。经过几方面的努力，俱兴义决定弃暗投明举行起义。11 月 16 日晚，俱兴义带人到沟弯庄子，向渭北总队司令员谈国帆等人报告了起义准备情况。谈国帆派孙庄禄、郑凤鸣等六七个游击队员换上俱兴义带来的保警队服装，跟随俱兴义进入方里镇碉堡。在俱兴义指引下，他们先击毙了保警队大队长赵应德，随后，同渭北总队三支队里应外合，向保警大队发起进攻，消灭了全部敌人。战斗结束后，俱兴义率领手下三四十人随三支队连夜转移到常社原。

第二天，俱兴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渭北总队第三支队第二中队，任命俱兴义为中队长。渭北总队派刘海锋担任二中队指导员。三支队人数增加至近百人，战斗力大幅提高。这年农历年前夕，又成功地袭击了敌石桥据点，消灭了国民党一个保警中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群众高兴地称之为“石桥缴枪”。

在解放战争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共渭北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在渭北地区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 1947 年 6 月中共路东工委并入中共渭北工委后，中共渭北工委领导的渭北总队成为一支拥有近千人的人民武装力量。一方面，中共渭北工委利用有效的统战关系，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发动起义，起到了重大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采用破袭敌方交通运输线、后方补给系统与通信侦察系统，瘫痪敌方供给等各种方式和手段，使敌方交通瘫痪，指挥失灵，补给困难，力量削弱，有力地推进了渭北地区的解放。

第四节　渭北游击总队与关中各县的解放

一、 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

（一）战略大决战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底，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战略大决战。三大战役历时 142 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及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144 个师，非正规军 29 个师，计 154 万余人。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在三大战役后基本损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

中共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全国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也很迅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分别于 1948 年 8 月和 11 月 15 日发动秋季和冬季两次攻势，对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集团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特别是冬季攻势有效牵制了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战场，有力的配合了淮海战役，并取得胜利。

（二）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

1949 年 2 月 1 日，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简称第一野战军）。2 月 19 日，第一野战军在陕东发起了春季攻势。

3 月 24 日，陕东春季战役结束，历时一个月。第一野战军经过在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国民党军（不含地方部队）6975 人，其中俘 4921 人，毙伤 1603 人，投诚 451 人。春季战役解放并巩固了白水、旬邑、大荔、朝邑、平民[①]、淳化、富平、同官、耀县、蒲城等县城及广大地区，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开展陕中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野战军自陕东春季战役后，在一个多月的整训期间，开展了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为陕中战役的作战做了充分准备。4 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并相继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攻克太原，威迫武汉。此时，在西北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4 月 25 日至 4 月底，收缩兵力，企图在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一线形成跨泾、渭两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5 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动规模空前的秦川追击战役（陕中战役），千军并发，分路冲向陕中腹地，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绵延数百里的追击作战。

5 月 11 日至 25 日，第一野战军先后攻占高陵、三原、泾阳、临潼、华阴、华县、渭南、蓝田、咸阳（今秦都区、渭阳区）、西安等地，陕东、陕中国统区全部获得解放。至 5 月底，第一野战军控制了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胡宗南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

① 平民县：1929 年析朝邑县东部黄河滩地于大庆关城置，属陕西省。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平民乡。1934 年迁黄河西岸堤浒村东。1950 年撤销，并入朝邑县。1958 年朝邑县又并入大荔县。

西段布防。

在陕中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共计 40920 人，其中俘敌 25150 人，毙伤 12020 人，起义 1680 人，投诚 2070 人，解放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在陕中战役中的作用

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战役发起前后，在中共渭北组织的领导下，活动在渭北一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率领五个支队，四处活动，采取收集情报、策动武装起义、消灭地方武装、抗粮抗丁、破坏敌人工防、配合主力作战等各种方式，为第一野战军开展陕东、陕中战役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49 年春季攻势战役发起后，中共三原组织遵照中共关中地委关于“建立统战据点，发展‘荫蔽’力量，准备起义，对非法武装鼓动其拉起来干”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利用统战关系，先后在柏嵯、陵前、大程、西阳、陂西等乡公所、乡自卫队以及保甲组织、国民党地方武装内安插了大批秘密党员、进步人士，为中共组织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为策动这些地区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

1. 国民党三原县自卫团起义

1948 年 10 月下旬，因三原县县长出缺，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委任石仲伟（富平人）补任三原县县长。11 月中旬，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志林到三原与石仲伟联系，要求石仲伟收集军政情报，保护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打通三原通往陕甘宁边

区的交通要道，架设电台，同边区保持电讯联络。石仲伟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他按照赵伯平的指示，秘密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加紧实施准备起义的工作部署，而对国民党驻军所派事宜敷衍应付。

为了给起义创造条件，石仲伟兼任三原县自卫团团长后，立即安排祁有珍等一批地下党员到自卫团任职，自卫团由400余人扩编到600余人，并将原有的1个大队、4个中队改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同时，石仲伟还通过关系，从当地驻军中搞到一批服装和大量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卫团。

1949年5月13日晚，三原县城的“北大门”鲁桥镇传来密集的枪声，县城内陷于一片混乱。面对这种局面，石仲伟一时与党组织派来的张志林失去联系，甚感焦虑。经过深思熟虑，石仲伟决定先撤离三原县城，待机起义。20日，石仲伟率部到达户县大王镇一带时，接到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要求他率领部队立即开往周至，听候调遣的命令。在此形势下，石仲伟与吉志发（中共党员）商议，派自卫团大队附李准西回三原和解放军联系起义。李准西走后不久，石仲伟却意外地和当地地下党员赵伟如接上了头，商定将部队拉到户县县城外的一个村子“荫蔽”。22日，石仲伟在丈八村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石仲伟明确提出：“国民党败局已定，解放大军势不可挡，继续南撤是死路，只有弃暗投明，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对石仲伟的意见，在场的人大多数表示同意，唯有三原警察局长高延鼎默不作声。当晚，高延鼎便带领部下200余人向周至方向逃去。23日下午，石仲伟得知户县已解放，即派自卫团团副乔浩然前往户县县城联系，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的杨团

长对此次起义非常重视并表示欢迎。乔浩然回自卫团即向石仲伟做了相关汇报，石仲伟当即集合部队，宣布起义，随之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龙江大队第七支队，石仲伟任支队长。

26 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掌派代表到起义部队驻地慰问，石仲伟提出整训的建议得到批准同意，起义人员开往西安十七师驻地整训。整训结束后，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的一个营。不久，该营随解放大军投入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2．国民党第三十八军搜索营第三连起义

1949 年初，魏清智、张光宇负责组建国民党第三十八军搜索营第三连，驻扎三原县城。1 月 15 日，获第三十八军军部批准，配发了服装和武器弹药等，魏清智任连长，张光宇任特务长。二人之前受黄子文领导陵前乡公所起义的影响，一直想组建武装进入革命阵营。1 月 25 日晚，他们宣布起义。参加起义的 17 名同志携带捷克式机枪 1 挺、步枪 17 支，子弹 1900 发，手榴弹 52 枚，由魏清智带领，从三原东梢门出发，沿咸宋公路连夜北上，当晚住在陵前共产党员肖德印、郭立三和进步群众家中。26 日晚，起义队伍转移到大寨堡，换了服装，藏了武器，人员分散“荫蔽”，并派人到淳化桃渠原一带寻找三原大队接应。29 日，渭北总队一支队队长慕天祥率领游击小组前往接应，于 30 日晚赶到大寨堡。翌日晨，在三原县大队掩护下到达桃渠河，起义队伍正式改编为三原大队一中队三分队，魏清智任分队长。

3．三原县陂西乡自卫队起义

1948 年冬，宜君县保警大队大队长侯景林率领百余人来到三原陂西，住在王德修家，准备起义。王德修即派人与渭北总队取得联系，渭北总队及时接收了这支起义队伍。事后，国民党宜君县县长及国民党三原县政府派人追查此事，国民党三原县政府通知王德修把陂西自卫队带进县城。王德修即派王建基带几十人赴三原，以应付县府，同时着手准备起义。

1949 年 1 月，地下党员朗瑞亭、杨百忍利用与王德修的统战关系，让陂西乡自卫队根据情况随时准备起义。2 月 19 日，第一野战军主力部队发起了春季攻势战役，王德修借此机会，于 2 月下旬集合自卫队 60 多人起义北上。刚过清河，自卫队即遭敌袭击。经过激战，起义部队迅速从瓦窑头坡上原，得到三原大队的接应，并被收编。

4. 三原县柏社乡自卫队起义

1949 年 2 月 19 日，渭北总队三原大队按照中共三原县委的指示，与三原柏社乡乡长曹金成、副乡长任锦章等取得联系，并在杨家河商议起义事宜。三原大队和柏嵯游击队代表慕天祥、段垣、段植，与三原县柏社乡代表曹金成、惠德明、段玉成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地点及联络方法等。

2 月 20 日晚，渭北总队三原大队和柏嵯游击队组成百余人的接应部队，在西段村城寨东边大柏树坟地空中鸣枪，三原柏社乡自卫队随即出城迎接部队进城。2 月 22 日，在柏社乡公所（驻西段村）召开乡自卫队起义大会，中共柏嵯区委书记段垣和区长兼柏嵯游击队队长段植分别讲话。会后，起义部队 30 多人携带长枪 44 支、子弹 1000 多发、短枪 4 支、手榴弹 50 枚等武器随渭北总队三原大队

进入边区。

5．三原县西阳乡自卫队起义

1948 年 9 月下旬，中共三原县工委派遣张庆发（即尚敬业）到国统区西阳地区开展地下工作。10 月，中共西阳区委成立，张庆发任书记，区委委员张茂修、李永业主要负责武装工作。

从 1948 年冬至 1949 年初，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胡宗南部三十三师和国民党耀县专员杜德霖率领保安团先后经西阳逃到了三原县城。盘踞在西阳的国民党便衣队及情报人员如坐针毡，预感末日即临，队长路定乾、组长马振英再三请求国民党西阳乡自卫队队长李永业寻找出路。在此情况下，中共西阳区委派人向他们讲明形势和党的政策，要求他们顺应形势，弃暗投明，将人员和枪支弹药集中到西阳镇听候命令。

1949 年 2 月 12 日夜，李永业率领西阳乡自卫队 30 多人，与路定乾、马振英带领的便衣队 60 多人和 12 名情报人员，共计 110 多人集中到西阳山门村待命，张庆发连夜赶到陵前请示中共三原县委。2 月 13 日傍晚，张庆发向起义人员宣布了中共三原县委的指示，任命李永业为起义大队大队长，路定乾为副大队长，张庆发为教导员，马振英为参谋。当晚，李永业率领起义队伍，携带长枪 80 支、子弹 3000 发以及驳壳枪、冲锋枪等武器，急行军开到陵前。在陵前朱家疙瘩整训后，3 月 1 日，被编入渭北总队三原县大队。

6．三原县大程乡十保巡逻队起义

1949 年 3 月 6 日，中共三原县委派张庆发赴大程收编包国翩等人自行组织的队伍。张庆发带领 9 人在大程镇瓦窑头遇见了第一野

战军侦察连邢参谋，方知大程这支队伍是在侦察连帮助下起义的，起义的具体组织者是大程西张人焦凤斌。3 月 8 日，马鸿逵反攻北上，焦凤斌率领大程乡十保巡逻队起义，转移到大程南相村时，侦察连邢参谋派人送来速向东北方向转移的指示信，焦凤斌到樊家村与张庆发、包国翩、潘志明会合，起义队伍被正式命名为西大游击队，计 50 多人，张庆发任队长，侦察连派范根贵任指导员。因敌情严重，西大游击队随侦察连向东北方向转移，到达澄城县东太平村后编为四个分队。4 月中旬，西大游击队回到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受到三原党政领导的接见，并将其改编为三原县大队三中队三分队。

这些武装起义，策应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壮大了渭北总队武装的力量。

（二）广泛发动群众，积极配合主力作战

渭北总队坚持采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机动灵活的战术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国民党军队据点，收缴非法武装枪支，消灭小股势力和当地反动宗教组织，破坏敌人交通运输、通信、侦察系统和各种工防基地设施，发挥了迟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巨大作用，为人民解放军主力作战奠定了基础。

渭北总队在渭北地区坚持开展革命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巩固建设根据地，以武装力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同时，发动人民群众，采用“能抗就抗，能拖就拖”的办法，开展抗粮、抗款、抗丁、抗税等各种苛捐杂役活动，同国民党保甲人员进行斗争，并把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激发人民群众团结斗争的勇气，给

国民党基础政权的财源设置了重重障碍，给地方驻军的供养造成了极端困难。随着一些县域的解放，渭北总队号召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报名参军、捐粮捐鞋、出物出力、清匪肃特等形式，全力支援前线，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解放战争，在发动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渭北总队在渭北地区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担负了重要的作战任务，在第一野战军进攻国民党部队时，或以牵制，以赢得时间消灭敌人；或以策应，以牵制敌方的军事力量；或以突袭，以摧毁敌人的工防设施；或以佯攻，以扰乱敌人的判断方向；或以主攻，以分散敌方的布防兵力，紧密配合主力部队赢得了最终胜利。在陕中战役作战过程中，渭北总队各支队、各县独立大队部分武装力量改编为解放军主力部队序列。

三、 三原解放之前的反攻准备工作

（一）中共关中地委“关于三原工作”会议的召开

1949 年 1 月 9 日，中共关中地委就三原解放的各项工作召开会议，进行了专门讨论。中共三原县委副书记吴皋森向中共关中地委汇报了三原干部、地方武装、地下党员等方面的情况。中共关中地委书记杨伯伦充分肯定了三原党组织两年来的工作成绩，要求积极做好三原解放后的干部准备工作，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抓住时机策反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起义。同时，会议决定把渭北总队一支队调配给中共三原县委直接领导指挥。

这次会后，新组建的中共三原县委和三原县人民政府为了迎接三原解放，于 1 月 20 日在耀县高老庄召开会议，研究了三原各

区干部的配备问题。已解放的方里、小丘区开始着手乡村政权建设。

（二）三原北部地区的第一次收复

1949 年 2 月，第一野战军发动陕中战役前，渭北总队武装力量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紧密配合，频频出击，从小丘、方里南下。2 月底，三原县警卫大队随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进驻陵前大寨堡，基本肃清了三原北部的乡保武装。3 月 5 日，三原当时管辖的小丘、柏社、马额、陵前、大程、西阳、陂西等区相继解放。同时，三原县警卫大队由出击前的 66 人发展到 300 余人。

之后，胡宗南纠集 7 个军的兵力，在马步芳的配合下，向渭北一带反扑。3 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出击后向北撤退，三原北部地区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3 月 11 日，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在北撤途中被马德胜部在耀县蒿圪垯冲散，10 多名同志被俘。当天下午，第一野战军将马德胜部歼灭，被俘同志得以营救归队。

（三）桃渠塬会议

1949 年 3 月 16 日晚，中共关中地委对“关于三原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县委书记张军就三原出击情况做了专题汇报，关中地委对三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指示。

4 月 8 日至 14 日，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关中地委的指示，在淳化桃渠塬召开县级干部及各区委书记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三个月的工作，对迎接三原解放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其间，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还对150多名党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培训，为解放区及时建立乡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同时，对游击队进行了整顿，要求加强侦察工作，建立情报组织，进一步摸清国统区国民党军、特、党、政等组织状况。

这次会议为三原解放后顺利开展军管接收、建政、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工作奠定了思想、组织、工作和干部基础。

四、 渭北各县的解放

1949年4月，第一野战军向关中地区进军。从4月25日起，盘踞在渭北的胡宗南部第六十九军、九十军、三十八军等部从铜川、蒲城等地先后撤至三原、高陵等县，驻防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守卫西安的弧形地带，企图顽抗。5月3日，第一野战军发动秦川追击战役。5月上旬，先后解放了铜川、耀县、蒲城、富平等县。

（一）高陵的解放

5月13日晚10时许，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四师十二团先头部队围攻高陵县城，渭北总队前敌指挥部的安汝英率领三原军分区第二支队（侦察支队）炸开北门，一举攻占县城。国民党自卫团第四中队魏西俊、樊光宇率领保安队7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15日，国民党九十军一个营兵力反扑高陵，被留守高陵的安汝英率第二支队击退，溃逃之敌被及时赶到的第一野战军二军四师主力部队追至泾阳崇文、永乐店一带全歼。到此，高陵解放。

（二）三原的解放

5 月 11 日，三原县城处于解放大军包围之中，距三原西北 10 里，有三原“北大门”之称的鲁桥镇（时属泾阳县管辖），城防坚固，由鲁桥乡自卫队和孙文秀带领的百余人驻守。此时，鲁桥镇周边均为人民解放军控制，鲁桥镇孤城据守。13 日中午，人民解放军攻打鲁桥镇。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在峪口山掩护，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侦察连主攻该镇北门，三原大队李永业率领三支队攻打东门，孙志正率领大队攻打南门，慕天祥率领大队攻打西门。参战的还有柏嵯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傍晚，人民解放军正式攻城，北门首先被炸开，接着其他各门相继被攻破。守敌见大势已去，弃城潜逃，不到 1 个小时，解放军顺利占领鲁桥。

13 日午，解放鲁桥的枪声打响，解放高陵县城的炮声隆隆，三原城内守敌更加恐慌不安。国民党县长石仲伟令东西郊守军南撤。晚 21 时许，石仲伟率县政府部分职员、县自卫团、警察局千余人从南门撤出县城。14 日晨，第一野战军先遣支队、渭北总队四支队和三原县大队（一支队）兵不血刃，相继顺利进城，三原宣告解放。

（三）泾阳和咸阳的解放。

5 月 13 日 11 时，渭北总队一支队、四支队在第一野战军一军侦察部队的配合下，攻克鲁桥镇后，又连续攻占了泾阳北部重镇云阳、口镇等地，国民党军犹如惊弓之鸟，迅速南逃。第一野战军第四军随即向石桥、王桥一带出击，第一军向云阳一带出击，第三军向永乐一带出击。5 月 17 日晨，国民党军全线向西溃逃，渭北总队



1949 年 5 月，第一野战军某部涉过渭河，追歼国民党军胡宗南残部

第三支队配合解放军，歼灭沿泾河西逃的国民党军第二一五师六四三团第一营大部。17 日拂晓，第二军在永乐店以南歼灭国民党军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及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俘获五十三师五十七团团长及余部 1000 余人。至此，泾阳县全境解放。渭北总队第三支队奉命驻守泾阳县城。5 月 22 日，三支队奉命离开泾阳前往临潼等地收缴非法武装，途经草滩镇时，与当地反动宗教组织“白莲教”遭遇，战斗中毙敌十七八人。6 月上旬，三支队又从临潼返回驻守泾阳。

咸阳县解放前夕，渭北总队第五支队将《入城守则》等宣传品贴在咸阳县城内，起到了瓦解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5 月，渭北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了渭北各县。18 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咸阳，咸阳解放。

（四）临潼的解放

1949 年 5 月，渭北总队第二支队派梁国栓去临潼县城详细侦察敌情。5 月 21 日，王庭兰带领二支队从新丰过河，国民党临潼县雨金镇镇长梁忠义率自卫大队约 200 人投诚。二支队临潼县城前，警察局所部已躲上骊山。经李虎臣从中协助动员，临潼县国民党自卫团和警察局七八百人下了骊山，缴械投诚。临潼县城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渭北组织的领导下，渭北总队紧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积极发动渭北人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有力地打击和消灭了国统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为解放渭北各县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共渭北党组织领导渭北人民的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渭北人



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炮兵部队

民不屈不挠追求民主解放的革命意志和坚定决定。渭北总队组织发动的人民武装斗争，不仅是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延续，更是苏区精神在渭北地区的集中体现。

第五节　三原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 中共三原县委的成立

1948 年底，为了加强对渭北各县革命斗争的领导，做好解放各县的组织准备，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北工委，建立各县县委。

1949 年 1 月，中共关中地委将中共三原县工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任命张军为县委书记，吴皋森为县委副书记，吴曰聪、孙一君、杨顺玉、陈鉴、慕天祥等任县委常委。中共三原县委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和民运部 4 个工作机构。刘宏任秘书处秘书，吴曰聪任组织部长，李思纲任宣传部部长，陈鉴任社会部部长，杨顺玉任民运部部长。县委机关驻地先后设在淳化方里、耀县小丘。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柏嵯、方里、小丘 3 个区委。

中共三原县委成立后，按照中共关中地委的指示，紧抓干部培训，配备县区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积极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加快解放三原的进程。2 月，吴皋森调离，县委机关移至淳耀蒿圪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春季攻势后，三原北部一带相继解放。3 月，中共三原县委先后建立了陵前、

马额、大程、西阳4个区委。县委机关先后移至陵前大寨堡和东里堡。4月，中共关中地委改称为中共三原地委，中共三原县委归属中共三原地委领导，机关驻地移至西阳镇东寨堡。这一时期三原县的中共党员达到307名。

三原解放后，中共三原县委又重新成立了中共长孙、文峰、陂西三个区委和三原市（区）委，县委机关迁至三原县城南大街。同时，中共方里、小丘区委分别划归淳化、耀县党组织管辖。

7月，三原县相继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3个委员会，刘力充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吴曰聪兼任妇女、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陈鉴调离后，黄太兴接任社会部部长。刘力充调离后，范云轩接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8月，中共三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吴曰聪兼任书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人民政府、三原军分区司令部共同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县军事民政管理事务，并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全面整顿社会治安秩序。至此，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三原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二、 三原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一）三原县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947年7月，为了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开展建政工作，中共三原县工委按照中共渭北工委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耀县小丘一带成立了三原县政务委员会（简称三原县政务会）。三原县政务会设政务主任、政务秘书各一人，办事员若干人，渭北总队副司令员黄子



新中国成立后三原县城的一隅

祥兼任三原县政务会主任，吴曰聪兼任政务会秘书。同时，三原独立中队改为三原县警卫队，隶属三原县政务会领导。10 月，三原县政务会设立一科、二科、保安科和裁判员，郭进宝任一科科长，周金科任二科科长，董士杰任保安科科长，任云峰任裁判员。

在中共三原县工委的领导下，三原县政务会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已无力控制的方里、小丘、嵯峨等地开展区、乡、村的建政工作。

（二）三原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1948 年 4 月，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三原县新政权建设的发展和解放区的扩大，决定成立三原县人民政府，取消三原县政务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孙一君为三原县代理县长，王耿介任县政府秘书。新政府的工作机构设立有一科（民政科）、二科（财务科）和秘书室，郭进宝任一科科长，杨顺玉任二科科长，任云峰任保安科裁判员。9 月，郭进宝调离，王耿介兼任一科科长。12 月，增设四科（建设科），赵新元任四科科长，李志超任二科副科长。

1949 年 1 月，在成立中共三原县委的同时，中共关中地委对三原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也做了调整，孙一君任三原县县长。3 月以后，中共关中地委又对三原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和机构进行了健全，任命了副县长和各科科长，设立了税局，由马宏山任副县长（未到职），段杰任县政府秘书。三原县的政权组织逐步健全。三原县人民政府建立初期隶属关中分区专员公署领导；4 月，改属三原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并增设了三科（文教科），郭立三任科长。

5月，三原解放，县人民政府下辖的各区政府改为区公署。同时，成立了文峰、长孙和陂西3个区公署，并增设了邮局和工商科。6月，改保安科为公安局，陈鉴任局长，黄太兴、焦思俊任副局长；李志超调离后，马修畅（马龙）接任二科副科长，阎志清（女）任一科副科长。

7月，三原市政府成立，张鸿斌任市长，尚敬业任副市长。三原市政府下辖17个区街政府，三原市委驻县城盐店街。

同月，三原县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院，任云峰任县法院院长。县政府秘书段杰调离后，任新哲任秘书室秘书；陈鉴调离后，黄太兴接任县公安局局长，李德馨接替张鸿斌任一科科长。

新的政权建立后，三原县人民政府围绕建政、支前、发展生产等中心任务，先后建立了各乡、区的基层政权，领导人民开展了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工作，并在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原县人民政府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参与政权建设，全县社会秩序迅速趋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正轨。

（三）三原县人民政府的基层组织

1948年2月，中共三原县工委为加强对方里地区党组织的领导，遂成立方里区政府，杨义英任区长，机关驻地设在常社村。1949年5月，方里区政府划归淳化县政府管辖。

1947年6月，三原县政务委员会在小丘南部的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小丘区公署，未配备区长，黄逸民任副区长。1949年春，小丘及南部地区解放，小丘区公署公开工作，并建立了小丘、乙社、红

岩、移村、中原、独冢6个乡政府。小丘区公署机关驻小丘街。同年5月，小丘区公署移交耀县人民政府领导。

1948年4月，三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渭北工委的指示，成立了柏嵯区政府，段植任区长。1949年3月，明生福任副区长。三原解放后，柏嵯区政府改为柏嵯区公署。区长段植调离后，王崇寿接任区长。区公署下辖10个乡政府，机关驻柏嵯区辛村镇（今新兴镇）。

1949年3月，陵前解放后即成立了陵前区政府，常庆春任区长，肖德印任副区长。三原解放后，陵前区政府改为陵前区公署。常庆春调离后，肖德印接任区长。陵前区公署下辖6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陵前镇。

1949年3月，马额区政府成立，马志轩任区长。5月，马额区政府改为马额区公署，下辖4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马额镇文龙堡。

1949年3月，大程区政府成立，焦其宝任区长。5月，大程区政府改为大程区公署，下辖12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大程镇。

1949年3月，西阳区政府成立，周新轩任区长。三原解放后，西阳区政府改为西阳区公署，李振东任副区长。西阳区公署下辖9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西阳镇。

三原解放后，文峰区区公署成立，段植任区长，区公署下辖10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雁北堡。9月，段植调离，李振东接任区长。

1949年3月，陂西解放后成立了陂西区区公署，赵金发任区

长。区公署下辖10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陂西镇。5月，赵金发调离后，唐玉怀接任区长，秦毅任副区长。

三原解放后，长孙区区公署随之成立，徐百川任区长，赵俊任副区长。9月，区公署下辖8个乡政府，机关驻地设在鲁桥镇东里堡。

三、 中共三原地委的成立

（一）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

1947年8月24日，关中分区重镇马栏收复，中共关中地委机关又迁回马栏。此时，关中地委除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双龙镇中心区等县（区）委外，还领导国统区原中共陕西省工委所辖的党组织。

1949年4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关中地委，自4月4日起，中共关中地委改称为中共三原地委，书记白治民。中共三原地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下辖中共三原、淳化、耀县、铜川、富平、高陵、泾阳7个县委。同时，关中军分区改称为三原军分区。渭北总队隶属三原军分区、西北军区领导。

（二）中共三原地委的组织机构

1949年5月20日，中共三原地委由旬邑马栏迁至三原县城。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关中分区改称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三原专署），三原专署仍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辖铜川、耀县、富平、淳化、泾阳、高陵、三原7县。中共三原地委书记白治民，副书记郭文学，专员杨玉亭。三原军分区司令员黄

子祥，法制委员白治民（兼），副司令员谈国帆，下辖以上 7 县大队及独立营。1950 年 2 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3 月正式对外办公后，中共三原地委划归其领导。同年 4 月，按照西北军区的指示，三原军分区与咸阳军分区合并。24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中共三原地委与中共咸阳地委合并。30 日，中共三原地委停止办公。5 月初，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三原分区与咸阳分区合并。三原专署下辖各县归属咸阳分区领导。与此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与共青团咸阳地委合并；陕甘宁边区妇联驻三原分区办事处，与咸阳分区妇女联合会合并；三原分区工会与咸阳分区工会办事处合并。

（三）中共三原地委的主要工作

1. 接管县城，建立新政权

从 1949 年 5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的 2 个月中，中共三原地委、三原专署所属各县在巩固和建立人民县级政权的同时，建立区（市）级政权 56 个、乡（街）级政权 390 个、村（居民组）级政权组织 5000 余个。

2.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支前工作

从 5 月下旬起，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西渡黄河向西北挺进，三原分区境内大军云集，支前任务空前繁重。截至 7 月中旬，三原分区筹借军粮 15 万石，食用油 17.6 斤，粉条 30 万斤，盐 41.9 万斤，碱 7.9 万斤，煤炭 1624.3 万斤。在支前工作中，先后动员和安排大车 1.2 万辆，牲口 1.2 万头，担架 3772 副，出动民工 130.7 万人次，全区妇女为部队赶做军鞋 23 万双，保证了过境军队对粮草、副食、燃料等各类物资的需求。

3．收编地方武装，壮大革命力量

1949 年 5 月初，三原分区军事系统共 4249 人，参加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渭北各地作战 16 次，俘敌 92 名。在大小战斗中，收编地方武装 657 名，补充渭北总队 613 名，补充各县大队 44 名。同时，收缴长短枪 2161 支，轻、重机枪 36 挺，六〇炮 3 门。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截至 8 月中旬，扩大武装力量 2349 人，其中奉命调给其他部队 1175 人。

4．开展清匪肃特反霸斗争，稳定社会秩序

三原等地是渭北特务分子的重要据点，分区各县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情况，采取政策宣传、张贴布告、利用特务线索“以敌制胜”等多种方式，敦促敌特人员了解政策，认清形势，主动投案自首。截至 1949 年 8 月 10 日，全区投案自首 928 人（其中：特务系统 230 人、政府系统 52 人，其他 634 人）。10 月 18 日，中共三原地委在三原召开了 3000 余人参加的反奸大会。会后，各县迅速掀起了肃反高潮。与此同时，农村也广泛地开展了反霸斗争。在清匪、肃特、反霸斗争中，收缴长短枪 348 支。这一工作的开展，稳定了社会形势，安定了民心，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5．举办训练班，为新区培养干部

中共三原地委、三原专署针对新中国成立初许多繁重的工作急不待缓，同时又要给外地抽调干部的情况，在干部政策上“大量吸收，放手使用”的方针。为了使新吸收的青年干部和旧机构改造留用的人员全面了解中共的政策，尽快适应工作，分区干校和各县专门举办训练班，对 1813 名学员进行了教育培训。这些学员中，有县级干部 19 名，区级干部 192 名，乡级干部 209 名，财经系统干部 16

名，军队系统干部 13 名，新吸收的进步青年 1364 名。经过培训学习，不仅解决了分区各县急需干部的问题，还给其他分区抽调科级以上干部 73 名。

1949 年，三原分区的党政军群团组织圆满地完成了接管、支前、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使命，在陕西地方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建设

（一）军政建设

1. 军管工作

1949 年 5 月 8 日，中共关中地委组建了三原军事接管委员会（简称三原军管会），关中分区副司令员黄子祥兼任主任，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军兼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军事、行政、保安、文教、财经、交通 6 个处及秘书处，并配备了各处工作人员。

5 月 14 日，三原军管会机关驻县城，统一管理全县的军事民政管理事务，担负起剿匪、肃特、城防等治安工作任务。为了稳定民心和正常的商贸秩序，三原军管会张贴布告，有计划地开展宣传动员、清理、登记等项工作。同时，组织城内四个公立中学（城外尚有两个）及两个私立中学的在校师生召开座谈会，筹备复课事宜。

15 日，三原军管会的军事、行政、财贸、治安、文教、交通等各处按照分工开展接管工作。其间，宣告中国人民银行票币为合法货币，取消金圆券，禁止流通银元和铜子。17 日，恢复了邮政局通邮，并救济了三原火车站百余名失业铁路工人。

19 日至 20 日，三原县电报局电报、电话逐渐开始畅通。城关

区内500多家商铺全部开门营业，分区贸易公司运来大批食盐、食用油供给市民，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同时，各中小学相继开学复课。文教处还通过军管会借粮15000斤，解决了教师的吃粮问题。西铜铁路线三原站、永乐站等16个部门的38名铁路工人主动到交通处报名，参加抢修泾河铁路桥和临履桥的工程，交通秩序很快恢复。

5月31日，接管工作结束，三原军管会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办理了移交手续。三原军管会部分成员被充实分配到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各部门。6月29日，三原军管会政务处的工作亦告结束，所有文卷经清点后交由三原县政府封存。

三原军管会成立后，始终把建政、支前、发展生产等工作作为中心任务，使三原县城的社会及经济秩序迅速得到稳定。

2．建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三原县委和县政府为各区配备的干部直接进入岗位开展工作。在支前工作中，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使群众对建立民主政权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同时，在支前和肃清敌特、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工作中，对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经过进一步教育、培养，逐渐搭起了乡、村政权的框架，为正式通过民主推选组建基层政权打下了基础。

三原军管会的工作结束后，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县级、区级领导机构和下辖的各部门机构。县、区两级机构建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各乡、区的基层政权先后建立。各乡、村也组建了党、团支部及农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7月下旬，三原县建政工作全部结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1个乡镇、90

个村、1365 个甲，改建为 8 个区分署，1 个市政府，91 个乡（街），269 个行政村（巷）、895 个自然村（居民组）。全县总人口为 115291 人，总面积为 2321 平方公里。

3．党团建设

三原解放后，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向各区委发出“关于建党整顿组织，改变地下作风”的指示。因支前工作任务繁重，到 7 月中旬，各区先后成立机关支部，开始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由于大部分中共党员长期处于秘密状态，联系不够，教育差，在农村党员中出现了工作疲沓、纪律性差等一些不良倾向。对此，中共三原县委从三点抓起。首先，了解审查，及时调整配备干部。其次，整顿农村党的组织，加强时政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重新审查登记党员，按生产单位建立支部和小组。再次，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干部和各项工作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按党章规定，及时培养吸收为新党员。

三原解放初期有中共党员 317 名。小丘、方里分别划归耀县、淳化后，103 名党员转为耀县、淳化当地党组织管理。此后，中共关中地委又派来党员 35 名，共 249 名。新中国成立后新发展 60 名，全县中共党员人数达到 309 名。当时，党员主要分布在陵前、西阳、柏嵯及县区机关。

三原共青团组织是 1949 年春重新组建的。3 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原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刘多荣任书记，王明礼任组织委员，李中衡任宣传委员兼秘书。到三原解放时，有共青团员 20 余名。在三原解放后的 3 个月中，发展共青团员百余名。8 月，刘多荣调离，李允接任书记，全县时有共青团员 129 名。

4. 群团建设

1949 年 3 月，三原县党、政组织逐步得到健全。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工作，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成立三原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任命贺友玉（女）为副主任。三原解放后，因支前工作繁忙，直到 7 月中旬，三原县妇女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7 月 24 日，筹委会召开妇女代表座谈会，选举白青山（女）为主任，贺友玉为副主任。这次座谈会后来被定为三原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

三原解放后，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在开展支前、清匪、肃特等运动中开始组建各级农民协会。6 月，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成立三原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县委书记张军兼任主任，组织部长吴曰聪兼任副主任。全县在开展支前、清匪、肃特、维护治安等工作的同时，在各行业成立了工会组织，为稳定市场、恢复生产提供了保障。

9 月，在成立各行业工会组织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三原县工会筹备委员会，王文显任主任。

（二）支前运动

三原解放后，支前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此，三原县军管会迅速组织铁路员工 700 余人，分组抢修泾河铁桥与清河桥梁。同时，动员群众加紧修补咸榆公路三原路段及富平通往三原、蒲城之公路，保证人民解放军顺利南下和西进。

三原解放当天，县军管会接到三原专署指示预借军粮 1.5 万石的任务后，立即付诸行动，县、区两级紧密配合军管会宣传政策，

筹借粮草，对全县各地的劳力、牲口、车辆也进行了调查统计，为粮草运送工作做了充分准备。县政府还动员5万农妇赶做军鞋，文峰、大程等5个区7天内做军鞋2200双，县粮站筹集预借粮3000石，各中、小学集资购置了大批肥皂、毛巾等物品。同时，写了1300多封慰问信慰问解放军。

5月29日，接到三原专署关于“发动群众，应大力支援招待大军”的指示后，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指示各区、乡做好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迅速投入支前。6月1日，三原县支前委员会成立，张军、孙一君分别任正、副主任。各区也成立了支前分会，基层成立支前小组40个，负责开展战前动员及服务工作。解放后的三原人民在支前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多群众未经上级动员主动投入支前工作。县城各界人士及学校还主动组建了欢迎解放军过境服务团，为解放军西进、南下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在解放军过境时，服务团自觉出车、畜、粮、草。

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政府按照“劳负30%，财负70%”的合理负担，保证军需与生产双顾。截至7月24日，全县先后给部队筹办军粮1.3万石、牲料2733石、大肉320斤、菜油7600斤、盐5.2万斤、蔬菜3.5万斤、煤炭50万斤、木柴20万斤、军鞋37.8万双、草鞋5400双、草8520万斤，投入支前的大车4788辆（其中未经动员的有2131辆）、担架966副（其中未经动员的有335付）、民夫7047人（其中未经动员的6720人）、牲口845头（其中未经动员的530头），沿途设茶水站338处，投入磨面的人、畜工日3.4万个，做军鞋的工日3.7万个，修桥补路的人工4.3万个，畜工5721个，车工4200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赠予三原县“为

人民争光，支前模范”锦旗。

（三）肃清匪特

新中国成立前，三原县曾是国民党在渭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军事要地和特务首脑机关所在地，仅敌特机关就有国民党国防部西北特技组、豫晋督导组、西安绥署渭北情报组、耀县专署政工队、渭北特派员办事处、三原县政府情报汇报室等。

新中国成立后，三原县军管会担负起防奸、防匪、防盗、防破坏工作任务，在县、市、区及农村共组建治安委员会68个，治安小组528个，时有治安主任、干事126人，治安员1110人，发动群众开展了肃清敌特和土匪、建立人民武装、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

同时，军管会还接收和清理了国统时期的全部户口册，并命令“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应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限时向公安机关报到登记”。从5月到10月，共登记敌特人员316名，其中军统81名，中统56名，其他179人。经过核查、甄别，对其中186人进行了管训。采用报到登记的方式清理乡保行政人员796名，其中乡、镇长18名，保长111名，乡保队附98名，其他办事人员510名。

三原军管会坚决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先后破获潜伏特务组织10多个，抓获敌特分子30余名，并对“一贯道”等反动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打击。全县共发现线索，登记处理各系统的特工人员558名，保甲人员221名，帮会人员31名。

三原军管会依照“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流窜骚扰的小股土匪进行了清剿，共歼灭土匪9股，捕获匪徒18名，毙匪1名，收容散兵游勇31名，收缴

各种枪械16支，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7起，三原境内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在建立人民武装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全县建立了7个区游击队。为了提高人民武装成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三原县大队对各区游击队进行了轮流整训，保证了支前、肃特、清匪、建政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恢复生产

三原解放初，商人拒绝使用国民党的金圆券，市场流通以白洋、铜圆为交易本位币。三原县军管会公布了银元收买牌价，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

为了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三原分区贸易公司实行了五项措施：一是开展贸易，推行人民币；二是广开营业门店，以低价批卖货物，推销土产，拒收白洋，稳定金融；三是回笼人民币5000多万元，提高人民币的威信；四是以人民币收缴营业所提税和10%的公粮代金；五是宣传动员群众拒用白洋交易。

三原解放后，分区贸易系统立即把10万斤盐、3万斤油及其他物资运进三原县城。同时，为了吸引物资南来，将耀县、铜川、马栏等地的土产价格进行了调整，把耀县食盐的价格由每斤35元提高到45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用的旧人民币）。土产大量南流后，贸易分、支公司及贸易站等又主动收购，避免土产价格跌落，保证供应城乡群众需要。从1949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各地收购炭1500万斤，盐40万斤，碱20万斤，油12.2万斤。

新中国成立初期，渭北各县物价皆高，三原物价较低。根据上

级指示，为了避免物资外流，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人民政府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及时公布各县物价，适当提高当地物价；二是限制机关、学校、部队抢购；三是发现外地商人高价收购棉花等物期间，采取冻结棉花，棉花归行经营等办法，制止奸商扰乱市场。至此，平抑了物价，稳定了社会秩序。

当时，由于战争的影响，棉价下跌。贸易分公司为了调动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根据邻区情况对棉价进行了调整，组织粮棉商行31家、粟店12家代收棉花90万斤。经过对北上棉花及南下盐、碱价格的适当调整，保障了贩运者的利益，除陕北土产源源南下外，新解放区的棉花、布匹也顺利向陕北流动。据三原县税务局统计，6月份，三原棉花北流3.56万斤，布匹北流643匹。当时，棉农兴奋地说："今年棉花值钱，可要好好务呀！"

在恢复发展生产方面，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人民政府针对农业生产缺乏劳力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组织变工、帮工、搭工的办法，动员群众翻好地，锄好秋，管好棉花和粮食作物，并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使全县的农业生产得以正常恢复。

人民政权在渭北地区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渭北地区的胜利。随着渭北各县的解放，渭北人民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开展支前运动、肃清匪特、保护设备、恢复生产等各项工作，以崭新的风貌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第八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与深刻启示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核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共三原组织和渭北党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斗争历史较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党、政、军优秀干部，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一）国家民政部关于确定革命根据地的标准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摇篮和基石。国家对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革命根据有明确的划定标准。1979 年 6 月 24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下发了《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民发〔1979〕30 号、〔79〕财税 85 号），其中规定了认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四项基本标准：一是曾经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二是有革命武装；三是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牲畜等运动；四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这四项基本标准，互为关联，不可分割，是划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渭北革命根据地完全符合国家认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标准。这里的党组织——中共武字区委早在 1928 年 7 月就在党群基础较好的武字区成立，孙平章任书记。在此之前的 1928 年 2 月，黄子文、唐玉怀在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以唐辉智为队长、孙平章为副队长的农民游击队。同时，组织发动了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以打击土豪劣绅，实行“三分五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1932 年 8 月，这里建立了以黄子祥任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9 月，又成立了以黄子文任主席的渭北革命委员会。

从 1928 年春到 1933 年夏，以乔国桢、黄子文、黄子祥、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渭北高原举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开辟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渭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 1931 年 5 月创建到 1933 年 8 月遭敌残酷“围剿”，红四团转战照金，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二）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地区主要建立了6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地区的6块革命根据地虽然都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其历史沿革有所不同，创建时间有先后之别。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建立起来的。1928年2月9日，黄子文和唐玉怀在武字区主持成立了抗敌委员会。2月22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农民武装和党的区委、县委，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以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成立为标志，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1931年5月至1932年9月，又先后建立了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等革命武装，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32年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相继组建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根据地的分粮分地斗争进一步发展，各项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其先后经历了寺村原、照金和南梁三个发展阶段。从1929年起，刘志

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0 年 10 月，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 年 9 月，刘志丹在南梁整编当地三支武装，创建了南梁游击队。1932 年 2 月 12 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原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4 月上旬，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在甘肃正宁寺村原成立，揭开了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寺村原诞生。12 月 24 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成立后，挥师耀县照金一带游击。以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为标志，照金苏区创建于 1933 年 3 月 8 日。1933 年 11 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回到甘肃庆阳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开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 年 2 月 25 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恢复，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4 年 11 月 7 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确立。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 1928 年 4 月成立的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赵伯平、马明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建立起来的，其政权建设是从建立县级政权开始的。1934 年 8 月 25 日，陕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安定县（11 月下旬改名赤源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从 1934 年 8 月至 1935 年 2 月，陕北根据地有 9 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1935 年 1 月 25 日，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

（今属子长县）召开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巩固。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是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战略转移，11 月 5 日进入陕南，12 月中旬到达川北。12 月 18 日，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建立了川陕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赤北乡苏维埃政府。12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层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 年 2 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在通江县城相继成立，宣告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1932 年 12 月下旬至 1934 年 4 月间，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镇巴、西乡、南郑的 122 个村建立苏维埃政府，198 个村苏维埃政府是 1935 年 2 月初，红四方面军举行“陕南战役”，解放宁强、勉县、南郑的大部分地区后相继建立的。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创立的革命根据地。1934 年 11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创建新根据地。12 月 8 日，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洛南县。12 月 10 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现属丹凤县）召开第 18 次常委会，决定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1935 年 4 月，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小河袁家沟口成立，标志着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成。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杨森、杨琪、贺晋年、张达志等领导红军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创建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1935 年 2 月 5 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说谢子长）。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从西北地区 6 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成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创建革命武装方面，还是在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方面，渭北革命根据地都先于其他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是西北创建时间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三）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评价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参与创建了渭北革命据地。对渭北革命根据

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习仲勋有深切的感悟和见解，并多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客观评价。

1945 年 7 月，习仲勋在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的武字区和心字区，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这一地区作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为了援助渭华起义，这里发生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一九三〇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荫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其间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斗争，杀土豪反劣绅。是个‘半红半白’的环境。另一方面群众在斗争中也遭到国民党反对派的捕杀镇压。这就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

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4 年 7 月 14 日，习仲勋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谈到陕甘边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

1986 年 4 月 7 日，习仲勋与陕西省组织史办公室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

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四）成为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探析

土地革命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率先建立，成为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与三原、泾阳、富平、耀县等地独特的区域性历史人文生态、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它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 三原在渭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为其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首选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清时期，三原即为“连湖广而通甘凉”的渭北商业中心，是东连晋、豫，北通延、榆，西达甘、凉的商贸集散地。清末民初，三原发达的经济贸易促进了渭北地区的近代化。三原自古文教昌盛，独领风骚，誉满陕西，文化教育的早期发展，影响和推动了渭北革命思潮的形成。民国初期的三原、泾阳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同盟会陕西支部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渭北地区早期的反军阀斗争，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近代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从明清至民国前期，区域经济的繁荣，文化中心的孕育，社会政局的激荡，革命思潮的涌动，这种经济特质、人文特质和政治生态，为三原、泾阳在西北终成民主革命的发祥地和先行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2. 三原早期蓬勃兴起、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及斗争实践，为中共党团组织在渭北的率先创建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早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员、三原宏道学堂学生杨

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王炳灵、张景秋等就积极宣传革命大义，被时论称为“时代强音”。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三原是除西安外陕西最早响应五四运动，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的地区。1923 年 8 月，共进社三原分社的成立，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使大批爱国青年获得了新的思想武装，站在了时代斗争的前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 中共三原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的早期建立，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三原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 年 12 月，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和渭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诞生，使渭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1927 年 2 月，西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大寨支部在三原武字区大寨村南汉圣母庙建立，拉开了武字区革命斗争的帷幕。三原党团组织的早期建立和发展，使渭北革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它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担负起了组织领导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担，推动了渭北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组织基础。

4. 渭北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时期，三原是陕西地区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三原的农民运动率先在三原武字区蓬勃兴起。亢维恪、乔国桢等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直接指导和领导了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渭北各县的农民运动，向渭北各县推广三原武字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三原“交农”围城斗争规模空前、影响

深远，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鼓舞了渭北人民的革命斗志和信心，拉开了渭北地区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三原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尝试

（一）践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

1. 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开始进行新的探索。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放在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 年 10 月和 11 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起义是一种特征。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

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 年 1 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红色政权虽然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由此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此把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性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

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唯一的革命道路，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和实践创造了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殊途同归的革命模式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人民，经过坎坷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坚持把马克思普遍真理与渭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敢探索，大胆创新，无意识地创出了一条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革命路子。

大革命时期，三原就有了中共党员和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8 年至 1930 年间，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县委领导下组织开展了交农斗争、武装围城、抗粮抗款，打土豪，杀恶差，实行武装夺取政权，在三原、富平、泾阳、耀县等地区形成了武装割据局面。1931 年 5 月至 1932 年 10 月，恢复了中共武字区委，先后建立了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了中共

三原中心县委；与此同时，相继成立了渭北苏维埃政府、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以及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根据地扩展到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六县的边界区域或局部区域。1933 年 7 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这一时期，党组织领导渭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全面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贾拓夫、焦维炽、杜衡（后叛变）、李杰夫（后叛变）、汪锋、赵伯平、张秀山等多次来渭北指导革命工作，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创建。

从上述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由党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再从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通过群众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这种“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形式，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带领渭北人民对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于 1930 年 1 月才基本形成，当时这一革命道路理论尚未传入陕西。1931 年之后，《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件和文章才逐步传到陕西及渭北。因此，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形成前，既无现成模式仿效，也无革命理论指导，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依照土地革命的原则，无意识地践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实现了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这一条自主性、独创性和开拓性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确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殊途同归，是完全一致的。

（二）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蒋、汪合流，实行“清党”和“反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了艰苦异常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前期，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国各地先后创建了 10 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毛泽东、朱德创建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等创建的洪湖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创建的湘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等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郭述申、徐向前等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澎湃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滕代远等创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等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等。

1930 年，毛泽东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分别称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模式，为中国

共产党积聚、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了立足点，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了实践平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提供了重要基地，使革命形势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推动中国革命取得了重大转机和发展。

这一时期，与全国各地一样，国民党当局在渭北地区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运动，疯狂缉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解散革命团体，渭北革命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关中地区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军阀土豪压榨盘剥，苛捐杂税繁重，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党团组织坚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渭北实际相结合，在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广大农村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烈火，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的创建，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各地创建的根据地处于同一时期，其规模、作用及影响虽然有限，但它无可置疑地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割据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

渭北苏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坚强的共产党人和渭北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

杀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舍生取义，高举革命的大旗，在腥风血雨中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巩固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一）对乡村劣绅地主的清算

土豪劣绅是封建势力在农村的残余，也是近代中国政治黑暗的原因之一。1911 年辛亥革命后，渭北地区仍是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他们作威作福，狼狈为奸，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革命时期，陕西接连遭遇灾荒，尤以渭北为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人民群众卖儿卖妻，背井离乡，沿门乞讨，投井、跳崖、上吊、自刎者甚多，农村死尸遍地、十室九空。豪绅地主借“清党”造成的权力真空，相互勾结，枉法渎职，操纵把持乡村政权，造成坚固的反动连环，民治基础被摧残殆尽，陷广大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悲惨处境。

从 1926 年到 1932 年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武字区党组织领导人民打土豪、杀恶差，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三原武字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这一时期，武字区人民武装对欺压贫农的义和村地主崔福成、西王堡地主雒彦福进行了打击和清算，捕杀催粮恶差 20 多人，镇压了国民党武字区区长李致泰、薛荫堂和一分区区长姚登奎，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洲和企图反攻倒算的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并烧毁了崔福成记的“变天账”。在富平淡村，镇压了恶霸田顺之等。由于灾情严重，先后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分了 30 多家豪绅地主的粮

食。中共武字区委通过筹赈委员会筹集粮食，解决了3700多人的无粮问题。在武字区的影响下，富平淡村地区先后4次筹粮3万多斤。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废债务，迫使封建势力减租减赋减税减息，为分田分地营造了声势，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打土豪、杀恶霸、分粮食的基础上，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中共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用革命竞赛方式把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数百亩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游击队队员。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

对豪绅地主的打击和清算，震慑了封建势力欺压鱼肉乡民的嚣张气焰，迫使封建势力降低或取消了部分田赋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负担，为百姓出了气，吸引贫苦百姓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将豪绅地主的土地及其浮财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而且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调动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它对贫苦农民的动员作用和对革命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对地方民团的打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地方地主、豪强组成的民间反革命武装称之为民团。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豪绅把持的民团武装。随着中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方针的提出，一些反动势力所控制的民团在人

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呼声中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公开“反共反人民”，与地方军阀政府相互勾结，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民团成为正在日益兴起的渭北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一个强大阻力障碍，民团和国民党驻地方正规军是当时主要的两支国民党军。

1915 年，三原县即成立民团。1926 年、1935 年，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淳化六县民团相互联合，进行反共活动。三原县民团不足百人，七八十支枪，团长李养民指挥 7 个区乡民团（亦称分团）。区乡民团保持二三十人，集中起来五六十人，枪 20 至 40 支不等。李养民率县民团常驻县城，活动于陵前、马额、柏社、嵯峨，王厚安民团驻陵前长坳堡，刘志茂民团、杨虎城部骑兵团第四连驻陵前侯家堡，王茂臣民团驻马额坡子村，段金玉民团驻新兴西段村（心字区），杨老五民团驻陂西（力字区），马振英民团驻西阳（肃字区），孙耀南民团驻大程（同字区）。在富平县，王德五民团、张德润民团、田俊福民团驻富平淡村，胡景铨民团驻庄里镇，别远亭民团驻觅子店，董宏昌民团驻董家堡，李天福民团驻南李家，尚德胜民团驻尚家堡。耀县小丘镇驻白军何高侯部，华里坊驻张恒义民团。这些民团依仗政府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拉丁抓人，抢劫财物，强征团款，无恶不作，充当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斗争的急先锋。他们“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捕杀迫害、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仅李养民率三原县民团先后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民群众就达 61 人。民团直接导致了民间治安状况的恶化。

土地革命肇始，中国共产党汲取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武装起义的革命路线和武装反抗民团的基本政策。在党的乡村

武装起义路线指引下，三原党组织和武字区党组织不仅把武力解除民团武装作为夺取乡村政权的必经之路，而且视其为动员民众参加渭北苏区革命的重要手段，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对盘踞在武字区、心字区及富平、耀县等地的反动民团、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进行了有力地打击。1928年5月至9月，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武字前区民团团总王厚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贪官恶霸。1929年11月，突袭富平淡村民团驻地石家堡，俘获了民团团总张长庆。1930年6月，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和马额乡公所，捕捉了豪绅侯延宾，逮捕并处决了途经武字区返回西安的宜君县离任县长潘恩桐。1931年6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在三原、富平、耀县一带领导群众与豪绅地主开展抢收小麦、反水利借款、反征收地亩税、反苛捐斗争。1932年8月，攻打了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9月中旬，消灭富平、耀县、同官三县民团数百人，活捉了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小丘民团团长柴子发。1933年7月底，红四团在三原与富平交界的老户沟全歼了长期横行陵马一带的富平淡村民团，击毙团首张德润。

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与地方民团的英勇斗争，虽然遭受了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和报复，渭北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代价，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渭北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镇压了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使苏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教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也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三）对渭北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牵制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武字区距三原县城仅 10 多公里，距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中心西安约 50 公里。这块根据地的建立，似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咽喉，令国民党陕西当局极端仇视，恨之入骨。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镇压和“围剿”，欲置其于死地。根据地党团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反击敌人“围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渭北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环境十分恶劣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驻防三原的军事武装众多，先后有国民党军田玉洁师、魏凤楼师、冯子明暂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国民党张汉民炮兵营、国民军第三十八军（原第十七师）、国民党冯玉祥部、毕梅轩部、王平部，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部（司令刘文伯）、国民党军孙立功营、国民党军杨竹荪步兵团、渭北警备司令部及杨虎城部等。这一时期，驻防富平县的国民党军先后有国民一军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的十九师一部、杨虎城部四十二师冯钦哉几个营、中央军七十二师旅长叶裳部等；驻防耀县的相继有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六师、十七路军警备第一旅、富同耀区保安指挥部、十七路军特务团和骑兵团、十七路军一七七师许权中独立旅等；驻防淳化县的先后有国民党军田金凯骑兵第一师二十七团、国民党军程下营、国民党骑兵团、国民党十二师王明钦（王克敬）团、国民党别动队骑兵师一个团、国民党警备第三旅等。渭北革命根据地处于众多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武装和反动民团武力的轮番“围剿”，渭北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坚决顽强的反抗。渭华起义爆发前后，三原、泾阳、淳化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先后领导发动了农民“交农”及武装围城斗争。1928 年 5 月 3 日，中共三原县委组织农民围攻县城的武装斗争，打响了渭北地区“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渭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从 1929 年至 1930 年，武字区的筹赈运动、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游击战和淡村区的群众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并极力进行军事围攻。根据地人民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顽强反抗，与敌周旋，震慑了盘踞在三原的国民党冯玉祥部和盘踞在武字区马额镇一带的毕梅轩部、王平部。在与敌正规军长期、频繁的作战中，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先后围攻了进犯武字区南原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了进犯根据地的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连，配合红二团全歼了驻武字区侯家堡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攻打了杨虎城特务团；先后与“围剿”武字区的杨虎城特务团和渭北“剿匪”司令、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调动的六个团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浴血作战，歼灭了为数众多的敌人。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根据地党组织还积极开展军事策反工作，促使国民党地方民团、乡保倒戈起义，变国民党当局的保甲为赤色联防，变国民党当局的堡垒为赤色据点。在这些斗争中，渭北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诸多经验。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虽然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几经起伏，但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军的斗争生生不息，一直坚持到

解放战争时期。

1947 年 3 月至 5 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黄子祥、黄子文等在胡宗南血腥统治的武字区组织敌乡政人员起义，打开了一条血路，冲进陕甘宁边区与关中革命武装汇合，有力地配合了关中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 年 5 月 20 日，渭北总队第四支队在“嵯峨山突围战”中击毙胡宗南部暂编二旅两个团和新九旅一部及国民党地方武装 200 余人，伤其大半。6 月 23 日晚，渭北总队第一、二支队在淡村北康家洞附近歼敌 6 名，在盘龙湾（富平县境内）袭击了胡宗南军马车运输队，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和物资。1949 年 2 月，武字区党的地下武装配合西北野战军第一军侦察连在武字区长坳堡、上河堡、三家店一带将敌九十军搜索连全部消灭，伤、俘敌 50 多人。

在敌强我弱、远离主力的不利形势下，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惧强敌，浴血奋战，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在渭北乃至陕西的反动气焰，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势力，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支持、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这在陕西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革命斗争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四、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巩固的重要依托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部区域与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渭北革命根据地既是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的前哨阵地，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一）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组建时的源头之一

1984 年 3 月，习仲勋在回忆三原“交农”和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时指出：“黄子文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为创建渭北和以后的照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① 1932 年 2 月，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三原县武字区党组织就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去参军。② 渭北苏区的这些革命青年直接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革命武装的重要源头力量。

陕甘游击队是在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过黄河扩大后称陕北游击队）重组改编的基础上建立的。1931 年 10 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杨重远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合水县林锦庙会师。1932 年 1 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全军 300 余人。1932 年 1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斗争相结合。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并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2 月 6 日，“三嘉原事件”发生，同盟军锐减到 200 多人，部队的力量严重削弱。省委随即指示渭北各县党组织动员青年农民前往参军，以充实同盟军队伍。按照省委新的指示，2 月 12

① 1984 年 3 月 22 日，习仲勋接见中共三原县委党史办 5 位同志时的谈话录音记录。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92 页，李维均：《战斗中成长的陕甘游击队》。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当日，黄子祥受党组织委派，带了三原武字区几十个农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大会上，李杰夫、谢子长讲话之后，黄子祥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发表了讲话。[①]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南下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黄子祥带领这几十个农民跟随陕甘游击队一起活动。部队到达耀县香山之后，黄子祥奉命回到武字区组建武字区游击队，筹建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他带领的这几十个青年农民直接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成为陕甘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从1932年2月中旬到1935年10月，由黄子祥带领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三原武字区革命青年艰苦转战陕甘边各地，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2. 渭北革命根据地多次为陕甘游击队提供兵员补充

陕甘游击队诞生后，便转战于陕甘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打了诸多胜仗。同时，在敌重兵围攻“围剿”之下也屡遭挫折，损失严重。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削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以革命大局为重，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后，三原武字区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部分新战士。4月21日，阎

① 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7页。

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支援渭北苏区的农民运动，武字区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五支队扩大到300多人。

6月2日，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率领部队从宜川县集义镇进入韩城。6月11日，陕甘游击队在国统区韩城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部队剩下200多人，急需补充人员。6月13日，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的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胡炳彦、张改明、方谋、杨遂、王建章、习浩胜等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踊跃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共产党员和青壮年群众由黄子文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此外，黄子文还动员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渭北游击队第二中队指导员王瑞琪等渭北苏区干部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月中旬，受“左”倾错误影响，陕甘游击队500余人在正宁县湫头原一带再次遭遇国民党部队驻山河镇一个团的乘机“围剿”，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200多人。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团仅200余人，枪150余支。

1933年1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①]。根据省委的号召，武字区再次为红二团组织输送了一批兵员。2月6日，贾拓夫在给省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委的报告中称：“二十六军下来，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去了，各处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革委决定设立到二十六军去的招待处。以后三五十群众带旧式武装前去，目前形势征调三千群众到二十六军是有绝大的可能。同时在耀州、富平、蒲城各地亦开始了这一工作。”①

这个报告说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积极响应省委号召，武字区又有众多青壮年参加了红二十六军。照金苏区建立后，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王柏栋、杨玉亭、张策、郭炳坤、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陈国栋、杨再泉、封正宝、李天赦、宋志奇、王安民、李尚勤、高占胜等主要干部都是先后从渭北根据地进入照金苏区的，推动了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黄子文等又多次回三原武字区进行“扩红”，一批又一批三原革命青年参加了红二十六军。

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三原武字区对陕甘边红军的“扩红”运动和多次兵员补充，虽然人数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陕甘边红军壮大了力量，缓解了危急局势，实现了最后的胜利。直到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陕甘边红军这面在西北高原第一次打出的工农革命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3. 红四团在危难中支撑了红二十六军

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1933 年 4 月，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和地方民团共 6000 余人分 4 路“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6 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创建新苏区。7 月 8 日，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陷入敌重兵包围，与敌激战数日，

① 《渭北特派员拓夫关于渭北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1933 年 2 月 6 日)。

部队伤亡严重，弹尽粮绝后几乎全军覆没。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失去主力红军支撑的照金苏区严重空虚，敌人加强了对照金苏区的“围剿”。7 月 28 日，杜衡等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外围形势十分严峻，照金苏区受到严重威胁，处境十分危险。

习仲勋在《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 4 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 40 多个人，枪不满 30 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

1933 年 7 月 24 日，中共陕西省委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惨痛消息后，将三原武字区的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共 120 余人。红四团成立后，重新打起了红二十六军的旗帜，担负起了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开始在三原、富平等地游击。7 月 28 日，红四团配合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县心字区的辘轳把村同三原驻军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战后，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百余人转战照金苏区。此时，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也进入了照金。30 日，为减轻照金苏区压力，红四团在富平与三原交界的老户沟歼灭了富平淡村民团。

8 月初，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向渭北根据地发动重兵“围剿”，红四团奋力反击。在强敌围攻下，为避免受损，保存革命实

力，8 月上旬，黄子祥、杨森带领红四团转战照金苏区，渭北根据地大批红军指战员及地方干部也相继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8 月 14 日，陈家坡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红四团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合形成新的红军主力，由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成为陕甘红军的重要力量。从 8 月下旬开始，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指挥下，红四团与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在让牛村、庙湾一带歼灭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并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9 月初，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 100 余人，在甘肃正宁金村庙地区消灭地主武装一部。9 月中旬，红四团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耀县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9 月 21 日，部队奇袭旬邑县张洪镇，杨森率红四团攻入旬邑县政府，击毙民团团总，俘获县府人员，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绅，并连夜开仓放粮，破狱救民。

10 月 18 日深夜，红四团与义勇军、耀县游击队、陕北一支队联合攻克合水县城，消灭驻防军一个连及民团数十人，并救出 80 余名被敌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骨干。10 月 28 日，在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域，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设伏将敌赵文治团 200 余人包围猛击，红四团骑兵连奋勇冲杀，一举将敌全线击溃。

11 月中旬，部队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攻打该地守敌一个连，战斗中，红三团正面攻击，左右迂回，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编）迂回敌后，断其退路，全歼守敌。红四团在照金苏区最危难的时刻支撑了红二十六军，它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照金的会合，壮大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

了国民党军及反动势力，缓解和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斗争的危急被动局面。

张秀山在《忆渭北游击队》一文中说："红二团南下失败，二十六军的旗子之所以没有倒，靠的是三原、耀县的农民。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苏区的群众，以后才发展到整个陕甘边苏区。"①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渭北根据地作为照金根据地的回旋地，没有红四团和渭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革命的火种就很难复燃。红四团使照金苏区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余地

1. 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渭北根据地的活动

1932 年 4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进入旬邑县开展游击活动。4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 月 21 日，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五支队来到武字区时，渭北的农民斗争形势正处于非常高涨的时期。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14 页；张秀山：《忆渭北游击队》。

1932 年 6 月 2 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央的《报告》[①]中写道：“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②]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军，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富平农民受到三原影响，也起来反抗捐税，把美原包围，公安局的枪都缴收了……耀县、蒲城的农民都起来包围县城，主要的是反抗苛捐杂税。这样形势更有利于游击队的南下，同时游击队的南下，必然的更要燃烧起广泛的农民斗争，提高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五支队到达武字区当天，参谋长杨重远即率骑兵中队配合武字区游击队将马额王茂臣民团 20 余人枪包围于马额城中，用炸弹猛攻，武字前区 200 余名武装农民飞奔到马额镇帮助五支队围攻，王茂臣诈降逃走，五支队遂占领马额城。22 日上午，武字区委、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 3000 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了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热情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

① 1932 年 6 月 2 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关于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② 兴字区：即心字区，指三原县新兴镇、嵯峨镇一带。

一样，高兴到了极点！[①]在欢迎大会上，杜衡讲话，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大会宣布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同时驱逐义勇军中的富农，将义勇军改组为赤卫队；宣布取消国民党区公所、民团等一切机关，逮捕区长王茂臣，并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

当晚，五支队获悉耀县西原一带国民党军的两个营前来“进剿”，有迫击炮2门，离武字区5公里的心字区也去了国民党军一个营，五支队便连夜设伏迎敌，但等到天亮也未见国民党军出现，五支队便向马额尚村转移。距马额镇二三公里处听到枪声，此时胡景铨带领富平东四联民团200余人占领了马额城，附近农民纷纷逃离。五支队遂决定向北撤退5公里，绕出包围圈，撤至耀县上卢村休整，研究军事战略。到上卢村后，又获悉国民党十七路军特务团1000官兵由北而来，离上卢村仅约10公里。五支队意识到国民党军将进行四面包抄，遂向西欲撤至小丘原，但国民党特务团已抢先占了小丘。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

在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下，渭北根据地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提供了回旋区域。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开展游击战争，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了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页。

2. 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退撤三原武字区

1932 年 8 月底，陕甘游击队在总指挥谢子长的率领下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9 月 12 日，刘志丹、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反击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三四百兵力“进剿”照金尖坪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时，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交由习仲勋参与领导；同时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为程双印[①]。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②]带队叛变，特务队队长程双印欲制止叛乱，被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出现混乱。陈克敏叛变事件，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与第五伯昌商量后，决定由习仲勋担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担任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

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历遭险阻，几经起伏，接连受挫，伤亡严重。同时，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追随者对陕甘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陕甘游击队受到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不利形

① 程双印，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 1928 年 5 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旬邑县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② 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参加陕甘游击队后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

势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等遂将刘志丹特意留在照金的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三原武字区。三原武字区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的游击活动，也支持和推动了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3．渭北革命根据地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大力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既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及回旋余地，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之一。

陕甘边地区土地贫瘠，经济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其贫困，党政军的开支主要依靠分得土豪地主的粮、财来解决。随着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部队和地方不仅急需大批干部及兵员，而且党政军军需严重不足，钱、粮、武器极其匮乏，急需补充短缺。1932 年至 1933 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苏区多次开展“扩红”活动，为陕甘游击队输送了大批兵员。与此同时，渭北根据地还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关中地区为渭河冲积平原，利于农耕，向以“八百里米粮川”而闻名，以三原、泾阳、高陵等县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土地革命初期，西北发生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重灾区。在渭北地区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渭北根据地仍为陕甘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同时也为中共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

1932 年 10 月，陕甘游击队为解决过冬困难，总指挥谢子长派

杨森带领第二大队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筹款集粮，武字区军民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及时提供了一批紧缺物资。12月22日，杜衡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①]中说："一部分（经费）给二十六军作工作上用，如组织后方办事处，输送及购买医药、宣传机器等用，这些东西，将派三原游击队保送下来，同时我听子文（黄子文）计算武字区的现款，目前都在大洋3000元以上，省委应责成特派员和三原中心县委负责提出一部分交常委"，"现在已经给省委大洋300元，红军办事处大洋300元，这些经费均由三原游击队送来"。

1933年至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和从河南邓州一带逃荒来到三原的乡亲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仔细地打成包，趁着黑夜或雨天，用板车推或用骡子驮运，秘密送往陕甘边。

渭北根据地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和大后方，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以革命大局为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三）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此时，黄子文将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区

① 原标题为《陕西励君关于二十六军之报告》，存陕西省档案馆。

后区的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渭北游击队。12 月底，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各有 20 多人枪。改编后的两个中队立即前往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新苏区。

1．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出潼关

1932 年 12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来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红二十六军的杜衡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给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立即赴上海中央局“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继续工作。

12 月 25 日，黄子文率渭北游击队 20 余名战士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了三原武字区。

此时，渭北革命根据地刚刚遭受国民党军和六县民团“围剿”，武字区侯家堡还驻着白军两个连，国民党的许多便衣侦探到处活动，与武字区相邻的富平县又有五六百人驻防，渭北根据地仍被白色恐怖笼罩，党组织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黄子文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设法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地方，将谢子长和阎红彦进行了妥善安置。因武字区不能久住，黄子文便去了渭南。

1933 年 1 月 5 日，黄子文在渭南先后给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和一封信，除汇报渭北特委的工作及成立红二十六军的情况外，还专门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谢子长、阎红彦的问题。

黄子文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你们接到报告讨论（后），立即

去三原和县委去接头，谢、阎怎么办，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久住，我马上从这里回去，如能在那再候数天，将问题能解决了更好，如果那里严重，我便把他们送到渭华一带，你们再解决，你们给送报告人决定，再送报告人回来，路费由你们给他。”①

由此可见，黄子文对谢子长、阎红彦的处境非常同情，希望中共陕西省委能够及时给予解决。此后，黄子文设法筹措路费，派渭北游击队的战士送谢子长、阎红彦出了潼关。后来阎红彦被派去苏联学习，谢子长参加察绥抗战后又辗转回到陕北。

2. 参与焦家坪、大香山、庙湾、芋园等战斗

1932 年 12 月 26 日，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开赴耀县照金地区，开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黄子祥、黄罗斌、金天华等率领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南下，在照金地区及其周边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

1932 年 12 月 26 日拂晓时，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将宜君县焦家坪之敌包围，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人防守，敌团总仓皇逃窜，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一举将敌全歼，俘敌 60 余名，缴枪 60 多支。焦家坪首战告捷。

攻克焦家坪据点之后，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经耀县衣食村南下照金香山寺。香山寺拥有良田 10 余万亩，储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渭北游击队没收分配寺庙粮食两三千石，赈济了大批灾民和当地民众。时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心焦如焚。基于救灾于水火之中，经团

① 原标题为《陕西子文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来信》，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党委研究，决定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①

随后，杜衡做出了火烧香山寺的决定。王世泰回忆说：“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② 遂由红二团负责烧寺，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分粮。灾民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但是，杜衡命令放火烧毁了这座始建于苻坚时期的千年古刹，对国家文物遗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是一种无视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文化遗产的“左”倾错误行为。

香山分粮后，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到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打土豪斗争，帮助当地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游击队，开辟了香山寺、九保两个地区。后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使红军活动区域扩大到薛家寨和照金地区。

1933年1月中旬，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团攻打耀县庙湾民团。庙湾为民团团总夏玉山指挥部所在地，地势险要，筑有碉堡，防守严密。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夏玉山民团与游击队建立有统战关系，民团曾给游击队帮助过武器弹药和给养，提供过情报，彼此商定互不侵犯。杜衡坚持“左”倾盲动主义，一意孤行，强令部队攻打耀县庙湾。

17日凌晨后，红二团与金天华率领的渭北游击队兵分两路向庙

---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1页。

湾行动。由于对山地距离估计不足，致使主力未能按时进入预定地域。次日上午8时，部队发起攻击，敌据险死守，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因没有重武器火炮，缺乏攻坚能力，虽多次强攻，终未攻下，且伤亡二三十人，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只好撤出，庙湾战斗失利。25日，渭北游击队政委金天华向中共陕西省委呈报了《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的报告》①。

在芋园反“围剿”战斗中，渭北游击队帮助遭敌重兵“围剿”的红二团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庙湾失利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杜衡独断专行，强令红二团进入芋园抗击进犯之敌。2月4日，国民党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夏玉山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下芋园，红二团因寡不敌众，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退路被夏玉山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紧要关头，金天华、马志舟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及时赶到，阻击夏玉山民团，红二团主力乘机突出重围，摆脱危险，安全转移。芋园战斗后，渭北游击队和红二团进入照金苏区，集中兵力，避强击弱，袭扰敌军，经过20多天的反“围剿”，使进犯之敌退出了照金地区。

1933年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外线，向东出击。渭北游击队随同红二团攻下同官金锁关后，挥师南下武字区。4月间，红二团南下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李平（刘捷三）率领第一大队配合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的红二团攻打三原心字区北原守敌。渭北游击队佯装“溃逃”，诱敌出动，红二团设伏袭击，全歼了国民党驻侯家堡骑兵团一个排。5月，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9页。

子祥、张秀山带领渭北游击队经常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配合红二团开展游击战争。

在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渭北游击队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并与红十六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渭北游击队的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3．渭北游击队——红四团在照金周边的独立战斗

1933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即刘捷三，后由黄子祥担任），政委金天华（后由张培述、刘映胜、张秀山分别担任），参谋长李天保（李天赦）。总指挥部管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 300 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 10 多支小游击队和赤卫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李平、金天华率领下辖的三个游击支队到达照金、柳林地区，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7 月上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前来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小丘驻军的一个连。战斗中，支队政治指导员赵永华等不幸牺牲。7 月 30 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后，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团长黄子祥指挥部队在三原和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乘淡村逢集之机，由参谋长李天保带领孙铭章等化装成土匪进入集市，诱惑民团上钩。淡村民团团长张德润率领民团 100 多人追入红四团伏击圈内，经过两小时战斗，淡村民团大部被击毙和俘

获，张德润被生俘处决。战斗中，一连连长马志舟、班长秦福善阵亡。

1933 年 11 月 8 日，红二十六军恢复，四十二师成立，下辖红三团、骑兵团和警卫连。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组建的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兼）。改编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内，骑兵团全歼了新堡民团，在荔园堡歼灭了甘肃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新兵营 60 余人，击毙营长梁邦栋。在阎家洼子歼灭驻军后又乘胜追击，全歼了赵家沟民团，然后挥师二将川消灭了赵富奎民团。在二将川，杨森命骑兵团以连为单位，分别在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为创建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4 年 4 月，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的率领下，再次东进、南下，打到敌占区，切断咸榆公路，牵制敌人。5 月中旬，骑兵团由黑水寺经洛河川东进甘泉、宜川，在屯石崾岘歼民团 16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后接前总命令参加攻打延长。骑兵团到达时，延长已经解放，前总将缴获的 100 余匹战马交给骑兵团，组成了骑兵第四连。6 月初，攻打宜川城不克，挥师南下，在洛川、宜君、白水三县交界处观音堂镇歼民团一部后，向澄城、合阳、韩城一带进军。先后在澄城县消灭民团 50 余人，在合阳甘井镇消灭民团 60 余人。接着奔袭韩城，筹款万余元，沿黄龙山回师洛河川下寺湾。7 月上旬，骑兵团在富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黄陵县龙坊原杨相之民团，并在富县、宜君、黄陵一带活动，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黄陵、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

路西侧，给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7 月中旬，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国民党当局苦心策划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10 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 3 个正规团和 3 个民团武装兵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新的“围剿”。10 月中旬，骑兵团在赤安游击队的配合下，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了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11 月 16 日，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奔袭并攻占了环县曲子镇，俘敌 100 余人，缴枪两三百支，战马四五十匹，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成被击毙，保安团团长李恒泰，保安团队长崇敬义、刘天云被俘。国民党陕甘当局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破产。

1935 年冬，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1 月 27 日，杨森率领骑兵团深入到外线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长武县城，歼灭了守城的敌人，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截断了西兰公路。

这一仗极大地震动了西北的国民党当局，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不得不发表“共匪刘志丹的骑兵团打开了长武县城”① 的消息。此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安定，杨森率骑兵团继续坚持外线作战，在东起黄河西岸的宜川、韩城，西到甘肃陇东的广大地区，消灭民团武装，摧毁保甲制度和反动政权，起到了牵制南线敌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的作用，为粉碎敌人对西北苏区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保卫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南北呼应，互为依托，相互策应，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促进

① 1985 年访问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等的谈话记录。

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形成。渭北苏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照金苏区、陕甘红军提供的大力支持，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人民为中坚骨干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积极配合西北红军开展的英勇斗争，既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进基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这与以三原、富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人民的参与和支持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是分不开的，其历史贡献不容否认，应予铭记。

五、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改编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基地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陷入巨大民族灾难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以三原、泾阳、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见证了国共两党再度联手、共赴国难、共御外敌的历史性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这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红军改编时大部分驻扎在渭北苏区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采取的扣留蒋介石及

其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了西安的敌对地位，极有可能引发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在此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共中央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自 1937 年 1 月起陆续进驻渭北地区。此后，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在军事上、政治上为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积极援助。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高陵等地的迅速集结，形成了内线策应友军、外线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军事态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西安事变实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中华民族进入了两党再度合作、联合抗战的新阶段。

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主力大部在渭北地区的集结，为中国工农红军出师抗战奠定了基础。以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请缨杀敌和抗日救亡的战略后方。

（二）八路军三个师大部分从渭北地区出发抗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并致电在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叶剑英，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已令各军 10 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征。8 月 6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

待命。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①]，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红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及三原东关大操场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8 月底至 9 月初，八路军各师部分别从驻地出发，顺利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工农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等地的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泾阳、三原、富平等渭北各县既是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杀敌的驻地，也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第二节　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坚持以强大的农民运动为基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渭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渭北的农民运动首先兴起于三原县武字区。

---

① 1937 年 9 月 1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1926 年 11 月，共产党员乔国桢就在三原武字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队。1927 年初，乔国桢、亢维恪等共产党员在三原成立了国民党渭北区农民运动办事处，指导三原、泾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运工作，农民运动在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地区迅猛发展起来。当时，三原县八个区中有六个区成立了农民协会，620 个村成立了村农协，会员达 5 万余人。武字区的 38 个村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万余人。

在三原武字区的影响和带动下，泾阳、富平、耀县等地也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武字区农民协会成为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依托，其撤销田赋陋规和苛捐杂税、禁止赌博、消灭土匪、审理贪官污吏、反抗土豪劣绅、打击土匪恶霸的斗争，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动摇了封建势力在渭北农村的统治基础。

党的八七会议召开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农民运动的烈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三原武字区先后成立了武字区抗敌委员会、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灾民自救军、筹赈委员会、武装赤卫队等农民武装组织，打土豪、杀恶差、分粮食、抗捐赋、赈灾荒等运动更加广泛，如火如荼，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指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和地方反动当局，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发动的渭北地区最早的有 3 万多农民参加、历时 4 天的“交农”围城斗争和农民武装围城斗争更将渭北农民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

域奠定了重要基础。黄子文、唐玉怀、金理科、习浩胜、孙平章、马志舟、郭明效、孙铭章、胡德润、肖德印等一批组织参与农民运动的当地骨干分子后来成为了渭北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的领袖或直接领导者。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农民运动发挥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接连遭敌“围剿”而受挫之时，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使渭北革命的薪火不断复燃，并迸发出燎原之势。

1926 年 9 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①

从三原武字区的革命实践中可以看出，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前最鲜明的斗争特色就是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三分”、“五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

这一斗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三原武字区的农民运动也充分说明，农民深受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政权的压迫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蕴含着雄厚的革命基础。同时也昭示我们，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必须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7 页、第 39 页。

二、 渭北革命根据地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高举的一面旗帜。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召开不久，三原武字区的党组织就建立了群众武装，坚持依靠群众武装保障和推动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党组织以武装割据为依托，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三原武字区的农民协会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黄子文意识到革命斗争必须要有革命武装力量的保障和支持，遂开始有意识地筹建群众武装。

1928 年春，黄子文和唐玉怀在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渭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武字区农民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随即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淡村一带，带领群众抗粮抗捐、打土豪，先后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区长和武字前区、武字后区的民团团总。在 5 月举行的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中，黄子文带领的武字区农民武装起了骨干作用。1930 年渭北灾民自救军成立后，武字区的农民武装成为其主要力量。灾民自救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财产，在渭北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1 年至 1933 年，为了保证群众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渭北苏区相继组建了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

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等革命武装，并在武字区各村也建立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这些革命武装直接参与开展了掩护群众收割地主豪绅的庄稼，保护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开展分粮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1932 年 10 月上旬，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的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发动游击战，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开展分粮斗争，游击队仅在高山槐就带领数百名群众 3 天分了地主豪绅的 300 多石粮。因为有了游击队的掩护，国民党当局不敢到三原、耀县一些地区征粮派款，地主豪绅不敢去讨债。1932 年 10 月中下旬，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的渭北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带领群众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38 个村堡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实行土地分配，其中上河村、口外庄分地 320 多亩，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33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中写道：“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武字区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搞农运、兴武装、打土豪、建政权的基础上，以武装割据为依托，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有机结合，使群众

斗争和土地革命有了武装力量的可靠保障，也使武装斗争有了民众基础这一不可缺少的力量之源。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虽然出现了“左”倾错误，后来又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规模“围剿”而受挫，但它是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需求、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利益的有力尝试，使贫苦农民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支持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也为后来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 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把中共组织建设与政权建设同步推进

政权是根据地存在的主要标志。根据地与其政权是相互依存、两位一体的关系。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在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党组织的基础上与党的建设同步推进的，其经历了一个更迭过渡和发展演进的过程。

大革命时期，三原武字区在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组织的同时开创了“农会代政”的新局面。早在 1925 年 12 月初，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就在三原县建立了咸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三原特别支部。1926 年 11 月，共产党员乔国桢、唐玉怀又在三原武字区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大寨支部。之后，相继在双槐村、三胜村、曹师凹村建立了党的小组。到 1927 年夏，武字区的官路西、油坊沟、樊王沟、桃园子、柿树坡等村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蒙家、鲍四庙、南原、西王、宋家河、上河等村堡还建立了党

的支部。随着中共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武字区以农民协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农民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

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成为渭北早期农民运动中团结广大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新型政治组织，它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国民党把持的政权机关形成极大的对抗性，中共组织通过农民协会代替旧政“管理一切农村行政事务，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权”，在三原初步形成了数千年从未出现的“一切权力归农协”、“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虽然受到三原驻军田玉洁部的严重破坏，农会代政也被迫停止了，但它是党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政权的最初形式，对后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教训和经验。

为了加强对渭北革命斗争的组织领导，加快建设渭北新苏区，从1927年7月到193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渭北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相继成立（或调整改组）了中共三原县委、武字区委、渭北特委、三原中心县委等党组织。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随着根据地党组织的不断健全和加强，根据地的政权组织也得到同步建设。1929年到1931年，面对空前的大饥荒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众，三原武字区的地方党组织就走出了一条以筹粮筹赈为旗帜、以解决灾民生存问题为目的的新路子，公开成立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不费一枪一弹替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基层政权。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在中共武字区委、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各村设村会）、武字区农民联合会、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苏维埃政府、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相继交替成立。当时，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均代行革命政权职能。

1932 年 9 月 22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全面形成，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入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党在渭北革命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武字区团委及雇农总工会，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太和堡等近 10 个村的妇女联合会。这些群团组织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为西北第一块苏维埃区域的创建提供了政治保证，其政权组织的及时跟进和建设，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者的同步协调推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 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民众运动与统战工作的协调开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最明显的斗争特色就是坚持以民众运动为基础，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这一斗争特色，是渭北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渭北地区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坚持民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同时，以习仲勋、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还注重采用各种方式和策略，灵活机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发动当地广大贫困农民参加革命。渭北地区的群众长期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很早就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接受了革命

的思想。大革命时期，乔国帧、唐玉怀、黄子文等在三原武字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交农”围城斗争，启发教育了群众，使广大贫困农民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的革命愿望，并寄希望于共产党。武字区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自主进行武装反抗斗争，使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赢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渭北根据地各个时期成立的革命武装，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其中一部分当地群众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领导人。

加强对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在1926年西安反北洋军阀的围城斗争中，共产党组织和陕军杨虎城部建立了友好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三原县委遵照省委关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的指示，在杨虎城部留守三原的炮兵营和补充团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28年5月3日举行的三原武装围城斗争中，中共三原县委联系杨虎城部驻三原炮兵营第四军支参与配合行动，时任副营长、军支书记张汉民为游击队提供了10余支枪，并派军事干部参与了围城指挥。

联络地方民团武装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5月初，黄子文利用统战关系，联络富平县胡景铨[①]的地方武装和泾阳县马仙舟的地方武装，配合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举行武装围城。党谢芳率领胡景铨部四个连的兵力参与了这次武装围攻三原县城的斗争。后因马仙舟突

① 胡景铨(1897～1979)，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人。早年随胡景翼从军，17岁加入同盟会。杨虎城主持陕政时，曾任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

然叛变，武装围城遂失败。1930 年 6 月中旬成立渭北灾民自救军时，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利用他与当时在高陵县保卫团任职的王学道曾是三原县中学的同学关系，即与共产党员李秉荣、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等分别联系动员高陵县王学道部、三原陂西镇王德修部及富平县共产党员田裕国领导的独立大队，汇聚于三原武字区长坳堡，联合武字区的农民武装，组建了 200 余人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渭北灾民自救军成立后，开仓济贫，捣毁乡公所，镇压敌区长，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

开展兵运工作壮大革命力量。1930 年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习仲勋受三原武字区党组织委派，与武字区的郭明效一起，利用关系，前往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两年间，习仲勋与打入该部队的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左文辉等共产党员，通过各种人际关系广泛联络士兵，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设法结识和争取部队所在地进步人士的帮助和参与，并在士兵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促进了兵运工作的有序开展，于 1932 年 4 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兵变之后，习仲勋总结经验教训，又积极投身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习仲勋任富平西区团委书记、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王泰吉骑兵团驻防三原期间，习仲勋在王泰吉部队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国民党军队官兵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注重转化土匪武装参加革命。土匪武装成员大多为贫苦农民，因不满封建地主、反动政府的压迫揭竿而起，劫富济贫。在兵运工作

中，武字区党组织多次派干部深入非法武装队伍中启发其阶级觉悟，教育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正如习仲勋所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

参与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1933 年春，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王泰吉任团长。驻防三原期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团三原县委书记习仲勋等多次与王泰吉及其侄子、共产党员王英[①]秘密来往，商议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赵伯平和习仲勋动员王泰吉、王英：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的办法多领枪支弹药，支援渭北游击队；调查部队装备和机密军情，向党组织汇报。在三原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抗日情绪高涨。移驻耀县后，王泰吉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表达起义决心，并将一支驳壳枪送给周芝轩做纪念。赵伯平将王泰吉的起义计划和决心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省委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并带领周芝轩、刘映胜等到耀县，同中共耀县县委一起，帮助和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7 月 21 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成功，收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地方民团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全县。8 月上旬，王泰吉率骑兵团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照金苏区根据地，11 月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成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一支骨干力量。

---

① 王英：即王振民，中共地下党员，时任骑兵团一连四排代理排长。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中，统一战线工作减少了敌对势力，扩大了统一战线阵营，为革命积蓄了力量，提供了有利条件。渭北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为了促进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尽可能地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

五、 许多毁家纾难的满门忠烈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榜样作用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创建的。在渭北革命根据地血雨腥风的艰苦斗争中，三原武字区、心字区涌现出许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革命家族，他们无私无畏、舍生取义、满门忠烈，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一）毁家纾难的“黄氏家族”

从大革命时期肇始，三原县武字区甘涝池村的“黄氏家族”——黄子祥、黄子文、黄侠仙、李盛云、黄培兰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可谓满门忠烈，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子文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9 年 5 月，黄子文出生于三原县陵前乡甘涝池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黄子文的父亲黄铭为同盟会会员，早年组织农民自强会，宣传革命。陕西辛亥光复中，黄铭随井勿幕转战东西路，1915 年参加讨袁逐陆（建



黄子文

章）之役，后任陕西第四混成团少校副官。1917 年随曹世英起兵耀县，任靖国军第三路独立营营长，驻防高陵，与陈树藩军相持数年。当时部队子弹缺乏，黄铭令其部属收集废铜铁制造炸弹，守河防御。黄铭长期战旅积劳成疾，1921 年卒于军中，年 50 岁。黄子文自小便受到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 年，黄子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3 月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4 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 7 月，汪蒋合流，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辗转返陕，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回到家乡三原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1927 年冬，黄子文发动组织农运，翌年领导农民起义，创建农民武装，开展武装围城斗争，并先后处决了武字区民团团总王厚安及恶差、豪绅 10 多人。为了筹集经费，购置武器，他卖了家里的土地，还自定“苦肉计”，让地下党员假扮“土匪”拷打自己，逼母亲拿钱施“救”。1929 年春，关中持续大旱，军阀土匪抢掠骚扰，渭北一带满目疮痍，广大贫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黄子文带头捐粮 7 石，与孙平章等在武字区成立了地方筹赈委员会，开展筹赈运动，领导灾民斗争。1930 年 2 月，国民党三原驻军魏凤楼部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与其兄黄子祥逮捕入狱。他身受酷刑，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和群众营救获释。此后，黄子文和陈云樵在武字区成立了 200 多人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财产救济灾民。为了革命，他多次被敌人抄家，10 多间瓦房被敌人烧毁。由于渭北斗争形势恶化，他被组织派往天津中共北方局工作。

1931 年 1 月，受中共北方局派遣，黄子文到山西从事兵运工作，后任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在晋西一带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4 年，黄子文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陕甘游击队第一步兵大队政委、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陕甘边第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 年 9 月，黄子文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捕关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出狱。1936 年春到 1937 年秋，黄子文先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1938 年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并任农民连连长。后来受到政治迫害，被迫离开陕甘宁边区，并失去中共组织关系。解放战争时期，黄子文在渭北一带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组建武工队，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 年 6 月 24 日，黄子文带领部队在三原县陵前乡小道口与敌遭遇，激战中不幸头部中弹，25 日在耀县烟当村牺牲，时年 39 岁。翌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追认黄子文党籍。半个世纪后，习仲勋同志曾这样评价黄子文：“从参加革命搞枪杆子开始，到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黄子文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1997 年 6 月，习仲勋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黄子文之兄黄子祥是渭北、陕甘边红军创始人之一。1918 年，

靖国军公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讨陈护法。为培养军事人才，黄子祥被推举前往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军事。结业回陕后，参加了杨虎城部队，后随杨虎城将军到西安守城。其间，黄子祥目睹了百姓横尸遍野的惨景，毅然弃职，返乡务农。1927 年杨虎城将军率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令赵寿山率领的补充团留守陕西三原。黄子祥应赵寿山将军的邀请出任补充团副团长。同年秋，黄子祥因痛恨军阀不顾百姓的死活，互争地盘，割据一方，连续发动战争的残酷现实，决然辞去副团长的职务，回家乡陵前组织农民武装斗争，投身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1930 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难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 年 3 月至 1933 年 7 月，黄子祥相继任武字区农民联合会主任、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武字区革委会主席、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其间，他带领渭北游击队在照金高山槐、老爷岭一带打游击，配合红二团打击国民党保安团。在敌人悬赏通缉，家财被烧，亲人牺牲的处境下，黄子祥毫不动摇，愈挫愈坚，顽强地在艰苦环境下开展游击斗争，帮助富平、耀县、三原等地建立起五支游击队，率红四团全歼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奋力反击国民党重兵对渭北根据地的“围剿”，后被迫撤离渭北根据地，北上照金苏区。1933 年 8 月中旬，黄子祥等带领部队先后歼灭了盘踞在照金苏区周围的庙湾、柳林、牛村的民团。9 月中旬，黄子祥率领红四团与临时指挥部各部队及强世清率领的红军陕北一支队攻克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10 月攻打甘肃合水县城、毛家沟门、三十里铺等战斗均取得胜利。11 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1935 年后，黄子祥历任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部长、三原中心

县委副书记，长期在渭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7 年 3 月至 5 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延安，黄子祥挺身而出，与黄子文、孙志正、郭立三等在胡宗南血腥统治的武字区组织敌乡政人员起义，打开了一条血路，冲进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与关中革命武装会合，有力地配合了关中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 7 月后，黄子祥先后任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副总队长、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三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陕西省第一届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20 世纪 60 年代，黄子祥曾被错误地划为“右派”，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1979 年 3 月，黄子祥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其党籍和公职。

黄侠仙系黄子祥的妹妹，黄子文的姐姐，1907 年出生。1927 年 1 月 12 日，她与进步青年郝义在武字区鲍四庙戏台上举行了新式婚礼，带头向封建习俗挑战，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此后在三原、泾阳、同官等地倡导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开展妇女放足等活动。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前后，在西安女子义务学校担任美术教师。1930 年前后，黄侠仙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赴北平美院进修。毕业后，党组织派她去保定中学教美术课。其间，她与党组织联系紧密，活动频繁，被国民党以“政治嫌疑犯”之名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在石家庄一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被日军杀害，壮烈牺牲。

黄子文之妻李盛云，1910 年出生于富平县淡村镇古西村一户书

香之家。1929 年 8 月后跟随黄子文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1930 年 10 月，省委派黄子文、李盛云夫妇去设于天津市法租界内的中共北方局开展革命工作。是年末，黄子文调往山西搞兵运，李盛云仍留天津。其间，李盛云加入了团组织。1931 年 3 月至 8 月，李盛云遭敌逮捕，她坚贞不屈，先后被关押于天津、北平监狱，在狱中她生下了大儿子，后经保释出狱，1932 年正月返回武字区。1933 年夏，红二团南下失败，国民党军封锁了渭河所有渡口，妄图消灭红二团。李盛云与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假扮夫妻，提着祭品篮暗藏 4 支短枪，以给住在渭河北的娘家母亲做周年祭奠为借口，掩护王世泰有惊无险地过了渭河渡口，辗转回到照金苏区。1935 年，李盛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遵照党组织安排，相继在庆阳抗敌后援会、三原武字区做妇女工作，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黄子祥的大女儿黄培兰，1932 年加入共青团。受黄子祥、黄子文的影响，1935 年春，黄培兰与其同在西安上学的同学李金芳（李盛云的侄女）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与创办列宁小学并任教员。李金芳亦被分配在洛河川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陕北进行错误“肃反”，200 多名党政干部被错误杀害，年仅 17 岁的黄培兰、李金芳也不幸蒙难。

黄氏兄妹出身富户，但他们彻底背叛了原来的家庭，纷纷投身革命，在血雨腥风的艰苦环境下出生入死、坚贞不屈、衷心为党，全家为革命牺牲了数人。他们反抗压迫和剥削、摆脱反动统治、追求光明真理的豪迈情怀和英雄气概，大大地激发了渭北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义无反顾、毁家纾难、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二）舍生取义的孙家兄弟

三原县武字区的孙平章、孙太章、孙铭章、孙海章等兄弟及其妹夫马先民是渭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中坚和骨干作用。

孙平章是领导渭北农民运动的先驱者。1898 年出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04 年，孙平章随父母从湖北均县逃荒到三原陵前焦村定居。1926 年冬，孙平章担任武字区农民协会四分会主席兼义和村农民协会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田、抗捐抗税抗派款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联络耀县、富平、高陵、临潼等地党的地下工作，并把自己的家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党的许多重要干部都曾先后在他家住宿、开会。1928 年 2 月至 1930 年 10 月，孙平章相继担任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副队长、中共武字区委书记兼鲍四庙村党支部书记、中共三原特支组织委员、特支书记，与黄子文一起发动农民开展“交农”斗争，开展筹赈运动，赈济了大批灾民。1931 年 4 月，孙平章与侯守愚、唐玉怀、王曲贤等，组织群众在心字区、武字区及耀县西原、富平西部开展打土豪、抗粮款斗争，带领群众先后分了 20 多家地主豪绅的粮食，镇压了对抗分粮的四分区区长崔福成。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建立后，孙平章任区委委员，参与组建革命武装。1932 年 5 月，孙平章被推选为渭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肃反部部长；9 月，任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1933 年 6 月 29 日，孙平章不幸被富平张德润民团逮捕。敌人对孙平章行刑逼供、残酷拷打，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遂被张德润民团杀害于长坳西城门口，时年 35 岁。

孙太章，1912 年出生，中共党员。先后参加渭北灾民自救军、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等革命组织，在耀县西部、富平县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县的心字、武字两区带领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斗争。1932 年 5 月 31 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率部围攻武字区，共产党员孙太章和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及革命群众张树宏被捕。同年冬，侯守愚、王曲贤、孙太章、张树宏与 4 月 12 日被捕的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敌人解往西安，12 月 23 日夜在西安新城东北角被敌杀害，推入枯井。后张树宏带伤从枯井中攀出，死里逃生，返回武字区。

孙铭章是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骨干之一。1931 年 5 月，孙铭章任中共武字区委委员、武字区武装赤卫队队长，在区委的领导下，组建革命武装，带领赤卫队在武字区和富平边界、耀县西原等地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及顽匪。1932 年，孙铭章相继担任武字区游击队队长、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他与黄子文、唐玉怀等在武字区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三原国民党当局受到极大震动。在黄子文为陕甘游击队扩充游击队员期间，孙铭章按照区委的安排，积极发动群众，动员了一批党员青年北上陕甘边地区，参加了陕甘游击队。为了增强武装实力，他与韩文禊千方百计筹款，并委托黄子祥、孙平章、孙海章在富平庄里、美原镇购回驳壳枪 3 支，手枪 1 支，步枪 1 支。孙铭章带领武字区游击队在根据地周边一带打游击，消灭地主和民团武装，打击和削弱了反动统治势力，鼓舞了渭北人民的斗志，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

孙海章也是创建渭北根据地的骨干成员。1927 年 7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 年，孙海章和习仲勋同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学校读书，同受教于共青团员严木三等进步教师，孙海章还担任学校党支部交通员，联系富平县党组织和党的活动。1929 年因春荒生活极度困难，孙海章休学回到家乡武字区，任双胜村党小组组长。在开展农运和筹赈运动期间，习仲勋常住在孙海章家，两人一起商量、探讨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武字区建立“反日会”，孙海章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冬，武字区党组织成立教育促进委员会，发动学校师生开展斗争，孙海章、马先民、胡德润、王曲贤等被安排在各村小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2 年，敌人加紧了对武字区的“围剿”。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孙海章打扮成账房先生，崔树林打扮成推车子的雇工，到富平庄里、美原镇一带购买枪支，冒险通过了敌人的哨卡，将枪支运回了武字区。1932 年 6 月初，孙海章任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中旬，黄子文、谢宝涵回武字区为陕甘游击队扩招游击队员，孙海章在武字区立即组织开展“扩红”运动，三天动员了近百名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 月初，孙海章组织武字区游击队联合泾阳苗家祥游击队攻打马额镇王茂臣民团，震慑了反动当局。不久，在渭北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以“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错误为由，撤销了孙海章的区委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党籍。但孙海章仍一如既往地坚持为革命工作。直到 1987 年 3 月在习仲勋同志的关心下，孙海章的党籍终于得到恢复。1997 年 12 月，孙海章去世，习仲勋送来花圈和挽联：“江山存肝胆，凋落一布衣。”

孙平章的妹夫马先民，又名德禄，1907 年出生，三原陵前人。

1926 年冬，在共产党员乔国桢的领导下，马先民和黄子文、唐玉怀、肖德印等一起组建了武字区农民协会。1927 年春，马先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4 月，参加三原“交农”围城斗争。1931 年 5 月，任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反日、反苛捐杂税、抢收土豪庄稼的斗争，取得胜利。1932 年 4 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马先民等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联合会，在武字区、心字区、肃字区及富平、耀县等地的 21 个村堡开展了大规模的分粮斗争。1932 年 4 月 12 日，马先民被捕，23 日在西安新城被国民党杀害，时年 25 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海章的胞弟孙志正（孙忙章）亦踊跃投身革命。1933 年 8 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退出渭北转战陕甘边一带。此后，渭北地区的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遭到反动民团武装的残酷镇压，党组织及武装力量转入地下活动。1942 年，孙志正受省委指派回三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1946 年春，黄子文、孙志正打入敌内部，掌控了陵前地区的政权和武装。5 月，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黄子文、孙志正决定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1947 年 3 月至 5 月，胡宗南部 23 万人大举进攻延安。在此危急关头，5 月 5 日至 6 日，孙志正与黄子文、黄子祥、郭立三等举行武字区陵前武装起义，取得胜利。5 月 9 日，起义部队到达淳耀县姚家河，被编为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发来贺电，对武字区起义表示祝贺和嘉奖。此后，黄子祥、黄子文、慕天祥、孙志正等率领这支部队，在三原、淳化、耀县、同官、彬县一带与胡宗南匪军进行了长期的战斗，为解放关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渭北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三原武字区的孙家兄弟胸怀大义，挺身而出，牵手投身革命，他们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

（三）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金理科和同凤云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金理科与同凤云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携手并肩走上了渭北革命的征途。

金理科，又名李科，化名金礼奎、李奎（李逵），1904 年出生于三原县陵前乡金尧村，1927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金理科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1928 年 2 月 9 日，武字区共产党员唐玉怀以农民协会为基础，在三原武字区鲍四庙成立了“抗敌委员会”，金理科负责一分会工作。同年 7 月，金理科任中共武字区南原党支部书记，参与并领导了创建和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1 年参加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及其周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翌年二三月间，金理科与马志舟组织成立口外庄赤卫队，发动口外庄 20 多岁的青年都参加了赤卫队，9 月又在赤卫队中组织成立了政治保卫队，金理科任副队长。赤卫队和政治保卫队均属游击队领导，主要是保护群众打土豪，进行分粮、分地斗争，巡逻放哨，负责村庄安全，配合渭北游击队消灭反动武装，保卫武字区的南大门。1932 年上半年，金理科与马志舟还组织成立了陵前乡太和堡妇女联合会。妇联会由同凤云负责，发动妇女和游击队一起参加分粮斗争，并为游击队做鞋、做袜、补衣、缝衣、送水、做饭、送信、放哨等。

1932 年 7 月，中共三原县委恢复，金理科任县委书记。9 月，

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金理科任土地委员。11 月上旬，渭北根据地按照 10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议》“左”倾错误要求，连续三天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十月革命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六县民团的残酷“围剿”搜捕和镇压，武字区先后六次被洗劫。渭北特委和革委会领导人被迫分散，根据地工作陷入瘫痪。12 月，中共陕西省委接连两次改组渭北特委，第二次改组时金理科临危受命，以省委委员身份兼任渭北特委书记。不久，渭北特委撤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12 月底，金理科受中心县委委派，与金天华、程建文、黄子文等整顿并改编了渭北游击队。此后，游击队由黄子文、金理科带往耀县照金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行动。在三原期间，金理科为恢复渭北苏区做了不懈努力，他带领赤卫队与敌作战，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加强了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为恢复和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民众领袖。

1933 年 3 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到照金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在照金苏区，金理科先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作委员会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1935 年 9 月，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金理科被关押一月之久，后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原地区，年仅 31 岁。

同凤云，1912 年出生，陕西高陵人，与金理科结婚后迁至三原县陵前乡前柴窑村金尧。她与李盛云（黄子文之妻）是结拜姐妹。同凤云与金理科结婚后，全力支持丈夫投身革命运动。1933 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到照金，组织、筹建中共陕甘边特委。3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迁驻薛家寨。同凤云从武字区奔赴照金，

成为一名女游击队员，在照金薛家寨医院和红军被服厂从事照料伤病员、站岗执勤、为部队缝制衣服等工作。

1933 年 9 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兵分数路，向照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进攻薛家寨。在此危急关头，同凤云与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拿起武器，奋勇抗击，为取得薛家寨保卫战胜利做出了贡献。10 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派重兵携大炮等重武器再次向薛家寨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薛家寨失守。同凤云在突围时受伤，后返回三原武字区。1977 年因病逝世。

金理科、同凤云夫妻并肩奋战、烽火一生，她们的革命精神风范深受渭北人民敬仰，并将永载史册。

（四）武字区的“革命教育世家”

清末，郭文魁一家从湖北挑着破箩筐，长途逃荒乞讨，来到了三原县，落户在陵前镇口外东坡村。此后，郭文魁当了一名乡村教书先生。在郭文魁老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他的三个儿子郭培生、郭立三、郭明效以及孙辈先后走出了 10 多位乡村教师，被誉为“革命教育世家”。

郭培生是郭文魁的大儿子，1890 年出生。他一生从教，曾在习仲勋的家乡富平县都村小学执教 22 年之久，是 1922 年习仲勋在都村小学上学时的启蒙老师，执教了习仲勋 4 年。中共早期党员宋文梅、程建文（1933 年 4 月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脱离革命阵营）、周冬至等都曾受教于郭培生。他思想开明、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对习仲勋、宋文梅等一大批早期中共党员的理想信念及其革命生涯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郭培生积极支持党的革命活动和武字区的革命斗争，他的家曾是渭北根据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1930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和武字区党组织利用郭家与王德修是亲戚的关系，委派习仲勋和郭培生的六弟郭明效去王德修部队开展兵运工作。郭培生默许了这个既涉及革命利益也涉及亲属安危的行动，并叮嘱六弟郭明效向王德修极力推荐习仲勋。1932 年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重返三原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经常住在郭培生家。为了保护习仲勋等革命骨干的藏身安全，郭家专门对家里的窑洞进行了改造，在原有的两孔窑之间挖了一孔偏窑，又在偏窑中挖了一孔暗窑，暗窑中放有桌凳等，并建了土炕，供习仲勋等人开会、食宿用。当时，共产党员黄子祥、黄子文、汪锋、赵伯平、习仲勋等都在郭家住过。此后几十年间，习仲勋始终对郭培生老师怀有深切的敬仰之情。1951 年冬，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将郭培生老师及其老伴接到西安居住了 5 天。回家时，习仲勋送给郭培生老师一件宁夏产的皮袄、一件军衣、一块怀表和一些生活费，希望这个一辈子为革命担惊受累的乡村教师能够安享晚年。

郭培生的三弟郭立三，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 年春，习仲勋赴长武王德修部开展兵运时，郭立三与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已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郭立三时任王德修的副官。

1931 年，郭立三离开王德修营部后返回武字区，以乡村教师、小学校长身份作掩护，在武字区开展革命活动。其间，他与黄子祥、唐玉怀、王曲贤等组成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掩护党的工作。


习仲勋送给郭培生老师的皮袄

1937 年 9 月，党组织指派郭立三组建陵前乡西岳庙高级小学并任校长、校抗敌委员会副主任。1938 年 8 月，郭立三与黄子文、李屹阳在长坳堡兴办女子义务学校，普及教育，培养妇女干部。1946 年春到 1947 年 3 月，郭立三与黄子文、孙志正等打入武字区陵前乡控制了地方政权和武装。时胡宗南军侵犯延安。5 月初，郭立三与黄子文、黄子祥、孙志正等组织发动了陵前起义，组织游击队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9 年 5 月，郭立三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兼任主管卫生、文化、教育工作的三科（时称县府三科）科长。此前两个月，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部向陕甘一带进行穿插突击，试图扭转败局。此间，郭立三不幸被抓，马鸿魁部将他拴在马尾巴上拖了三里地，后被营救。担任三科科长后，郭立三为三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了许多开拓性举措，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郭培生的六弟郭明效，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底，郭明效和唐玉怀将正在富平庄里开展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乔国桢邀请到了三原武字区，与乔国桢、唐玉怀一起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从村到区普遍地建立起农民协会，并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中共支部——大寨支部，为渭北乃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埋下了火种。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武字区委的领导下，郭明效踊跃参加“三分”、“五抗”和打土豪、分粮食、分浮财的斗争，他的家多次遭到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的洗劫。1930 年春，郭明效与习仲勋一起远走长武开展兵运。后来，他又回到三原武字区当

了一名小学教师，此后多年担任小学校长，一心从事乡村教育，直到1958年退休。

孙一君是郭培生的女婿，又名孙烈，三原县西阳镇孙家坡人。新中国成立前，孙一君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1925年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孙一君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30日，在吴化之的指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孙一君任候补委员。1927年，他以教书作掩护，在三原、临潼、淳化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受党组织派遣，孙一君以国民党三原县指导委员会人员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在三原县教育局以督学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遭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孙一君与共产党员周芝轩、谈国帆等一起组建中共渭北工委，任工委委员。194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孙一君为三原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他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并筹备接管国民党政权。三原解放后，孙一君在建设新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三原县陵前镇口外东坡村的郭氏家族，祖孙几代从事革命教育工作，他们为渭北革命的发源、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

（五）侠肝义胆的安子英和宋士斌

安子英（安大元）与其妻弟宋士斌同庚，均出生于1908年，皆为三原县心字区张家坳人。安子英1927年参加革命，宋士斌1931年参加革命，两人在心字区并肩战斗，开展革命活动。

1931 年，心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宋士斌任主席，安子英任常务委员，同时成立了赤卫队。二人以“黄蛇尾”、马刀、锄、镢、矛为武器，带领赤卫队员，先后在安社村、马莲滩、里寨新城、西段村、郝家村、宋家村、丰王崔家坡、泾阳县红沟等地将 10 多户地主的粮、钱分给贫苦农民。后赤卫队改为心字区游击队，继而又被编为渭北游击队补充第二支队，安子英任队长。在心字区革命斗争中，宋士斌、安子英得知堂兄安大荣父子给敌人通风报信，密告游击队情况后，即大义灭亲，带领游击队处决了安大荣父子三人。同年，在小道口战斗中，安子英诱敌深入，红二十六军骑兵出击，消灭敌人一个骑兵排，缴获长枪 48 支，短枪 1 支。在淳化十里原战斗中，安子英率众攻入城堡内与敌搏斗，子弹打完了用大刀长矛战斗，杀死敌人多名，战斗持续七八个小时，歼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

1933 年，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围剿”武字区和心字区。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派遣宋士斌赴泾阳石桥、安子英到武功县做地下工作。不久，因奸细告密，宋士斌、安子英被武功县民团秘密逮捕，后押送三原县民团。1935 年 6 月，两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 27 岁。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众多的革命家庭和满门忠烈，凝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正是有了这股力量，有了他们坚守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榜样和带动作用，才有了人民群众自觉主动的参与和支持，渭北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才有了生存、发展的前哨和依托。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启示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陕西地区复兴革命运动而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时，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党在西北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首次尝试，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同时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一、 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

1945 年 7 月 11 日，习仲勋在中共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总结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习仲勋的这一论断，揭示了渭北根据地在区域位置上对开展革命斗争的不利影响。

渭北根据地距离国民党陕西统治中心太近，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仇视和反复“围剿”

武装割据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渭北根据地处在关中平原腹地，根据地的中心三原武字区距当时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三原县城仅 10 多公里，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也仅 50 多公里，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当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似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咽喉，国民党陕西当局颇感威胁，不可能坐视渭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加之根据地所在的三原、泾阳、

高陵号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必然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地理条件上不利于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的区域中保存、发展和壮大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军事根据地要建立在“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地方”①。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提出，应选择有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地形险要的农村，特别是两省或三省交界，既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又有足够给养和经济实力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确定和创立，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那时，毛泽东亲自带队做巡回式的选择，经过反复比较才定下决心。正如他指出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为罗霄山脉中段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继井冈山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在选定赣南、闽西根据地时，也都从地理因素上进行了系统运筹，充分考虑了该区的地理条件，从而使这些根据地的开辟建立在了可靠的客观基础上。对照毛泽东关于选择武装割据地域的基本思想，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地势环境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其所在区域既无高山大川，也无天然险阻，难以抵御反动武装的“进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二版，第 53 页。

和袭击，不利于革命力量和根据地的保存、发展和壮大。因而，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最终导致了根据地的战略北移。

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指出，“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作“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这是习仲勋从开辟渭北根据地到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经验。

二、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必须依赖于强大的红军力量

坚持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支撑根据地建设，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反动势力要通过武装斗争去打倒，革命根据地要通过武装斗争去开辟和保卫，广大群众要靠武装力量去发动和组织，土地革命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和发展。渭北根据地的创建虽然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但由于革命武装力量弱小，缺乏强有力的正规红军部队的支撑，在优势之敌的反复残酷“进剿”下，难以有效抵御和抗击，最终导致根据地陷落，红四团转移照金苏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共陕西省委确定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只看到了关中一带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没有看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没有考虑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对于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其教条性是很明显的。

1928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①，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②

同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③ 渭北革命根据地遭敌重兵“围剿”而战略北移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论断。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但力量单薄弱小，武器装备低劣。1928 年 2 月黄子文早期成立的武字区农民游击队仅有队员 30 多人。1930 年 6 月成立的渭北灾民自救军，包括临时参与的陂西镇王德修部 30 余人、21 支枪，高陵王学道部 100 余人、数十支枪，总共也不过 200 多人、百余支枪。

---

① 挨户团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农村武装组织。“挨户”形容几乎每户都要参加。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利用，变成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也叫挨户团常备队。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5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63 页。

1931 年 5 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时只有 30 多人。1932 年 5 月，武字区游击大队有队员 40 余名，长短枪 34 支；8 月 1 日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时也只有 60 余人，30 多支枪。根据地赤卫队、儿童团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黄蛇尾，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1932 年 12 月被敌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仅有 40 多人，不到 30 支枪。武字区遭六县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驻军“围剿”后，时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习仲勋曾向黄罗斌讲道：“渭北苏区以武字区为中心，东邻富平，西连淳化，北接耀县，南临三原，东西长不过 40 里，南北宽不过 20 里，地方太小；游击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周围民团经常进行骚扰，既没地方躲藏又没回旋余地；地方小了，群众就少，兵源也就缺乏。所以，苏区一定要发展，要扩大。苏区发展壮大了，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充足的兵源，反击敌人才有力量，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壮大。”①

1933 年 7 月下旬，渭北根据地虽然成立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但部队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其小生产者的弱点明显，且红四团只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仅 120 余人枪，缺乏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情况下，只能避敌锋芒，离开根据地而向照金苏区转移。

强有力的正规红军是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的利剑，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是不能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根据地的反复“进剿”的。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如毛泽东所说，当年“被逼上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在山上？

① 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

就是有这枪杆子。它打出游击队，从小到大，打出红军，打出政权，没有枪杆子的地方，那里有没有政权？有没有工会、农会？”因此，党领导下的武装割据，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强大革命武装力量即正规红军的支撑和保障。

三、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必须不断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正是党内“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泛滥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4 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1930 年 6 月至 9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尤其是 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使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执行了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方针。

第一，杜衡脱离实际，急躁冒进，过高地估计了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左”倾错误影响，没有正确估量革命力量，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1932 年 2 月至 4 月，针对渭北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以杜衡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或报告，做出了夺取三原，以此为中心建立渭北临时苏维埃政权，进而建立一大片苏维埃区域的冒险计划，并且要求采取冒进式

地向前发展。这一决策的形成，正是源于杜衡只考虑了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群众基础好、革命形势高涨等有利因素，没有考虑当时敌强我弱、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太靠前等不利因素，对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根据地的艰巨性缺乏正确的认识，过高地估计了渭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因而改变了省委在陕甘边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制定了向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发展，同渭北连成一片的计划。同时，中共陕西省委对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的整个陕西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革命有可能很快在陕西取得胜利，因而同意了杜衡的建立渭北新苏区的计划。杜衡的“左”倾错误是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冒险行动。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武装和反动民团的轮番“围剿”，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没有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保存积聚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没有从稳固发展根据地与准备长期革命斗争出发，而犯了主观盲动主义的错误，总想迅速在强敌统治的中心区域建成大片根据地，因而实施了一系列冒险行动，造成了渭北根据地的严重受挫和失利。

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多年以后，他带着深刻的教训回忆说：“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

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习仲勋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写道：“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1984 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在给三原县委党史工作者谈了自己对渭北根据地执行“左”倾路线的看法：“我认为主要教训有两点，一是太显示自己的力量，如去西阳镇游行，在武字区打王茂臣民团，明知不成却有意显示自己的实力，刺激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引起了敌人的大‘围剿’，损失很大；二是我们镇压的人太多，那时杀人很随便，杀了一些不该杀的所谓‘反革命’。渭北群众是很好的，根据地也很有群众基础，但当时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左”倾错误路线是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最终失守的罪魁祸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影响。

第三，“左”倾错误执行者思想激进，独断专行，给渭北根据地的当地干部和根据地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干扰和危害。

1931 年 5 月后，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李杰夫、杜衡等大批干部赴渭北根据地开展工作。由于受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他们在指导工作中也执行了“左”的思想。

1932 年 6 月初，时任省委常委的李杰夫来三原巡视工作，在武字区直接指定孙海章为中共武字区委书记，两个月后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为由，将其撤职，孙海章险些被李杰夫枪毙（后被错误开除党籍）。

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一文中写道：“那时，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来到渭北搞‘左’的一套，他们不从当时实际和斗争需要出发，极力主张分配土地，建立公开政权，黄子文不同意分配土地，争论很大，他们指责黄子文‘右’倾。现在看起来，黄子文当时的意见是对的。”

1932 年 11 月上旬，国民党军大规模进犯武字区，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等严令渭北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黄子文从失败的教训中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认识。1932 年 11 月下旬，渭北特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革命形势问题时，黄子文与省委委员杜衡提出的“马上组织全陕武装起义”的意见发生分歧，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错误地停止了黄子文的一切工作。“左”倾路线执行者听不进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意见，高谈阔论，给地方干部乱扣帽子，说不服就压服，压不服就撤职，凭领导地位压人，独断专行，谁反对就说谁是反革命。他们没有将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同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既要领导群众与反动势力、地主豪绅斗争，还要顶着压力与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作斗争，对根据地的干部和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严重伤害。

“左”倾错误对渭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和影响，足以反映了它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损失。造成“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在早期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革命斗争脱离了客观实际，超越了现实，激进盲动，逞一时之勇，不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其危害和教训极为深刻。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缺乏对敌斗争经验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右”，坚决排除“左”，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革命和建设。

四、 革命根据地内部必须建立起一个团结稳固的领导集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领导集体在不断地建立完善和更迭调整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1928 年 1 月至 1931 年 4 月），三原武字区建立了抗敌委员会、农民游击队、武字区筹赈委员会、渭北灾民自救军等农民武装，并成立了中共武字区委、中共三原特支，形成了以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等当地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领导集体，“交农”围城、农民起义、筹赈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起义、打击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的斗争此起彼伏，革命活动范围扩大到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这一时期，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马先民等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武装围攻县城和渭北灾民自救军的斗争虽然先后受挫，

但黄子文、唐玉怀等一批领导人经历了锻炼，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31 年 5 月至 1932 年 11 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发展阶段，根据地的党军政团群组织和革命斗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中共武字区委、武装赤卫队、渭北游击队、渭北革命委员会、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共青团渭北特委等党军政团群组织相继成立，持续发展壮大，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在根据地的党军政团群领导集体中，当地共产党员黄子文、黄子祥、唐玉怀、孙平章、习仲勋、马志舟、孙海章、胡德润、孙铭章、侯守愚、赵应奎、王瑞琪等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或重要职务，他们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与国民党地方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艰难曲折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严峻考验，为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组织领导和保障作用。

1932 年 11 月至 1933 年 8 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发展和红四团转战照金时期。由于根据地接连遭到反动当局驻军、民团及地主武装的进攻和“围剿”，根据地的斗争转入低潮和恢复重建阶段。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杜衡、李杰夫、贾拓夫、汪锋、曾楚川、李冲霄、程建文以及赵伯平、张秀山、金天华、李平等省委主要领导或省委常委、委员、特派员、巡视员来渭北根据地指导工作，或担任领导职务，直接领导根据地的创建。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北特委及根据地的党团、武装组织的领导集体进行了频繁的更迭调整。从 1932 年 6 月到 1933 年 1 月的半年内，省委军委

书记李杰夫和三原中心县委先后对武字区委主要领导人做了四次调整，孙海章、孙铭章、赵应奎、马志舟相继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任职时间最短的仅 1 个月左右。从 1932 年 10 月上旬到 12 月中旬，两个月时间，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北特委调整改组了三次，李杰夫、李冲霄、金理科先后被任命为特委书记，后又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任书记。1933 年，省委又多次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1 月 16 日增补汪锋为副书记；3 月 29 日任命刘映胜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 月上旬任命赵伯平为书记。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三原中心县委对渭北游击队及其总指挥部、团三原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亦多次进行了调整改组。

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对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和革命武装组织领导人的必要调整改组，加强了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对根据地党团、武装等组织领导人的频繁调整，导致在根据地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统一稳固的领导集体，虽然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一批优秀革命干部，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次，由于外来干部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有的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甚或执行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之间不时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论，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影响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和革命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再次，省派干部在根据地处于领导地位，一些当地干部被边缘化，即使个别省派干部持“左”倾意见，当地干部也只能唯命是从，难以对革命活动进行有效的领导和控制。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

“在复杂、艰苦、激烈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这就要求：首先，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其次，政策要正确。”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在创建和发展中接连受挫，除客观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外，缺乏一个坚强有力、团结稳固的领导集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和形成一个坚强、稳固、正确、可靠的领导集体，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和保障。

五、 革命根据地必须争取外部力量的广泛支持

从 1928 年 2 月 22 日黄子文在武字区成立农民游击队，到 1933 年 7 月下旬成立红四团，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在长期而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渭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很少有外部军事力量的参与和支持，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独立作战，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组织，完全是在武字区各村建立赤卫队和武装赤卫队的基础上，白手起家逐步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武装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在四面受敌、白色恐怖肆虐、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下，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更需外部武装力量的配合和支持。渭北根据地在开展武装斗争中，主动争取和联系外部武装力量参与配合支持的对敌作战仅有不多的几次。

1928 年 5 月初，黄子文发动武装围城时，主动联系了富平地方武装胡景铨部、泾阳地方武装马仙舟部参与支持这次武装斗争。1930 年 6 月中旬，黄子文、陈云樵等组建渭北灾民自救军时，主动联系了三原陂西镇王德修部、高陵王学道部及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临时参与其中，壮大了武装力量。1933 年 1 月上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同时，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作为陕甘革命的回旋余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红二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革命武装曾先后来到武字区、心字区，并配合渭北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攻打国民党驻军和反动民团，但停留时间短暂，南北之间未形成长期有效的联合互动作战机制。

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依靠外部军事武装的参与配合和支持，是开展革命斗争、打击强大之敌不可或缺的有效方式和军事战略。1933 年 7 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苏区处于严重危急之际，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三支革命力量及时汇聚照金，使照金苏区扭转了危急局面。从 1935 年 2 月到 8 月底，陕甘和陕北两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历大小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和对陕甘边的第六次“围剿”，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相互支援，紧密合作结出的硕果，特别是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游击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武装力量，还取决于与外部军事力量的联合互动。

渭北根据地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根据地在开展对敌斗争中，缺乏主力红军的有效配合参与，主动寻求和争取陕甘、陕南、西安、渭华及三原、富平周边各县人力物力的帮助和支持不足，与陕西各地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形成统一的联合作战格局，这是渭北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教训。因此，在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对外关系中，与主力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之间的同盟联合互动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九章　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加快老区建设

第一节　渭北革命精神的内涵

革命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凝聚和锤炼出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精神体系。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始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革命的前沿。在陕西，从最早响应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党团组织在渭北地区的率先建立，从大革命失败后与白色恐怖的顽强斗争到土地革命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的率先开辟，从抗日战争时期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到解放战争时期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殊死斗争，以三原、富平、泾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了艰难曲折、英勇悲壮的革命历程，铸就和形成了以“忠诚于党、全心为民，坚守信念、敢闯新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渭北革命精神。

这一独具地域特色的革命精神，起源于辛亥革命后期，孕育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发展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贯穿于渭北人民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渭北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渭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生动写照，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

渭北革命精神的形成，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源于以三原为代表的渭北地区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态和革命传统，源于习仲勋、刘志丹、汪锋、贾拓夫、赵伯平、黄子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渭北地区的革命实践，是苏区精神在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化、形象化、地域化的集中体现，它承载着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一、 忠诚于党、 全心为民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根基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劳苦人民的根本利益，汪锋、赵伯平、黄子文、黄子祥、习仲勋、马先民、孙平章等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舍生忘死，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交给了革命事业。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黄子文曾对三原地下党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对党永不变心。"① 这铮铮誓言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从参加革命到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黄子文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

1928 年 3 月，习仲勋在省立三师开展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与反动当局坚持斗争，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

① 习仲勋：《回忆黄子文》；1984 年 4 月访问习仲勋同志时的谈话。

党。出狱后，他自觉服从中共武字区委的安排，积极投身筹赈运动，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受中共武字区委的指派，习仲勋不畏艰险赴长武开展兵运工作。失败后，他没有消沉，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强决心，积极投身于创建渭北根据地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面对白色恐怖，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在县城以卖水为名掩护身份，汪锋、赵伯平等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长期隐姓埋名，矢志不移地开展革命活动，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紧跟党走、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源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这种革命斗志如团团烈火，在渭北根据地从来没有被枪炮、屠刀所扑灭。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为了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在渭北农村连年灾荒、浮尸遍野、十室九空、官逼税捐、土豪强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形势下，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等共产党员发动数万人举行“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分浮财，开展筹赈运动，组织灾民自救，抗击地主武装，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共产党人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反剥削、反压迫，为贫苦群众争自由、争解放、求翻身的生动体现。

在筹赈期间，黄子文带头向困难群众捐粮，并亲自派人把筹集的粮食送到了困难外来户群众家里，令群众极为感动。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洞悉农情民意，组织渭北各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急农

民之所急，忧农民之所忧，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劳苦农民参加抗粮、抗租、抗税斗争。根据地的共产党人视群众利益为生命，帮助贫苦农民渡过了难关，满足了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委会在武字区各村堡还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从根本上实现了群众的经济利益。

正是有这样一批忠诚于党、全心为民、不怕艰险、不怕牺牲，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共产党人，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才获得了最为强大的力量源泉。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态度，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为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坚定气概，铸就了渭北革命精神中最为稳固的根基。

二、 坚守信念、 敢闯新路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核心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经受考验的精神支柱。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笼罩渭北大地，革命斗争充满生死考验。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始终是激励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的不竭动力，它贯穿了渭北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在开辟渭北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中，为了追寻崇高的理想、光明的愿景，以三原、富平、泾阳、耀县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奋勇斗争，义无反顾。无论是面对敌人的屠刀，还是纷飞的战火，无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多么艰苦，以汪锋、赵伯平、黄子文、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都没有被艰难险阻所吓倒，没有被敌人的反复残酷“围剿”所吓倒，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

在动员群众贯彻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搞农运、打土豪、斗劣绅时，黄子文自信地激励大家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① 在组织筹赈会期间，黄子文被敌人逮捕经多方营救获释后，他回到武字区说：“只要我不死，革命就要革到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畏难、不怕死，为革命拼命到底的坚定决心。在四面受困、敌强我弱、缺乏主力红军支撑，国民党反动当局接连不断进行“围剿”的极度困难形势下，渭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五年多，根据地的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多年不倒，直到解放，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在渭北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马先民、孙平章、侯守愚、王曲贤、顾先臣、安大元、宋士斌、姚万忠等许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在狱中，他们大义凛然，铁骨铮铮，志坚如钢，不惧酷刑，抗拒诱降，先后都惨遭敌人杀害，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是源于抱定了为革命胜利而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这种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正是渭北革命精神的灵魂所在、精髓所在。

渭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党组织和三原党组织领导人民大胆探索、敢于创新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陡然逆转，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潮。

---

①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陕内资图批字 2004 年 073 号),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9 页。

这一时期，在新旧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摸索前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处于探索阶段。在没有现成模式可仿，没有成功经验可循的境况下，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等共产党员从武字区当地实际出发，把开展农民运动与抗击反动政权相结合，在渭北地区率先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好转，中共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共产党人积极贯彻省委指示，以广大农村为依托，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使革命的烈火愈燃愈旺，在武字区开创了一片赤色区域，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到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等地，无意识地在西北地区史无前例的率先探索并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建立了渭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开拓性、创造性革命成果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闯新路、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这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核心。

三、 百折不挠、 无私奉献是渭北革命精神的要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也是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百折不挠、英勇奋战的过程。在烽火连天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形势多么残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渭北根据地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 1928 年 2 月到 1933 年 8 月，根据地广大军民与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当地驻军直接进行了数百次武装斗争。面对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接连不断的捕杀镇压和反复“围剿”，“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黄子文、李平（刘捷三）、金天华、李天赦、苗家祥、刘清和、马志舟、赵立魁、王瑞琪等率领渭北游击队、赤卫队英勇奋战，抗击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这片根据地。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汪锋、赵伯平、习仲勋、张秀山、金理科、杨森、黄罗斌、王柏栋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与敌周旋，历尽了艰难和挫折，经受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在敌人悬赏通缉、家产被烧、亲人牺牲的情况下，不屈不挠，愈挫愈坚，顽强地开展游击斗争。黄子文的一生只有短短的 39 年，他多次被敌人逮捕关押，被“左”倾路线执行者迫害，但他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从未衰退过，手中的武器从未放下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1933 年 8 月至 1936 年 12 月，因叛徒出卖，赵伯平被捕入狱。在狱中，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多次使用各种伎俩威逼刑讯，以判处死刑进行恐吓，他镇定自若，毫不屈服。后来敌人判他有期徒刑 10 年，他一笑置之，轻蔑地说：“判我 10 年，看你们岂能统治 10 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共产党员岳强明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036 页。

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在强敌重兵“围剿”之下严重受挫，但根据地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斗争的火焰却始终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全国解放。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没有广大军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没有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得到长期巩固。因此，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和革命意志是渭北革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精髓。

渭北根据地的斗争史也是根据地人民的奉献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渭北游击队员经常吃住在群众家里，敌人常来“围剿”，群众设法进行保护；游击队员没有衣服，群众就及时给做、给送。白天游击队员和群众一样在田地里劳动，晚上则集合起来打土豪、分粮食、除恶霸。广大群众不仅为游击队员洗衣、做鞋、带路、放哨、护理伤员，而且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报名参加渭北游击队、武装赤卫队及陕甘游击队的动人情景。为了筹措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黄子文、黄子祥带头变卖了家里的土地，几乎把全部家产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为了支持革命，很多群众变卖家畜，捐钱捐物，倾其所有。游击队听党指挥、不畏艰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无私奉献，筑起了一道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在渭北根据地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3 年 8 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 6 个团的兵力对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的重兵“围剿”中，四五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赤色群众先后遭敌逮捕，60 多人被敌杀害，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渭北苏区，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种无私奉

献，才铸就和形成了渭北革命精神。

四、 顾全大局、 团结奋斗是渭北革命精神的特质

渭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从开始的武字区、心字区扩大到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的交界地域和高陵、蒲城、白水县的部分地域，其生存和发展之源就在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顾全大局、携手并肩、同仇敌忾、团结奋战，在根据地内外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合力。这既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渭北革命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质。

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全局观念。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独断专行、急躁冒进、无端指责，甚至遭受诬陷排挤，面对各种不同意见和分歧，面对诸多的争论和误会，他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不动摇，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革命大局为重，正确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时时处处维护了党政军群的团结。

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根据地的领导人黄子文、黄子祥、孙海章等历遭挫折和坎坷，他们都曾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错误撤职、开除，都曾被组织和同志误会过，但他们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革命意志从未动摇，一如既往地战斗在革命第一线，在思想政治上、革命行动上表现出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宽广胸怀，表现出了他们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根据地的团结统一的坚定性。这种“只知有党，不为其身”的高贵品格，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无私无畏、维护团结、齐心协

力干革命的崇高精神风范。

团结互助、协同作战是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南北呼应，紧密相连，两个苏区在游击队和红军的建立及发展上，在军政领导人的调任交流上，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团结合作、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关系。渭北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互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回旋地，陕甘游击队——红二团几次转战渭北革命根据地建党、建政，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之初，渭北游击队及时前往照金地区配合红二团作战，开辟照金新苏区。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遭敌“围剿”的危难之际，渭北游击队旋即升编为红四团，加入了红二十六军序列，并迅速与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照金会合，共同反击“围剿”之敌，扭转了照金苏区的危急局面，增进了革命队伍间的团结和友谊。红二十六军既是创建照金苏区的主力红军，也是支持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后来，汪锋、黄子文、金理科、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金天华、黄罗斌、王柏栋等渭北根据地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又被派往照金苏区，成为照金苏区和陕甘边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

正是这种战略上的互为依托，团结合作，协同作战，推动了渭北根据地和照金苏区的游击战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促进了两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①

在艰难曲折的渭北革命斗争中，广大军民无私无畏、顾全大局的革命境界，同仇敌忾、团结奋战的革命气节，正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实现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力量之源，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是渭北革命精神内在特质的集中体现。

第二节　渭北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渭北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苏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锤炼出来的一种原创性精神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延续和新的升华，它凝结着渭北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独特贡献，是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

一、 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渭北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座时代丰碑，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269 页。

革命的红色基因，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渭北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概念和基本思想，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提出的。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 并首次提出了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提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完全符合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开辟这一根据地的过程中，没有现成模式可仿，没有成功经验可循，渭北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出路中坚持从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的当地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渭北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把发动农民运动与建立和发展地方革命武装相结合，坚持把开展游击战争与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立足点"相结合，坚持把扩大游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11—11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16 页。

队，建立正式红军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结合，使革命斗争得到了不断深入、持续发展，实现了根据地的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一开拓性革命成果的取得，正是渭北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结果。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历程是党的思想路线最本质的体现。

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更要大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闯新路的精神，并以更加形象、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示出来，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接受崇高革命精神的洗礼中突破思想的禁锢、实现思想的解放，以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观念和全新的思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努力开创更加幸福和谐美好的明天。

（二）渭北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理想与信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表达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牺牲精神，也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支持、参与党的事业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智慧。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色，是党的精神力量所在，永远不会过时。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时期，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时期。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近 6 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史可轩、刘志丹、贾拓夫、汪锋、赵伯平、习仲勋、王世

泰、张秀山、杨森、王泰吉、黄罗斌等革命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他们坚守信念、忠诚于党、全心为民、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百折不挠、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优秀的政治品格、高尚的道德情操、昂扬的革命斗志。

这些精神风范和优良作风，是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铸就的，是在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担当中呈现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奋斗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①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②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③。渭北革命精神中蕴含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都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渭北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着追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辉煌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历史，就是带领人民艰苦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渭北苏区共产党人展现的革命精神必然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①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②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时的讲话。
③ 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同志视察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时的讲话。

需求。

当年，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开展“三分五抗”，打击豪绅地主，开展筹赈救灾，实行土地革命，为反剥削、反压迫，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与人民群众打成了一片，融为了一体，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受到了渭北苏区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历史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根本，也是渭北革命精神的法宝。

渭北革命精神所蕴含的“全心为民”的价值追求和实际行动，正是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正是渭北苏区共产党人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献身人民，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真实写照，正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深刻反映。渭北革命精神彰显出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不仅充分体现了渭北苏区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执着追求，而且为当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正确导向。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只有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赋予渭北革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同样始终是引领渭北地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携手共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力量源泉。

二、 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鲜活教材

渭北革命精神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彰显了渭北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其精神特质历久弥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召力，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

（一）渭北革命精神为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进补精神之钙提供了生动本源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血雨腥风，赵伯平、黄子文、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而不气馁，历经反“围剿”斗争的严重挫折而不灰心，历经牢狱之苦、生死之忧而不屈服，就是因为革命者有坚定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信仰和理想是渭北革命精神的精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①

今天，面对世界风云变幻，面对改革发展的诸多难题，渭北革命精神为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精神家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危机风浪

① 2012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面前无所畏惧，在利益矛盾面前坚定立场，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更好地为党担责、为人民负责、为事业尽责，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鲜活教材。

（二）渭北革命精神为共产党人锤炼务实作风、恪守为政之本提供了不竭动力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是共产党人的慷慨悲歌，这是党的领袖对革命先烈真挚而深沉的怀念和继往开来的豪迈誓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寄托着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的理想和夙愿。继承渭北苏区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的遗志，大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切实改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加快推进渭北革命老区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也是神圣的使命、历史的担当。

渭北革命精神蕴含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高尚情操，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渭北苏区人民培育形成的先进群体作风，更是新时期渭北地区党员干部群众要大力传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作风，更是新时期共产党员加强作风建设、永葆先进本色的内在要求和力量源泉。在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肆虐，物资极其匮乏，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没

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没有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没有百折不挠的刚毅斗志，就不可能有渭北根据地的创建、生存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渭北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同样，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需要党员干部大力传承渭北革命精神蕴含的政治本色和红色基因，让坚定信念、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争创一流成为自觉行动，让渭北革命精神成为改进思想作风、谋求发展共识、凝聚发展力量、形成发展合力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渭北革命精神为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稳固思想之元提供了力量源泉

加强党性修养，增强组织纪律性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也是渭北革命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质。革命战争年代，渭北根据地共产党人无限忠诚于党，严守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即使受到“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使被错误撤销党内外职务，依然坚持革命不动摇，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革命先辈忠诚于党、坚持原则、不为利己、维护团结的宽阔胸怀和品格魅力，是渭北革命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和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

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①

渭北革命精神所蕴含的“顾全大局，团结奋战”的意志和行动，是新时期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大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对于共产党员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性修养，坚持组织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团结统一，形成发展合力，努力开创各项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渭北革命精神既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获取精神营养，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锤炼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以坚强的作风，团结奋进，争创一流，满怀信心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宝贵资源

渭北革命精神是以贾拓夫、汪锋、赵伯平、黄子文、习仲勋、唐玉怀、金理科、孙平章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坚守的核心价值观，是早期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是新时期开展先进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渭北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弘扬渭北革命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

① 2014 年 1 月 14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渭北革命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根本内涵上是内在统一、一脉相承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渭北革命精神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和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主题，所体现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所倡导的全心为民、无私奉献等党的优良作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本质和精神内涵上，渭北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都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

大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引导和鼓励全国人民积极追求经济富强，建构政治民主，保障内外和谐，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普及和加强公民教育，重塑民众精神信仰回归，复兴文化传统。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升为全社会的信仰追求，变为凝聚民心民力，增强自豪感的动力；弘扬渭北革命精神，就是要重塑人民的价值信仰，形成价值信仰的共识与追求，引导人民重振民族的自信与自强，实现富民强县、文化强盛的目标。

渭北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鲜活的宝贵精神资源。

四、 共筑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在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渭北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渭北革命精神，蕴含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不畏艰险、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革命气节。这既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渭北苏区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富民强县、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要让渭北革命精神“世代传承”，“固根守魂”

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期，要永远铭记革命先辈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追思和学习革命先辈崇高的品格风范，准确把握渭北革命精神的主流形态和本质内涵，精确领悟激荡在渭北革命精神中的意志品格、气魄斗志和精神信念，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真正以历史先贤、革命先烈、时代先锋为镜，把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转化为实现富民强县、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二）要让渭北革命精神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渭北革命精神是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形态。结合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要让渭北革命精神充分发挥时代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其始终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撑。广大党员干部都要把渭北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勇于应对挑战、战胜困难，以优良的作风凝聚社会发展进步正能量；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奉献，矢志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要坚定必胜的信念，勇于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积极探索，开拓进取，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加快打造区域经济升级版、改革创新示范区、生态宜居幸福城，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奋斗。

（三）要赋予渭北革命精神以“改革创新”的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奏响了新时代的最强音。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改进工作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束缚，大力推进改革发展。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实现富民强县、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节　三原革命老区的开发与建设

“革命老区”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历史概念，最早是1948年2月毛泽东提出的。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摇篮，是社会主义大厦的牢固基石。革命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包括三原在内的全国各地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建设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 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的关怀和支持

（一）三原县被省委、省政府划定为革命老区

以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首次尝试，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两点一存”的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原人民为这块革命根据地开辟和创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党和国家对三原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2 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依据民政部关于认定革命根据地的标准，将三原县划定为革命老区，其区域包括原武字区和心字区，即现在的陵前镇，马额镇，新兴镇，嵯峨镇，鲁桥镇的东沟村、楼底村，西阳镇的东寨村、五联村、五泉村，徐木乡的毕家沟村等行政区。

与此同时，渭北革命根据地包括的富平县、耀县、泾阳县和淳化县的部分地区亦被划定为革命老区。

（二）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开发和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1 号）、《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发改西部〔2012〕781 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扶贫开发、转移就业、民生改善、精准扶贫、新兴产业、生态环境、资金扶持、土地保障、资源开发、人才交流等方面，对革命老区给予了大力支持。省、市各级党委、政府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促进了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革命老区的开发建设和贫困老区的脱贫发展问题。201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了《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

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64 号）。《指导意见》的印发和实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革命老区的开发建设和脱贫攻坚必将发挥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革命老区时多次满怀深情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继承和发扬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① "在革命战争年代，勤劳朴实的老区人民养育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竭尽所能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壮大革命力量、夺取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极大贡献。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加快老区发展，使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责任，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然也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必须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所以，党中央特别关心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发展。""革命老区一定能够完成脱贫致富的任务，让革命

① 2015 年 2 月 13 日，习近平同志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辈含笑九泉，让他们的革命理想得以实现。”①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有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齐心努力，有老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定能够创造老区人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建碑镌文赓续传承渭北革命烈士精神

革命先烈，浩气长存。为了缅怀先烈功勋，继承先烈遗志，1987 年 6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人民政府在三原县陵前镇（原武字区）三胜村举行“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1989 年 11 月纪念碑落成。纪念碑面东背西，基座为正方形，底边长 8 米，碑座高 1.9 米，碑高 11.3 米。纪念碑正面为习仲勋同志题字“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背面为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纪念碑一侧为汪锋同志题词“人民先烈永垂不朽”，一侧为赵伯平同志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三原陵前革命烈士陵园为陕西省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三原县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三原县中小学德育基地。

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碑文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以三原县原武字区为中心，涉耀县、富平、泾阳、高陵、淳化六县部分地区，七百六十平方公里。

---

① 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视察扶贫开发和老区建设等工作时的系列讲话。

大革命时期，这一地区就在中共三原特支领导下开展了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秋，共产党员乔国桢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陕到武字区，和共产党员唐玉怀、郭明效一起宣传组织群众，使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革命和农民运动，关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军阀土豪压榨盘剥，苛捐杂税繁重，渭北人民奋起反抗。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北人民走武装起义道路，并派三原县委农运委员黄子文到武字区，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组织渭北人民交农围城，抗粮抗款，打土豪，杀恶差，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间，省委多次派重要干部到渭北，先后建立灾民自救军、渭北游击队、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人民坚持武装斗争，进行政权建设，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全面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对渭北根据地轮番“围剿”，根据地人民和革命武装不畏强敌，披艰历险，英勇善战，对敌人“围剿”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威震西北。一九三三年七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由团长黄子祥指挥，在三原县老户沟全歼富平淡村民团。八月，敌再集“渭北剿共司令部”三个团、两县民团和附近驻军进行“围剿”，根据地领导机关被破坏，红四团北上转移照金。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滥施酷刑，大肆屠杀，惨绝人寰。

在创建渭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献出了生命。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为打开渭北革命的局面，毁家纾难；渭北游击队五支队指导员赵永华、红四团连长马志舟、排长

秦福善英勇牺牲；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长苗家祥、武宇区委书记马先民、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姚万忠和共产党员王曲贤、侯守愚等先后惨遭杀害；渭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孙平章被敌人酷刑后枪杀，壮烈就义。

渭北根据地为发展革命武装和创建新的根据地，锻炼了干部，提供了经验。共产党人的壮烈情怀和英雄业绩，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奋斗。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而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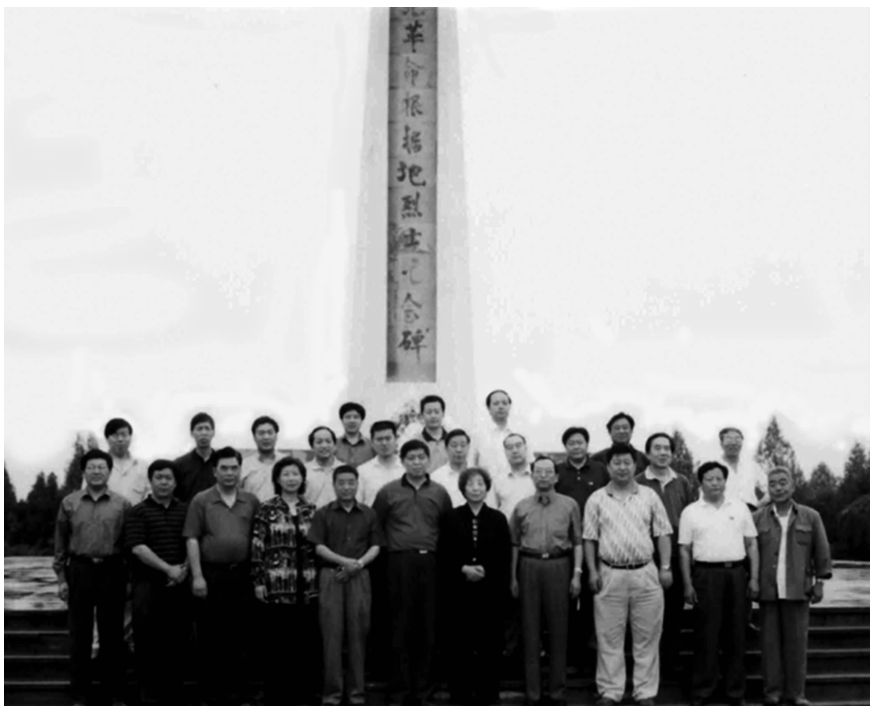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
陕西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四）亲切的关怀与巨大的鼓舞

1．心系三原，情牵革命老战友

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与三原武宇区人民及并肩战斗的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的革命情谊历久弥深，相沿不辍。

1958 年 9 月，习仲勋在陕西视察调研工作期间，专程到三原陵前镇（原武宇区）黄子祥家看望分别多年的黄子祥及黄子文夫人李盛云。久别重逢，三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百感交集的泪水打



2000 年 6 月 26 日，齐心、栗战书等同志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纪念碑前

湿了他们的衣襟。1962 年 9 月，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被下放河南劳动。1964 年，黄子祥也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回到家乡，参加劳动。这一时期，他们仍然互捎书信，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经常遭受批斗的黄子祥还常常将他写的诗托人捎给习仲勋，深得习仲勋的赞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子祥向在广东主政的习仲勋写了一封久别思念的信，反映三原老区的新变化。1979 年 8 月 7 日，习仲勋看信后亲笔给黄子祥写了一封情谊真挚、感人肺腑的回信："府上一别，二十余载，怀念故人，无时神驰……回忆往事，使人久久不能平静……"1982 年 3 月 4 日，习仲勋和王任重获悉黄子祥病逝，十分悲痛，专门发来唁电，并委托陕西省政协送来花圈，表达他们的哀思和深切怀念。

1995 年 7 月 1 日前夕，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和陵前镇党委给孙海章盖了四间大瓦房，解决了孙海章的住房困难。1997 年 4 月 14 日，习仲勋在给孙海章胞弟孙志正的信中说："来信知悉孙海章同志党籍已经恢复，生活待遇和住房问题也得到解决，十分高兴。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祝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合家幸福!"

1997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三原县委召开黄子文烈士牺牲 50 周年纪念座谈会，习仲勋得悉后专门发来电报，高度评价黄子文的革命精神，表达了对努力建设新家乡的良好祝愿。1998 年春，习仲勋特意委托夫人齐心千里迢迢来到三原陵前镇专程看望 88 岁高龄的黄子文夫人李盛云。2000 年 6 月下旬，习仲勋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思念之情，委托夫人齐心回到三原县看望健在的老人，与当地群众倾心交谈，回忆那段峥嵘岁月。习仲勋还特意嘱托夫人齐心去看看他早年

曾经就读的省立三师（现为三原县幼儿园）旧址，并向学校捐款、题词，表达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习仲勋在他的一生中，一直牵挂着三原人民。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北京多次接见咸阳市和三原县的党史工作者，并深情地说："我在三原上学，在三原参加革命，三原人民群众对我很好，我感激三原人民，我永远难忘。"

2．情系三原，躬行至亲显真爱

在革命老区三原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贾拓夫、汪锋、赵伯平、习仲勋、王世泰、陈元方、李屹阳、黄罗斌、张凤岐、谈国帆、张中涛等诸多老一辈革命家战斗的足迹。当年，他们与三原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浴血奋战、共克时艰。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依然情系老区人民，情系三原发展，躬行践履，止于至善。

贾拓夫在渭北巡视工作期间，经常住在武字区慕天祥家，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贾拓夫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曾调慕天祥赴京工作，后又将其安排回地方工作。

1958 年，赵伯平主政陕西时，多次到三原、泾阳视察指导农业发展、水土流失防治等工作，后还批转了他视察三原等地的调查报告，着重解决了制订小流域治理规划和落实农业技术措施等问题。

1987 年，在黄子文牺牲 40 周年时，赵伯平、李屹阳、陈云樵、张中涛、张凤岐、习浩胜等专门赋诗、撰文，表达对老战友的不尽思念。

20 世纪 80 年代，时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屹阳为家乡陵前镇卸坊村小学捐款 500 元，支持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王世泰、

黄罗斌曾先后专程赴陵前镇看望黄子文夫人李盛云，并带着难以释怀的心情察看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遗址遗迹。

1980 年，原渭北游击队第四支队队长、时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的刘光远特意为三原洪水公社争取了一个购车指标，解决了当地干部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1984 年，黄罗斌任甘肃省顾委主任期间，专门撰写了渭北根据地相关资料，追忆当年的烽火岁月，并寄往三原县委党史办公室。



王世泰（右一）在陵前镇（原武字区）看望李盛云（中）时合影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间，习仲勋不仅从情感上魂牵梦绕着老区人民，而且帮助三原老区人民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和问题，深受三原老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战乱年代，黄子文的儿子黄北平多年失散，家人长期苦寻未果。1950 年，习仲勋依托组织在新疆找到了黄北平，并安排李盛云搭乘顺路军车赴兰州接回了多年失散的儿子，黄家惊喜之余对习仲勋的关爱和帮助格外感激。

在一些小事情上，习仲勋同样给老区人民以极大的关怀和帮助。新中国建立后，照金村民集资在河南购买了两辆胶轮马车却被

当地以投机倒把名义扣留。淳朴的照金人民思来想去便让曾任三原陵前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刘友民去找习仲勋。习仲勋见到刘友民得知情况后，当即给河南省委办公厅写信，帮助老区人民要回了马车。

1979 年，陵前公社（原武字区）迎来了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粮食大丰收。公社党委派遣兰子敬携信赴广东，向习仲勋汇报夏粮丰收的喜讯和老区人民的问候，并反映运输车辆十分紧缺的实际困难。当时汽车属国家统一分配，货源供不应求。为了支援老区建设，1979 年 8 月 7 日，习仲勋给陵前公社党委全体成员及党委书记张正写了回信，并将当地生产的南粤牌卡车调剂了两辆，一应急需，后又给三原县水利局调剂了一辆小面包车。后来，习仲勋还协调陕西省政府帮助三原修建新龙桥，解决群众在县城的南北通行难问题。

1986 年秋，习仲勋邀请李盛云去北京观光，他问得最多的话题是武字区和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称赞黄家“满门忠烈”。习仲勋与孙海章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土地革命时期的战友。1984 年 4 月，习仲勋邀孙海章去北京，当得知孙海章的组织关系自 1932 年 8 月被错误开除至今未得到恢复时，习仲勋随即写了证明材料，并亲自邮寄到三原县委。1987 年 3 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孙海章的党籍终于得到恢复。1997 年 12 月，孙海章去世，习仲勋送来花圈和挽联，“江山存肝胆，凋落一布衣”。

习仲勋非常敬重于右任先生的爱国风范。1986 年春，三原县领导金光旭和史凌云（史可轩烈士女儿）赴京联系举办于右任书法真迹展事宜。其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百忙中高兴地接见了他们。



习仲勋在北京参观于右任书法展

1986 年 5 月 10 日，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的于右任书法真迹展览开幕式剪彩，并挥毫签名。三原于右任纪念馆建成之初，时任陕西省政协主席的吕剑人请习仲勋为纪念馆题词，从不喜欢为地方题词的习仲勋这次破例为三原于右任纪念馆题词：“爱国风范，民族气节，诗书大师，神州永志”。

3. 政系三原，策为老区促发展

长期以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省、市各级领导，各个层面，都对三原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1995 年 1 月 21 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亲临三原县大程镇，视察指导乡镇企业发展和东周村建设工作。5 月中下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先后莅临三原视察。1998 年 2 月 13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来到三原调研农业农村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农业灌溉难、群众生活饮水难等问题。

2004 年 5 月，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先后来三原视察调研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工作。2007 年 4 月 28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亲临三原调研指导农业生产工作。

从 1998 年到 2016 年间，程安东、李建国 、赵乐际、袁纯清、陈德铭、岳亮、卫华等各级领导多次来三原指导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民生改善、扶贫开发、移民搬迁等重点工作，看望困难群众，现场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下，三原县新龙桥建设、“引清入城”供水工程、移民搬迁工程、农村饮水工程、通村公路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临履 2 号大桥建设、三原县医院急救中心建设工程等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实事项目得到顺利实施。

各级的支持，社会的关爱，发展的成果，使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加满怀信心、奋发有为地创造美好生活，建设幸福家园。

二、 三原革命老区的建设成就

三原县历史悠久，人文蔚盛。早在史前时期古人类就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耕耘。秦汉以来，三原长期为京畿之地。千百年沧桑岁月的浮沉嬗变，革命烽火岁月的激荡和历练，铸就了三原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坚强品性。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老区三原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积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全力加快发展步伐，全县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迁。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农业高效稳步发展，先后被评为“全国粮食流通示范县”、“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点”、“国家级蔬菜生产基地县”、“省级设施蔬菜示范县”和“时令水果基地县”等。建成西郊、正大、金源山庄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馨盛、天齐等12个市级农业园区。工业聚集优势显现，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28户，连续五次荣获“全国食品工业强县”称号；2015年6月28日，三原被确立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规划面积20.78平方公里。小磨香油产业园、清河食品工业园、大程食品机械配套工业园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县域工业园。一批新商业模式和特色街区已经形成，“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实现全覆盖，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被命名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三产服务业成为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三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32:44:24调整到2015年的16.8:56.7:26.5。“十二五”末，全县生产总值达到177.63亿元，较“十五”末35.2亿元翻了两番多，人均GDP达到4.23万元；规模工业总产值达到100.7亿元，是“十五”末23.5亿元的4.3倍；农业总产值达到53.4亿元，是“十五”末17.9亿元的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6.59亿元，是“十五”末32亿元的5.2倍；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85亿元，是“十五”末0.52亿的9.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100元，是“十五”末6836元的5.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100元，是“十五”末2357元的5.1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

（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自“十一五”以来，县委、县政府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全县累计投资近100亿元，实施城乡交通、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供水应急水源建设等民生工程项目389个。改造和修建了县体育场、三原剧院、临履2号大桥、池阳大桥、南环路、池阳街西延段等30余条城市道路和一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15平方公里。陵前、大程、西阳、嵯峨等市、县级示范镇建设稳步推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镇化率达到54.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以县城为中心，以国省干线为依托，以县乡公路为骨架的公路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建设扶贫重点村65个，建成通村水泥（柏油）路1000多公里。解决了10万多亩“水中旱”和农村28.93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建成保障性住房万余套，1200多户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搬迁贫困群众3273户14033人，3.75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仅“十二五”时期，累计投入民生项目资金75.87亿元，占总支出的87.2%。发展的成果惠及了全县人民。

（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发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全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率先发展。高标准实施了中小学及学前教育标准化建设项目，城乡学校全部实现信息化，三原县先后荣获“全国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全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先进县”、“全省‘双高双普’合格县”等荣誉称号。高考质量始终在咸阳市保持领先水平，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98%，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均达到100%。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公共文体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县文化馆、图书馆分别达到国家三级馆和二级馆标准；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14个，村级文化室173个，在咸阳市率先实现了村级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和“省级文化先进县”、“陕西省传统文化示范县”、“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陕西省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陕西省农家书屋管理先进单位”等称号。

实施了县医院、中医院、精神病院、疾控中心和12所乡镇卫生院、156所标准化村级卫生室改扩建工程，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9.94%，各种社会保障实现了人群全覆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强化，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达到94.24%，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四）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自“十一五”以来，三原县绿化造林10余万亩，建成绿色家园示范村42个，森林覆盖率达到16.2%。先后实施了县城供水应急水源、污水处理和垃圾填埋、城镇公厕、农村改厕等一批重点工程，建立了城区保洁及农村生活垃圾长效机制。

“十二五”期间，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81%，县城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93.6%，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6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8.05平方米，通过了“省级园林县城”验收。投资8.3亿元，以清河湿地公园为核心的景观带建设启动实施。积极推行小流域治理、经济林建设、休闲旅游开发“三位一体”综合治理新模式，鲁桥东沟小流域治理被评为国家级水保科技示范园。实施环境治理投资项目89个，四十里塬坡绿色长廊建设取得新进展，2个镇16个村被省市评为生态镇、村，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三原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结合部，北部四十里塬坡是渭北黄土高原的南缘台原沟壑区，经济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多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平稳较快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的良好态势，但工业化、产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依然较低，基础设施依然滞后，城乡发展还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仍比较突出，建设“富强、人文、和谐”新三原，让老区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需要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励精图治，不懈奋斗。

三、 三原革命老区的发展蓝图

（一）三原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三原适应新常态、培植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建设新三原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党和国家《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关（中）天（水）规划、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精准脱贫、同步小康、陕西西安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等诸多规划和意见的加快实

施，将为三原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政策利好；省委、省政府打造渭河北岸新兴城市群，加快建设关中城际铁路网和西咸北环线等，三原作为关中核心区域、大西安的北大门和副中心城市，其发展潜力将得到深度开发，成为陕西新经济增长极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三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奋斗目标

四大定位：

—— 建设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文化新重镇。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及省市共建大西安的重大机遇，充分挖掘三原县的旅游资源、人文资源和历史资源，拓展地域文化，实现三原县与“一带一路”在文化层面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 建设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副中心城市。按照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主动承接西咸国际化大都市的功能外延、产业外迁，将三原打造成为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副中心城市。

—— 建设大西安产业配套、生活供应、生态休闲与文化体验基地。依托大西安北部重要交通区位优势，发挥三原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新型医药研制、现代商贸物流四大产业优势，打造大西安产业北移三原配套基地；做大做强“粮、菜、果、畜”四大优势产业，建设大西安的生活供应基地；构建大物流、大商贸、大旅游、大文化的服务业新格局，打造大西安生态休闲文化体验基地。

—— 建设渭河北岸新兴城市经济增长极。以富（平）阎（良）高（陵）三（原）经济框架一体化、建设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契机，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为导向，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提升综合效能，推动创新创意和资本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承接和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

发展目标：

按照四大定位，突出发展壮大“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研制、现代商贸物流、特色文化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产城融合、园区聚集、商贸活县、民生优先、文教强县、绿色发展”六大工程。“十三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20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到15:55:30，经济总量达到285亿~300亿元，人均GDP达到66300~70000元，超过陕西小康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000元，年均增长1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300元，年均增长12%以上，力争跨入陕西经济“十强县”，争取实现“撤县设市”，如期建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富裕、生态美好、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三原。到2025年，实现“再造一个新三原”，使县域综合实力更加雄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社会保障更加有力。

（三）三原发展的总体布局

优化发展空间布局，总体实施“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向南联合拓展，主动融入西安优势资源的辐射范围，实现与西安大都市各种市场要素的无缝对接；向北优化布局，将空间开发与生态环

境保护融为一体；向东主动融入，与渭南、阎良、富平等市区县对接资源，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向西与咸阳市各县共同联合谋发展，积极推进三原城市与西咸新区的一体化发展，形成西咸国际化大都市的副中心城市，构建核心区聚集、圈层辐射带动、产业同构互补、带状组团发展、点面生态隔离结合、高新区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新格局。

（四）三原发展的工作重点

1. 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特色产业新体系

打造现代特色农业基地。以“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和创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为抓手，以打造西咸国际化大都市生活服务基地为重点，以互联网模式推进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粮食高产创建，加快发展现代种业，重点推进延西高速现代农业产业带和“优质粮食生产基地、绿色蔬菜基地、优质苹果基地、木本油生产基地、畜牧业规模养殖基地”五大特色基地建设，形成集约发展、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业集约化特色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打造工业产业集群。以省级·三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为承载，培育绿色食品加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电力电子产业、航空配套产业、特色传统食品产业、科技生态产业承载地，打造工业升级版，改造传统产业创新区。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相融合，深化物联网、互联网在装备制造、食品制造等领域的应用，再造传统产业新优势。

打造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实施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市场建设、内外贸协调、电子商务示范、特色旅游餐饮开发五大工程，改造提升商贸、住宿、餐饮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全方位承接西安产业外迁和物流枢纽北移、东南沿海地区企业西进和国外物流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布局，实现物流布局节点网络连通。规划建设农产品、工业品两大类物流园区，构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交易为主体，由核心物流园区、龙头物流企业组成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仓储运输、物流配送、生产加工、商贸交易、综合服务、信息处理”六位一体的大西安国际物流集散中心、制造生产配套基地。

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唱响“书法之乡、右任故里”，加大宣传力度，打好名人、名景、名吃三张牌。拓展升级城隍庙旅游景区，推进清河湿地公园、三原老街、清河北岸文化长廊、宏道书院、北城老街、龙桥古镇、西社村仿古文化一条街等项目建设。挖掘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休闲旅游产业，推进嵯峨山森林公园、唐献陵旅游开发、清凉寺、柏社古村生土民居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开发红色旅游遗存，改扩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将民俗风情、传统文化和特色小吃相结合，打响“吃在三原”品牌。创新营销模式，推进“互联网＋”与旅游业衔接。

2．坚持统筹协调，构建城乡发展新体系

按照建设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副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大力实施“旧城改造扩容、服务功能完善、特色街区建设、城市形象提升”四大工程，提高城市品位和容纳人口强度。积极打造陵前、大程国家级重点镇、西阳、嵯峨等省级重点镇，加强道路、电力、供水、

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建制镇功能，提高人口集聚能力。

因地制宜建设“特色风貌、长期保留、单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共建共享。构建城乡统一市场，共享城乡公共服务，使城乡建设水平在全省的位置显著提升，努力把三原建成陕西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县。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把各类扶贫资源优先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解决贫困地区饮水安全、水利、交通、医疗、卫生、文化、电力、农业等基础设施问题。开展“双包双实现”精准脱贫攻坚行动，对所有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重点改善旱腰带地区发展环境，提升旱腰带地区整体发展能力。以产业化扶贫为突破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稳定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贫困地区畜菜果等主导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份额达到85%以上。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力度，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能力、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

3. 繁荣社会事业，构建公共服务新体系

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推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内涵特色发展。实施第二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高中质量提升和特色建设工程，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巩固提升“陕西省教育强县”建设水平，向“全国教育名县”迈进。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公共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文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的公共文化事业服务体系。

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高县镇医疗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加大城乡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基本公共卫生及新农合投入补贴力度，确保群众最大受益。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将政府新增财力的 80% 用于民生事业，全面加强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群众需求。

4. 推动生态文明，构建绿色生态新体系

打造生态景观廊和滨水绿廊，实施清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四十里塬坡综合治理项目、荒坡沟生态治理项目、清峪河人工湿地建设、“三北”五期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争创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强化环境治理，开展“治污降霾·保卫蓝天碧水”行动，实施三原县东区、南区、西区排水工程，建成一批省、市级生态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美丽三原”建设，努力为全县人民创建一个洁净、舒心的生活环境。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共进社和〈共进〉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前后和抗战初期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组织及其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渭北工委与渭北游击总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支益民、刘揆楚主编：《中共陕西省组织发展沿革概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咸阳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咸阳市组织史资料》（1925.12 ~ 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中共铜川市委组织部、中共铜川市委党史研究室、铜川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铜川市组织史资料》（1927.5 ~ 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三原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1925.12 ~ 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中共富平县委组织部、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富平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平县组织史资料》（1926.5 ~ 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中共耀县县委组织部、中共耀县县委党史研究室、耀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耀县组织史资料》（1928. 冬～1987. 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中共临潼县委组织部、中共临潼县委党史研究室、临潼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临潼县组织史资料》（1927. 4～1987. 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铜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中共铜川市耀州区委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三原县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原县简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中共淳化县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淳化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中共泾阳县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泾阳县简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富平历史大事记》（1919. 5～1995. 12），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李小三主编：《中共革命根据地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马栏革命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张廷贵、袁伟编：《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共青团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一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二册），三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三册），三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四册），三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五册），三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耀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黄陵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陵县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阎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阎良区志》，三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临潼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91年8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泾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富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平县志》，三秦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淳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淳化县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旬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旬邑县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陕西地方志丛书、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渭南地区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中国地方志丛书、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中国地方志丛书、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蒲城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赵伯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赵寿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峥嵘岁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李振民著：《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陈元方、史础农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

1 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杨中州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姬乃军、申辉著：《西安事变实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郭润宇著：《陕西民国战争史》（中），三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陈俊民主编：《红色烙印——陕西长武民主革命斗争史话》，三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陕西省档案局（馆）编：《陕西解放档案文献图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版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陕出批）字第 08801 号，1988 年 5 月第 1 版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陕内资图批字 2004 年 073 号，2004 年 6 月第 1 版

中共高陵县委办公室、中共高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高陵县简史》（民主革命时期），陕内资图批字 2005（AX）019 号，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后　记

渭北革命根据地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陕西省、咸阳市和三原县党史部门就开始了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相关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三原县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三原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参与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近年来，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红色革命史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2015 年 6 月，中共三原县委、县政府将编撰《渭北革命根据地史》列为重点课题，纳入了编写计划，特邀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继担任主编，并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组。该课题由三原县档案局牵头负责，党史、档案、县志部门共同参与，起草了编写大纲。王继教授对编写大纲做了全面修订，重新制定了较为详尽的编写提纲，确定了全书的指导思想与逻辑框架。三原县委常委会先后两次对本书的编撰工作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编辑组同志先后赴陕西省档案局、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咸阳市档案局及富平、泾阳、高陵、耀县等地史志档案部门广泛征集资料，征询宝贵意见，为编撰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提高编写质量，撰写初稿之前，主编王继教授对参与编写的人员进行了规范的专业培训，系统讲解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史，深入论证了渭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还对编写中应该注意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提出了具体要求。

2016 年 3 月底，编辑组完成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史》初稿的撰写工作，共有九章三十三节，另有绪论一篇。其中，徐建刚撰写了绪论和第八章、第九章，刘磊编写了第六章、第七章，乔怡红编写了第二章、第三章，李永斌、乔怡红编写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常敬之编写了第一章。王继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并对相关内容做了全面细致修订。2016 年 4 至 6 月间，编辑组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反复讨论，从结构、内容、文字等方面先后进行了五次全面修改、调整和完善，并增加了部分注释。第三稿完成后，王继教授再次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审阅，进一步订正了部分史实。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参考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系列党史资料丛书，同时吸收了党史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档案馆，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咸阳市档案局以及兄弟县区党史、档案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我们邀请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姚文琦研究员担任本书特邀审稿，他系统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完善意见；还有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方

世信、秘书科原科长任义长等老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提供了相关史料。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凌尚文同志修正了相关内容。白秋林同志为本书制做了相关地图，三原县政协委员陈勋提供了有关照片。三原县档案局副局长雒莉搜集、整理了相关史料，蔺灵芝、盛晓英同志参与了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马晓庆同志为编写工作提供了诸多服务。在此，我们谨向关心、关注、支持和参与本书编纂工作的部门（单位）及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表示衷心谢忱。

渭北革命根据地时间跨度长，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地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有关决议、文件为准绳，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其中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请党史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渭北革命根据地史》编辑组

2016 年 6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渭北革命根据地史/ 王继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编.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24-11925-1

Ⅰ. ①渭… Ⅱ. ①王… ②中…Ⅲ. ①革命根据地-革命史-陕北地区 Ⅳ. ①K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4440号

出 品 人：惠西平
总 策 划：宋亚萍
责任编辑：刘景巍 王亚嘉
整体设计：周国宁

渭北革命根据地史

编　　者　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
　　王　继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35.75印张
字　　数　385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925-1
定　　价　79.00元